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列宁选集 (3)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说 明

本卷选载列宁 1917 年 3 月至 1919 年 5 月即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以及反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前半期的文献，共 63 篇。

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遭失败，力量消耗殆尽，经济濒于崩溃。战争重负下的俄国人民遭受愈来愈大的苦难，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沙皇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企图同德国单独媾和，在国内建立军事专制制度，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镇压。俄国资产阶级既不满意沙皇政府的腐朽无能，又不愿看到君主制的覆灭，打算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更换沙皇，迫使他让步，和他分掌政权。资产阶级同沙皇专制的矛盾加剧了俄国的政治危机，有利于工农民主革命运动。沙皇政府完全陷于孤立，革命形势日益成熟。1917 年初开始的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发展为强大的示威游行，最终转变为人民的武装起义。2 月 27 日（俄历），革命在首都取得胜利，并迅速向全国扩展，在俄国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沙皇专制制度土崩瓦解。

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这场革命斗争，但由于党的许多领导者被监禁或流放，大批先进工人被送上前线，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足够力量把自发的革命洪流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二月革命后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前者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后者是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农政权。但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支持临时政府，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处于少数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使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成了列宁深深思考的大事。

本卷开头所载《远方来信》（第一封信）是列宁在国外获悉二月革命的最初消息后所写的评述这场革命的五封系列信件之一。在这封信中，列宁对二月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原因、革命第一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作了深刻的分析。

1917 年 4 月 4 日（俄历），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的第二天，在自己的报告中宣读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即本卷所载《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这个纲领性文献阐述了从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过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待战争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的途径等等问题。二月革命后，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列宁认为，下一步则应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四月提纲》发表后遭到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内对提纲也有异议。为此，列宁写《论策略书》，批驳所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等说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而不是死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按照旧的方式，先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然后才可能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实际生活中，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时出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的现实生活中的确切事实。在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列宁进一步全面阐

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这一小册子的内容实际成了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有关决议的基础。

《论两个政权》一文分析了两个政权并存这一特殊政治局面，论证了结束这种局面所应采取的方针。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他提出建立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他在1917年6月上旬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发言，抨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为了摆脱政治危机而于5月上旬改组为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所谓“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参加了联合政府。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入阁的孟什维克为联合政府辩护，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愿意单独掌握政权、为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时，列宁反驳说，布尔什维克“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见本卷第77页）。

《论口号》和《革命的教训》等文回顾二月革命以来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七月事变后的形势，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新策略。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政权完全落入临时政府之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苏维埃帮助临时政府，支持它所采取的反革命措施，已完全沦为它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失去意义。这个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而革命和平发展已不可能。列宁认为从“七月事变”中得出的经验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独立地掌握政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当时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国家问题恰恰是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搅得最乱的问题。特别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严重地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捍卫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潜心研究国家问题，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有关国家问题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国家与革命》这一名著。这一著作共分六章。在第一章中，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最基本的观点，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国家的消亡等问题。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列宁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了1847年至189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观点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摧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本阶级的专政。列宁说明，无产阶级需要专政的国家，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以便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他还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他特别引述了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所采取的措施。在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第五章中，他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学说，指出了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别。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各章中对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作了有力的批判，最后又专辟一章（第六章）揭露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径。在这一章中，他集中批判了考茨基“盲目崇拜”国家、“迷信”官僚制度，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局限于议会等错误观点。

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一著作中阐明了无产阶级要建立的國家的基本政策及其经济纲领。他详细论证了克服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办法：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这些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他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见本卷第 266 页）列宁指出，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

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驳斥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掌握政权、即使掌握了政权也无法保持的论调。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政权，而且能够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保持政权、组织新社会的建设。他在说明摧毁旧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工农政权时，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作了科学的区分。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些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外，还准备了那些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机构，如大工厂、铁路、电话、银行、邮政、辛迪加等等。在上述《国家与革命》中，他就作了这种区分。他赞赏“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一说法，认为在经济方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应该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见本卷第 154 页）在本小册子中，他又说，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他进一步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执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职能的“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见本卷第 298 页），可以把它们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些机构畸形化的东西。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载入本卷的《革命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局外人的意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1917 年 10 月 10 日（23 日）会议的《决议》、《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给中央委员的信》等文献说明，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息后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最终消失，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已成为必然。起义是一种艺术。列宁说，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靠人民的革命高潮，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列宁根据对国内形势的全面分析，认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业已成熟。

1917 年 10 月 24—25 日（11 月 6—7 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首都彼得格勒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着手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

本卷所载的列宁关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及其《总结发言》、《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其中包括列宁起草的苏维埃政权的最初一批法令。大会通过的列宁草拟的《和平法令》充分表达了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它宣布苏维埃政府完全废除一切侵略性条约，建议各交战

国人民及其政府立即就缔结普遍的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并郑重声明俄国决心本着公正的条件立即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土地法令》宣布：立刻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个法令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载入本卷的二月革命后列宁为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拟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也以阐述这一政策为内容。《土地法令》附有社会革命党人所拟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其中包含了“平分土地”的方针。关于这件事，列宁在《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一信中作了说明。

载入本卷的《工人监督条例草案》、《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等文献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最初一些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同《土地法令》一样，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它们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列宁认为，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提出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要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党人”也纳入政府。这一提法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极少数人的支持。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反驳了这一提法。发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是解散立宪会议。本卷所载《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和《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反映了这一事件。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人民早就提出的要求，二月革命以后列宁也主张召开立宪会议。但是，根据十月革命前所提候选人名单选出的立宪会议成员没有反映出十月革命胜利后阶级力量的真实对比关系，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反动分子占了多数，他们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企图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因此，立宪会议不仅过时，而且成了苏维埃政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终于被解散。

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本来要提交立宪会议讨论通过，但立宪会议拒绝加以讨论，解散立宪会议后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这个宣言。这个宣言按内容来说，具有立法性质，因而成了后来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的基础。宣言说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体制：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宣言肯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决定，宣布了建立红军的命令和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本卷所载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在提到大会宣布俄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事时说，俄国可以采用这个名称，但实际上，“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见本卷第409页）。

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攻击布尔什维克执政以来行使暴力、造成经济破坏和混乱。列宁在《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以及《预言》等文中予以驳斥。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仅仅针对剥削者与反革命分子的反抗，这不过是以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

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竞赛是吸收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极好形式。列宁说，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

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列宁认为，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中间是很多的，他们已觉醒过来，正独立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列宁非常重视工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他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见本卷第381页）他反对在实践中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他认为，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收入本卷的《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奇谈与怪论》、《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等文献反映了苏维埃政权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即向协约国各政府建议，共同与德国及其盟国进行关于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谈判，以便尽快摆脱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缔结和约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列宁认为，党内某些人提出的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是冒险主义的空话，只有利于想把苏维埃国家继续拖在战争泥潭中而加以消灭的帝国主义者；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德国则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国家，苏俄如果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作战，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列宁指出，把第一个工农政权保存下来，对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他以极大的耐心进行说服工作，他的主张在党内终于获得多数的支持，布列斯特和约得以签订。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执行革命的妥协策略的范例。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之一就是最终解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本卷收录的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说明了立即签订对德和约、争取和平喘息时机的重要意义。代表大会的另一项任务是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列宁就此项任务所作的报告，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必要性，阐明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指导思想。从这次代表大会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称俄国共产党（布）。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苏俄在1918年春天赢得了一个极其短暂的和平喘息时机，从而有可能着手经济恢复工作。《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提出，由战争转到和平后，苏俄已开始实行宏伟的社会主义改造，要使俄罗斯由既贫穷又衰弱的国家变成既强大又富饶的国家。列宁认为，俄罗斯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因为它在天然财富和人力后备方面，在伟大革命为人民的创造力提供的广阔天地方面，都具有充足的条件。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包含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面临着一个“历史转折”，党和国家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认为，首先提上日程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生产力，并力争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他提出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基础，“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见本卷第476页）。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必须执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强化管理工作。他在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意义时指出，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千百万人的工作。他号召把民主精神同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对统一意志的服从结合起来。他竭力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经验，他说：“社会主义

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见本卷第 492 页）他在论证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重要性时指出，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

列宁认为，苏俄国民经济的发展应立足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同时写的《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提出对俄国自然生产力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调查，以便尽快制定俄国工业改造和经济发展计划。本卷所载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两份文件反映出列宁不但重视自然科学，而且也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是另一篇包含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要思想的文章。本文是为论战而写的。它驳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际和国内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策略。在就国内问题同“左派”辩论时，列宁对苏俄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精辟的阐释。他深谙苏俄国情，认为苏俄当时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错综复杂的国家。他第一次指明了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的五种经济成份。他说，在多种经济成份中，“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见本卷第 521 页），它大大地高于苏俄当时的经济，它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加以控制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列宁视当时的德国为实行这种资本主义的样板：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有计划的经济组织。列宁形象地把德国和苏俄比做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体现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德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生产、社会条件；苏俄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列宁认为，苏俄既然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所需的全部条件，就应该学习德国在经营和管理资本主义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列宁由此谈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他从来反对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他说：“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见本卷第 536 页）

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继续阐述前面提到的有关苏俄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他特别说明，改造社会，改革经济，是非常艰巨的事业，必须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经过探索和实验，不断纠正“局部的错误”。他认为，任何一个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不会设想，根据某种预先作出的指示就能立即构思出和规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只有集体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作出决定性的指示。在过去的社会中，上层分子左右历史；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只能依靠共同的经验，依靠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苏俄刚刚着手进行的和平建设很快就被迫中断，1918 年春夏之交，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了。

在此时期，列宁仍未放松对经济工作的关心。他写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提出“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希望报纸搜集、审核和研究新生活建设中的各种事实，批评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在报纸上占用篇幅太多。他呼吁“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见本卷第 573 页）他写《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是为了推荐一本优秀的政治读物，这一读物生动地描述了新生

活建设中的实际事例。

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二国际领袖人物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观点。考茨基歪曲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诋毁俄国革命的经验，宣称布尔什维克不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因而不顾俄国经济的落后力图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驳斥了他的谬论。考茨基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时，不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阶级分析，提出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问题，企图证明民主“优越”于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用处。列宁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并且指出，只要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列宁指出，考茨基对苏维埃政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实质进行歪曲。列宁认为：在俄国，由于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第一次出现了民主的最高类型——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中，资本家千方百计地不让群众参加管理，而苏维埃政权却在世界上第一次吸收劳动者直接地积极地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和实行十月革命期间的策略是正确的。列宁在本著作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论“民主”和专政》发挥了本著作中的思想。撰写本著作期间列宁所作的《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也涉及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载入本卷的他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继续阐述这个问题。

机会主义者宣扬“纯粹民主”时，还在“自由”、“平等”问题上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讲话说明，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口号，但未加以实现。列宁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讲话对斯维尔德洛夫作为无产阶级组织家的伟大一生作了极高的评价。列宁称他为“职业革命家”的典型，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他把密切联系群众同善于领导群众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他在解决许多极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材方面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列宁认为，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

《俄共（布）纲领草案》是列宁所拟的新党纲。党纲草案的理论部分保留了1903年党纲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评述，并增加了对帝国主义性质的分析。党纲草案的实践部分规定了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的各项基本任务。这个党纲草案是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拟定的，在它所规定的具体经济任务中，也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某些思想。列宁所拟的这个党纲草案的大部分条文为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条文所吸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关于党纲的报告》，对党纲的修改作了说明。列宁指出，新党纲保留旧党纲关于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论述，是从俄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顶部”，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苏俄当

时存在着大量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只有承认现实，阐明小商品生产的性质，才能正确制定对小商品生产的主要代表——中农——的政策。

十月革命实行土地改革，俄国农村经济中农化了。俄共（布）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以争取中农。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农村形势的变化，中立中农的政策被代以同中农妥协、同中农结成联盟的政策。本卷所载《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一文肯定了政策的这种改变：“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见本卷第 583—584 页）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党纲的报告》以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对中农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以来，列宁即提出建立新国际的问题。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下，1919 年 3 月，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列宁在大会以后写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对三个国际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作了评价。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由于当时运动是向横的方面发展，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暂时加强；刚刚成立的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本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是列宁为祝贺匈牙利无产阶级在 1919 年 3 月取得政权而写的，列宁要求匈牙利共产党人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俄国的革命经验，不能简单仿效。

列宁选集(3)

远方来信^[1]

(1917年3月)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2]

(3月7日[20日])

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经爆发了。这第一次革命想必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

这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917年3月1日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根据在瑞士得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想必不会是我国革命的最后阶段。

一个已经维持了许多世纪并且在1905—1907年这三年极其伟大的全民的阶级搏斗中依然保持了下来的君主制度，竟在短短8天之内（这个天数是米留可夫先生在拍给俄国一切驻外代表的大吹大擂的电报中说的）就土崩瓦解了，怎么会出这样的“奇迹”呢？

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

为了使沙皇君主制在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当时需要有许多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条件的配合。现在把其中的主要条件列举如下。

没有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三年间所进行的极其伟大的阶级搏斗和所表现出的革命毅力，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也就是说，这次革命的开始阶段就不会在几天之内完成。第一次（1905年）革命深深地翻松了土壤，根除了世代相传的偏见，唤醒了数百万工人和数千万农民去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使俄国社会中一切阶级（以及一切主要政党）彼此表明了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了它们的真正的本质，表现了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力量、它们的行动方式以及它们的当前的目的和未来的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它的全部腐败和丑恶，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廷为首的沙皇匪帮的极端厚颜无耻和放荡淫逸，揭露了罗曼诺夫家族的全部兽行，正是这些大暴行制造者使犹太人、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洒遍了俄国，正是这些占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头号”地主为了保全自己和本阶级的“神圣的私有制”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任意摧残和扼杀国民。

如果没有1905—1907年的革命，如果没有1907—1914年的反革命，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境内其他民族中一切阶级的“自决”，这些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对沙皇君主制的态度的决定，就不可能像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8天内表现得那样明确。这8天的革命就像是——如果可以这样譬喻的话——经过十来次主要的及次要的预演后所作的一次“表演”；“演员们”对于彼此的面貌、自己所扮的角色、自己所站的位置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都极为熟悉，连各种政治倾向和行动手段上稍微有点意义的细微差别也都揣摩得非常

透彻。

但是，如果说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及其走狗斥之为“大叛乱”的1905年第一次大革命，在12年之后引起了1917年“灿烂的”“光荣的”革命（它之所以被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宣告为“光荣的”革命，是因为它（暂时）给了他们政权），那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万能的“导演”，他一方面能大大加速世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则能引起空前严重的世界危机，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 international 的危机。这里除了需要异常加速全世界历史的进展以外，还需要全世界历史的特别急剧的转折，才能让沾满血污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车子在这样一次转折中一下子倾覆。

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

说这次战争是全世界的战争，这在目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因为合众国和中国今天已经有一半卷入了这场战争，明天就会完全卷进去。

说这次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在目前也是无可争辩的了。只有资本家及其走狗，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用一般批评性的形容词，而用大家熟悉的俄国政界的人名来表示），只有古契柯夫们和李沃夫们，米留可夫们和盛加略夫们，只有格沃兹杰夫们、波特列索夫们、契恒凯里们、克伦斯基们和齐赫泽们，才能否认或抹杀这个事实。无论德国资产阶级或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金融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来挽救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

这一转变过程已由1917年的二、三月革命开始了，这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首先向我们表明，当时有两种力量共同打击沙皇制度：一方面是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和地主连同他们所有不自觉的追随者，再加上他们所有自觉的领导者，即英法两国的大使和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已经开始在吸收士兵和农民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3]。

有三个政治阵营，三种基本政治力量：（1）沙皇君主制政府——农奴主-地主的首脑，旧官吏和旧将军的首脑；（2）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十月党^[4]-立宪民主党^[5]，跟着他们跑的小资产阶级（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伦斯基和齐赫泽）；（3）在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体贫苦居民群众中间寻找同盟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三种基本政治力量甚至在“第一阶段”的8天之内就把自己的面貌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甚至对于笔者这样一个远离事变发生地点，只能看到外国报纸上一点简略电讯的观察者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在详细说明这点以前，我应该先回头说一说我这封信中论述头等重大因素即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那一部分。

战争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和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在一起了。一团血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的社会政治生活情景。

在战争开始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如德国的大卫之流和谢德曼之流，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等等，老早就痛骂革命家的“幻想”，痛骂巴塞尔宣言^[6]的“幻想”，痛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梦幻般的滑稽剧”了。他们百般颂扬似乎是资本

主义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正是他们这批人曾经帮助资本家在各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适应性”和驯服性，愚弄和分化各工人阶级。

但是，“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资产阶级并没有能长期推延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危机的到来。这一危机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一切国家日益发展，从正遭遇着“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用一位不久前访问过德国的观察家的话来说）的德国起，直至饥荒也已逼来而组织得远不及德国那样“高明”的英法两国止。

在无组织现象最严重而无产阶级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品质，而是因为“1905年”的富于活力的传统）的沙皇俄国，革命危机自然就最先爆发了。这一危机因俄国及其盟国遭到多次最严重的失败而加速到来。这种失败动摇了全部旧的政府机构和全部旧制度，引起了全国所有阶级对它的仇恨，激起了军队的愤怒，大批地清除了那些带有因循守旧的贵族习气和腐败透顶的官僚性质的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多半是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事指挥人员。那些公然对资产阶级摇尾乞怜或者简直是毫无气节的人，曾经大吵大闹地反对“失败主义”，他们现在面临一个事实，这就是最落后最野蛮的沙皇君主制的失败同革命大火的燃起有历史的联系。

但是，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失败起过加速爆发的消极因素的作用，那么英法两国金融资本，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同俄国十月党及立宪民主党的资本的联系，则是通过直接策划反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阴谋而加速这一危机到来的因素。

对于事情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英法报刊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而保持缄默，德国报刊则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冷静地面对现实，交战的前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的那些外交官和部长们的假仁假义的官场外交谎言也好，交战的后一个集团的那些在金融和军事方面同前者竞争的人的嬉皮笑脸和挤眉弄眼也好，都不能使我们困惑。二、三月革命的整个事变进程清楚地表明，英法两国大使馆以及它们的代理人 and “内线”，为了阻止尼古拉二世（我们希望并且要设法使他成为末世）同威廉二世“单独”妥协和单独媾和，早就在作疯狂的努力了，他们联合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一部分将军以及军队中特别是彼得堡卫戍部队中的一部分军官，直接策划了以废黜尼古拉·罗曼诺夫为目的的阴谋。

我们决不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决不陷入某些人所犯的错误：像动摇于格沃兹杰夫—波特列索夫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之间、动不动就陷入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的“组委会分子”^[7]或“孟什维克”那样，现在就准备歌颂工人党同立宪民主党的“妥协”、对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等等。这些人为了替自己那套陈旧的、背熟了的（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辩护，公然掩盖英法帝国主义同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进行的阴谋活动，而这一阴谋活动的目的是要使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主要打手”下台，起用几个比较有活力的、有生气的、能干的打手来代替他。

革命胜利所以那样迅速，而且从表面上乍一看是那样彻底，只是因为在那时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潮流，两种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汇合起来了，并且是十分“和谐地”汇合起来了。其中一个方面是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他们曾经推动米留可

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夺取政权，以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以求更疯狂更顽强地进行这场战争，以求再屠杀数百万俄国工农，好使古契柯夫之流获得君士坦丁堡……好使法国资本家获得叙利亚……好使英国资本家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另一个方面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全体城乡贫苦居民）争取面包、争取和平、争取真正自由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深刻的运动。

谁要是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支持”用英国钞票“堆成的”、和沙皇帝国主义一样丑恶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帝国主义，那简直是愚蠢的。革命工人一直在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今后还将彻底破坏可恶的沙皇君主制，至于在一个短暂的情况特殊的历史关头，布坎南、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一伙人图谋另换君主、最好换成另一个罗曼诺夫，这就帮助了革命工人，但革命工人并不因此而感到欢喜，也不感到不安！

事情就是如此，而且也只能如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害怕真理，善于冷静地权衡革命中社会力量的对比，善于在估计任何“当前形势”时不只看到它今天的、现有的特性，而且还看到它更深的动因，看到俄国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更深刻的相互关系，他就会这样看问题，也只能这样看问题。

彼得格勒工人和全俄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为反对沙皇君主制，为争取自由，为农民争取土地，为争取和平，为反对帝国主义大厮杀，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英法帝国主义资本势力，为了继续进行和加强这场大厮杀，竟制造了宫廷倾轧，勾结近卫军军官策划阴谋，怂恿、鼓励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并暗中安排了一个已经完全拼凑好的新政府^[8]，这个政府在沙皇制度遭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初一些打击时就夺得了政权。

在这个新政府里，真正重要的岗位，战斗的岗位，决定性的岗位，即军队和官吏，都掌握在昨天还充当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帮凶的十月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9]的手里，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手里，而米留可夫及其他立宪民主党人坐在那里则更多是为了装饰门面，为了充当招牌，为了发表甜蜜的教授式的演说，“劳动派分子”^[10]克伦斯基在这个政府里不过是当一个专用空话欺骗工农的丑角。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

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统治着我国，并且在 1905—1907 年革命时期，在 1907—1914 年反革命时期，最后——而且是用特别快的速度——在 1914—1917 年战争时期，已经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组织起来，已经把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11]等等抓在自己的手里。到 1917 年，这个新阶级已经“几乎完全”执掌了政权；所以沙皇制度一遭到打击就立即倾覆，为资产阶级扫清了地盘。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各种力量极度紧张化，大大地加速了落后的俄国的发展进程，使我们“一下子”（仿佛是一下子）就赶上了意大利和英国，并且几乎赶上了法国，获得了所谓“联合的”、“民族的”（即适合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和愚弄人民的）、“议会制的”政府。

除了这个政府（从这次战争看来，实际上不过是拥有亿万资本的“英法”“公司”的伙计），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居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正在努力联系士兵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

当然，特别是农业工人，首先是农业工人，同他们的联系要甚于农民。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牢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沙皇君主制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

想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的、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府，其实是“英法”金融公司的一个伙计，它不得不许诺给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而这些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碍这个政府保持其统治人民的权力和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为限度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居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它正在努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

这三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决定着目前的形势，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形势。

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深刻的，暂时的，是仅仅由一时的特殊情况引起的，即由帝国主义战争中事态的急剧转折引起的。整个新政府都是君主派，因为克伦斯基口头上的共和主义实在是不庄重的，是政治家所不齿的，客观上是玩弄政治手腕。新政府还没有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就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地主王朝勾搭上了。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需要君主制政府作为官僚和军队的首脑，以便保护资本对于劳动者的特权。

说工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势力就应该支持新政府（这样说的显然有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和契恒凯里之流以及说话吞吞吐吐的齐赫泽之流），这种人就是工人的叛徒，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和平和自由事业的叛徒。因为实际上正是这个新政府已经被帝国主义资本，被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掠夺政策束缚住了手脚，已经开始勾结（并没有征求过人民的意见！）王朝，已经在为复辟沙皇君主制而工作，已经在迎请新的沙皇接位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极，已经在设法为他巩固宝座，废除正统的（合法的、靠旧法律维持的）君主制而代之以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式的（靠弄虚作假的人民投票维持的）君主制。

不，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制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不只是在口头上保证，不是靠花言巧语的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口许诺，那就不是工人应该支持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支持”工人！因为获取自由和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的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加强、扩大和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

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话和谎言，都是自由派和激进派阵营中的政客们的自欺欺人的把戏。

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或至少要对这件事不加阻挠，——这样，俄国的自由就将不可战胜，君主制就不可能恢复，共和制就会得到保证。

不然，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就会恢复君主制，丝毫也不会实现、确确实实丝毫也不会实现他们所许诺的任何“自由”。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

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府，即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即使真心诚意想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古契柯夫和李沃夫有诚意），那也不可能办到。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因为它是主战的政府，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政府，是从事掠夺的政府，它想掠夺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重新侵占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边疆区等等。这个政府被英法帝国主义资本束缚住了手脚。俄国资本只是那个掌握着数千亿卢布名叫“英法”环球“公司”的分公司。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面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它最多只能像德国那样给予人民“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可是人民是不愿意忍饥挨饿的。人民会知道，而且大概很快会知道，面包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只有采取不崇拜资本与地产的神圣性的手段才能取得。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自由，因为它是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它畏惧人民，并且已经开始勾结罗曼诺夫王朝了。

关于我们最近对待这个政府的策略任务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里来阐述。那里我们将指出，当前形势即从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其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口号，即“当前任务”应该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在，当我们只限于分析革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有哪些同盟者？

它有两个同盟者：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批群众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这批群众必然会受资产阶级、特别是受就生活条件来说同他们最为接近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定影响，他们会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战争的残酷教训，因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这伙人愈坚决地进行战争而显得愈残酷的教训，必然会把这批群众推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新制度下的相对自由，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用最大的努力来启发和组织这批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成立农业工人苏维埃，这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农业工人单独成立自己的苏维埃，而且要使贫穷困苦的农民离开富裕农民单独组织起来。关于现在所急需的这种组织工作的特殊任务和特殊形式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封信里谈。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二个同盟者就是一切交战国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目前他们在颇大程度上受着战争的压制，而代表他们说话的往往是那些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格沃兹杰夫和波特列索夫一样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者。可是，随着帝国主义战争一个月一个月地进行，无产阶级已经逐渐在摆脱他们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又必然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

拥有这两个同盟者的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以取代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备受战争折磨的各族人民以

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尼·列宁

载于 1917 年 3 月 21 日和 22 日《真理报》
第 14 号和第 15 号（有删节）
全文载于 1949 年《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
第 23 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
第 9—21 页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12]

(1917年4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4月3日夜里我才回到彼得格勒，所以我在4月4日的会议上作关于革命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时，当然只能用我个人的名义，并且预先声明没有充分准备。

为了使我自己和诚实的反对者便于工作，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准备了书面提纲。我宣读了这份提纲，并把它交给了策列铁里同志。当时我读得非常慢，而且读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13]上，后来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14]上。

现在我把我的这份提纲交去付印，只加了一些极其简短的注释，而在报告的当时，这些注释要发挥得详尽多了。

提 纲

1. 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

觉悟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同意进行真正能够证明革命护国主义是正确的革命战争：(1) 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2) 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放弃一切兼并；(3) 真正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

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

要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

举行联欢。

2.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而且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对这个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

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在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极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时必须善于适应这种特殊条件。

3. 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

4. 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比起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机会

主义分子的联盟——从人民社会党人^[15]、社会革命党人^[16]起直到组织委员会^[7]（齐赫泽、策列铁里等）、斯切克洛夫等等止——暂时处于较弱的少数地位。

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5.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

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6. 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

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个大田庄（其面积约100俄亩至300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7. 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8.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9. 党的任务：

（1）立刻召开党代表大会；

（2）修改党纲，主要是：

（a）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b）对国家的态度以及我们关于“公社国家”的要求；

（c）修改已经陈旧的最低纲领；

（3）更改党的名称。

10. 革新国际。

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相对立的国际。

为了使读者了解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诚实的反对者（这样的“事例”是罕见的例外），我请读者把下面戈尔登贝格先生的反对意见同这个提纲比较一下，他说：列宁“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竖起了内战的旗帜”（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先生的《统一报》^[17]第5号）。

即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即由巴黎公社提供了原型的那种国家。

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在世界各地都背叛社会主义，投奔资产阶级了（如“护国派”和动摇的“考茨基派”），所以我们不应再叫“社会民主党”，而应改称共产党。

所谓“中派”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摇摆于沙文主义者（=“护国派”）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那个派别，即德国的考茨基之流，法国的龙格之流，俄国的齐赫泽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英国的麦克唐纳之流等等。

这岂不是奇谈吗？

我写的、宣读的和反复说明的是：“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

而资产阶级中那班既不属于拥护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也不属于护国主义群众的、自称社会民主党人的先生们，竟然聪明地把我的观点转述成这样：“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竖起了内战的旗帜……”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这同鼓吹大暴行有什么区别呢？这同《俄罗斯意志报》^[18]有什么区别呢？

我写的、宣读的和反复说明的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而某些反对者却把我的观点说成是号召“在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中进行内战”！！

我抨击临时政府，是因为它不但没有确定近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甚至根本没有确定召开的日期，只是用些诺言来搪塞。^[19]我曾一再说明，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证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人硬把一个观点加在我的头上，说我反对尽快召开立宪会议！！

如果不是几十年的政治斗争教会我把反对者的诚实看作罕见的例外，那我也许要把这种话叫作“梦话”了。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报纸上把我的讲话叫作“梦话”。真是好极了，普列汉诺夫先生！但是请看看，你自己在论战中是多么愚

蠢、笨拙和迟钝。假使我讲了两个钟点的“梦话”，为什么几百个听众会听得下去呢？其次，为什么你的报纸竟用整栏篇幅来叙述这些“梦话”呢？这是你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

当然，喊叫、谩骂、哀号，比起试着叙述、解释和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1872年和1875年怎样谈论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无产阶级需要哪种国家来，要容易得多。

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大概不愿意再想起马克思主义了吧。

罗莎·卢森堡1914年8月4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叫作“一具发臭的尸体”，我引用了她的话。而普列汉诺夫先生们、戈尔登贝格先生们等等却“叫起屈来了”……为了谁呢？为了那些被叫作沙文主义者的德国沙文主义者！

可怜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已经头脑发昏了。

载于1917年4月7日《真理报》
第2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
第113—118页

参看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卡·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和17日给路·库格曼的信，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1—386页，第4卷第392—393、393—394，第1卷第228—229页，第3卷第19—22、30页）。——编者注

论两个政权

(1917年4月8日[21日])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我国革命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造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一事实是需要首先认清的；不认清这个事实，就不能前进。对于旧“公式”，例如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要善于补充和修改，因为这些经实际证明大体上是正确的公式，具体实现的结果却成了另一个样子。关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以前谁也没有想到，而且也不可能想到。

两个政权并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除临时政府即资产阶级政府外，还形成了另一个尽管还很软弱、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毕竟确实存在而且在日益成长的政府，即工兵代表苏维埃^[3]。

这另一个政府的阶级成分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穿了军装的农民）。这个政府的政治性质怎样呢？它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直接依靠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这完全不是欧美先进国家中迄今最常见的那种一般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政权。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不深入思考这一点，而这却是全部实质的所在。这个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其基本标志是：（1）权力的来源不是议会预先讨论和通过的法律，而是来自下面地方上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直接的“夺取”；（2）用全民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的、同人民对立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在这种政权下，国家的秩序由武装的工农自己，即武装的人民自己来维持；（3）官吏，官僚，或者也由人民自己的直接政权取代，或者至少要接受特别的监督，变成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一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的官吏，处于普通的受委托者的地位；他们从占有能领取资产阶级高薪的“肥缺”的特权阶层，变为特殊“兵种”的工人，其报酬不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

巴黎公社这一特殊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普列汉诺夫之流（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之流（“中派”分子，即摇摆于沙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子）先生们，以及所有一切现在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16]等等，都把这种实质忘掉了和歪曲了。

他们空话连篇，装聋作哑，推托躲避，千百次地相互祝贺革命成功，但是不愿意想一想，工兵代表苏维埃究竟是什么。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明显的真理：既然存在着这种苏维埃，既然它们是政权，那在俄国也就存在着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

我强调了“既然”这两个字。因为这还只是萌芽状态的政权。它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达成了直接的协议，做了许多实际的让步，是它自己把阵地不断让给资产阶级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犯了“错误”吧？没有的话。只有庸人才会这样想，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这样想的。原因在于无产者和农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上述领袖们的“错误”在于

他们采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在于他们不去启发工人的意识，反而模糊他们的意识，不去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反而诱发这种幻想，不使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反而加强这种影响。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我们的同志也犯了这么多的错误，竟“简单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当马上推翻临时政府？

我的回答是：（1）应该推翻它，因为它是寡头的、资产阶级的政府，不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它不会给人民和平、面包和充分的自由；（2）但是不能马上推翻它，因为它有同工人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这样一个主要的苏维埃达成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形式的和实际的协议作依靠；（3）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因为它依靠第二个政府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对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第二个政府是直接反映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比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更高更好类型的政府，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来，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

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因为在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20]，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反对空谈，反对依赖资产阶级。

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优秀分子已经创造了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我们要团结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本阶级的工作，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就会愈来愈多地转到我们方面来。因为实际生活将时时打破“社会民主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以及“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更“地道的”小资产者等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

资产阶级主张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觉悟的工人主张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主张用启发无产阶级意识、使它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办法而不是用冒险行动来取得单一政权。

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则摇摆不定，妨碍这种启发和摆脱的工作。

这就是决定我们任务的实际的阶级的力量对比。

论策略书^[21]

(1917年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

说 明

1917年4月4日，我在彼得格勒就标题所点出的问题先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13]上作了一次报告。当时到会的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22]的代表，他们就要回到各地去，因此不容我有任何拖延。会议结束后，主席格·季诺维也夫同志代表全体到会同志向我提议，要我随即在准备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14]上再作一次报告。

不管立刻再作一次报告对我来说有多么困难，既然我自己的同志和孟什维克都有这种要求，而我们又因归期在即，确实不容我拖延，我也就没有权利推辞了。

在报告会上，我把我那篇发表在1917年4月7日《真理报》^[23]第26号上的提纲念了一遍。

无论提纲或是我的报告，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和《真理报》编辑部都引起了一些分歧。经过多次商谈，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把这些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这样，可以给将在1917年4月20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我党（由中央委员会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24]提供材料。

为了执行这个展开讨论的决定，我把下面这几封信刊印出来，在这些信里，我并不想对问题作全面的研究，而只想提出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任务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几个主要论据。

第一封信 对形势的估计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做法，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根据哪些确切肯定的客观事实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呢？

在登载于1917年3月21日和22日《真理报》第14号和第15号上的我的第一封《远方来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中，以及在我的提纲里，我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

我把登在这一号《真理报》上的提纲连同简要注释附在这封信的后面。（见本卷第13—18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编者注

因此我认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口号或“当前任务”就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真理报》第15号）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

1917年二、三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掌握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阶级的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个新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这里，我们会听到喜欢把自己称作“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反对者的喧嚣声：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重蹈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16]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关于这些变异，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

见本卷第11页。——编者注

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

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才可能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政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因为不要忘记，彼得格勒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政府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无论警察、脱离人民的军队或是权势极大的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都不存在。这是事实。这正是反映了巴黎公社类型国家的特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实际生活，而不是重复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以便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执政的是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也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阶级吗？怎么能得出结论说这一阶层不能取得政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

我的回答是：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形势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自由地进入了第二个政府即附属政府，自由地补充、发展和完善着这个政府。同时，他们又同样自由地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这是一种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論的现象，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曾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维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还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太可笑了。

农民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我不仅没有忘记这种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我在直接地确切地表述土地纲领时还估计到一种新现象，即贫雇农和农民业主之间发生着更深刻的分裂。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农民会听从社会革命党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劝告；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受了资产者的影响，转向护国主义，劝告人们等待立宪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可能，

见约·沃·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为了使我的话不被人误解，我马上要预先声明：我绝对赞成雇农和农民苏维埃立刻夺取全部土地，但是，它们自己要严格遵守秩序和纪律，丝毫能毁坏机器、建筑物和牲畜，万万不能破坏经济和粮食生产，

农民会继续保持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协议，保持他们目前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记土地运动和土地纲领，将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忘记现实，同样会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实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同农民已达成协议的事实，或者用更确切的、少带法律含义而多带经济和阶级含义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同农民已实行阶级合作的事实。

只有这一事实不再成为事实，只有农民离开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而这一点要留待以后专门去谈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想到将来可能有这样的阶段，而忘记在农民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现在自己所负的责任，他就会变成一个小资产者。因为他在实际上会鼓动无产阶级去信任小资产阶级（“它，这个小资产阶级，这些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就一定同资产阶级分开”）。他只想到“可能”有一个愉快而甜蜜的未来，那时农民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他只想到“可能”有这样一个愉快的未来而忘记了不愉快的现在，忘记了农民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目前还在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充当李沃夫“陛下”的反对派^[25]。

我们上面所假设的这种人，很像甜蜜蜜的路易·勃朗和媚人的考茨基分子，决不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26]，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

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20]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详细论述过的，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

愚昧无知的人或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可以叫喊什么

而要加强生产，因为士兵需要加倍的粮食，人民也不应当再挨饿。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4—336、371—386页。——编者注

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谁只要肯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样的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自然不会而且绝对不会陷入布朗基主义的泥潭。这样做，也不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因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向无产阶级统治过渡的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张在这个时期必须有国家，不过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国家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是没有常备军、没有同人民对立的警察、没有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统一报》^[17]上拚命地叫喊无政府主义，这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在《真理报》（第26号）上曾向普列汉诺夫挑战，要他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1872、1875年在国家问题上是怎样教导的，普列汉诺夫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只能是默不作答，只能像被激怒了的资产阶级那样咆哮一通。

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顺便提一下，在他那本论无政府主义的德文小册子^[27]里，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懂的迹象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尤·加米涅夫同志在《真理报》第27号上的一篇短评中是怎样表述他同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的“分歧”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更确切地了解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

加米涅夫同志写道：“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认为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有两大错误：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问题提得不正确。这种抽象的、简单的、单色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提法，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谁这样提问题，谁现在只是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谁就无法了解极其复杂的至少是“两色”的现实。这是从理论上说。而在实践上，他就是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举手投降。

确实是这样。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现实的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后一个“也是政府”，它自己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自己使自己依附于资产阶级政府。

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

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建立一个脱离资产阶级政府的单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能建筑在情况不明的基础上。

如果这样的专政还有可能，那么，走向这种专政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立

刻坚决地、彻底地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小资产阶级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转向了沙文主义（=护国主义），“支持”资产阶级，依赖资产阶级，害怕撇开资产阶级等等。

这个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取得政权，但是它不愿意，那怎么才能“推动”它去执掌政权呢？

只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分离出来，摆脱这些小资产者的畏缩心理，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团结起来，才能使小资产阶级觉得脚下发“烫”，在一定条件下不得不把政权拿过来；甚至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也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也会赞成齐赫泽、策列铁里、社会革命党人和斯切克洛夫掌握无限权力，建立单一政权，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护国派”！

谁立即迅速而彻底地使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谁就是在下述两种可能情况下正确地反映运动的利益，一种情况是俄国还会出现一个单独的、自主的、不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一种情况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永远（也就是一直到社会主义来临）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我们之间。

谁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个简单的公式行事，谁就像是在保证小资产阶级一定能够不依赖资产阶级。这样做他也就是在目前乖乖地向小资产阶级投降。

附带说一下，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公式”，不妨回忆一下我在《两种策略》（1905年7月）中特别强调的一段话（《十二年来》第435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加米涅夫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到了1917年，还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过去。而实际上，这个专政的未来已经开始，因为雇佣工人和小业主这两者的利益和政策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并且是在“护国主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这样的极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这里我要涉及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提纲的第8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

一个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不可能反对把实施社会主义当作直接任务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俄国建立“公社国家”（即按照巴黎公社类型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能“立刻”办到，因为这需要所有（或大多数）苏维埃

见本版选集第1卷第591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6页。——编者注

中的大多数代表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的策略和政策的全部错误和全部危害。而我十分明确地声明过，我在这方面只“指望”“耐心的”说明（如果要实现“立刻”就能实行的转变，还用得着耐心吗？）！

加米涅夫同志有点“不耐烦地”说过了头，他重复了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偏见，似乎巴黎公社想“立刻”实施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惜的是公社迟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公社的真实本质并不在资产者通常寻找的那些地方，而在于它创立了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已经诞生，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加米涅夫同志没有深入思考事实，思考目前存在的苏维埃的意义，思考苏维埃在类型上、在社会政治性质上同巴黎公社国家的一致，他不去研究事实，却开始谈论我似乎“指望”“立刻”会发生的事情。很遗憾，他是在重演许多资产者的故伎：不让人们注意迫切的、现实的、实际生活提出来的问题，如什么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按类型来说是否高于议会制共和国，它是否更有益于人民，是否更民主，是否更有利于斗争（例如同缺粮作斗争）等等，而引导人们去注意“指望立刻转变”这种空洞的、貌似科学而实际毫无内容的、教授们感兴趣的毫无生气的问题。

这是一个空洞的虚构的问题。我所“指望”的仅仅是，无非是：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处理增加粮食生产、改善粮食分配、改善士兵给养等等实际困难问题上，会比官吏和警察高明。

我深信，工兵代表苏维埃会比议会制共和国更快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关于这两种国家类型的比较，在另一封信里再详谈）。它们会更好、更实际地、更正确地决定怎样才能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以及究竟能够采取哪些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今天，德国的容克^[28]和资产者正采取这种步骤来对付人民。明天，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它就会更好更多地采取这种步骤来为人民谋福利。

是什么东西迫使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呢？

是饥荒，经济失调，即将临头的崩溃，战争的惨祸，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惨痛的创伤。

加米涅夫同志在他的短评的结尾说：“在广泛的讨论中，他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被接受，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唯一可能接受的观点，因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希望继续成为而且应该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党，而不至于变成共产党员宣传员的小团体。”

我认为，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形势的估计是非常错误的。加米涅夫同志把“群众的党”和“宣传员的小团体”对立起来。但是要知道，“群众”现在正好感染上“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在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者能够抵制“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即一起感染上流行病要更体面些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欧洲各交战国里，沙文主义者不也是借口希望“继续同群众在一起”来为自己辩护吗？难道不应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为了把无产阶级的路线从“群众的”护国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解脱出来，宣传员的工作不正好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吗？把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搅在一起，不分析群众内部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护国主义得以流行的条件之一。轻

蔑地谈论无产阶级路线的“宣传员的小团体”，恐怕不太妥当吧。

1917年4月由彼得格勒波涛
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
第135—149页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29]

(1917年4月10日[23日])

俄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关头有下列基本特征：

这次革命的阶级性

1. 仅代表一小撮操纵全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官吏)的农奴主-地主的旧沙皇政权已经被打碎和废除,但还没有被彻底摧毁。君主制还没有正式废除。罗曼诺夫匪帮还在策划保留君主制的阴谋。农奴主-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还没有消灭。

2. 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同那些在1906—1914年间异常热心地拥护血腥的尼古拉和绞刑手斯托雷平的公开君主派(如古契柯夫和其他一些比立宪民主党人^[5]更右的政治家)缔结了同盟。李沃夫之流的资产阶级新政府,企图而且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家族就在俄国恢复君主制问题进行谈判。这个政府在革命词句的掩护下,任命旧制度的拥护者担任国家要职。这个政府把国家机器的全部机构(军队、警察、官吏)交给资产阶级,力求使整个机构的改革愈少愈好。新政府已开始竭力阻挠群众的革命创举,不让人民从下面夺取政权(这是革命真正胜利的唯一保障)。

直到现在,这个政府连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它并不触动地主土地占有制这一农奴主沙皇制度的物质基础。对金融垄断组织、大银行、资本家的辛迪加和卡特尔等等的活动,它根本不想去调查、公布和监督。

新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最主要的部长职位(内务部、陆军部,即指挥军队、警察、官吏,指挥压迫群众的全部机构的司令部),都属于明显的君主派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拥护者。立宪民主党人,这些昨天的共和派,违背自己意愿的共和派,只得到一些不能直接指挥人民、同国家政权机构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职位。劳动派^[10]代表和“也是社会党人”的亚·克伦斯基,除了用响亮的词句麻痹人民的警惕性,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由于这一切原因,即使在对内政策上,资产阶级新政府也不配享有无产阶级的丝毫信任,而无产阶级也不应当予以任何支持。

新政府的对外政策

3. 由于客观条件,现在对外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是为了瓜分资本主义赃物,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勾结起来进行战争的政府。

新政府屈从于俄国资本及其强有力的保护者和主子即世界上最富有的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违反由兵工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绝大多数民族十分

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愿望，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去制止各民族为资本家的利益而互相残杀。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具有掠夺内容（瓜分波斯，抢劫中国，抢劫土耳其，瓜分奥地利，夺取东普鲁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资本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它承认沙皇政府缔结的这些条约；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其他专制魔王掠夺和压迫了更多的民族，它不仅压迫大俄罗斯民族，而且玷污和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它变成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

新政府在承认这些可耻的掠夺性条约以后，违反由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俄国大多数民族明白提出的要求，不向交战的各国人民建议立刻停战。它只是用一些冠冕堂皇、有声有色、但毫无内容的宣言和词句来敷衍搪塞，这样的宣言和词句在资产阶级的外交家口里，一向是用来欺骗被压迫人民中轻信而幼稚的群众的。

4. 因此，新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配享有丝毫信任，不仅如此，向它继续提出要求，要它表达俄国各族人民的和平意志，要它放弃兼并等等，实际上也只是欺骗人民，让人民空抱不能实现的希望，阻碍人民觉醒，间接使人民容忍战争继续打下去，而这一战争的真正社会性质，则不是由善良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进行战争的政府的阶级性质，由这个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同俄、英、法等等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联系，以及由这个阶级所实行的真正的实际政策决定的。

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和它的阶级意义

5. 我国革命最主要的特点，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就是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天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所谓两个政权并存，就是说有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加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显然是绝大多数的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推翻了整个沙皇君主制，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居民群众的直接力量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6. 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然得到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信任的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竟自愿把国家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自愿把首位让给临时政府，同它达成支持它的协议，而自己则只是充当监视和监督立宪会议的召开（召开的日期，临时政府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宣布）的角色。

这种史无前例的异常独特的情况，使两种专政交织在一起：一种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种专政，就是说，是既不依靠法律，也不依靠预先表示出来的民意，而是依靠暴力夺取的一种政权，而且这种夺取是由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来实现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兵代表苏维埃）。

毫无疑问，这种“交织”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现在，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在各处拚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兵工代表苏维埃，以求建立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刻，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这种过渡的不稳定的局面的阶级意义（以及阶级原因）在于：我国革命也同其他一切革命一样，要求群众有高度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同时一下子就把数量空前的普通人卷进了运动。

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

俄国就是这样。俄国正在沸腾。在政治上沉睡了10年、因受沙皇制度残酷压迫和替地主工厂主做苦工而在政治上受压抑的千百万群众，现在已经觉醒过来并渴望干预政治了。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业主，小资产者，即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那些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是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

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

小资产阶级过的生活是业主式的，不是无产阶级式的（就其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依赖资产阶级，在思想方式上也跟着资产阶级走。

对资本家即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就是俄国群众的政治现状的特点，这就是在欧洲一个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以革命速度产生出来的现象。这就是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之间达成“协议”的阶级根源（我要强调说：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默默达成的协议，轻信地不觉悟地让出政权）；这种协议给了古契柯夫之流一块肥肉，给了他们真正的政权，而苏维埃所得到的只是克伦斯基之流的许诺、尊敬（暂时的）、恭维、空话、保证和奉承。

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

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一直到社会革命党人^[16]，都始终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组织委员会^[7]的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也是一样；非党的革命者（斯切克洛夫等）同样随波逐流，或者没有抵挡住、没有来得及抵挡住这种浪潮。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的策略特点

7.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人物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实际情况的特点必然造成当前策略的特点。

这种特点提出了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酸醋和苦汁掺入到革命民

主词句的甜水中去”（这是我们党中央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同志昨天在彼得格勒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30]上说的，这句话说得非常中肯）。要进行批评，说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训练和团结觉悟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成员，使无产阶级从“普遍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中解脱出来。

这好像“只是”一种宣传工作。其实这是最实际的革命工作，不如此就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因为目前革命所以停顿，所以被空话阻塞而在“原地踏步”，并不是由于外界的阻碍，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使用暴力（古契柯夫暂时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士兵群众），而是由于群众的轻信的不觉悟。

只有同这种轻信的不觉悟作斗争（斗争的方法只能是并且应当是用同志的态度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指出实际生活的经验等），我们才能从猖獗一时的革命空话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扬群众在地方上大胆坚决的首创精神，促使他们自动地去实现、发展并巩固自由、民主和全部土地归全民所有的原则。

8. 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府的经验创造了两种保持对人民压迫的方法。第一种是使用暴力。尼古拉·罗曼诺夫一世（刑棍尼古拉）和尼古拉二世（血腥的尼古拉）已把这种屠杀方法淋漓尽致地表演给俄国人民看了。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被受过多次大革命和群众革命运动“教训的”英法资产阶级修饰得非常精巧。这种方法就是欺骗，恭维，说空话，无数的许诺，小恩小惠，小处让步，大处不放等等。

俄国当前的特点就是从第一种方法极其迅速地转到第二种方法，从用暴力压迫人民转到恭维人民，用诺言欺骗人民。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31]。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把持着政权，维护资本的利润，为了俄国资本和英法资本的利益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时用空洞的诺言、堂皇的宣言、娓娓动听的声明来敷衍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这类“厨子”的高谈阔论，尽管这些“厨子”在那里不断地威胁、劝告、央求、恳请、要求、慷慨陈词……猫儿瓦西卡边听边吃。

这种轻信的不觉悟和不觉悟的轻信，必然会日益消失，特别是对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更是这样，因为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教他们不要信任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应该”教导人民信任资产阶级。无产者应该教导人民不信任资产阶级。

革命护国主义和它的阶级意义

9. “几乎把一切”都吞没了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它的最大最鲜明的表现要算是革命护国主义了。正是革命护国主义是俄国革命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死敌。

谁在这一点上失足而不能自拔，谁就谈不上革命。不过群众的失足和领袖不同，因此，他们的解脱方法也不一样，他们是经过另一条发展道路、经过另一种方法求得解脱的。

革命护国主义一方面是群众受资产阶级欺骗的结果，是农民和一部分工人轻信的不觉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的反映，因为小业主从兼并和银行利润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他们“神圣地”保卫着以残害其

他民族来腐蚀大俄罗斯人的沙皇制度的传统。

资产阶级欺骗人民，利用了高尚的革命自豪感，把事情说成似乎由于革命的这一阶段，由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准共和国代替了沙皇君主国，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在俄国方面就发生了变化。人民也就相信了（暂时地相信了）这种谎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的偏见，即认为除了大俄罗斯民族以外俄国的其他民族都是大俄罗斯人的某种私有财产或世袭领地。沙皇制度卑鄙地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大俄罗斯人习惯于把其他民族都看成一种下等人，“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腐蚀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除的。

我们要善于向群众说明，决定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的，不是某些个人、集团以至某些民族的“善良愿望”，而是进行战争的那个阶级的地位，那个阶级的政治（战争是这一政治的继续），资本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的种种联系，国际资本的帝国主义性质，俄国在财政、银行、外交上对英法等国的依赖等等。要巧妙地用群众易懂的话说明这个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谁也不能不出差错地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宣传的方向，确切些说，我们宣传的内容，应该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不管用多么漂亮的话，用怎样的“实际”理由来辩护，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都是背叛社会主义，都是彻底背弃国际主义。

“打倒战争”的口号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估计到当前任务的特点，没有估计到必须用另一种方法去对待广大群众。我看，这个口号就同“打倒沙皇”的口号一样，“想当年”笨拙的鼓动家带着“打倒沙皇”的口号贸然闯到农村，结果挨了一顿打。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拥护者是真心诚意的——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阶级来说，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阶级（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兼并和扼杀别的民族方面确实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与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先生们的情况不同，这些人明明知道不放弃资本的统治就不能放弃兼并，却还要用漂亮的词句、无边无际的许诺、多不胜数的担保来无耻地欺骗群众。

护国主义广大拥护者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平常，他们说：“我并不愿意兼并，但是德国人向我‘闯过来了’，因此我维护的是正义的事业，而完全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的利益。”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取得成效——也许不会很快取得，但这种成效会是牢固而可靠的。

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10. 战争不是“凭愿望”就能结束的。靠单方面的决定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像一个护国派士兵所说的“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结束不了战争的。

靠各国社会党人的“协议”、全世界无产者发起的“行动”、各国人民的“意志”等等，是结束不了战争的。所有这类充满在护国派、半护国派、半国际主义派报纸的文章中的词句，所有这类充满在无数的决议、号召书、宣言以及兵工代表苏维埃的决议中的词句，无非是小资产者的空洞的、天真的、善良的愿望而已。关于“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关于无产阶级轮番发起革命行动（继俄国无产阶级之后，按“顺序”该是德国无产阶级）等

等词句，是最有害不过的了。这一切都是路易·勃朗主义，都是甜蜜的幻想，都是玩“政治运动”游戏，实际上是再现关于猫儿瓦西卡的寓言。

虽然战争确实只有利于资本家强盗，只会使他们发财，但战争并不是由资本家强盗的恶念造成的。战争是由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全世界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争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

1917年二、三月的俄国革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开端。这次革命迈出了停止战争的第一步。但是只有迈出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这将是全世界“突破战线”——突破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无产阶级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的惨祸，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的幸福。

俄国革命既然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也就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了这种“突破”资本“战线”的阵地。

在我国革命中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11. 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目前还没有为人们所理解，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还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

最完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类型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权力属于议会；国家机器，管理的机构和机关，和往常一样，有常备军、警察以及实际上从不撤换、拥有特权、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

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革命时代，产生了一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国家；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国家从某些方面来看已经不成其为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就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它以人民自己的直接武装代替了脱离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巴黎公社的实质就在于此。资产阶级的著作家们曾谩骂和诽谤巴黎公社，错误地认为巴黎公社打算立刻“实施”社会主义。

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开始建立的正是这种国家类型。由全俄人民代表立宪会议或由苏维埃会议统一起来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它的出现是由于千百万人民的主动，是由于人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动地创立民主制度，既不等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教授先生们拟定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法律草案，也不等待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中的老学究和老顽固（如普列汉诺夫先生或考茨基）放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

与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上述时期需要的，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和旧类型的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回到君主国是非常容易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整个压迫机器——军队、警察、官吏仍然原封不动。而公社和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则打碎并铲除这个机器。

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自主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工兵代表苏维埃则与此相反。

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马克思曾把这种国家类型叫作“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通常有人反驳说：俄国人民还没有条件“实施”公社。这是农奴主的论调，他们也曾经说过：农民还没有条件享受自由。凡是在经济现实中和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识中还没有绝对成熟的改革，公社即工农代表苏维埃都没有“实施”，也不打算“实施”，而且也不应当实施。经济破坏和战争造成的危机愈深，就愈需要最完善的政治形式，以便更容易地医治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可怕的创伤。俄国人民的组织经验愈少，就愈应当坚决着手人民自己的组织建设，而不是专靠一批资产阶级政客和占据“肥缺”的官吏去做。

我们愈迅速抛弃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旧偏见，愈热心帮助人民立刻在各地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使其支配全部生活，李沃夫之流先生们愈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人民就会愈容易选中（通过立宪会议，如果李沃夫迟迟不召开立宪会议，那就不通过它）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人民自己进行新的组织建设，起初难免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而不断前进，总比等待李沃夫先生召集法学教授来草拟关于召开立宪会议、关于永远保存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和扼杀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法律要好。

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并做好宣传，那么，不仅无产者而且十分之九的农民也会起来反对恢复警察，反对从不撤换的、拥有特权的官吏，反对脱离人民的军队。新的国家类型的实质就在这里。

12. 用民兵代替警察 这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产生出来并正在俄国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改革。我们应该向群众说明，在大多数通常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这种改革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资产阶级，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阶级，也总是恢复专制制度下的那种脱离人民、受资产者指挥、惯于多方压迫人民的旧式警察。

不让警察恢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全民的民兵，把它和军队融合起来（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从15岁到65岁（可以大体上以此为少年和老人参加的年龄标准）的男女公民，人人应当参加民兵。资本家应当按照雇佣工人和仆人等等在民兵中执行公务的天数付给他们报酬。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至于护理病人、照料流离失所的孩子、注意饮食卫生等等的“警察”职能，除非妇女享有实际上的而不是纸上的平等，是根本不能完美实现的。

不让警察恢复；发动全体人民的组织力量来建立人人参加的民兵，——这就是无产阶级为捍卫、巩固和发展革命而应当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任务。

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

13. 现在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俄国农村在最近是否会展开强大的土地革命。我们无法知道，农民中近年来确已加深的阶级分化，即一部分人成为雇农、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另一部分人成为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样的问题，要靠实际经验，也只能靠实际经验来解决。

但是，为了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提出土地纲领，而且绝对必须宣传那些立刻可以实现的实际措施。

我们应当要求全部土地国有化，就是说，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家中央政权所有。这个政权应该规定移民用地的数量等等，定出保护森林、改良土壤等等的法律，严禁土地所有者（国家）和租地者（农户）之间有任何中介行为（严禁土地转租）。但是支配土地的权力以及规定地方上占用土地的条件，都应完全由各区域和各地方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而绝不应该操在官僚、官吏的手里。

为了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和增加产量，为了发展合理化的大农场和对它们实行社会监督，我们应当在农民委员会内部争取把没收来的地主田庄都改建成大规模的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苏维埃负责监督。

社会革命党人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词藻和政策，特别是什么“消费”土地份额、“劳动”土地份额以及“土地社会化”等等空谈；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说明，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小经济制度决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生活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状况。

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一定要立刻把农民代表苏维埃拆散，但它应当说明，必须组织单独的雇农代表苏维埃和单独的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代表苏维埃，或者至少要组织这种阶级地位的代表，作为总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单独的党派，举行单独的定期会议。否则，民粹主义者说到农民时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甜言蜜语，就会成为富裕农民欺骗贫苦群众的护身符，而富裕农民只不过是资本家的一个变种而已。

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按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或完全是官吏的腔调进行宣传，劝告农民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不要夺取地主土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号召农民立刻自动地实行土地改革，并根据当地农民代表的决定立刻没收地主土地。

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坚持必须增加食品生产，以供应前方士兵和城市，严禁任何损坏牲畜、工具、机器和建筑物等现象发生。

14.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充分自由。

没有真正实现分离的自由，任何放弃兼并的声明和宣言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或是小资产阶级的天真愿望。

无产阶级政党力求建立尽可能大的国家，因为这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它力求各民族彼此接近以至进一步融合，但是它不想通过暴力，而只想通过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自由联合来达到这个目的。

俄罗斯共和国愈民主，它组建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愈顺利，各民族劳动群众自愿趋向这种共和国的力量就愈大。

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

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

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的国有化

15. 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只有躲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以这个真理为借口，替那种不执行实际上业已成熟的迫切革命措施的拖延政策进行辩护，而这类措施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了，因为这是同日益逼近的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要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可能防止即将临头的破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战争”大发横财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空前的高额利润。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16. 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正是在现时特别突出地提到了首要地位。

现在，只有懒汉才不拿国际主义发愿起誓，连沙文主义护国派，连普列汉诺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连克伦斯基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更有责任把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口头上的国际主义作一个鲜明、确切、清晰的对照。

只向各国工人发表宣言，空口担保自己忠于国际主义，企图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各交战国革命无产阶级发起行动的“顺序”，硬要在各交战国社会党人之间订立关于革命斗争的“协议”，忙于召开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开展和平运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主张、企图或计划，无论它们的炮制者怎样真诚，但从客观意义来看，都只是空话，至多不过是天真的善良愿望，只能为沙文主义者欺骗群众打掩护。在玩弄议会欺诈手段方面最圆滑、最老练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早就打破了纪录，他们一方面高喊空前响亮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词句，同时又极其可耻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加入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内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公债（像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近来在俄国所做的那样），反对本国的革命斗争等等。

好心肠的人常常忘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严峻而又险恶的环境。这种环境容不得空谈，而且会嘲弄天真甜美的愿望。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32]。

战争爆发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三种派别；谁要是离开现实的基础，不承认这三种派别的存在，不对它们进行分析，不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派进行彻底斗争，他一定会软弱无力，束手无策，陷入错误。

三种派别如下：

(1) 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首先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

这些人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各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先生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盖得、桑巴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33]和“拉布分子”(指“工党”的领袖们)^[34]，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和他的党，丹麦的斯陶宁格和他的党，美国的维克多·伯杰及其他“保卫祖国派”等等。

(2) 第二派即所谓“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之间。

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对政府多方施加“压力”，从多方面“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赞成各种各样有利于和平的运动，赞成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同时也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和平。“中派”赞成“团结一致”，反对分裂。

“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的王国，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他们是那些客观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荣耀的职位等等)的工人阶层和集团，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帮助他们为瓜分资本主义的赃物而进行争斗。

“中派”是一些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的环境等等败坏了的守旧派，是习惯于待遇优厚的职位和“安稳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1914年的阶段向新阶段的过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级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一门艺术方面，这门艺术就是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创了社会革命的纪元那时起，新阶段的到来在客观上就成为必然的了。

“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1914年8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中派”就是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和帝国国会中的所谓“工作小组”^[35]，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和整个所谓“米诺利特”(少数派)^[36]，英国的菲利浦·斯诺登、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37]的其他许多领袖以及一部分英国社会党^[38]的领袖，美国的莫里斯·希尔奎特以及其他许多人，意大利的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等，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等，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组织委员会的党——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

自然，个别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到“中派”立场，

或者从后者转到前者。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随意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同样，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派别随意转到另一派别，虽然有人力求融合各个派别，但政治生活中的派别是各不相同的。

(3) 第三派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39]（我们把他们1915年9月发表的宣言作为附录转载于后，使读者能够就原件了解这一派别的产生）。

这一派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既同社会沙文主义也同“中派”彻底决裂。他们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他们坚决反对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甜言蜜语（社会和平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梦想不打破资本的枷锁和统治而获得永久的和平），反对利用种种借口来否认因这次战争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适当的和及时的。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即“国际派”^[40]，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的最有名望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随后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成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少说也有几百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他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等等）作无情的斗争，而且同他本国的中派即同他们的齐赫泽、策列铁里（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110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团结一致”，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除他以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像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所正确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一具发臭的尸体。

德国另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是不来梅的《工人政治》^[41]。

堪称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在法国有洛里欧和他的朋友们（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以及在日内瓦出版《明日》杂志^[42]的法国人昂利·吉尔波；在英国，有《工联主义者报》^[43]及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的部分党员（如罗素·威廉斯，他曾公开号召同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分裂），有苏格兰的国民教师社会党人马克林，他因从事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判处苦役，因同一罪名而入狱的还有几百个英国社会党人。他们，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工人党”^[44]以及机会主义“社会党”^[45]内那些从1917年1月开始出版《国际主义者周报》^[46]的人；在荷兰，有出版《论坛报》的“论坛派”（潘涅库克、赫尔曼·哥尔特、怀恩科普、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后者曾是齐美

尔瓦尔德的中派，现在已转向我们)^[47]；在瑞典，有青年党或左派党^[48]，党的领袖有林德哈根、图雷·涅尔曼、卡尔松、斯特勒姆、塞·霍格伦，霍格伦曾在齐美尔瓦尔德亲自参加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现因进行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判罪入狱；在丹麦，有特里尔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退出了以斯陶宁格大臣为首的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丹麦“社会民主党”^[49]；在保加利亚，有“紧密派”^[50]；在意大利，最接近国际主义的是党的书记康斯坦丁诺·拉查理和中央机关报《前进报》^[51]的编辑塞拉蒂；在波兰，有拉狄克、加涅茨基和其他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此外还有罗莎·卢森堡、梯什卡和其他由“总执行委员会”^[52]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们草拟了举行“全民投票”的理由书（1917年1月）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作斗争，1917年2月11日，他们在特斯举行的社会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原则上革命的反战决议^[53]；在奥地利，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左派青年朋友，其中一部分人常在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内活动，极其反动的奥地利政府现已查封了这个俱乐部，这个政府还因弗·阿德勒英勇地——但欠考虑地——枪击首相而对他进行迫害；以及其他等人。

问题不在于细微差别，就是在左派中也有不同的细微差别。问题在于派别。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们才代表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只有他们才是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在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所有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在帝国主义战争这种环境中客观上必然要起变化。谁如果只限于向资产阶级政府“要求”缔结和约或“要求”它“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等等，他在实际上就是堕落到改良派的立场。因为战争问题在客观上只能用革命手段来解决。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战争而缔结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可以使各国人民从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老爷们亿万利息的盘剥下解放出来。

可以而且应当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但是不能陷入马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义去要求那些与帝国主义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和阶级斩断这些联系；而不斩断这些联系，用战争反对战争的一切议论都只是空洞的骗人的词句。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实际上的改良主义者，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17.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一开始就站到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主要缺点，它破产（因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了）的原因，就是同社会沙文主义、同以在海牙（荷兰）的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等等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旧国际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在这样一个

实际决定一切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动摇不定。

在我国还有人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考茨基派。而这正是一个不能不考虑到的基本事实，现在西欧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实。就连沙文主义者，德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海尔曼，即极端沙文主义的《开姆尼茨报》的编辑兼由帕尔乌斯出版的极端沙文主义的《钟声》^[54]的撰稿人海尔曼（自然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热烈主张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人），也不得不在报刊上承认，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一个东西。

到1916年底和1917年初，这个事实被完全确认了。虽然昆塔尔宣言^[55]斥责了社会和平主义，但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方面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1917年1月和2月的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投票赞成社会党的和平主义决议（1916年12月通过）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和平主义决议^[56]（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该决议也是在1916年12月通过的）；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1916年12月17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当然不是偶然的）用民族主义词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57]和昆塔尔代表会议^[58]的主席罗伯特·格里姆，在1917年1月，同他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雷利希、普夫吕格尔、古斯塔夫·弥勒等）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1917年1月和2月举行的各国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两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国际青年组织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年国际》^[59]的编辑明岑贝格，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得到的很多；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机会像在俄国那样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德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德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并且在活动了。

这就是我在上面一一提到的那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他们，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为数尚少，那么就请每个俄国工人问一问自己：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前夜，俄国的觉悟的革命者多不多呢？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张和政策。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宣布”国际主义，而在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对订立协议和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抱希望。只要

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国际间的往来就会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铁钳钳住。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附加的政府的“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在1917年4月也没有准许瑞士社会党人、瑞士社会党^[60]书记、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滕进入俄国（虽然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是来探望妻子的亲属的，又因他在里加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为此坐过俄国的监狱，并为获准出狱曾向沙皇政府缴纳过保释金，他来是想取回这笔保释金的。），既然“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竟能够在1917年4月的俄国做出这种事来，那么现在资产阶级关于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的诺言、词句和宣言究竟有什么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政府拘留托洛茨基应当怎样解释呢？不让马尔托夫离开瑞士，想把他骗到英国，使他遭到同托洛茨基一样的命运，这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我们不要陷入幻想，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然事实证明，一些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连从斯德哥尔摩进入我国都得不到许可，连他们的信件都不准寄来（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完全可以用最严密的手续来审查这些信件的），那么，“等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或会议就无异是背叛国际主义。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上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畏惧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定，看到我们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看到我们现在也决心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信念了。

多得者应当多予。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的自由。我们利用这种自由，不是为了鼓吹支持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革命护国主义”，而是要勇敢地、忠实地、本着无产阶级的和李卜克内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国际，建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以及“中派”这些动摇分子势不两立的国际。

18. 根据上述情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谈不到统一的问题，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宁可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只剩下两个人——这就是说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一起——也丝毫不能有同组织委员会的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的想法，因为这些人甘愿同《工人报》^[61]的波特列索夫结成联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公债^[62]，他们已经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了。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63]

谁想帮助动摇分子，首先要自己不动摇。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19. 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

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社会民主党在下面主要两点上歪曲和背叛了这个宣言：（1）工人没有

祖国，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2）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被第二国际歪曲了。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 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 1894 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

第二国际（1889—1914 年）的领袖们，像普列汉诺夫先生、考茨基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了。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需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 1871 年巴黎公社以及 1905 年和 1917 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现实生活，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虽然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可是这种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这已经是群众的实践问题而不只是领袖们的理论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由脱离人民的武装队伍来控制群众。

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也是国家，因为我们需要武装队伍，需要最严格的秩序，需要用暴力来无情地镇压君主派和古契柯夫-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尝试。

但是，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俄国许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群众自己，就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居于人民之上、脱离人民、拥有特权、实际上从不撤换的人。

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看通常是资产阶级的那种民主，这种民主通过旧的君主制的管理机关即警察、军队和官吏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要向前看正在诞生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前，在 1917 年 3 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

现在的形势已和 1871—1914 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此外别无他法。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现在还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错误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5 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89—490 页。——编者注

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时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的利润所腐蚀，巴黎公社遭到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刚刚（1871年）胜利，半农奴制的俄国仍然沉睡不醒。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了解了要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全人类濒临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并且不知还会使多少百万人走向粗野和死亡。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怯懦地、不坚决地、不自觉地、对资产阶级过分信任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大多数的（这是真情，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要知道影响群众的正是这种工具——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跑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受了这些领袖的欺骗。

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就让“许多”工人去真诚地理解社会民主党吧。现在是学习区别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领袖。

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却是这样：我们党的旧名称便于人们欺骗群众，阻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处处见到那些说话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领袖，而这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他们都拿着“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期票要求兑现……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会把我们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怕同社会民族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混淆起来，不怕同法兰西共和国激进社会党人^[64]这个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骗群众最高明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党混淆起来呢？“……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正是这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明天的革命任务，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把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把包围着无产者的那帮“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家伙对实际事业的破坏都丢开不管了。这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守旧的理山。

而我们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万万卷进去、有千百亿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场战争除了进行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

可是我们又自己怕自己。我们还舍不得脱掉那件“穿惯了的”、“可爱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的”脏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

1917年4月10日于彼得格勒

后 记

由于经济破坏和彼得堡各印刷厂窝工，我这本小册子已经过时了。小册子是在1917年4月10日写成的，今天已经是5月28日了，可是还没有出版！

小册子是作为一个行动纲领草案来写的，准备在我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24]召开以前，用来宣传我的一些观点。小册子曾经用打字机打了若干份，在会前和会上发给一些党员，也总算起了它的一部分作用。现在，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会议已经开过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早已公布（见《士兵真理报》^[65]第13号增刊），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我的小册子有不少地方成了这些决议的初稿。

现在我只希望在涉及这些决议的场合，小册子对阐明这些决议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在第27页上我建议，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代表会议没有同意我这个意见，因此我不得不对关于国际的决议案投反对票。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代表会议犯了错误，事变的进程会很快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也是在推迟第三国际的建立（虽然这违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摆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的齐美尔瓦尔德这个沉重的包袱，就是间接地阻碍第三国际的建立。

现在我们党的处境（在全世界所有工人党的面前）正是要求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现在除了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拖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就能立刻放手去建立第三国际（同时，只要情况允许，还可以利用一下齐美尔瓦尔德）。

可是现在，由于代表会议的错误，我们只好消极地等待，至少要等到1917年7月5日（即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的日子；只要它不再来一次延期，就是万幸！它已经延期一次了……）^[66]

不过，代表会议闭幕后我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登在5月12日《真理报》第55号上的一项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决议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德去同部长们商量问题，我们就退出齐美尔瓦尔德。我愿表达如下希望：一旦我们召开“左派”（即“第三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见上面，第23—25页）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另一半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917年5月6日成立的“联合内阁”^[67]。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好像更是过时了。

其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一点也没有过时。它的一切论述都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这种分析对交出6个部长给10个资本家部长做人质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来说，像火一样可怕。既然小册子的一切论述是以阶

见本卷第61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6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57—60页。——编者注

级分析为依据的，它就没有过时，因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加入内阁，只不过稍微改变了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同资本家政府协议的形式，而我在小册子第 8 页上曾有意强调，“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

事情愈来愈清楚：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不过是资本家的人质，“革新的”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根本不想而且也不会履行自己的任何漂亮诺言。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在政治上已经自杀，他们已经成了资本家实际扼杀革命的帮手。而克伦斯基则已堕落到对群众使用暴力的地步（参看小册子第 9 页：“古契柯夫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群众”，而克伦斯基竟已经来实现这种威胁了……）^[68]。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已经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自杀。这一切，人民是会看得愈来愈清楚的。

联合内阁只是我的小册子简要分析过的我国革命根本阶级矛盾发展中的过渡现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存在。不是后退到全面的反革命，就是前进到使政权转到另外的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中，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

尼·列宁

1917 年 5 月 28 日于彼得堡

1917 年 9 月由彼得格勒波涛
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
第 150—185 页

同上，第 42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43 页。——编者注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69]
(1917年5月)

1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

(5月17日[30日]以前)

1. 地主的和私人的所有土地，以及皇族和教会等等的土地，都应该立即无偿地交给人民。

2. 农民应该通过农民代表苏维埃立即有组织地夺取当地的全部土地，从经济上加以支配，这丝毫不妨碍立宪会议或全俄苏维埃会议（如果人民把中央政权交给这种苏维埃会议的话）将来对土地制度作最后的决定。

3. 土地私有制应该根本废除，即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只应属于全体人民。土地应该由地方民主机关来支配。

4. 农民应该拒绝资本家、地主和他们的临时政府的意见，不同当地的地主达成立即支配土地的“协议”；全部土地如何支配的问题应该由当地多数农民的组织决议来确定，而不能由多数人（即农民）同少数人、而且是同极少数人（即地主）达成协议来确定。

5. 不仅地主现在和将来会千方百计地反对把全部地主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而且资本家也会这样做，后者拥有巨大势力，因为他们有钱，还能够通过报纸，通过许多习惯于资本统治的官吏、职员等等来影响目前还无知的群众。因此，不消除农民群众对资本家的信任，不建立起农民同城市工人的紧密联盟，不把全部国家政权完全交给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地主的全部土地就不能彻底地、牢靠地无偿交给农民。国家政权由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掌握，对国家的管理不是通过警察、官吏和脱离人民的常备军，而是通过全民的、工农都参加的武装民兵，只有那样，才能保证实现全体农民所要求的上述的土地改革。

6. 农业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即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畜和农具而靠部分雇佣劳动来取得生活资料的农民，应该尽一切力量单独成立苏维埃，或者在全体农民苏维埃中成立单独的小组，以便与那些必然想同资本家和地主勾结的富裕农民进行斗争，捍卫本身的利益。

7. 由于战争的缘故，俄国同一切交战国及许多中立国（非交战国）一样，因缺乏劳动力和煤铁等而受到经济破坏、灾难和饥饿的威胁。只有由工农代表监督和引导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才能拯救国家。因此，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工人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以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换取农具、鞋子、衣服和其他物品，不要通过资本家，不要让资本家管理工厂。为了同一目的，应该鼓励把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交给农民委员会共同使用。同样，还应该鼓励根据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在农艺师指导下把各个大的地主田庄改建成用优良农具共同耕作的示范农场。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70]

(1917年6月上旬)

1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 (6月4日[17日])

同志们，在给我的短短的时间里，我只能谈一谈执行委员会报告人和随后几个发言人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我想这样比较适当。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出席的是什么会议，现在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的苏维埃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在这里大谈特谈的革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大谈特谈革命民主，是为了掩盖他们对革命民主的毫不理解和彻底背弃。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论革命民主，而又模糊这个机构的性质、阶级成分和它在革命中的作用，对这些问题一字不提，同时却想要取得民主派的称号，真是怪事。他们把整个西欧过去就有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纲领向我们描述一番，把现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我国政府也在内）都承认的改革纲领也向我们描述一番，同时又对我们谈论革命民主。他们是对什么人谈这些话呢？是对苏维埃。那我就来问问你们，欧洲哪个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共和制的国家有类似苏维埃这样的机构呢？你们一定会回答说：没有。这种机构哪里也没有，也不可能，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产阶级政府以及人们向我们描述的、在所有国家里都提过几十次但仍然是一纸空文的改革“计划”；或者是人们现在向之发出呼吁的机构，即革命所创造的新型“政府”，这样的政府只是在革命最高涨的年代有过先例，例如1792年在法国，1871年也在法国，1905年在俄国。苏维埃，这是任何一个通常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所没有的机构，而且是不可能与资产阶级政府并存的机构。这是一种新的、更民主的国家类型，我们在我们党的决议中把它叫作农民-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里，唯一的政权属于工兵代表苏维埃。如果认为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以为这是可以回避的问题，或者用现在有某种机构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来搪塞，那都是徒劳的。不错，它们并存着。但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空前多的争执、冲突和摩擦。正是这种情况使俄国革命刚一高涨、刚一前进就转向停滞和倒退，也就是目前在俄国联合政府^[67]中，在整个对内对外政策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因准备发动帝国主义进攻而出现的倒退。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通常的资产阶级政府，那就不需要农民、工人、士兵等等苏维埃，苏维埃不是被那些手里有军队、根本不理睬克伦斯基部长高谈阔论的反革命将军解散，便是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些机构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不能后退，也不能停在原地，只有前进才能生存。这种国家类型不是俄国人臆想出来的，而是革命创造出来的，因为不这样，革命就不能胜利。在全俄苏维埃内部，必然会发生摩擦，发生党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但这将是以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来消除各种可能产生的错误和幻想（喧声），而不是靠部长们作报告，讲一些他们昨天说过的、明天要写的、后天要许诺的东西。同志们，从俄国革命所创立的、现在面临着生死存亡问题的机构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可笑的。苏维埃不能再按照现在的样子存在下去。工人和农民又不是

小孩子，竟要聚集在一起，通过一些决议，听取一些根本经不起实际检验的报告！这样的机构是向一种共和国过渡，这种共和国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建立一个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的坚强政权，这种政权在西欧还不能存在，而俄国革命没有这种政权就不能取得胜利，即不能取得对地主的胜利，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没有这种政权，就谈不上我们自己会取得这样的胜利，并且愈深入地研究人们在这里向我们建议的纲领和我们面临的事实，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愈突出。像报告人和其他发言人一样，人们都对我们说第一届临时政府^[8]真糟糕！可是以前，当布尔什维克，不走运的布尔什维克说“不给这个政府任何支持和信任”的时候，人们却纷纷责骂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现在大家都说上一届政府很糟糕，可是有准社会党人担任部长的联合政府又怎样呢？它和上一届政府有什么区别呢？难道空谈纲领、方案还谈得不够吗？难道这些东西还谈得不够吗？难道还不到采取行动的时候吗？从5月6日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请大家看看事实，看看俄国和所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经济破坏的情形吧。造成经济破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资本家的掠夺。这才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这是报纸公开承认的事实，而且不是我们的报纸，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绝对不是，而是部长的《工人报》^[61]。这家报纸说：“革命”政府提高了工业用煤的订货价格！！^[71]联合政府丝毫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有人问我们，俄国是否可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立刻进行根本的改造。同志们，这都是些毫无根据的托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正像他们经常阐述的那样：“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不可能向纯粹社会主义过渡的纯粹资本主义，只有某种中间的、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因为卷入资本家之间的罪恶战争的几亿人正面临着死亡。问题不在于答应进行一些改革——这是空话，问题在于采取我们现在需要采取的步骤。

如果你们要谈“革命”民主，那就请把这个概念同资本家内阁的改良主义民主区别开来，因为现在应当抛掉“革命民主”的空谈，不再拿“革命民主”来互相庆贺，而要按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科学社会主义教导我们的那样来作阶级评价。人们建议我们实行资本家内阁执政下的改良主义民主。从西欧通常的范例来看，这也许很好。可是，现在许多国家都处在灭亡的前夕，而那些实际措施，据前面发言的邮电部长公民说来，似乎复杂得简直难于实行，必须特别加以研究，其实这些措施是十分清楚的。他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我回答说：“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不放弃这样做，它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掌声，笑声）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但是，如果部长公民向我们和右派政党都提出这个问题，那他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答。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在还有自由的时候，在逮捕和流放西伯利亚等等威胁——这些来自同我们的准社会党人部长们共事的反革命分子的威胁还只是威胁的时候，任何一个政党都会说：信任我们，我们就会拿出我们的纲领。

我们的代表会议在4月29日已经提出这个纲领。可惜人们不重视这个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编者注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民出版社 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编者注

纲领，不按这个纲领去做。看来需要对这个纲领作一番通俗的解释。那就尽我所能，向邮电部长公民通俗地解释一下我们的决议，我们的纲领。关于经济危机，我们的纲领要求立刻——毫不拖延——公布资本家所获得的高达500—800%的骇人听闻的全部利润。这些利润并不是资本家在自由市场上，在“纯粹”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的，而是靠军事订货获得的。这才是真正需要而且可能实行工人监督的地方。这就是你们这些自称“革命”民主派的人应该代表苏维埃实行而且一夜之间就可以实行的措施。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让人民看清什么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什么是真正玩弄帝国主义的把戏，玩弄人民财产、玩弄几十万人生命的行为。这几十万人明天就会因我们继续扼杀希腊而丧命。把资本家老爷们的利润公布出来吧，把50个或100个最大的百万富翁逮捕起来吧，哪怕是以软禁尼古拉·罗曼诺夫的优待条件拘留他们几个星期也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迫使他们提供各种线索，说出种种骗人的把戏、肮脏的活动、自私自利的勾当，而这些东西使我们国家甚至在新政府管理下每天也得损失千百万财富。这就是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破坏的基本原因，因此我们说：我国一切都是老样子，联合内阁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多了一大堆宣言和动听的声明而已。不管人们多么真诚，不管他们多么真诚地希望劳动者过好日子，但是情况并没有改变，掌握政权的仍旧是原来那个阶级。现在实行的政治并不是民主政治。

有人对我们说，要使“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民主化”。难道你们真不知道，这些话只有对俄国才是新鲜东西吗？在其他国家不是已经有几十个准社会党人部长向他们的国家许过这样的诺言吗？我们面前摆着的活生生的具体事实是，地方居民选举政权机关，而中央却硬要任命或批准地方政权机关的人选，从而破坏了起码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试问这些诺言还有什么意义呢？资本家还在盗窃人民的财产。帝国主义战争还在进行。而有人却答应我们改革，改革，改革，这些改革在现在这个框框内根本不能实现，因为战争压倒一切，决定一切。有人说，战争并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你们为什么不同意这种说法呢？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看哪个阶级在当权，哪个阶级在继续做主人，哪个阶级在继续利用银行业务和金融业务赚取几千亿利润。这个阶级仍然是资本家阶级，因此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第一届临时政府也好，有准社会党人担任部长的政府也好，什么都没有改变：秘密条约还是秘密条约，俄国还是在为争夺两个海峡^[72]而战，为继续贯彻利亚霍夫对波斯的政策^[73]而战，以及其他等等。

我知道，你们不希望这样做，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样做，部长们也不希望这样做，因为不能希望这样做，因为这是杀害几亿人的生命。可是请看一看米留可夫之流和马克拉柯夫之流现在大谈特谈的进攻吧。他们完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这同政权问题，同革命问题有关。有人对我们说，应该把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别开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可笑的。立宪民主党人^[5]非常清楚现在提出的是政治问题。

至于说从下面发动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可能导致单独媾和，这是诬蔑。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我们要实行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逮捕那些最大的资本家，割断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一切线索。否则，谈论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都是讲空话。我们所要实行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撇开各国政府，向各国人民宣布：我们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强盗，不论是捷列先科——捷列先科丝毫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过比他稍微蠢些——还是法国的、英国的和其他一

切国家的资本家。

你们自己的《消息报》弄糊涂了^[74]，不是提议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而是提议保持原状。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没有兼并”的和约的。甚至农民代表大会^[69]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接近真理，它谈到要建立“联邦”共和国^[75]，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共和国不想用新的或旧的方式压迫任何一个民族，不想靠强制办法同任何一个民族共处，不论是芬兰也好，乌克兰也好，而陆军部长却对芬兰和乌克兰百般刁难，造成不能容许和无法容忍的冲突。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有坚强政权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共和国，但是坚强的政权要靠各民族自愿协议才能建立起来。“革命民主”是庄严的字眼，如今却用到了以卑鄙的刁难使乌克兰和芬兰问题复杂化的政府身上！其实乌克兰和芬兰并不愿意分离，它们只是说，不要把实施起码的民主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

只要你们不放弃你们的兼并，就缔结不了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实在可笑，像是耍把戏，欧洲每个工人都会嘲笑说：他们口头上说得很漂亮，号召各国人民打倒银行家，而自己却把本国银行家送进内阁去。逮捕银行家，揭穿他们的勾当，查出各种线索，——这些事情你们都不做，尽管你们拥有不容抗拒的权力机关。你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你们知道，革命不是按照定单制造的，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通过流血起义的艰苦道路实现的，而在俄国没有一个集团、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抗拒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这个革命如果立刻同一切资本家阶级决裂，立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那么在极短时期内就会得到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赞同，因为这些国家快要灭亡了，因为德国已经陷于绝境而不能自拔，因为法国……

（主席：“您发言的时间到了。”）

再有半分钟我就结束……（喧声，会场上有人要求继续讲下去，有人反对，有人鼓掌。）

（主席：“我向大会报告，主席团建议延长发言时间。谁反对？大多数赞成延长。”）

我刚才谈到，假如俄国的革命民主派不是口头上的民主派，而是实际上的民主派，那它就会推动革命前进，而不是同资本家妥协，不是空谈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而是取消俄国自己的兼并，并且公开宣告，它认为任何兼并都是犯罪和强盗行为。这样就能避免帝国主义为瓜分波斯和巴尔干而发动的使千百万人受到死亡威胁的进攻。这样就能开辟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但这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它并不排除真正革命的战争。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像巴扎罗夫今天在《新生活报》^[76]上提出的那样^[77]；我们只是说：俄国现在的情况是，它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阶段的任务比想象的要容易一些。俄国的地理条件非常好，假如强国敢于凭资本及资本的掠夺利益来反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同它接近的半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假如强国敢于这样做，那对它们来说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德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在美国参战以后（美国想吞并墨西哥，而且大概很快就会同日本打起来），德国就陷于绝境，它将被消灭。法国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吃的苦头比谁都多，它的力量消耗殆尽。这个国家的饥荒虽然没有德国厉害，但

人力的损失比德国大得多。如果你们第一步从限制俄国资本家的利润开始，使他们根本无法榨取几亿利润，如果你们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反对一切国家的资本家，并且直截了当地声明，你们决不同德国资本家以及一切直接或间接纵容他们或者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进行任何谈判和发生任何关系，你们拒绝同法国和英国资本家谈判，那你们才能够在工人面前控诉他们。你们也就不会把 发给麦克唐纳出国护照这件事^[78] 看成一个胜利，麦克唐纳从来没有进行过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允许他出国，是因为他没有表现出反对英国资本家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原则、实践和经验，而我们的马克林同志和其他几百个英国社会党人就是因为进行这种斗争而坐牢的，我们的李卜克内西同志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坐牢的，他被关在苦役监狱里就是因为他说过：“德国士兵们，向你们的皇帝开枪吧。”

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在专门重新召集的第三届杜马中（不过我不知道这届杜马算是第三届还是第四届），每天都在准备并且扬言要把我们送去服苦役，而且司法部已经在拟订有关的新法律草案，其实，把帝国主义者资本家送去服苦役岂不更正确吗？马克林和李卜克内西才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思想付诸行动的社会党人。这就是必须向各国政府说的话，为了争取和平，必须向各国人民控诉各国政府。这样，你们就能使一切帝国主义政府陷于混乱的境地。现在你们自己却陷于混乱的境地了，因为你们一方面在3月14日向人民发表的和平号召书^[79]上说，“打倒你们的皇帝、你们的国王和你们的银行家吧”，但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掌握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一种人数众多、经验丰富、有强大物质力量的空前未有的组织，却同我们的银行家订立联盟，成立准社会党人联合政府，草拟一些在欧洲已经草拟了好几十年的改革方案。欧洲在嘲笑这种争取和平的斗争。只有苏维埃取得了政权并且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欧洲人才能理解这种斗争。

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阶级的规模、通过反对资本家而不经流血革命来采取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步骤。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俄国。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存在，俄国就始终是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不可能同普通类型的临时政府长期共存。只有在转入进攻的时候，苏维埃才会照旧存在。转入进攻是俄国革命整个政策的转变，即从期待和平，从由下面举行革命起义来准备和平转为恢复战争。从一条战线上的士兵联欢进到所有战线上的士兵联欢，从冒着服苦役的危险用面包皮同饥饿的德国无产者交换小折刀的自发联欢进到自觉的联欢，这就是已经显示出来的道路。

我们一经掌握政权，就要制服资本家，那时，战争就不是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战争了，因为战争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进行战争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纸上写的东西来决定的。在纸上，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但是，只要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在政府中占多数，那么无论你写什么，无论你说得多漂亮，无论有多少准社会党人部长，战争还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大家都知道、都看到的。阿尔巴尼亚的例子，希腊和波斯例子^[80]，都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攻击我们关于进攻的书面声明^[81]，而关于具体例子，却没有一个人吭一声！答应拟订一些方案是容易的，可是具体的措施总是迟迟不采取。草拟关于没有兼并的和约的宣言是容易的，可是，阿尔巴尼亚、希腊和波斯的事例恰恰是在联合内阁成立以后发生的。《人民事业报》^[82]（这家报纸并不是我们党的机关报，它是政府的机关报，部长

们的机关报)就这些事例写道:扼杀希腊是对俄国民主的嘲弄^[83]。而米留可夫,就是那个被你们当作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他们党里的一个普通党员,跟捷列先科没有任何区别的米留可夫,连他也写道,协约国的外交扼杀了希腊。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此,不管你们多么想要和平,不管你们对劳动者的同情多么真诚,不管你们的和平愿望多么真诚(我完全相信,群众的和平愿望不可能不是真诚的),你们还是无能为力,因为除了进一步发展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结束战争。俄国革命一开始,来自下层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也就开始了。如果你们掌握了政权,如果政权转归革命组织并被用来进行反对俄国资本家的斗争,那时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就会信任你们,你们就可以提出媾和建议。那时我们的和平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保证,即从大量流血牺牲、陷于绝境的两个民族,从德国和法国得到保证。如果那时的形势使我们不得不进行革命战争(这一点谁也不知道,我们也不能担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们就会说:“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如果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如果它真正消除了资本家对事务的任何影响,使他们无法扩大经济破坏,无法从经济破坏中获得几亿利润,那我们是不拒绝进行战争的。”革命政权会毫无例外地向一切国家的人民解释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是自由的,德国人民不应该为保住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战,法国人民也不应该为保住法国的殖民地而战。因为法国如果为它的殖民地而战,那俄国也有希瓦和布哈拉^[84],这也是类似殖民地的地区,那时就会开始瓜分殖民地了。怎样进行瓜分,按照什么标准呢?按照实力。而实力已经起了变化,资本家的处境就是这样: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一旦你们取得革命政权,你们就可以通过革命道路来达到和平:向各国人民发出革命号召,用你们的例子来说明策略。那时在你们面前就会展开一条用革命方法取得和平的道路,你们就很有可能使几十万人免于死亡。那时你们就可以确信,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会声明赞成你们。而英国、美国、日本的资本家即使想要进行反革命工人阶级的战争(资本家一旦被制服、被排除,监督权一旦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就会增加十倍),即使美国、英国、日本的资本家想要进行战争,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可能。你们只要声明,你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你们要保卫自己的共和国,保卫工人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不受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侵犯,这样就足以保障和平了。

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关于进攻的声明具有如此根本性意义的原因。整个俄国革命史上的转折关头已经到来了。俄国革命的发生,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帮了忙的,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为俄国同中国或印度差不多。可是不然,俄国除了有一个现在是地主和资本家占多数的政府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这种按力量来说是世界上从未听到过和看见过的代表机构,虽然你们参加资产阶级联合内阁就是在扼杀这个代表机构。而且俄国革命还做到了使来自下层的反对资本家政府的革命斗争在各个国家中都获得了极大的同情。现在的问题是:前进还是后退。革命时期停留在原地不动是不行的。因此,从政治、经济的意义来说,而不是从战略的意义来说,进攻是整个俄国革命的转折点。现在举行进攻,就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就是继续使几十万、几百万人为扼杀波斯和其他弱小民族而丧命,客观上就是这样,不管这个或那个部长的意志和认识如何。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把政权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就是转到以人类历史上痛苦最少的最可靠的方式来进行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就是转到使革命工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取得政权和获得

胜利的保障。（会场上一部分人鼓掌）

载于 1917 年 6 月 15 日和 16 日
（28 日和 29 日）《真理报》第 82
号和第 83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
第 237—249 页

论口号

(1917年7月中旬)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像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

看来，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会遇到某种类似的情况。在我国革命已经永远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比如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它显然已经不正确了。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当前的迫切问题。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而当前，在7月4日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同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的形势是根本不同的。^[85]

那时候，即在过去的这一段革命时期，国内存在着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论在物质上或形式上都表明，国家政权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我们不会忘记，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那时候，政权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分掌政权。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在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最先迈出的、能够直接实现的一步的口号。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内，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当然也是最合乎愿望的，但是现在，革命的和平发展是绝对不可能了。

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口号。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不仅仅是指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不仅仅是如此。说当时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甚至还指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痛苦最少地进行。

人们对于后面这一点也是注意不够的。苏维埃按其阶级成分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通过试行他们自己的措施受到批判。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阶级和执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可能仍然是牢固的，而不会削弱。我们丝毫不能忽视，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各阶级间的对比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这会及时地有力地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靠拢工人，进而同工人联合起来。

如果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这对人民来说是最轻松、最有利的。这是一条痛苦最少的道路，所以在当时是应该以最大的

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的。但是现在，这个争取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斗争已经结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我们所以说7月4日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因为在这以后客观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政权动摇不定的状态结束了。政权在决定性的地方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16]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5]妥协的基础上，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演变使它们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屠杀的参与者和帮凶。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因而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月27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86]勾结在一起，半拉半吓地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了过去，把实际的国家政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

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象是唐·吉诃德精神^[87]，或者是一种嘲笑。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现在也是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或作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维埃内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刽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只当作没有发生。

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残杀布尔什维克、支持过在前线进行枪杀和解除过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所谓“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主要的）是像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实质。

问题的这一实质在于，用和平方法现在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了。现在能够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目前实际的执政者，即依靠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军队、依靠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的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

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革命的人民群众才能够战胜这些新的执政者，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

谁把市侩的道德观念混杂在政治问题中，谁就会这样议论：就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卡芬雅克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和革命部队的武装，犯了“错误”，但也应当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阻难”他们改正“错误”；要使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地倒向工人方面来。这种议论，如果不是对工人的又一次欺骗，也是一种幼稚的或简直是愚蠢的见解，因为小资产阶级群众倒向工人方面来，只是而且正是指他们离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现在只有宣布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唐恩和拉基特尼科夫是刽子手的帮凶，那才能算是改正“错误”。我们完全地无条件地赞成这样“改正错误”……

我们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应当作一补充：正是在革命中，我们随时会遇到看不清真正的政权在哪里这种情况，会遇到形式上的

政权和实际的政权相分离的情况。这也正是一切革命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1917年3、4月间，人们不知道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维埃手中。

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使觉悟的工人冷静地观察一下革命的根本问题：目前国家政权是在谁的手里。只要你想一想政权的物质表现是什么，而不把空话当作事实，那你就并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国家首先就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之类的物质的附属物。在目前，那就是士官生和特地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的哥萨克，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就是那些封闭《真理报》^[23]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某一部分士兵武装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士兵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军队的人。正是这些刽子手掌握着实际的政权。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是没有实权的部长，是傀儡部长，是支持屠杀的那些政党的领袖。这是事实。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本人也许“不赞成”屠杀，他们的报纸战战兢兢地表白同屠杀没有瓜葛，那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种政治外表的变化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封闭彼得格勒15万选民的报纸，士官生因工人沃伊诺夫从印刷厂拿出《真理报小报》^[88]就把他杀害（7月6日），这难道不是屠杀吗？这难道不是卡芬雅克分子干的勾当吗？有人会对我们说：无论是政府，还是苏维埃都“没有过错”。

我们回答说，这对政府和苏维埃来说就更糟糕，因为这说明它们等于零，它们是傀儡，并不掌握实际的政权。

人民首先应当十分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真相，应当知道实际上是谁掌握着国家政权。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政权掌握在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克伦斯基、某些将军和军官等）手里，而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整个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所有黑帮报纸，通过《新时报》^[89]、《现代言论报》^[90]等等进行活动的一切君主派都支持他们。

必须推翻这个政权。否则一切关于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话都是空话，都是“欺骗自己，欺骗人民”。

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党现在都拥护这个政权，因此必须向人民说明他们充当着刽子手的角色，并且说明这些政党在4月21日、5月5日、6月9日和7月4日犯了“错误”^[91]以后，在他们赞同进攻政策（这种政策预先就大体决定了卡芬雅克分子在7月的胜利）以后，是必然会有这种“结局”的。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使鼓动工作考虑到当前革命的具体经验，特别是七月事变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说，应当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敌人是那帮军人，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并且应当明确地揭露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直起着刽子手帮凶的作用。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必须说明，不推翻那帮军人的政权，不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使他们失去人民的信任，农民就绝对没有希望获得土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条件下，要达到这一步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困难的过程，但是战争和经济破坏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这种

“加速器”可以使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相当于一年。

对于以上论述，大概会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谈坚决斗争就是鼓励分散地发动斗争，而这正好是帮助反革命势力；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推翻反革命势力，这意味着政权仍然转到苏维埃手里。

我们对第一种反对意见回答说，俄国工人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决不会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时刻受人挑拨。如果他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和反抗，那会对反革命有利，这一点是无庸争辩的。只有在广大群众中重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只是一般地谈论革命高涨、革命高潮、西欧工人的援助等等是不够的，必须从我们的过去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考虑我们自己的教训。经过这样考虑就一定会提出同夺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

第二种反对意见归结起来也是用过于一般的议论来偷换具体的真理。除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有了1917年7月的经验以后，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无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已经回答过，哪些情况能够非常迅速地使这一点加快实现。

在这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苏维埃，但是不是现在的苏维埃，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关。到那时候，我们也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来组织整个国家，这是必然的。这不是一般苏维埃的问题，而是同目前的反革命势力，同目前的苏维埃的背叛行为作斗争的问题。

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现在的苏维埃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而垮台了，完全破产了。现在，这些苏维埃像是一群被牵去宰割、在屠刀下咩咩哀叫的绵羊。现在，苏维埃在节节胜利的反革命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一筹莫展。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号召把政权交给现在的苏维埃，如果这样说，如果号召这样做，那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欺骗人民。而欺骗是最危险的行为。

从2月27日至7月4日这个俄国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发展周期已告结束。新的周期开始了，在这个周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在斗争烈火中更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应当运用新的即七月事变以后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在新的周期开始时，必须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已经取得胜利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它妥协，而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战胜它。当然，在这个新的周期，无论是反革命势力获得彻底的胜利，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彻底的失败（不进行斗争），或是掀起新革命的新高潮，都还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留待以后这些阶段分别出现时再谈了……

革命的教训

(1917年7月底)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应当仔细考虑俄国革命的教训，特别是现在7月底，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更应当如此。

—

我们看一看，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究竟是要得到什么？他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不是给人们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对前线士兵实行死刑^[92]，把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捣毁工人报纸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纸。常常甚至没有提出任何罪名，或提出显然是诬告的罪名，就逮捕布尔什维克。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惩办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破坏自由，因为这只是根据一定的罪名惩办一定的人。这种反驳显然是故意胡说，即使个别人犯了罪，即使这种罪名已经由法庭证明和认定，那也不能因此而捣毁印刷所和查封报纸。如果政府公布一条法律，确认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它的方针和观点都是违法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谁都知道，自由俄国的政府根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做。

地主和资本家的报纸因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而疯狂地谩骂布尔什维克，甚至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指控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罪名时，就公开要求逮捕和惩办布尔什维克，这是揭穿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纯属诬陷的主要证据。

人民要求和平。而自由俄国的革命政府，却依然根据从前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让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人民而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又重新恢复了侵略战争。这些秘密条约一直没有公布。自由俄国的政府借词推托，始终没有向各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和约。

粮食没有了。饥荒又要来了。大家都看到，资本家和富人靠军事订货丧心病狂地盗窃国库（现在战争每天要耗费人民5000万卢布），靠抬高物价榨取空前的利润，但是，在让工人认真地计算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简直什么也没有做。资本家愈来愈猖狂，把工人赶出大门，而且正是在人民苦于商品匮乏的时候。

大多数农民在许多次代表大会上响亮而明确地发表声明，宣布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抢劫。但是自称为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府却一连好几个月都在愚弄农民，用诺言和拖延手段欺骗农民。资本家一连好几个月不让切尔诺夫部长颁布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而在这个法律终于公布出来之后，资本家又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并且直到现在还在攻击。政府在保护地主方面是这样的卑鄙无耻，竟开始把“擅自”夺取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

愚弄农民，劝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资本家则一再拖延，推迟召开这个会议。现在，在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下，这个会议已定于9月30日召开，可是资本家又公开叫嚷，说这个期限“过于”短促，要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19]……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5]的一些最有势力的党员，如帕宁娜，就公然鼓吹把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

解决土地问题要等到立宪会议召开。召开立宪会议要等到战争结束。结束战争要等到完全胜利。结果就是这样。在政府中占多数的资本家和地主简直是在嘲弄农民。

二

在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自由国家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

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1917年2月27日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在将近4个月中，俄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是通过各个自由组成的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管理的。因此，要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首先必须研究主要政党的情况，这些政党维护哪些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政党的相互关系怎样。

三

在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国家政权转到第一届临时政府^[8]手中。这个政府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资本家所组成，而同他们连成一气的还有地主。资本家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占最重要的地位，它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或者说政府党。

政权落到这个政党手中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当时同沙皇军队斗争、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的根本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和农民，水兵和士兵。政权之所以落到资本家政党手中，是因为这个阶级拥有财富、组织和知识这些力量。在1905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间，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阶级在本身的组织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

立宪民主党一直是君主派政党，1905年是这样，从1905年到1917年还是这样。在人民战胜沙皇暴政以后，这个党就宣布自己是共和派政党了。历史经验表明，当人民战胜了君主制的时候，资本家的政党总是愿意成为共和

派政党的，只要能够保住资本家的特权和它对人民的绝对统治。

立宪民主党在口头上拥护“人民自由”，实际上它拥护的是资本家，于是所有的地主、君主派和黑帮分子^[86]马上就站到它那边去了。报刊和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以后，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所有黑帮的刊物都同立宪民主党人唱起了一个调子。一切君主派政党还不敢公开活动，于是在选举中，例如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就支持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人在取得政府权力以后，便想方设法继续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是同英法资本家签订掠夺性秘密条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进行的。根据这些条约，俄国资本家在战争胜利后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洞的托词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对工农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

人民利用获得的自由，自动地开始组织起来。占俄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要组织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在二月革命时已开始形成，二月革命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俄国多数大城市和许多县城中，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就通过苏维埃联合起来了。

苏维埃的选举是完全自由的。苏维埃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即工农的组织。苏维埃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工人和穿着军服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

不言而喻，苏维埃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只有这样，我国革命才能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这样，真正争取和平、真正厌恶侵略战争的劳动群众，才能够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结束侵略战争和实现和平的政策。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才能制裁那些大发“战争”横财而使国家遭到经济破坏和饥荒的资本家。但是，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16]。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

四

我们首先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然后再来探讨多数人民信任他们的原因。

五

在俄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资本家妥协。

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刚被推翻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作“社会党人”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从来都不是社会党人，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10]，直到1917年3月才成

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就通过他来尽量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果然给软化了，他们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

苏维埃认为自己是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苏维埃的领袖们成立了所谓“联络委员会”^[93]，也就是同政府联络、接洽的委员会。在这个联络委员会中，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袖经常同资本家政府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不管部部长或非正式的部长。

整个3月间和几乎整个4月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资本家一再拖延，支吾搪塞，竭力争取时间。在这个时期中，资本家政府没有为发展革命采取过任何一项比较认真的措施，连召开立宪会议这个由它直接承担的任务，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完成，没有向各地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成立中央的筹备委员会。政府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恢复由沙皇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掠夺性国际条约，尽量小心谨慎、不露形迹地阻挠革命，什么都答应，什么都不执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联络委员会”里当了傻瓜，他们被动听的词句、诺言和“明天就办”的空话喂饱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像一篇著名寓言中的乌鸦^[94]一样，经不起阿谀奉承，高兴地听信资本家所作的保证，说什么他们高度尊重苏维埃，未经苏维埃同意决不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时间一天天过去，资本家政府并没有为革命做任何事情。但是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恢复了掠夺性的秘密条约，更确切些说，就是确认了这些条约，并且还同样秘密地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外交官进行谈判，使这些条约“起死回生”。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为作战部队的将军和军官建立反革命组织（至少使他们互相接近）奠定了基础。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开始把工业家、厂主组织起来，这些人在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再让步，但同时又开始暗中破坏生产，准备一到适当的时机就停止生产。

但是，把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组织到苏维埃中去的工作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被压迫阶级的优秀分子已经感觉到，尽管政府同彼得格勒苏维埃^[3]达成了协议，尽管克伦斯基吹得天花乱坠，尽管有了“联络委员会”，这个政府仍然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群众已经感觉到，如果不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业就必然遭到失败。群众已经愈来愈愤怒了，愈来愈不能忍耐了。

六

群众的这种情绪在4月20—21日爆发了。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作过准备。这个运动非常猛烈地反对政府，有一个团甚至全副武装出动，到玛丽亚宫去逮捕各部部长。大家都非常清楚，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苏维埃本来可以（而且应当）把政权拿到手，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政府，由于同政府妥协而更加束缚了自己，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断送革命的步骤。

革命迅速地深刻地教育了各个阶级，这种速度和深刻程度在平时，在平静时期是不曾有过的。组织得最好、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方面经验最多的资本家学得最快。他们看到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国家资本家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用来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组织所谓“联合内阁”，即由资产阶级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倒戈分子联合组成共同的内阁。

在自由、民主和革命工人运动同时并存最长久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资本家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社会党人”领袖们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后，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俄国“民主共和派”资本家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马上就上了钩，于是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参加的“联合”内阁^[67]也就在5月6日成了事实。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傻瓜们欢天喜地，沐浴在领袖入阁的荣耀的光辉中洋洋自得。资本家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们得到了“苏维埃领袖”这些反人民的帮手，得到了这些人支持“在前线发动进攻”即恢复已经中断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承诺。资本家知道这些领袖外强中干，知道资产阶级关于监督生产以至组织生产、关于实行和平政策等等诺言是永远不会兑现的。

结果正是这样。在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从5月6日到6月9日或18日，完全证实资本家的算盘打对了，他们的确毫不费力就愚弄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当彼舍霍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宣称要把资本家的利润100%拿过来，说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等等，用这些花言巧语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的时候，资本家却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裁资本家。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部长已经成了转移被压迫阶级视线的留声机，而整个国家管理机关实际上仍然操在官僚（官吏）和资产阶级手中。臭名昭著的工业部副部长帕尔钦斯基就是这类机关的典型人物，他对任何反对资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挠。部长们专事空谈，一切仍然照旧。

策列铁里部长更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革命的工具。当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者大胆地起来撤换政府任命的委员时，策列铁里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安抚”工作。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喀琅施塔得大肆进行恶毒的疯狂的造谣、诽谤和攻击，给它加上企图“脱离俄国”的罪名，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来吓唬小资产阶级和庸人。而策列铁里就是被吓坏了的愚蠢庸人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比谁都“老实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攻击的圈套，比谁都卖力地“抨击和安抚了”喀琅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当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结果他成了同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成立如下一项“协议”的工具：喀琅施塔得的委员不能简单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选举，政府批准。背离社会主义而投靠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就是把时间花在进行这类可耻的妥协上面。

凡是资产者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党人”部长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面讲话（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拚命替内阁辩护，粉饰资本家，一次又一次地用诺言欺骗人民，劝大家等待，等

待，再等待。

切尔诺夫部长尤其忙于同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作交易，直到7月间，直到在7月3—4日的运动后新的“政权危机”发生^[85]，直到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切尔诺夫部长一直忙于办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众望的事情，即“开导”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劝他们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买卖。禁止土地买卖的诺言是在彼得格勒全俄农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上极其庄重地向农民宣布的。但是诺言仍旧是诺言。切尔诺夫无论在5月或6月都没有能履行这个诺言，直到7月3—4日，由于革命的浪潮自发地起来了，恰好立宪民主党人又退出内阁，这样他才有可能实行这项措施。但是就在当时，这也是一项孤立的措施，不能使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真正得到改善。

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未能完成的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任务，即恢复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任务，这时由社会革命党新党员“革命民主派”克伦斯基在前线顺利地出色地执行了。克伦斯基在欣赏自己的口才，而那些把他当作小卒任意摆布的帝国主义者则恭维他，奉承他，崇拜他，因为他死心塌地为资本家服务，劝导“革命军队”同意恢复战争，以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条约，使俄国资本家能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利沃夫，得到埃尔泽鲁姆和特拉布宗^[95]。

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5月6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在“社会党人”部长的掩护和保卫下，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准备好了进攻，既要对外部敌人发动攻势，又要向内部敌人即革命工人进攻。

七

6月9日，革命工人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在彼得格勒举行示威，使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满和愤怒有组织地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被自己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所牵制，被帝国主义的进攻政策所束缚，感到自己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而非常恐慌。到处都发出反对游行示威的狂吠，而且这一次是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沆瀣一气。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行同资本家妥协的政策，在他们的领导下，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联盟的形势就完全确定了，并且非常明显。6月9日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就在这里。

布尔什维克取消了这次示威，他们决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导工人去同联合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殊死的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了多少保持一点群众的信任，不得不定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资产阶级怒不可遏，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倒向无产阶级方面的表现，于是决定在前线发动攻势来麻痹民主派的行动。

果然，6月18日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即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在彼得堡的群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6月19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庄严宣布，就在6月18日前线发起了进攻。

所谓波拿巴主义（因法国两个名叫波拿巴的皇帝而得名），是指这样一种政府，这种政府利用资本家政党和工人政党之间的极端尖锐的斗争，竭力装作超越党派。实际上这种政府是替资本家服务的，它最善于用诺言和小恩小惠欺骗工人。

这次进攻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恢复掠夺战争。因此，进攻一方面必然使沙文主义大大加强，使军权（因而也使政权）转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另一方面必然对群众采取暴力，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

如果说5月6日是用绳索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绑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战车上，那么6月19日则是用锁链把他们当作资本家的奴仆锁住了。

八

由于重新挑起掠夺战争，群众的愤怒自然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增长起来。7月3—4日，群众的愤怒爆发了，布尔什维克试图制止这种爆发，而且理所当然应该设法使它采取最有组织的形式。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被主人锁住了的资产阶级奴隶同意一切照办：同意把反动军队调进彼得格勒，同意恢复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军队的武装，同意非法逮捕、缉拿人犯和查封报纸。于是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不能完全掌握的而苏维埃又不愿意掌握的政权，就落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地主和资本家是完全支持他们的。

一级一级滚下去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既然躺在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斜坡上，就不能不往下滚，一直滚到底。2月28日，他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答应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5月6日，他们拯救了要垮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并且同意实行进攻。6月9日，他们同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对革命无产阶级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造谣和诽谤。6月19日，他们赞同重新挑起掠夺战争。7月3日，他们同意把反动军队调来，这是向波拿巴主义者彻底交权的开端。一级一级地滚下去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落得这样可耻的下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小业主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造成的结果，欧洲的经验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九

当然，谁都看见过小业主怎样拚命挣扎，想“出人头地”，想做真正的业主，想上升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资产阶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小业主或者是自己成为资本家（在100个小业主中，至多有1个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是破产，成为半无产者，最后成为无产者，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这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多次证明了的。

俄国革命的事态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造成的极深刻的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得非常迅速，俄国革命的经验即1917年2月到7月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地位不稳定这一条老真理。

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到革命工人这边来。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贫苦农民支持他们的话）才能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无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的自由，战胜饥荒，消除战争，达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

后 记

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在7月底写的。

8月间革命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本文的论点。后来在8月底发生了科尔尼洛夫叛乱^[96]，造成了革命的新转变，从而向全体人民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勾结反革命将军是想解散苏维埃，恢复君主制。革命的这一新转变的势头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结束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有害政策，不久即可见分晓……

尼·列宁

1917年9月6日

正文载于1917年8月30日和31日
(9月12日和13日)《工人日报》第8
号和第9号

后记载于1917年波涛出版社出版的
尼·列宁《革命的教训》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
第50—65页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97]
(1917年8—9月)

第一版序言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海德门和费边派^[33]，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者
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即第 2 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 2 章中增加了第 3 节。

作者

1918 年 12 月 17 日于莫斯科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了第6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98]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编者注

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16]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十分明确地得出来的。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忘记”和歪曲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要详细地证明。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织^[99]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划分“很自然”，但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力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

西都是以前的氏族 克兰 社会所没有的。……”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种“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同武装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觉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

19世纪末，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只能是这样。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特殊的、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盖了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就其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等等来说，固然会不同于拿着树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恩格斯在上面的论述中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时，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使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这段话至迟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页。——编者注

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4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6页）。——编者注

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纪第二十年代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竞争的侵略者”，即进行掠夺的大国瓜分完了。从此陆海军备无限增长，1914—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即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使贪婪的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酿成大灾大难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个大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特殊的、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站在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比克兰代表更大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论问题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的俾斯麦，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开始迫害革命无产阶级以后，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168页。——编者注

同上，第168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编者注

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婚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 12 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结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考虑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说普选制是。

“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他们的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这种荒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白、准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荒谬性，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今的”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传最广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这种引用也多半好像是对神像鞠一下躬，也就是为了例行公事式地对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而丝毫不去考虑，先要经过多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9 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0 页。——编者注

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他们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所说的国家“自行消亡”这句话是这样著名，这样经常地被人引证，又这样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手法的实质，以致对它必须详细地考察一下。现在我们把谈到这句话的整段论述援引如下：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德文第3版第301—303页）

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被现代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接受的只有这样一点 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废除”说不同，按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样来削剪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意味着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

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歪曲，所以产生这种歪曲，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忘记了我们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极重要的情况和想法。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这样一来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人们是“照例不”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一种“黑格尔主义的

毛病”。其实这句话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即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按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这个出色的极其深刻的定义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人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就是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一种（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鲜明地说“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也是国家、因而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本身，就是说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他说明这个原理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且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国家自行消亡”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

可以担保，在 1 万个读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论的人中，有 9990 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 10 个人中可能有 9 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伟大的革命学说竟然这样被人不知不觉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观念。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被千百次地重复，庸俗化，极其简单地灌到头脑中去，变成固执的偏见。而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却被抹杀和“忘记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 70 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除了对于民主概念的市会的、夸张的描写，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由于当时是在合法地用这个口号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上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个口号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 70 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100]

第五，在恩格斯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

论述，还有关于暴力革命意义的论述。恩格斯从历史上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评述变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颂扬。但是，“谁都不记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党内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这些思想在对群众进行的日常宣传鼓动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论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是联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的。

请看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101]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德文第3版第193页；第2编第4章末）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一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说里呢？

人们通常是借助折衷主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随心所欲（或者为了讨好当权者），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时而抽出这个论述时而抽出那个论述，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正是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鲜，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可以见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下面还要更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30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102]的时候，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过头话”，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224页。——编者注

同上，第1卷第160—161页和第285—286页。——编者注

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都详细而具体地发展了他们的这些观点。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他们学说中这个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1848—1851 年的经验

1. 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 1848 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部著作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从 1848—1851 年革命的经验作出结论以前不久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885 年德文版第 182 页）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 年 11 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06 年德文第 7 版第 31 页和第 37 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103]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占支配地位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人忘记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的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0 页。——编者注

同上，第 263 页和第 272 页。——编者注

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革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英、法、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104]，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 1848—1851 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2. 革命的总结

关于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 1848—1851 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105]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黑体是我们用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半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106]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 50 万人的官吏队伍和 50 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职能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 年汉堡第 4 版第 98—99 页）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 1852 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 1848—1851 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91—692 页。——编者注

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无产阶级在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他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作寄生机体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当然，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竟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和粉饰的市侩，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无可置疑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为数很多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还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情况吧：以前优先给予黑帮分子^[86]的官吏位置，现已成为立宪民主党人^[5]、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猎取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且又把立宪会议慢吞吞地推迟到战争结束再举行！至于瓜分战利品，攫取部长、副部长、总督等等职位，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的例子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

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 1848—1851 年这三年法国历史更广阔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 3 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国家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907 年版第 4 页）

最后一句评语已经过时了，因为从 1871 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使阶级斗争达到彻底的结局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法国在 1848—1851 年这 3 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 1852 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1907 年，梅林把 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107]上（第 25 年卷第 2 册第 164 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1—602 页。——编者注
第 2 版增加的一节。

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书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10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587—682页。——编者注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1. 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 1870 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当 1871 年 3 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像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 1905 年 11 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斗争，而在 1905 年 12 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着用不着拿起武器”^[109]。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110]，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 1872 年 6 月 24 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 年 4 月 12 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50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9 页。——编者注

同上，第 2 卷第 372 页。——编者注

革命的下一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 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 20 年卷（1901—1902）第 1 册第 709 页）（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 1871 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 1917 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 1914—1917 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 20 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111]或土耳其革命^[112]，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 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1871 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2 页。——编者注

见本版选集第 1 卷第 699—708 页。——编者注

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113]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面。”“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

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斯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3. 取消议会制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议会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评，现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之列。部长和职业议员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把批评议会制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又根据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宣布，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党人”就产生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像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屏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问题，如果把议会看作国家的一种机构，从无产阶级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和第376页。——编者注

级在这方面的任务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摆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读作：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不知道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击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带有腐朽的市侩习气的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议会，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党人”部长先生们用空谈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农民。在政府里，不断地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在官厅里，在司令部里，却在“干着”“国家”工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82]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上流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党人”（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还是旧的，还在按旧的方式行使职权，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坏革命的创举！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情况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官场里的切尔诺夫、鲁萨诺夫、晋季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满不在乎地在公众面前像谈小事情一样厚着脸皮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佬的，官吏的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联合的实质。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除非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是空谈，除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不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是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像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产阶级民主需要的那种官吏的职能时，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作比喻，即拿雇

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作比喻。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就像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而从来不对这些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像普列汉诺夫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或者像策列铁里说“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一样。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19世纪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样式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对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如同对所有“国家”官吏的工作一样，付给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在对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它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考虑到了实际上已经由公社开始了的尝试（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4. 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个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114]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理解，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多么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想必他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像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Auf Lösung——直译是解散、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第136页）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東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376页。——编者注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他们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斯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斯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斯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但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充耳不闻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物这样的话。

5. 消灭寄生物——国家

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的言论，现在还应当补充几段。

马克思写道：“……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bricht——打碎）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115]>……是反对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

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東西了。”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被废弃”，——这就是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在国家问题上使用的说法。

所有这些都是将近半世纪以前写的，现在必须把这些话发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观察了他经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作出的结论，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骗人的东西。……”

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对法国历史作了精确的观察，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导致的结论：事情已到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地步。

当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

第四章 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马克思对公社经验的意义问题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

1. 《住宅问题》

恩格斯在他论住宅问题的著作（1872年）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几次谈到了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今的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说明了向消灭国家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为社会福利所要求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

（1887年德文版第22页）

这里没有考察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谈到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剥夺和占据住宅是根据现今国家的命令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116]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第68页）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触及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需要有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9—550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5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4—545页。——编者注

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20]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来的时候，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第55页）一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从事剿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认“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也算作“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给国际主义者加上无政府主义的罪名现在是愈来愈时行了。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们来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是特别有益的。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文章^[117]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文章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40页）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同上，第527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讥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权威主义者”，也就是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轮船来说吧，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设施，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页）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554页。——编者注

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

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种十足的市侩式的庸俗论调：“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的庸俗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头脑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地提出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可以说是把它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含糊地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无论在对待银行方面还是在对待国家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3. 给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18—28 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附带说一下，据我们所知，倍倍尔第一次发表这封信是在他 1911 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 2 卷里，也就是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 36 年之后。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118]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 321—322 页）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 1875 年 5 月 5 日）里曾作过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如果向为了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出来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在修改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建议。困难也许只是在用词上。德文中有两个词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词不是指单个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也许只好采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词，虽然这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再是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无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这种攻击有正确之处，因为“人民国家”像“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都是无稽之谈，都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使它摆脱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搁置了36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诫过的那些错误。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也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却可以看到国家问题上一种完全错误的论调：

“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们的目的》1886年

德文版第14页）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9版（第9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听任一些人如此顽固地重复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调，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4. 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10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对爱尔福特纲领^[119]草案的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顺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

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回过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方面的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120]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编者注

同上，第273页。——编者注

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 1917 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恩格斯在谈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制共和国问题时写道：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 1866 年和 1870 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3 页。——编者注

同上，第 273—274 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5—276 页。——编者注

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而在这些特殊条件中，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虽然无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问题来掩盖这种反动性的行为，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这种倾向。

在英国，无论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语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似乎已经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他承认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前进一步”。自然，这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

但是，恩格斯绝对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 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坚决不要这样的官吏，就像不要普鲁士的 Landrat 和 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党人”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23]（1917年5月28日第68号）上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所谓革命民主派的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们是如何令人气愤地背弃民主主义。自然，这些通过“联合”而把自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推翻了一种非常流行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277页。——编者注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80—183页。——编者注

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非常流行的偏见，即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 1792—1798 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见。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关于地方自治这整个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没有充分注意。

5. 1891 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 3 版写的导言中（导言注明的日期是 1891 年 3 月 18 日，最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顺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问题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还对公社的教训作了极其鲜明的概括。这个概括，由于考虑到了公社以后 20 年的全部经验而作得非常深刻，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对国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中，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121]）落到了“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列铁里身上。他在 6 月 11 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122]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既说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又说成这就是“国家的”需要！

策列铁里在 6 月 11 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研究 1917 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证明策列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恩格斯顺便提出的另外一个也是有关国家问题的意见是谈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它的日益腐化而愈来愈机会主义化，愈来愈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进行庸俗的歪曲。就是说，把这个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问题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起来反对的就是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完全背叛，但恩格斯在 1891 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内机会主义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说得很谨慎：

“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26 页。——编者注

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

恩格斯故意强调“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侩的水平，这种市侩可以容许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

将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在探讨该党 1914 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时，会找到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的材料：从该党思想领袖考茨基的论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门的暧昧言论起，直到党对 1913 年的与教会分离的运动^[123]的态度止。

现在我们来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后 20 年是怎样为斗争的无产阶级总结公社教训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认为最重要的教训：

“……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 1798 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 6000 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以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荣耀的”职位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部找到肥缺的桥梁，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0—331 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4 页。——编者注

名义上约等于 2400 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 6000 卢布。有些布尔什维克提议，例如在市社马内，给 9000 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议全国以 000 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是完全不可饶恕的。[12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5 页。——编者注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所犯的那种错误：他们说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巧妙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论断，对于任何一种民主制度，包括给官吏发微薄薪金的办法在内，都可以套得上，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彻底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任何民主都是会消亡的。

这是一种诡辩，正像一句古老的笑话所说的：一个人掉了一根头发，他是否就成了秃子呢？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恩格斯继续写道：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3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恩格斯告诫德国人，叫他们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原理。他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直接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的教训，因为他们在“联合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形式，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2）为什么只有新一代才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呢？这个问题是同民主的消除问题联系着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

6. 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给自己那本 19 世纪 70 年代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作序(1894 年 1 月 3 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写道,在所有的文章里,他都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而不用“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125]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mag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然而,对真正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 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

也许哪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话来安慰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有真正的政党,它在很好地发展;就连“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名词,这个除了表示我们在 1903 年布鲁塞尔—伦敦代表大会^[126]上占多数这一完全偶然的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词,也还“可以过得去”……现在,由于共和党和“革命”市侩民主派在 7、8 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127]，“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除此而外,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对我在 4 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但是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告诫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们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90 页。——编者注

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101、110 页和本卷第 16 页。——编者注

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第9年卷第1册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同我们在前面研究过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粗略地对照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纲领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一词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仿佛存在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要解决的任务不同。恩格斯的任务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概括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十分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题目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时，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造成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5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编者注

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以后，就来提出问题，并且好像是告诫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实肯定了的科学材料。

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

2.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关于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材料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是怎样变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编者注

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得惊人地长久和稳定，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而在这个时期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来“利用合法性”，来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举世未有的高度。

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看到的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万雇佣工人中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500万雇佣工人中有300万是工会会员！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并不像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线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

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千百万次地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而且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很明显，剥削者少数要能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就必须实行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就必须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其次，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过程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动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

随之消亡。

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扣除后备基金、扩大生产的基金和机器“磨损”的补偿等等，然后从消费品中还要扣除用作管理费用以及用于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像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估计。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他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作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教授，包括“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

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只是现在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像夏洛克^[128]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129]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正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许诺，谈到“实施”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仅没有许诺过，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实施”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为这根本无法“实施”。

这里我们也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不正确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来着重谈论它就很不可笑了，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个别无政府主义者（在克鲁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尔纳利森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已经“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者如少数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格耶所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话）。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阶段之一。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

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如下的结果：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会更好工作。）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有关的字据。

当大多数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是“政治国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理职能”（参看上面第4章第2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像整个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直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和助长机会主义的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庸俗化。

为了说明（哪怕是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吧。

1. 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书名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诺夫竟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论述这个主题而完全回避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他的这本小册子有两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

这两个主题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理主义者^[130]，半庸人。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怎样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自己在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31]闭幕才两年。”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不理睬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已经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多。难怪有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页。——编者注

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有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又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现过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132]，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论战，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33]上提出的决议叫作“橡皮性”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一些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现在，当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就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本身来看，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来看，我们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Spreng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像样的了。

而考茨基在详尽驳斥伯恩施坦主义^[134]的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

但一般说来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斯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 1852 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135]，考茨基却只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斯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 172 页）

这不是反驳伯恩斯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到 1891 年这 40 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 1899 年，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偷换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作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这一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他那本论“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课题。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在谈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限于此，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得政权。恰巧马克思在 1872 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中已经“过时的”东西^[136]，考茨基却在 1902 年把它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这样一节：“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其中既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又讲到国内战争，又讲到“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已经给了工人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德国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纲领”。接着他叙述了纲领的各条。至于 1871 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像“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进行持久的和深入的斗争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通过“深入的”斗争这种空洞而浮夸的言词回避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在口头上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么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

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来组织。”（1903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148页和第115页）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训作例子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一个工厂、大商店和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都绝对要求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给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会有完全停产或损坏机器和产品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像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像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我们国内最反动的时期出版的^[137]）。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像1899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泛谈革命纲领，也不像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涉及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问题而泛谈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那些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纪元”已经到来的具体情况。

作者明确地指出，阶级矛盾一般都在尖锐化，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190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编者注

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
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的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应当把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当作一个尺度来
衡量一下，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答应要做什么，在战争
爆发时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
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
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比它表面
看来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
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
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
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像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
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
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年）；但是，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
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1852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
（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3. 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
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
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
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
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态。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
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
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
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就接触到了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
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
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
取消<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国家的强力工具……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
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
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辞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清
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
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
724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
些与本题无关的缺点，这里暂且不谈），那么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

出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实质抓住了，而就在这个根本的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在这场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因为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使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而他把“夺取”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后路。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1850年曾说必须“坚决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138]。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问道：潘涅库克是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呢？

这不过是一种把戏，正像伯恩斯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管理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取消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前（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 löst——直译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有各部中没有一个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为了避免误会，我再说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今的国家。”（第725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革命问题。这无论在他那篇文章的标题上或在上所引的那段话中都讲得很清楚。

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

照他的意思：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再专门来谈。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破坏它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选举产生，还可以随时撤换，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这个绝妙的理由，证明考茨基是在重复过去伯恩斯坦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斯坦在他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斯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阐述的英国经验^[139]。据说，工联根据自己70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役下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编者注

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只需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来代替和怎样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拼命的策略，而不是为完成具体的任务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时考虑到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革命的工作。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看，公社就是通过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来扩大民主制度和根绝官僚制，得以在数星期内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作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群众能过新的生活，使大多数居民无一例外地人人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

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派^[140]（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141]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142]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费边派和“独立党人”（即“独立工党”^[37]，实际上始终依附于自由派的党），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重大的区别。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无数的后路。

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为着解决究竟由英国还是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还是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而去屠杀千百万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第七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

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版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 1917 年 8、9 月间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 7 章《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 2 册（《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者

1917 年 11 月 30 日于彼得格勒

1918 年在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1 卷

第 1—116 页

革命的任务

(1917年9月6日[19日])

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事业，和平、自由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事业顺利、和平、迅速、稳妥地获得胜利。

我国革命的进程在实践中使我们看到了这些动摇。我们决不要对社会革命党^[16]和孟什维克党抱幻想，我们要坚定地走我们的无产阶级的道路。贫苦农民的穷困，战争和饥荒的惨状，这一切愈来愈明显地向群众表明：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

小资产阶级希望同资产阶级“联合”、同资产阶级妥协，希望能够“平静地”等待“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19]，等等。他们这些“和平的”希望都被革命的进程残酷无情地打破了。科尔尼洛夫叛乱^[96]是最近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在各地的资本家和地主欺骗工农、军官欺骗士兵等等的千万个小教训上又添上的一个大教训。

在军队、农民和工人中间，不满、愤慨和怨恨的情绪日益增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什么都答应而又不兑现，这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推动他们走上起义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的左派反对派（斯皮里多诺娃等）和孟什维克中间的左派反对派（马尔托夫等）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在这两个党的“党务会议”和“代表大会”中已经占40%。而在下层，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中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多数都是“左派”。

科尔尼洛夫叛乱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学到了好多东西。

我们还无法知道，现在苏维埃能不能走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前面去，从而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或者苏维埃仍旧在原地踏步，从而使无产阶级起义必不可免。

这一点现在还无法知道。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人们尽一切可能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帮助的办法就是解释我们的纲领，说明它的全民性质，说明它是绝对符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以下各节就是我们解释这个纲领的一次尝试。

我们要尽量把这个纲领带到“下层”去，带到群众中去，带给职员、工人和农民，不仅要带给受我们影响的群众，而且特别要带给受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群众，带给没有党派倾向的和无知的群众。我们要尽量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能独立判断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并向民主会议^[143]、苏维埃、政府派遣自己的代表团。这样一来，不管民主会议的结果如何，我们的工作总不会徒劳无益。无论对于民主会议，无论对于立宪会议的选举或者一切政治活动，我们的工作都是有用的。

生活教导群众认识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性。从4月20日到科尔尼洛夫叛乱，“时间虽十分短促，而经历却非常丰富”。

群众的经验，被压迫阶级的经验，使他们自己在这段时期内学会了很多

东西，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完全离开了群众。只要能让群众来讨论极其具体的纲领，这一点一定会在这种纲领中如实反映出来。

同资本家妥协的危害性

1. 如果照旧让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使人数不多）掌握政权，让阿列克谢耶夫、克列姆博夫斯基、巴格拉季昂、加加林这样一些显然是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将军掌握政权，或者让那些在资产阶级面前完全软弱无力但却善于效法波拿巴的克伦斯基之流掌握政权，那就是对饥荒敞开大门，对资本家蓄意加速、加深的必不可免的经济崩溃敞开大门，另一方面，也就是对军事崩溃敞开大门，因为军队痛恨大本营，他们决不会热心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此外，如果照旧让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军官掌握政权，他们一定会像在加里西亚和里加干过的那样，故意给德国人开放战线。只有根据下面的新原则建立新政府，才能防止这一点。在有了4月20日以来的全部经验以后，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旧同资产阶级妥协，不管是怎样的妥协，那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

政权归苏维埃

2. 全部国家政权应当根据一定的纲领并且在政府完全对苏维埃负责的条件下整个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各地苏维埃应当立刻改选，这既是为了吸收人民在内容极其丰富的最近几个星期来的革命中所取得的全部经验，也是为了消除有些地方一直没有纠正的极不公正的现象（如选举时不按比例、不平等，等等）。

在还没有民主选举的机关的地方和在军队中，全部政权应当完全转归地方苏维埃和它们选出的委员，或者转归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其他机关。

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应当把工人和革命军队，即经实际证明能够镇压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军队，无条件地和普遍地武装起来。

给各国人民以和平

3. 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即同时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工农群众）提出马上根据民主条件缔结全面和约，马上签订停战协定（哪怕停战3个月也好）。

民主和约的主要条件是放弃兼并（侵占），这并不是说各个强国收回自己失去的东西，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唯一正确的理解是：无论在欧洲或者殖民地，每一个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有自己决定成立单独的国家或者加入任何别的国家的自由和可能。

苏维埃政府既然提出媾和条件，自己就应当立刻履行这些条件，就是应当公布并且废除我们至今受之约束的秘密条约，即沙皇签订的准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其次，我们有义务立即满足乌克兰人和芬兰人的要求，保证他们以及俄国境内的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有充分的自由，直到分离的自由；对于整个亚美尼亚也要采取同样的原则，我们必须撤离亚美尼亚和我们所占据的土耳其领土，等等。

这样的媾和条件是不会受到资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热烈的赞同，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战争的一致愤恨，这样，很可能会立即停战并同意开始和谈。因为，工人反对战争的革命正在各地不可遏止地发展着，而要推进这个革命，决不能空谈和平（一切帝国主义政府早就用空谈在欺骗工人和农民，我们的克伦斯基政府也不例外），只有同资本家决裂并提议媾和才能做到。

如果任何一个交战国连停战都不同意（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战争就成为真正被迫进行的战争，成为真正的正义战争和防御战争。单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这一点的认识，就会使俄国在军事方面强大好多倍，特别是在同掠夺人民的资本家完全决裂以后；更不用说，到那时候我们方面进行的战争将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成为同一切国家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了。

在这里必须特别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话。他们说：要是我们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结成的目前这种掠夺性的同盟一旦破裂，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就会使俄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害。一些胆子最小的人和小市民有时就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谎话，因为“盟国的财政援助”是让银行家发财，它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援助”不过是绳索对被吊的人的援助。俄国有足够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不过要做到正确地分配这些产品，必须摆脱掠夺人民的地主和资本家。至于说到俄国人民可能受到来自目前的盟国方面的军事威胁，有人推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会把他们的军队同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进攻提出公正和约的俄国，这种推测显然是荒谬的；至于英国、美国和日本，即使它们向俄国宣战（这是它们万难做到的，因为这样的战争极不得人心，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瓜分亚洲，特别是由于掠夺中国而发生了物质利益的冲突），也不会使俄国受到它在同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作战时所受到的损失、所遭到的灾难的百分之一。

土地归劳动者

4. 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宣布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把这些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也应当交给这些农民委员会支配，以便无条件地首先交给贫苦农民无偿地使用。

绝大多数农民在历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来自各地的数以百计的委托书中（在《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44]所载的根据 242 份委托书写成的综合委托书中也可以看到）早就要求采取的这些措施，是绝对迫切需要的。农民在“联合”内阁^[67]时期已经尝够了拖延的苦头，再不能容许丝毫拖延了。

凡是拖延实行这些措施政府，应当被看作反人民的政府，理应被工人和农民的起义推翻打垮。相反地，只有实行这些措施政府，才是全民的政府。

防止饥荒和消除经济破坏

双关语，俄文“
编者注

”一词，既有“援助”的意思，也有“吊住”的意思。——

5. 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消费实行工人监督。5月6日以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不采取这项措施，一切改良的诺言和尝试都无能为力，而饥荒和空前未有的灾难则一星期比一星期迫近，威胁着全国。

必须立刻把银行、保险事业以及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石油、煤炭、冶金、制糖等）收归国有，同时必须无条件地取消商业秘密，并且规定由工人和农民严格地监督一小撮资本家，因为他们一向靠国家订货发财，而又拒绝公布报表，逃避合理的利润税和财产税。

这些措施对于平均分担战争重负说来是绝对公平合理的，对于防止饥荒说来是刻不容缓的，这些措施并不剥夺中农、哥萨克和小手工业者一个戈比的私有财产。只有制止资本家的掠夺行为，禁止他们故意停止生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实行粮食同工业品的正常交换，并且把富人隐藏起来的数十亿纸币收回国库。

不实行这些措施，就不能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因为地主的土地大部分都抵押给银行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最近通过的决议中（《工人报》^[61]第152号），不仅承认政府的措施（如提高粮价使地主富农发财）“极端有害”，不仅承认“政府所设的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的事实”，甚至还承认这个政府“违犯法律”。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一自供，再一次表明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十分罪恶的政策。

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6. 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的叛乱得到了以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5]为首的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支持。这已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74]公布的事实完全证实了。

可是，在彻底镇压这种反革命方面，甚至在清查反革命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也决不可能在这些方面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不管是什么委员会，不掌握国家政权，就不能彻底查清和逮捕罪犯，等等。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逮捕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头子（古契柯夫、米留可夫、里亚布申斯基、马克拉柯夫等），取缔反革命组织（国家杜马和军官联合会等），把这些组织的成员交给地方苏维埃监视，解散反革命军队，使“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不致在俄国必然重演。

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彻底地公开地调查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案件和其他一切案件，哪怕是资产阶级起诉的案件；只有这样的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才会号召工人完全服从它和协助它。

资本家利用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数百万金钱，霸占最大的印刷厂和大部分报纸，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封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纸（《言语报》^[145]、《俄罗斯言论报》^[146]等），没收它们的印刷厂，宣布由国家垄断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即由苏维埃发行的、向农民讲真话的政府报纸登载私人广告。只有这样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走这个用来任意造谣诬蔑、欺骗人民、把农民引入迷途、筹划

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革命的和平发展

7. 目前在俄国民主派面前，在苏维埃面前，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面前，出现了革命史上极为罕见的机会，也就是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而不再拖延、保证国家不致遭到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崩溃、保证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

如果苏维埃现在把国家政权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执行上述纲领，那么，苏维埃就不仅会得到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即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且会激起军队和大多数人民的极大的革命热情，没有这种热情就不能战胜饥荒和战争。

现在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面对苏维埃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会和平地交出政权。只要工人和农民起来监视剥削者，对抗拒者采取没收全部财产和短期拘留的惩治办法，就足以制止资本家抗拒苏维埃纲领的行动。

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从4月20日运动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不可避免的崩溃将使这一战争日益迫近。人们的理智能够考虑到的事实和理由都说明，这次战争的结局一定是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取得彻底的胜利，使上述纲领得以实现；然而这可能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战争，会使好多万地主、资本家和同情他们的军官丧命。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而不实行上述纲领就不能挽救革命。但是如果苏维埃抓住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那么无产阶级一定会全力支持苏维埃。

载于1917年9月26日和27日（10月9日和10日）《工人之路报》第20号和第21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48—157页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47]

(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饥荒逼近

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十分混乱，而且愈来愈混乱，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运送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破坏和阻挠）生产，指望空前的灾难能使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所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无限权力。

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必须“英勇努力”以防止毁灭，等等。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公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但是却不见商品，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之为腐朽的革命也许更公道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制，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

情况确实如此。可以保证，任何一次演说，任何派别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十分明确地承认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公认的。然而这也正是人们所不敢做的，他们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靠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谁都知道，谁都看到，谁都为之惊叹不已。

可是国家方面丝毫没有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计算和监察。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计算以及要调整好这项工作的任何尝试，在各

地不断遭到暗中破坏。只有幼稚到了极点的人才不懂得，只有虚伪透顶的人才假装不知道，这种暗中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因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这种暗中破坏，这种对任何监督、监察、计算的破坏，都是同民主共和的国家形式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资本家老爷们很好地领悟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切赞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口头上都承认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6]，在他们的朋友占据了部长、副部长等职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的管理形式代替君主制的管理形式，丝毫也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本质，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改变一下，在民主共和制下照样可以顺利地保持这种利润，如同在专制君主制下一样。

当前有一种最新的、适应民主共和制的暗中破坏监督、计算、监察的手段，就是资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监督“原则”，承认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坚持要“逐渐地”有计划地“由国家正规地”实施这种监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对监督的破坏，把监督化为乌有，使之有名无实，成为儿戏，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无生气的官僚监督机关，而这些机关完全依赖资本家，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可能做。

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出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了“联合政府”^[67]，因此，他们在俄国工农面前，要对纵容资本家、对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负政治责任。

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谓“全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机关中的最高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74]1917年9月7日第164号上，登载了一个处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决议，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们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它的决议正式承认，“政府所设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是事实。

难道还有什么证据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能证明他们政策的破产吗？

早在沙皇制度下人们就认为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必要，并且为此也建立了一些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经济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经济破坏现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5月6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并保证实行国家监督和调节。那时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赌咒发誓说，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行动负责，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正在实际监视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从5月6日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在这漫长的4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间经济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无论在水运方面，还是在农业和矿山勘探等方面本来完全有可能做出许多事情，但是4个月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认政府所设的监督机关“不起任何作用”！！

而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在9月12日民主会议^[143]召开的前夕），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俨然以政界大人物的姿态侈谈什么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148]之流，即同里亚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先科之流搞联合，以代替同立宪民主党人^[5]的联合，事情还能补救！

试问，怎样来解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种惊人的盲目呢？是否应该把他们看作政界的黄口小儿？他们是由于极端鲁莽幼稚，才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是真心诚意而犯了错误，还是由于占据了部长、副部长、总督、委员等等许多职位，就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盲目症？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措施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没有经过试验、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没有实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

唉！的确有人竭力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11]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愿意把俄国从战争和饥荒中拯救出来的真正革命政府的纲领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为了开玩笑才叫作革命民主政府，那它只要在成立的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作出决定、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居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命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

银行国有化；

(2) 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 取消商业秘密；

(4) 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 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 and 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像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 15 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 15 卢布的所有者，谁有 1500 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 1500 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

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过程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

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帐务。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那些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便利公众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小业主，对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然后调节经济生活，最后是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像“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像“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

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149]或《统一报》^[17]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

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掩护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

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就举糖业辛迪加这个例子来说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自然，这个联合组织充满了最反动的、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贱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有利于资本巨头和富人的监督和调节。

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国民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大发其财。应当号召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向民主派而不是向官僚号召，向工人和职员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要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联合”这些糖业大王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本来是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几天之内一举做到的。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

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已经使石油业在极大程度上“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就是他们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靠剪息票为生，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在国家经受极大的危机，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国民劳动和增加燃料生产的时候，尤其如此。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先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像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办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那些在原封未动的旧国家机构中被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留任原职的官吏）。

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他们。如果能在1917年4月立刻就采取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么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

够在夏季利用水运在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种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这一基础上的瓦解，仍然是对国民劳动的侵占，一切都和沙皇制度下一样，改变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发文和收文上的名称！

至于煤炭工业，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同样“具备”了实现国有化的“条件”；掠夺人民的煤业大王在管理上也同样卑鄙无耻，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坏和停止生产的桩桩事实有目共睹。甚至孟什维克部长的报纸《工人报》^[61]也承认了这些事实。那又怎么样呢？除了举行几次工人代表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主张“联合”，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就是同工商界“联合”，而联合就意味着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从而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取消商业秘密

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要么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要么可能完全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来实现。尽管这一点对任何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十分明显，尽管《真理报》^[23]一直坚持取消商业秘密（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对真正监督的这一首要条件连想也没有想过。

这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暗中破坏生产的资本家的最敏感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不加思索一再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帐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又在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这是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的经济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1—172、285、286—288、364—366、367369、370—372页。——编者注

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小手工业者或一般农民的经济，他们根本不记商业帐，所以取消商业秘密同他们没有关系！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

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报表，那就是说，法律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可以实行）正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擦亮人民的眼睛，而是不让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全部真相。

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 1000 或 10 000 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

此外还要考虑到战争。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家、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用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这一理由来反驳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要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一直在盗窃国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为了战争俄国现在每天耗费 5000 万卢布。每天 5000 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在这 5000 万中每天至少有 500 万，也许有 1000 万以至更大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和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作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可耻的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书”，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通常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实、绕开“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明确无误地多次提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气吞声，都听任政府冠冕堂皇地谈论“监督”和“调节”！！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

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来自下面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125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125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

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资本家激起人民公愤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维持的经济破坏现象也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最害怕的事情。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150]供俄国“消遣”。

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

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90—93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

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

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作逃避兵役者加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他们也必须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只是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1905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

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

调节消费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对付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让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量的远不是一切食品，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如此而已。别的就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量，付诸实施，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很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在无一例外的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富人一直不受任何消费“定量”的限制。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大家”谈起来都是加以嘲笑的。德国社会党的报刊（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经常登载一些短评和消息，报道富人的“菜单”，披露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托病到那里疗养）可以无限制得到白面包，富人吃的是难以见到的珍馐佳肴，而不是大众食品。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发挥工人以及所有劳动者的主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证，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决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并不想把战时更多的负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用反动官僚办法解决战争向人民提出的任务，就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性，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主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用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很多的，“老百姓”在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除官方规定的很少一点定量外，还得到各种“补贴”，而且不许别人对自己监督。

在刚刚完成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大家看到富人可以轻易躲过

“面包配给制”的限制，这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眼，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他们这样做非常容易。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种交情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而且数量很大。人民却在挨饿。调节消费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设法根据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来进行这种调节。

“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充分贯彻对消费的监督；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要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真正的革命干劲。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的部长们，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行一样，说些“为人民利益共同劳动”、“调动一切力量”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觉察到了这些话的虚伪性。

结果是踏步不前，瓦解现象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其原因在于：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让工人服军事苦役吧，我国政府无法做到，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制度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生怕触犯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

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办法和方法。我们处处都看到了，以民主派为一方，以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向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仅我们说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冲突所实际证实，只要提一下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历史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重担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的民主组织，即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进行

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反对民主组织，并且搞垮了这些组织！！

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背后进行活动，而不在大庭广众公开出面（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活动，乐意推出策列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在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撤销自发民主组织的指令！！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讨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践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定的见不得人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晦地提交人民审判。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他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的全部政策，仍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派。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老老实实地做些事情，同民主组织取得联系，把它们作为依靠。彼舍霍诺夫的工作经历和退出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派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党员^[15]，虽然决心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

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151]第1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右派代表罗洛维奇这个顽固维护私人商业利益、激烈反对粮食垄断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

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回答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只要革命还在俄国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事，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

但是，可惜！事实对这个反声明作了非常严酷的修正：言中的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有产者的代表。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派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而民主派的代表连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也愤慨地加以否认。”

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反其道而行之！

罗洛维奇这个资本家的代表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

灵通的，这正像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145]和《交易所小报》^[152]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

这种消息灵通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嘲弄人民的行径呢？也许他们已经发表了告工人和农民书，宣告干这种事情的克伦斯基及其同僚只配进监狱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我们已经提到的虚声恫吓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决议中声称，克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有害的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莫大的打击”，说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违反”法律的！！

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讨好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富人，采取这种对整个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整顿摇摇欲坠的财政的工作有害的办法，就是违反法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继续谈论同工商界达成协议，继续同捷列先科磋商，继续宽恕克伦斯基，只是通过了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

这里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甚至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利益，这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正好相反，他们的政策竟使国家干出了提高粮价这种可耻的事情！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不可避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己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军事苦役或者说沦为军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使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储藏的纸币。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那些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回交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153]！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

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 125 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28]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像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 20 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既然谈到战胜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

情况确实如此。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国民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部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好。如果在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时，发挥群众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水平大大提高。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暗中破坏生产的资产阶级搞“联合”，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旧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分享部长、副部长等等官位，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么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的国家，成为一个土地归农民、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超过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它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由农民委员会掌握的农民国家，它的军事实力超过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人们常常拿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奋勇作战的奇迹作例证。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即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

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154]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20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法国在125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帝国战争，这个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沙皇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利沃夫、亚美尼亚等等。

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仍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目前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一起前进，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整个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1905年的传统还充满活力），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全世界工人革命日益发展的气氛，给我们以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极为罕见的革命民主的自由正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老提法（只要形式上相应地作些改变）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而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担任了反动的角色：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

革命的经验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们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遭到失败^[155]。在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年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联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重复资产阶级所喜爱的对比方法，即拿资产阶级与民主派作对比。但是，这种对比实质上就像拿尺与斗作对比那样荒谬。

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只有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都十分无知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要作这种不正确的对比，是为了掩盖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整个“联合”的实质、整个联合内阁的实质、克伦斯基这个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说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没有消除战争，也

没有消除经济破坏。

这话不对。遭到破产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半年来是这个联盟在统治俄国，而且在这半年中使经济破坏加剧了，使战争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

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破产愈彻底，人民受到教育也就愈快。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出路，那就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1917年9月10—14日

1917年10月底由波涛出版社

在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

第181—225页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156]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9月13—14日^[26—27]）

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散布一种机会主义的谎话，说什么准备起义以及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布朗基主义”^[20]。这是这些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曲解。

机会主义的首领伯恩施坦由于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早已弄得声名狼藉，现时的机会主义者又叫喊什么布朗基主义，其实他们一点也没有翻新和“丰富”伯恩施坦的贫乏“思想”。

马克思主义者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竟有人因此而诬蔑他们是布朗基主义！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样曲解真理更令人气愤的吗？因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正是马克思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肯定、最准确、最无可争辩，正是他把起义叫作艺术，他说，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须赢得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不停地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如此等等。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

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

为什么应当承认正是在目前这个时机我们党必须承认起义已经被客观事变进程提上日程，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呢？要证明这一点，也许最好使用比较法，把7月3—4日的情形^[85]和9月间的情形作一对比。

在7月3—4日，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而并不违背常理：夺取政权可能更正确些，因为敌人反正会指控我们搞暴动，把我们当作暴动者来惩办。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当时就该夺取政权的结论，因为当时还不具备起义获胜的客观条件。

（1）当时作为革命先锋队的阶级还没有跟我们走。

当时我们在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中间还没有获得多数。现在我们已经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多数^[155]。这种多数只是经过了7月和8月的事变，经过了“惩办”布尔什维克^[127]和科尔尼洛夫叛乱^[96]才形成的。

（2）当时还没有全民的革命高潮。而现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已经有了这种高潮。外省的情形和许多地方苏维埃掌握政权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3）当时在我们的敌人中间以及在三心二意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没有发生关系政治全局的严重动摇。而现在却发生了很厉害的动摇。我们的主要敌人，即协约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因为“协约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脑），开始犹豫了：究竟是战到最后胜利呢，还是实行单独媾和来反

对俄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人民中显然失去多数之后，也极厉害地动摇起来，放弃了同立宪民主党人^[5]的联盟，即不再同他们联合执政了。

(4) 所以说，在7月3—4日举行起义就会犯错误，因为当时我们无论在实力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权。尽管彼得格勒有时也在我们手中，我们在实力上还是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人和士兵还不会为占领彼得格勒去搏斗，去献身，他们还没有下这样的“狠心”，他们无论对克伦斯基之流或者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都还没有这样切齿痛恨，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经受过社会革命党人^[16]和孟什维克所参与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

在7月3—4日的时候，我们在政治上也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军队和外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有可能而且一走会向彼得格勒进攻。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现在阶级的大多数，即能够带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

现在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因为切尔诺夫退出政府虽然远不是唯一的标志，但是是一个极为明显的标志，说明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联盟（以及从社会革命党人本身）是得不到土地的。而这正是革命能否具有全民性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的党所处的地位也对我们有利，当整个帝国主义以及整个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都发生空前动摇的时候，我们的党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走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胜利的保证，因为人民快要完全绝望了，而我们给全体人民指出了正确的出路，我们“在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日子”向全体人民显示了我们的领导作用，后来我们又向联盟派提出妥协的建议，而且在他们始终动摇不定的情况下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如果现在以为我们的妥协的建议还没有遭到拒绝，以为民主会议^[143]还会接受这个建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妥协是由一个政党向其他政党提出来的，不然就没有可能提出来。其他政党已经拒绝了这个建议。民主会议只不过是一个会议罢了。有一点不能忘记，民主会议里并没有大多数革命人民的代表，并没有满腔愤恨的贫苦农民的代表。它是少数人民的会议，决不能忘记这一明显的真理。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就成了十足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常设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

现在我们具备了起义胜利的一切客观前提。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有利，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消除一切使人民受折磨的动摇，才能消除世界上这种最折磨人的东西，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立即给农民以土地，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粉碎用单独媾和来反对革命的鬼把戏，才能公开提议迅速缔结更全面、更公正的和约，有利于革命的和约，来粉碎这种鬼把戏。

最后，只有我们党在起义中获得胜利，才能拯救彼得格勒。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媾和建议竟遭到拒绝，如果我们连停战都得不到，那时我们就会成为“护国派”，成为各主战政党的首领，成为最“主战的”政党，我们就要以真正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战争。我们将夺取资本家所有的面包和所有的

靴子。我们只留给他们一些面包皮，我们要叫他们穿草鞋，我们将把所有的面包和鞋子都送到前线去。

那时，我们一定能捍卫住彼得格勒。

进行真正的革命战争的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或者精神资源，俄国都还非常丰富。德国人至少会跟我们停战，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而在目前赢得停战，就无异是战胜了全世界。

既然我们意识到绝对必须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举行起义来挽救革命，使俄国免遭两个联盟的帝国主义者“单独”瓜分，那么，我们首先应该使我们自己在民主会议上的政治策略适应于日益成熟的起义条件；其次，我们应该证明，我们不是只在口头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思想。

我们应该立刻在民主会议中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追求数量，不要怕把动摇分子留在动摇分子的营垒中，他们留在那里要比混在坚决忠诚的战士的营垒里对革命事业更有利。

我们应该写一篇布尔什维克的简短的宣言，用最有力的词句着重指出：现在冗长的演说合不合时宜，任何“演说”也不合时宜；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挽救革命；绝对必须同资产阶级一刀两断，撤换现政府的全部阁员，同准备“单独”瓜分俄国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完全决裂；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

我们的宣言应当以极其简短有力的措辞表述上述结论，并且同如下纲领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没收骇人听闻的利润，制裁资本家骇人听闻的破坏生产的行为。

这个宣言愈简短愈好，愈有力愈好。在宣言中还必须明确指出极其重要的两点：人民已经吃尽了动摇的苦头，受尽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犹豫不决的折磨；我们必须同这两个政党彻底决裂，因为它们背叛了革命。

另一点是：我们要立刻提议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立刻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断绝关系，这样做我们马上就可以赢得停战，或者使整个革命的无产阶级转到保卫国家方面来，使革命民主派在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真正正义的、真正革命的战斗。

我们宣读了这篇宣言，号召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空话，号召行动起来而不是写决议案，我们就应当把整个党团都派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里才是我们党团工作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的生命线，那里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源泉，那里才是民主会议的原动力。

在那里，我们应该作慷慨激昂、充满热情的演讲来说明我们的纲领，并且这样提出问题：要么是民主会议全盘接受这个纲领，要么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危在旦夕。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团都集中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么我们就能够正确估计开始起义的时机。

既然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么我们就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应当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罗巴甫洛夫卡^[157]，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成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也不让敌人向城市各中心地点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158]；我们应当动员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

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附近，使它能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通话，如此等等。

当然，这都是大概而言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机要继续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革命，就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

尼·列宁

载于 1921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 2 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
第 235—241 页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59]

(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再版序言

从下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9月底开始写，10月1日写成的。

10月25日的革命，已经把这本小册子提出的问题从理论的领域转到了实践的领域。

现在不应当用言论，而应当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理论根据，是不堪一驳的。这些论据已经被推翻了。

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证明工农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活跃的正直的农民，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一定会竭尽全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

干起来吧，大家都干起来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应当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

尼·列宁

1917年11月9日于彼得堡

从《言语报》^[145]到《新生活报》^[76]，从立宪民主党^[5]科尔尼洛夫分子到半布尔什维克，总之，除布尔什维克以外，所有派别在哪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呢？

在以下这点上：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或者即使敢于夺取并且夺到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极短暂的时期也保持不住。

如果有人说，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某些极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狂热者”才会认为这个问题是现实的，那么我们只要把负有最重大责任、最有影响的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的言论一字不改地引来，就能驳倒这种论调。

但是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敢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谈几句。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70]上听策列铁里部长的一次发言时当即在席位上大声插话，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复^[160]。而且，不论在报刊上或者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布尔什维克发表过关于我们不应当单独夺取政权的声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

现在，我们来引用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16]和半布尔什维克（我倒更愿意称他们为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在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

9月16日《言语报》的社论说：

“……亚历山大剧院的大厅里笼罩着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的气氛，社会党人的报

刊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十分明确而且毫不隐讳。在民主会议上，这是少数人的观点。然而在苏维埃里，却是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尽管布尔什维克言辞激昂，自吹自擂，摆出十分自信的姿态，但是他们除一小部分狂热者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嘴上勇敢。他们的本意并不想夺取‘全部政权’。他们这些地道的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骨子里却是一群胆小鬼，他们内心里深知自己腹中空洞无物，深知他们目前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也像我们大家一样非常清楚：他们彻底胜利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迅速垮台的第一天。他们按本性来讲是一些毫不负责的人，按方法和手段来讲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能算作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流派，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偏向。要永远摆脱和根除布尔什维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要不是意识到这种试验是不能容许的，有招致毁灭的危险，真可以豁出去试一试这种有英雄气魄的办法。我们再说一遍，好在这些可悲的当代英雄自己也决不想真正夺取全部政权。在任何条件下，建设性的工作都是他们难以胜任的。因此，他们的十分明确和毫不隐讳的态度，只能表现于政治讲坛上和群众大会上的空谈。实际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的立场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是，这种立场在某一方面也取得了某些实际结果：它把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派别联合起来反对自己……”

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现在请看俄国最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82]9月21日的一篇同样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社论中：

“……如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资产阶级不愿意根据民主会议批准的纲领同民主派合作，那么，联合内阁就应当从民主会议的成员内部产生出来。这对拥护联合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牺牲，但是，宣传政权‘清一色路线’这种主张的人也应当作这样的牺牲。不过，我们担心在这方面可能达不成协议。那就只有第三种即最后一种办法了：政权由民主会议中原则上拥护清一色政权的主张的那一半成员负责组织。

明确地说，就是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布尔什维克极力把仇视联合的思想灌输给革命民主派，答应在消灭‘妥协’以后给他们各种好处，并且说妥协是我国一切灾难的根源。

如果布尔什维克了解自己鼓动的是什么，如果他们不欺骗群众，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兑现到处随便开出的支票。

问题非常明显。

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匆忙炮制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

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

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种办法，三条道路，其他的办法和道路是没有的！”（黑体是《人民事业报》原来用的）

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最后，请看新生活派^[161]“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如果脚踏两只船也可以称作立场的话）。下面这一段话摘自9月23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社论：

“……如果再同柯诺瓦洛夫、基什金一起组织联合内阁，那就只能意味着民主派又一次投降，意味着撤销民主会议的关于根据8月14日的纲领建立责任政权的决议……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清一色的内阁，就像联合内阁里负有责任的社会党人部长一样，很难感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政府不但不能把革命的‘活跃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也不能指望从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稍微积极的支持。

但是组织另一种清一色的内阁，即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这也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更坏的出路，其实这不是出路，简直是死路。诚然，这样的口号谁

也没有提出过，只有《工人之路报》在偶尔发表的不那么大胆的意见中提到过，后来才不断加以‘解释’。”（这些负责的政论家连9月21日《人民事业报》的社论也忘掉了，居然“大胆地”写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

“现在，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七月事变之后，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的苏维埃明确地走上积极反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时候取消的。现在不仅可以认为‘苏维埃路线’是经过校正的路线，并且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到，在准备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布尔什维克将获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一条旨在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策略路线’。其实，苏维埃也可以理解为农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依靠俄国整个民主派绝大多数人的政权。但是这样一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失去独特的意义，因为它使苏维埃成为在组织成分上同民主会议所组织的‘预备议会’几乎相同的东西……”（《新生活报》的论断是最无耻的谎话，这等于说，冒牌和伪造的民主同民主是“几乎相同的东西”：预备议会是伪造的，它是以少数人，特别是以库斯柯娃、柏肯盖姆、柴可夫斯基之流的意志来冒充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甚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柴可夫斯基之流所伪造的农民苏维埃在民主会议上反对联合的也占很大的百分比，如果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在一起，其结果也足以使联合彻底垮台。第三，“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农民苏维埃的政权主要会扩展到农村去，而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可以稳占优势。）“……既然两者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就应当立刻取消。如果‘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只是掩饰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那么这样的政权正是意味着革命的破产和失败。

不仅脱离国内其他阶级、而且也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力量的无产阶级，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使它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运转起来，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目前唯一符合时局要求的政权，就是民主派内部真诚联合的政权。”

请读者原谅，我们摘引了这样的话，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须确切地介绍一下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各个党派的立场。必须确凿地证明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所有这些党派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不仅是十分现实的问题，而且也是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立宪民主党人到新生活派，“大家”都确信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所持的理由。

堂堂的《言语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不过是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话把布尔什维克痛骂了一顿。顺便说一下，我们引用的话也表明，如果以为《言语报》在“挑动”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因此说什么，“同志们，要当心，敌人建议我们干的准不是好事！”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地估计到一般的用意和具体的用意，就“相信”这是资产阶级在“挑动”我们去夺取政权，那我们就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因为资产阶级无疑永远会恶毒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会造成千万种灾难，永远会恶毒地叫嚣“要一下子‘永远’摆脱布尔什维克，最好是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然后把他们彻底打垮。”这种叫嚣也可以说是一种“挑动”，不过是出于相反用意的挑动。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者决不是“建议”我们而且从来没

有“建议”我们夺取政权。他们只不过想用政权面临的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任务来吓唬我们。

不，我们不应当被吓坏了的资产者的叫嚣吓倒。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无法解决的”社会任务，至于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作为摆脱极端困难的状况的唯一出路，这些完全可以解决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解决。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么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获得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巩固的胜利。

我们要完全实事求是地讨论那些会使某一时机变得不利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让资产阶级疯狂的叫嚣吓倒，同时也不能忘记，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确实成了十分迫切的问题。现在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对我们的党有莫大的危险，比我们认为夺取政权“为时过早”要危险得多。在这方面，现在决不可能说什么“为时过早”，因为千百万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也许只有一两件例外。

对《言语报》的恶毒的谩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背诵几句诗：

我们听到的赞许声
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
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162]

资产阶级对我们这样切齿痛恨，这也最明显不过他说明了一个真理：我们正确地给人民指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和方法。

非常难得，这一次《人民事业报》没有赏我们一顿痛骂，但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只是指出“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的前景，企图用这种间接的暗示的方式来吓唬我们，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社会革命党人在吓唬我们的时候，自己却着实被吓倒了，被吓坏了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得魂不附体了。我可以同样肯定地说，在某些特别高级和特别腐朽的机关里，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类似的“联络”（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触的，老实说，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勾勾搭搭的）委员会^[93]里，社会革命党人也能吓倒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第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议会”^[163]等等这一切机关里，空气坏到极点，臭得令人作呕，长久地呼吸这种空气对任何人都是有害的；第二，着实的惊恐是有感染力的，着实被吓倒的庸人甚至能把个别革命者一时变成庸人。

尽管“按人之常情”来说，一个过去不幸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当部长或者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能当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着实被吓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让别人把我们吓倒，那就是犯了政治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很容易弄到背叛无产阶级的地步。先生们，把你们的切实的理由摆出来！别以为我们会被你们的惊恐吓倒！

这一次，我们只在《新生活报》上找到一些切实的理由。《新生活报》这次所扮演的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扮演这种角色对它来说，要比扮演使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164]显然感到“怪难为情”的布尔什维克的辩护士的角色更合适些。

这位辩护士提出了六条理由：

- （1）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 （2）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

- (3) 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
- (4) 无产阶级“不能使”这个机构“运转起来”；
- (5) “环境非常复杂”；

(6) 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

《新生活报》提出第一条理由,实在笨得令人可笑,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是这一阶级的主要代表)和无产阶级。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时,说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

《新生活报》大概是想说,无产阶级脱离了农民,因为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决不会是地主。但是又不能明确地说无产阶级现在脱离了农民,因为这种说法显而易见是十分荒谬的。

很难设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像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很少脱离小资产阶级,请注意,这是指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在客观的不容争辩的材料中,我们有一些最近的材料,它们说明了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165],也就是声名狼藉的“民主”会议^[143]的“各选民团”赞成和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表决情况。试以苏维埃的选民团作例子,情况如下:

	赞成联合的	反对联合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	83	192
农民代表苏维埃.....	102	70
总计.....	185	262

可见,多数人总的说来拥护无产阶级的口号: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同时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在增长。要知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民主会议,是由苏维埃的昨天的领袖,即在中央机关中拥有可靠的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召集的会议!显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实际的优势,在这里是被缩小了。

无论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上,或者在立刻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目前都已经得到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里的多数的拥护,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9月24日的《工人之路报》^[166]第19号转载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167]第25号上发表的关于9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消息。在这个会议上,主张无限制联合的有4个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萨马拉省和塔夫利达省);主张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的有3个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和黑海省)和2个集团军执行委员会;而反对联合的有23个省和4个集团军的执行委员会。

可见,大多数农民是反对联合的!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此外还应当指出,主张联合的是3个边区省(萨马拉省、塔夫利达省、黑海省)和4个工业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科斯特罗马省和莫斯科省)。在这3个边区省份中,使用雇佣工人的富裕农民和大地主比其他各省多得多,在4个工业省份中,农民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俄国大多数省份强。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材料收集起来,看看有没有关于农民最“富裕的”那些省份里的贫苦农民的资料,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集团”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了很大的优势:40

票对 15 票。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之流对俄国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采取兼并政策，横施暴力的政策，已经自食其果了。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居民群众，即他们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超过了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因为历史已经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了。资产阶级卑鄙地背叛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无产阶级则忠于这一事业。

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目前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切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容争辩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无产阶级一点也“没有脱离”其他阶级。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这两个问题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行坚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从而不仅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一下子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且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真正爆发出来，因为群众将从政府那里第一次看到，不是沙皇制度下那种地主对农民、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残酷压迫，不是共和制度下那种在花言巧语掩盖下继续实行类似政策的意图，也不是挑剔、凌辱、诬蔑、拖拉、阻难和搪塞（也就是克伦斯基赐给农民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一切），而是见诸行动的热烈同情，是反对地主的紧急的革命措施，是立刻恢复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穆斯林等等的充分自由。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拉拢合作社派^[168]的半立宪民主党人上层分子来帮助自己执行反对群众的反动民主政策。所以，对于实际政策的某些事项，例如是不是应当立刻把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是不是应当满足芬兰人或乌克兰人的某些要求，等等，他们永远不敢征求群众的意见，不敢举行全民投票，甚至不敢在各个地方苏维埃、各个地方组织中进行表决。

而在和平问题这个当今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其实无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全民族的代表，是各个阶级中一切活跃的和正直的分子的代表，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到政权以后才会立刻向各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只有无产阶级才会采取真正革命的措施（公布秘密条约，等等），尽可能快地取得尽可能公正的和平。

不，《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只能表明他们自己主观上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毫无疑问，俄国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没有“脱离”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在人们取得了“联合”的惨痛教训之后，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

第二条理由是所谓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实在费解。这大概“讲的是希腊语”，——法国人遇到这种场合常这么说。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是一些能当部长的角色。他们完全适合在立宪民主党人手下当部长。因为对这种部长所要求的无非是善于说冠冕堂皇、八面玲珑、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空话，这种空话可以用来掩盖一切丑恶行为，因此一定可以博得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定会鼓掌赞成新生活派认为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说法，因为这种话的言外之意是（或者说，这种话他们一听就明白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

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是“民主派活跃的力量”。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是僵死的力量。这一点已经由联合的历史证实了。

新生活派被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氛吓倒了，竟把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重大差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右翼，如《人民意志报》^[169]和《统一报》^[17]等等当作“活跃的”力量。而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跟群众而不是跟富农有联系的力量，只有那些受到联合的教训因而抛弃联合的力量，才是活跃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左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积极的活跃的力量”的代表。这个左翼的加强（特别是在七月反革命事变^[85]以后），是无产阶级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力量的一个最可靠的客观标志。

最近社会革命党中派的向左摆更加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切尔诺夫9月24日的声明就是向左摆的证明，他说他那一派不赞成重新同基什金之流联合。从社会革命党在城市、尤其是在农村所得的选票的数目来看，这个党是目前占优势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而在这个党的代表中中派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它的中派向左摆证明：上面引的《人民事业报》关于民主派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保证给”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充分的支持”的声明，无论如何都不是说说而已的。

社会革命党的中派拒绝重新同基什金联合的事实，以及外省孟什维克护国派（高加索的饶尔丹尼亚等）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优势的事实，都是客观证据，证明一部分一直跟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群众将支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俄国无产阶级现在恰恰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

第三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这也许是最常见最流行的理由。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这个理由指出了摆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所以它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毫无疑问，这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假使我们这些自称为社会党人的人指出这个困难仅仅是为了逃避完成这种任务，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同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差别了。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困难，应该促使无产阶级的拥护者更仔细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

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新生活报》的撰稿人说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这个机构，这就暴露出他们非常愚昧无知，他们既不肯重视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又不愿考虑布尔什维克出版物中早已说明的道理。

《新生活报》的所有撰稿人，都认为自己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也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有学识的社会党人。可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一本小册子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册已经印好，不日即可问世，书名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构”。1917年4月4日以来，我曾经

多次指出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几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中也谈到过这一点。当然，《新生活报》本来可以声明他们根本不赞成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但是像这样一家经常傲慢地责骂布尔什维克对困难问题采取了所谓不严肃态度的报纸，却对这个问题完全避而不谈，这无异是证明自己思想贫乏。

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新生活报》居然把这个“国家机构”完全忘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新生活派这样谈理论，实质上就是在政治理论领域干着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实践中所干的事情。因为，既然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确实不需要任何新的国家机构，那么苏维埃也就失掉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权利了，那么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消灭苏维埃的意图也就是正当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70]（《新生活报》在彼得格勒市杜马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曾经同他们结成联盟）也表现出某些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地方，所以《新生活报》这种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就显得越发骇人听闻了。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民主会议上宣读的那份苏维埃多数派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由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所建立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构成了一种革命国家机构的新机体，以代替旧制度国家机构衰朽的机体……”

这未免说得过分漂亮了一点，就是说，在这里华丽的辞藻掩盖着政治思想上明确性的不足。苏维埃还没有代替旧“机体”，而且这个旧“机体”并不是旧制度的国家机构，它既是沙皇制度的又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是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在这里毕竟要比新生活派高明得多。

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像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革容易实行。第五，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的。第六，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我国 1905 年的苏维埃，可以说只是腹内的胚胎，因为它们总共只存在了几个星期。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苏维埃的全面发展。在 1917 年的革命中也还谈不上这一点，因为几个月的时间太短促，尤其是因为社会

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糟蹋了苏维埃，把它们变成了清谈馆，变成了这些领袖的妥协政策的附属品。苏维埃在李伯尔、唐恩、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领导下活活地腐烂了，解体了。苏维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一种玩物。“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意味着苏维埃的瘫痪。

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构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糟蹋苏维埃的悲惨历史，实行“联合”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苏维埃摆脱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历史，也就是苏维埃通过“涤罪所”^[105]，即苏维埃实际领教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联合的全部卑鄙龌龊行为的历史。但愿这个“涤罪所”没有使苏维埃受到损伤，而是使它们受到了锻炼。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确的、最认真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像司徒卢威那样死背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是把它和任何政权一样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照新生活派的意思直说：不是实行工人监督，而是实行国家监督，那得出的是一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话，实质上是一个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式，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点也不反对工人参加“国家”监督。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非常清楚，这种参加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上极巧妙地收买格沃兹杰夫、尼基京、普罗柯波维奇、策列铁里之流以及所有这帮歹徒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跟着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以此说明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俄国工人群众在它的统治下“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折磨”已经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的困难，主要任务。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维埃正在筹划无产阶级的这种可以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组织工作。

这里我们就涉及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

这个“国家机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拿过来”，使它“运转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阶级政府用一道命令就能够而且定会把这些职员变成国家职员，这正像资本主义的看门狗白里安等资产阶级部长用一道命令把罢工的铁路员工变成国家职工一样。我们需要而且能够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国家职工，因为资本主义简化了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使之成为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并不那么复杂的记录工作。

把银行、辛迪加、商业等部门的大批职工“国家化”，无论在技术上（由于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或者在政治上（在苏维埃进行监督和监察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应当和对待资本家一样，只能“从严”。他们一定会和资本家一样起来反抗。一定要粉碎这种反抗；一贯天真得可爱的彼舍霍诺夫是一个真正的“政界的黄口小儿”，他早在1917年6月就咿咿呀呀地说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而无产阶级一定会认真地把这句小孩子话、这句幼稚的狂言变成现实。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问题只是粉碎极少数人，简直可以说是一小撮人的反抗；职员联合会、工会、消费合作社和苏维埃将对他们每个人实行监察，使所有的季特·季特奇^[148]之流都受到包围，就像一个法国人被困在色当^[171]城下一样。只要弄到一张经理、董事、大股东等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季特·季特奇的名字。他们在全俄国总共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拥有苏维埃、职员联合会等机构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给他们每个人指定10个甚至100个监督者，这样一来，甚至通过工人监督（监督资本家）也许就能使任何反抗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用不着去“粉碎反抗”了。

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税率）的办法来代替没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公开帐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工人国家的工人监督。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28]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

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

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第四条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这个理由同前一个理由比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旧机构我们当然既不能掌握也不能使它运转起来。新机构苏维埃则借助“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已经运转起来了。不过必须解除领导这个机构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套在它身上的羁绊。这个机构已经在运转，不过必须去掉那些妨碍它全速前进的畸形的小资产阶级赘瘤。

为了补充以上所述，还应当研究两点：第一，不是我们而是资本主义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第二，在管理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方面加强民主制的意义。

粮食垄断和面包配给制不是我们而是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和它整个历史创造活动一样，是从资本主义那里获得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臆造”和“凭空创造”这种武器。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一旦用来对付资本家和所有富人，一旦由工人用来对付这班人，它就会产生一种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力量，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监督和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172]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只能起震慑的作用，只能粉碎积极的反抗。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震慑”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且还要粉碎消极的、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们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强迫他们在新国家组织范围内工作。“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重新为国家服务。无论是对资本家，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以及某些高级职员等等，都应当如此。

我们也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

每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那时，这个证件对他并不是一种侮辱，虽然现在它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证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证明。

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的制度（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绝大多数农民大概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用不着劳动手册的）。劳动手册将不再是“贱民”的标志，不再是“下”等人的证件，不再是雇佣奴隶制的证明。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

参看我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那里更详细地说明了强迫辛迪加化的意义。（见本卷第251—253页。——编者注）

作者的证明。

富人应当向最接近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工人联合会或职员联合会领取劳动手册，每周或每隔一定时间必须从该联合会取得他们工作踏实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不能领到面包配给证和其他一切食品。无产阶级的国家会说：我们需要银行业的和企业联合的优秀组织者（在这方面，资本家有比较多的经验，而使用有经验的人，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需要比从前愈来愈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我们要所有这类工作人员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我们大概只能逐渐实现报酬的完全平等，在过渡期间将保留这些专家较高的报酬，但是，我们要使他们受到工人的全面监督，我们要彻底地无条件地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最好的工厂、试验站、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我们只能借鉴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

我们说，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苏维埃把全体居民组织进来就能粉碎这种反抗，对特别顽强和拒不服从的资本家自然必须惩办，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把他们关进监狱，只要无产阶级胜利了，像我今天在《消息报》^[74]上看到的那种事情就会多起来。我们这样说，当然丝毫不会陷入空想主义，不会离开极其冷静而实际地估计情况的立场。今天的《消息报》说：

“9月26日有两个工程师到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声明说，有一批工程师决定组织一个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协会。鉴于现在实质上已经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该协会愿意听从工人群众指挥，并且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愿同各个工人组织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回答说，理事会愿意在自己组织中成立工程师部，该部应当把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要点列入自己的纲领。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和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团体的发起人近日将举行联席会议。”（1917年9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

1905年革命以后是13万地主管理俄国，他们管理的方法就是对15000万人滥用暴力，肆意侮辱，强迫大多数人从事苦役、过半饥饿的生活。

而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不能为了替穷人谋福利、为了反对富人而管理俄国。这24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100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欧洲的经验 and 俄国的经验都证明，就连彼得格勒杜马8月的选举也证明，党员人数同党的得票数的比例正是如此。可见，我们已经有一个由一百万思想上忠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20日领取大笔薪俸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的“妙法”，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为了说明这种妙法是多么简便，效果是多么灵验，我们且举一个尽可能简单明了的例子。

国家有时要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常有的事，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资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失去了干活的人而缴不起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一大帮法警、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要派一个

哥萨克分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法警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们知道，撵人搬家的场面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濒于绝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愤怒，激起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把法警和民警队打成肉酱。需要大量的兵力，而且一定要从某边远地区调几个团到大城市来，这样士兵就不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不致“传染上”社会主义。

假设无产阶级国家要让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强行搬进富人住宅。假设我们的工人民兵分队由 15 个人组成：2 个水兵，2 个士兵，2 个觉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 1 人是我们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 1 个知识分子和 8 个劳动贫民，这 8 人当中至少必须有 5 个妇女，而且要有仆人、粗工等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 2 男 2 女住着 5 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您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之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以前，你们必须挤一挤。你们的电话要 10 家共用。这样可以不必跑遍各家铺子等等，可以节省 100 来个工时。其次，你们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轻劳动而没有事干的半劳动力：55 岁的女公民和 14 岁的男公民。他们每天要值班 3 小时，监督供应 10 家的食品的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记。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学生公民马上就把这项国家的命令抄成两份，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字据，保证切实执行这个命令。”

依我看来，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构和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情形就会是这样。

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

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把民主制教给人民。立宪民主党的女士们同意根据英国和法国最好的资料给女仆们作关于妇女平等的讲演，并且还准备在最近的音乐会上，在露天舞台上，在几千人面前表演接吻：演讲人立宪民主党的女士吻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吻前部长策列铁里。感激不尽的人民将受到一次实例的教育，知道什么叫作共和制的平等、自由、博爱……

是的，我们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策列铁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忠于民主制，并且在人民中间宣传这种民主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民主制有某种不同的概念，那该怎么办呢？

在我们看来，为了减轻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的负担和灾难，为了医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就需要实行革命的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上述例子中那种根据贫民利益分配住房的革命措施。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对食品、衣服、靴鞋等等的处理，以及在农村对土地等等的处理都应当这样。我们可以立刻吸引 1000 万人，甚至 2000 万人组成的国家机构从事这种意义上的国家管理，而这样的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充分的、毫

无保留的支持。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觉悟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训练”（我们并没有白受资本主义的训练）而富有纪律性的工人，他们能够建立工人的民兵并逐渐把它扩充（要立刻开始扩充）为全民的民兵。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领导，并且他们也能够吸引真正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

自然，这种新机构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但是，难道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经营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吗？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要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即资产者、官吏和“社会党人”部长们企图按老办法管理国家，但又无法管理，结果7个月之后居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激起了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通过实践让他们看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合理地最有秩序最有组织地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符合贫民的利益。不这样，就不能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认真地、勇敢地、普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眼界狭窄的旧官僚分子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对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逼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来讲，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

同国家机构问题有关的还有集中制问题，巴扎罗夫同志在9月27日《新生活报》第138号《布尔什维克和政权问题》一文中，十分有力又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巴扎罗夫同志是这样推论的：“苏维埃不是适应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机构”，因为7个月的经验已经表明，“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有几十份、几百份文件资料”已经证实，苏维埃虽然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已享有“充分权力”，但是“在消除经济破坏方面，并没有能取得稍微令人满意的结果”。需要一个“按生产部门划分的、在每个部门内实行严格集中制并服从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心”的机构。“请看，问题不在于更换旧机构，而仅仅在于改良旧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一直讥笑持有这种计划的人……”

巴扎罗夫同志所有这些同资产阶级论调一模一样、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断，简直是软弱无力得令人吃惊！

确实如此。说苏维埃在俄国某地某时曾享有“充分权力”，这简直是可笑的（即使这不是在重复资本家出于阶级私利的谎言）。所谓享有充分权力，就是要有支配全部土地、所有银行和所有工厂的权力；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经验以及有关政治同经济的关系的学术资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小小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法就在于它不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对苏维埃采取的任何一种重要步骤都暗中破坏，继续把持政府，保留支配土地和银行等等的权力，却又把经济破坏的罪责推在苏维埃身上！！联合的全部惨痛教训也在于此。

苏维埃从来没有掌握过充分的权力，它的措施除起缓解作用和加剧混乱外，什么结果也没有。

向布尔什维克，向这些按他们全党的信念、纲领和策略来讲都是集中主义者的人证明集中制的必要性，那简直是多此一举。《新生活报》的撰稿人于这种无聊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了解我们对他们那个“全国性的”观点加以嘲笑的意思和意义。而新生活派没有了解这一点，又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嘴巴上而不是在脑子里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一面背诵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一面却时时抱着理论上是可笑的、实践上是反动的“超阶级观点”，并把这种为资产阶级的效劳叫作“全国性的”计划。

可爱的人们，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更通俗一点讲：我们不是讥笑那些“计划”，而是讥笑巴扎罗夫之流不懂得否认“工人监督”、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拥护资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无缥缈的空想。

从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对过苏维埃的集中制，反对过苏维埃的统一。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反对按生产部门成立工厂委员会，反对工厂委员会的集中化。巴扎罗夫在无的放矢。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讥笑的都不是“集中制”，也不是那些“计划”，而是改良主义。因为在有了联合的教训之后，你们的改良主义是太可笑了。谁说问题“不在于更换机构，而在于改良”，谁就是改良主义者，就成了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派。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

这正是半年来联合所作的尝试。

我们所讥笑的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异口同声他说：“是呀，正是呀，我们恰好不反对改良，我们主张工人参加全国性的监督，我们完全同意。”而巴扎罗夫由于没有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细加思索，就上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圈套，于是好心的巴扎罗夫在客观上就扮演了资本家应声虫的角色。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企图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们的下场，过去一向如此，将来还会永远如此。正因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不能理解阶级斗争，他们的政策是十分可笑地永远动摇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可爱的公民们，去拟订“计划”吧，那不是政治，不是阶级斗争的事情，在那一方面你们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你们的报纸有许多经济学家。请你们同那些准备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工程师及其他人联合起来吧，请你们的大“机构”（报纸）拿出一个副刊来认真研究关于俄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关于银行和辛迪加等等的精确材料，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的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不致引起特别有害的影响，正是这种“计划”工作不致引起工人的讥笑，而会得到工人的感谢。

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让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来节省劳动的办法，探索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为劳动者的利益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不

给他们饭吃。

我们拥护集中制，也拥护“计划”，但是，我们拥护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制和计划，是无产阶级为了贫民、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反对剥削者而调节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制和计划。我们只同意把所谓“全国性”理解为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全部政权交给大多数人民，即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

第五条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因为“环境非常复杂……”

真是聪明人！他们也许愿意顺应革命，但只能是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向往这种革命而发出的叹息，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的哀鸣。即使革命开始时环境并不太复杂，革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造成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因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是旧事物无比复杂而痛苦的死亡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新生活方式的诞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而只有套中人^[173]才会认为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国内战争是可以设想的。

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么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

第五条理由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因为这里既没有什么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没有任何别的思想。这里有的只是革命使之感到忧愁和恐惧的人们所发出的叹息。为了说明这种叹息的性质，不妨谈一下我个人经历的两件小事。

七月事变前不久，我同一个富有的工程师谈过一次话。这个工程师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做过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甚至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现在，他完全被吓坏了，对情绪激昂、无法制服的工人充满愤恨。他（一个有学识的到过外国的人）说，假如这些工人能和德国工人一样就好了，当然，我了解社会革命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在战争造成工人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不是革命，这是毁灭。

要是历史像德国特别快车进站那样平平安安、稳稳当当、正点到达社会革命，他是愿意承认社会革命的。文雅的乘务员打开车厢门喊道：“社会革命站到了。请全体下车(Alle aussteigen)！”那时，有什么理由不从季特·季特奇之流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转到工人组织中的工程师的地位呢？

这个人见过罢工。他知道，就是在最平静的时候，一次最普通的罢工也总要掀起一场情绪激昂的狂风暴雨。他当然懂得，在阶级斗争唤起了一个大国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时候，在战争和剥削把千百万受地主数百年折磨、受资本家和沙皇官吏数十年掠夺和殴打的人民弄到几乎绝望的时候，这种狂风暴雨必然要更加猛烈千万倍。他“在理论上”了解这一切，但他仅仅在嘴巴上承认这一切，他简直被“非常复杂的环境”吓坏了。

七月事变后，承蒙克伦斯基政府的特别照顾，我有幸转入了地下。掩护我们这种人的当然是工人。有一次，在离彼得格勒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么好的面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再给坏面包了。我们早就不指望

在彼得格勒还能买到好面包。”

对七月事变的这种阶级估量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由于什么形势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口号和我们党的机构，以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挨过饿的人是没有想到的。面包对我来讲自然就像是写作的副产品。要通过政治分析这种非常复杂的途径才会想到一切的根本，想到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

而被压迫阶级的人，哪怕是待遇很好和十分有知识的工人，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而且说得那样朴实直率、斩钉截铁、观点鲜明，令人感到惊奇，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整个世界分成两个阵营：“我们”劳动者和“他们”剥削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感到不安：这只是劳动跟资本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斗。要砍树木就别怕木片飞进。

“革命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真令人难以忍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我们把‘他们’压了一下，‘他们’已经不敢像先前那样耍无赖了。我们再压一下，就可以完全把他们压倒。”工人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第六条，即最后一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

先生们，请别吓唬人，你们吓不倒谁。我们已经在科尔尼洛夫叛乱^[96]中（克伦斯基执政和它没什么两样）领教过这些敌对力量和它们的进攻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怎样消灭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和为数不多的特别富有、同革命特别“敌对”的地方小土地占有者阶层的代表曾处于多么可怜和无可奈何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看见了的，这是人民都还记得的。9月30日的《人民事业报》劝导工人在立宪会议^[19]召开（在对付起义农民的“军事措施”保护下召开！）以前要“容忍”克伦斯基执政（即科尔尼洛夫叛乱）和伪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人民事业报》上气不接下气地再三重复《新生活报》的第六条理由，并声嘶力竭地喊道：“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不听命于苏维埃政权，即不听命于工农政权，《人民事业报》为了不落在暴徒、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请看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

但是，无论《新生活报》或者《人民事业报》都吓不倒觉悟的工人。你们说：“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更简单明了、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克伦斯基政府要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竟敢说这是什么将是“国内战争”，这将是“可怕的前途”！

不，先生们，你们欺骗不了工人。这将是国内战争，而是一小撮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绝望的骚乱。就是说，他们想“不听命”于人民，并且想不顾一切地挑动人民大规模地重复在维堡对待科尔尼洛夫分子的那种行动，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想这样做，要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克伦斯基想这样做，他就会触怒人民。不过，先生们，你们这样是吓不倒工人和士兵的。

真是卑鄙无耻到绝顶了：他们伪造了新布里根杜马，利用伪造手段招募了一些反动合作社派即农村富农当作帮凶，再加上一些资本家和地主（所谓有选举资格的分子），又企图利用这帮科尔尼洛夫匪徒来蹂躏人民的意志，蹂躏工农的意志。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像滔天洪水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9月30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在9月29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

“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为消灭俄国中部农村中仍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做什么事。”

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在9月29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换句更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京、基什金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

“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他们在7月8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9月17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自食其言，甚至不顾孟什维克唐恩的劝阻而推迟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11月底，而不是像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10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即将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会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会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军事措施的政府，对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伪造选举的行为明目张胆地进行庇护的政府会如期召开立宪会议。

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竟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说：“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起义农民的政府！”

使几十万俄国士兵在6月19日之后的进攻中送了命，使战争拖延下来，使德国水兵不得不举行起义，把自己的长官投到水里，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还在一味地空谈和平而不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还在恬不知耻地向工人和农民，向朝不保夕的士兵说：“必须容忍”，要相信“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的政府，要再相信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一个月，而他们在一个月中又会把几万士兵送到屠宰场……“必须容忍”。

难道这还不是恬不知耻吗？？

不，社会革命党的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是骗不了士兵的！

工人和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克伦斯基政府了，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府将立刻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因此一定能立刻实现停战并迅速缔结和约。

我们农民军队的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这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农民起义的克伦斯基政府违反苏维埃意志存在下去了。

不，社会革命党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再也骗不了工人和农民了！

在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的问题上，也就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新生活报》深信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的那种进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逻辑上和政治上的非常惊人的错误，只有那些已经让别人吓得几乎神经失常的人才看得出来。

你们说：“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说得好。不过可爱的同胞，你们都是些经济学家和有学识的人。你们都知道，拿民主派同资产阶级作对比是荒诞的和愚蠢的，这就像拿斗同尺作对比一样，因为世上

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非民主派的（能参加旺代^[174]叛乱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各种敌对力量”，这是一句空话。而阶级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拥护它的还有地主）。

俄国也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成三种主要“力量”：资产阶级和地主，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首先是农民。正是这三种主要“力量”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在俄国），不仅早已为科学的经济分析所证明，而且也为一切国家的整个现代史的政治经验、为18世纪以来欧洲所有革命的经验、为1905年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了。

那么，你们是想恐吓无产者，说资产阶级的进攻会把他们的政权消灭吗？你们的恐吓就是这个意思，也只有这个意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

好吧。比方说，如果资产阶级能够消灭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那剩下的就只是“联合”，也就是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或妥协。任何别的都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要知道联合已经试验了半年，已经遭到了破产，并且你们这些可爱而不善于思考的《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自己也已经放弃了联合。

结果怎样呢？

《新生活报》的公民们，你们吓糊涂了，你们让别人吓得甚至连最简单的议论都不能自圆其说了，连总共不到五而只到三的数目都弄不清了。

或者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这你们早已不赞成了，甚至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敢提了，因为它知道，在4月20—21日，人民用肩膀一撞就把这种政权撞翻了，现在更是会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打翻这种政权。或者政权归小资产阶级，即由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联盟，妥协），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愿意而且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经济科学证明了的。经济科学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资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间是站不住的。这个联合半年来在俄国试用过不下几十种方法，但还是失败了。

最后，或者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贫苦农民，而不是归资产阶级，以便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还没有尝试过，而这是你们《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劝人民不要去干的，你们用自己畏惧资产阶级的心理去吓唬人民。

第四种办法是连臆造也臆造不出来的。

这就是说，如果《新生活报》因为无产阶级政权仿佛可能被资产阶级搞垮而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等于暗地里回到同资本家妥协的立场！！！很明显，谁害怕反抗，谁不相信能够粉碎这种反抗，谁教导人民说，“你们应当害怕资本家的反抗，你们制服不了这种反抗”，谁就是以此号召重新同资本家妥协。

现在，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都已看到联合的破产，不敢公开拥护联合，同时他们又得到资产阶级的保护，而害怕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掌握全部政权，所以弄得糊里糊涂，《新生活报》也像他们一样，糊涂到了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地步。

害怕资本家的反抗，同时又自命为革命者，希望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多么可耻！被机会主义败坏了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在思想上堕落到什么地步，才能发出这种论调！

资本家的反抗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全体人民也看到过了，因为资本

家比其他阶级更有觉悟，他们一下子就理解了苏维埃的意义，马上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直到采取空前未有的造谣诽谤的手段，制造军事阴谋，来破坏苏维埃，消灭苏维埃，糟蹋苏维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之下），把苏维埃变为清谈馆，长年累月地用无聊的空话和玩弄革命的把戏使农民和工人厌倦。

而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反抗力量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贫困和资本主义奴隶制所摧残的人们实际看到和感觉到国家政权到了被压迫阶级手中，并正在帮助贫民对地主和资本家展开斗争，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什么样的回击资本家的潜在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隐蔽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来；只有那时，如果工人阶级政权有 1 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顽抗的敌人，就会有 100 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们斗争，而这些新战士至今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他们一直在贫困折磨和绝望状态中苟延残喘，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也会为他们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兵分队会完全信任地召请他们直接地经常地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

在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这帮先生善意参加下，资本家和地主用尽一切办法糟蹋民主共和国，用效劳财富来糟蹋民主共和国，致使人民变得冷漠无情，使他们觉得反正都一样，因为一个挨饿的人不会去区分共和国和君主国，一个挨冻、赤足、受尽折磨、为旁人的利益去送命的士兵是不会爱上共和国的。

但是，一旦无论哪个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娘，随便哪个破产农民都看到，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向财富卑躬屈节，而是帮助贫民；这个政权敢于采取革命措施；这个政权把寄生虫的多余食品拿来分给饥民；这个政权让无家可归的人强行搬进富人的住宅；这个政权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土地交给劳动者，工厂和银行受工人监督；百万富翁隐匿财产会立刻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旦贫民看到这一切并且感觉到这一切，那时任何资本家和富农的力量，任何拥有数千亿的世界金融资本的力量也战胜不了人民革命，相反地，人民革命将战胜整个世界，因为在所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熟。

如果我们的革命自己不害怕自己，如果它把全部政权交给无产阶级，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更加成熟的和更加有组织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暂时受到了战争的压制，但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战争使它更加强大了。

担心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即保证能得到贫苦农民全力支持的无产阶级政权会被资本家先生们“消灭”！这是多么近视！这是多么可耻的害怕人民的心理！这是多么虚伪！流露出这种恐惧心理的人都属于“上等”（这是按资本主义的尺度，而实际上是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讲到“正义”这个词，自己并不相信，而是习惯于把它当作一种空话，并不赋予它任何内容。

这里有个例子：

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个著名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再找不到比他更温和的劳动派分子^[10]，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更志同道合的人了。没有哪个部长比他更热心地替资产阶级效劳。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比他更热烈地拥护“联合”、拥护同资本家的妥协！

请看，根据护国派《消息报》的报道，这位先生在“民主”（应读作：布里根）会议上的发言不得不供认：

“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反映集团要求即阶级要求和民族要求的纲领。最坦率地维护这个纲领的是布尔什维克。而民主派其他部分的人也很难拒绝这个纲领。要知道，这是劳动群众的要求，是被歧视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民主派难以同布尔什维克决裂，拒绝这些阶级要求，首先是因为这些要求实质上是正义的。我们在革命前为这个纲领奋斗过，为这个纲领进行过革命，在其他条件下我们都会一致地拥护它，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个纲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现在，这种危险性更大，因为这些要求恰恰是在国家不能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首先要保卫国家这个整体，把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一条路：不管提出的要求多么正义和强烈，一概不予以满足，相反地，要各方面忍受必须忍受的限制和牺牲。”（9月17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当资本家们还掌权的时候，他所保卫的不是什么整体，而是俄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的私利。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和资本家，和他们的秘密条约，和他们的兼并（侵占别人土地），和他们的银行的金融诈骗行为断绝关系之后，战争才不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在断绝这种关系之后，战争才会在敌人拒绝接受正式向他提出的公正的和约的情况下，成为防御性的、正义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一个摆脱资本的枷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银行和工厂置于工人监督之下的国家的防御力量，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许多倍。

而最重要的是，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既然他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的正义性，不得不承认它的要求是“劳动群众”即多数居民的要求，那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立场，放弃了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全部立场。

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的政府将是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纲领。

要知道，彼舍霍诺夫先生是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政治朋友，是富农之类的老爷们的代表，如果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或者克伦斯基的军队（他们是一路货）打败了布尔什维克，这些老爷们的老婆和姐妹第二天就会用小伞挑出被打得半死的布尔什维克的眼珠。

就连这样的一位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要求的“正义性”。

在他看来，“正义”不过是空话。但是在半无产者群众看来，在被战争弄得破产，弄得痛苦不堪，弄得疲惫已极的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看来，这不是空话，而是最尖锐、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是关系到会不会饿死、能不能取得一片面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政策都不能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挨饿者和破产者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妥协”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定会得到这些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支持。

知识分子和那些根据他们“洞悉”经济唯物主义的“奥妙”这个堂皇的理由而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坏蛋们说：正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

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正是在目前，布尔什维克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代表，以自己的政策体现了那种在全世界推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

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当大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物质机构依靠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先进国家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奇妙的技术，而资本主义却妨碍这些技术的运用的时候，当觉悟的工人团结成一个有 25 万党员的党，以便在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支持下有计划地掌握这种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后记

上面这篇文章写好了的时候，10月1日的《新生活报》社论又提出了一套糊涂的新妙论，这套妙论特别危险，因为它是隐藏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后面的，隐藏在“不要受人挑动”这种深奥的庸俗议论的烟幕后面的（可别落入这种关于挑动的叫喊的圈套，因为这种叫喊无非是企图恐吓布尔什维克，使他们不要夺取政权）。

这套妙论说：

“无论是7月3—5日运动的教训，还是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都非常明显地表明：民主派拥有在人民中威信最高的机关，如果它在国内战争中采取防御立场，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掌握进攻的主动权，那它就要失去一切中间的、动摇的分子而遭到失败。”

如果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套议论中所反映的这种庸俗的糊涂思想表示任何形式的一点点让步，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革命。

因为发表这种议论的作者在谈到国内战争（这个话题恰好是通体漂亮的太太搭得上话的）的时候，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训曲解到了极端滑稽可笑的地步。

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代表和奠基人卡尔·马克思谈到这些教训，谈到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时是这样论述的：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决心干到底（直译：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全部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马克思指的是起义的最“困难的”情况，即必须反对“巩固的”旧政权，反对还没有在革命影响和政府动摇影响下瓦解的军队）；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

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年德文版第118页）

《新生活报》的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把一切都改了^[175]，我们有的不是三倍的勇敢，而是两种长处，“我们有这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在“我们”看来，世界历史的经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1917年两次运动的经验——透过莫尔恰林^[176]的眼镜被歪曲了的经验。

让我们不戴这副可爱的眼镜来看看这个经验吧。

你们拿7月3—5日的事变同“国内战争”相提并论，是因为你们相信了阿列克辛斯基和佩列维尔泽夫之流。而相信这样的人正是《新生活报》的先生们的特色（尽管他们拥有大型日报的庞大机构，但在收集有关7月3—5日事变的材料方面却没有独立地做过一点事情）。

我们姑且假定，7月3—5日的事变不是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在雏形阶段内的国内战争的胚胎，而是真正的国内战争。我们就这样假定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训证明了什么呢？

第一，布尔什维克没有转入进攻，因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转入进攻，那就会在7月3日夜里，甚至在7月4日拿下许多东西。如果说这是国内战争（《新生活报》正是这样看的，而不是如实地看作自发的爆发向4月20—21日那种示威的转变），采取防御正是他们的弱点。

由此可见，“教训”同《新生活报》那些聪明人所说的相反。

第二，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连起义的打算都没有，为什么当时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它并不在我们和《新生活报》争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国内战争”即起义的教训，而不是革命政党由于显然缺乏多数人的支持而放弃起义的念头。

因为大家知道，1917年7月过了很久以后，布尔什维克才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在全国获得了多数（在莫斯科获得了49%以上的选票），可见，得到的“教训”又完全不是新生活派那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想看到的那些。

不，不，《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请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搞政治吧！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

为什么《新生活报》谈到7月3—5日事变的“教训”，却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呢？那是因为谈论政治问题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小团体中被资产阶级吓倒了的人们。

还有，第三，事实表明，正是在7月3—4日事变之后，正是由于策列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586页。——编者注

铁里先生之流被自己的七月政策揭穿了，正是由于群众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是自己的先进战士而“社会联盟派”是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才开始垮台的。他们的垮台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就完全为彼得格勒8月20日的选举所证实了，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而“社会联盟派”遭到了失败。（《人民事业报》不久前隐瞒各党派得票的总数，企图推翻这一事实^[177]，但这是欺骗自己和欺骗读者；根据8月24日《日报》^[149]仅仅关于城市的材料^[178]来看，立宪民主党人得票的百分数从22%增加到23%，绝对票数减少了40%；布尔什维克得票的百分数从20%增加到33%，绝对票数只减少了10%；所有“中间”党派得票的百分数从58%下降到44%，绝对票数减少了60%！！）

七月事变后和科尔尼洛夫事变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垮台，也为两党中的“左”翼人数几乎增加到40%这一情况所证实，这真是替遭到克伦斯基先生之流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报了仇”。

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失去了”数百个党员，但是在7月3—4日事变中赢得了许多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群众懂得了并看到了它的忠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背叛。这就是说，得到的“教训”和“新生活派”所说的完全不同，这个“教训”就是：决不能离开沸腾的群众而去迁就“民主派的莫尔恰林们”，如果是起义，那就要趁敌军分散的时候转入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新生活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精确估计客观形势作为策略的基础，而是荒谬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国内战争”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召开立宪会议”混为一谈吗？

先生们，这简直令人可笑，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任何逻辑的嘲弄！

如果在客观形势中没有使阶级斗争激化到“国内战争”程度的根据，你们在谈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这里分析的《新生活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如此）的时候，为什么要谈到“国内战争”呢？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并且证明，在客观形势中没有进行国内战争的基础，因而可以并且应该把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在法律上和议会制上是“简单的”东西，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之类放在策略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那就可以认为这类代表大会和这类会议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国内战争的必然性或者哪怕只是可能性是以目前的客观形势为根据的，如果你们不是“信口”谈论国内战争，而是明显地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国内战争形势的存在，那么，怎么能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会议放在首要地位呢？？这简直是嘲弄挨饿的和受蹂躏的群众！难道挨饿的人会同意“等待”两个月吗？难道你们自己每天都在描写的日益加剧的经济破坏会允许“等待”到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在我方没有采取争取和平的重要步骤（即没有正式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的条件下，德国的进攻会允许“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你们有这样的材料，使你们能够断定，从2月28日到9月30日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的历史，从10月1日起到11月29日^[179]就会发展得极其平静、和平、稳步、合法，而决不会有爆发、飞跃、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危机吗？难道前线的军队，由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代表前线正式宣布“不会再打下去”的那个军队，会平静地忍受饥寒，直到“预定的”日子吗？难道由于你们把

农民起义叫作“无政府状态”和“暴行”，由于克伦斯基派“武装”力量去镇压农民，农民起义就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因素了吗？难道可以设想一个在农民国家里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能平静地、公平地、不伪造地进行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吗？

先生们，你们不要讥笑“斯莫尔尼学校张皇失措”^[180]！你们张皇失措的程度并不小些。是你们在用张皇失措的言语和可怜而立宪幻想来回答国内战争的各种严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染上了这种情绪，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自己的革命。

尼·列宁

1917年10月1日

正文和后记载于1917年10月

《启蒙》杂志第1—2期合刊

再版序言载于1918年彼得格勒

出版的本文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

第282—331页

局外人的意见

(1917年10月8日[21日])

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0月8日，要在9日就送到彼得格勒同志们手中，恐怕希望不大。也许这篇东西写晚了，因为北方苏维埃代表大会^[181]已于10月10日召开。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出我的“局外人的意见”，说不定彼得格勒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士兵可能很快发起行动，但是还没有真正行动。

全部政权应转归苏维埃，这是很清楚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或者说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这在目前来说是一回事），一定会获得世界各国包括各交战国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特别是俄国农民的最大的同情和全心全意的支持，这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同样应该是无可争辩的。这些人所共知的早已证明的真理，无须多谈。

现在必须谈谈未必所有同志都十分清楚的问题，即政权转归苏维埃目前在实践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看起来，这似乎很明显，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一直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拒绝武装起义，就等于背弃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等于完全背弃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但是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必须仔细考虑这些规律。卡尔·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也正如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

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

(1) 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 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在决定性的关头，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训练、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 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 必须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不放过敌军还分散的时机。

(5) 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

如果把这点应用于俄国，应用于1917年10月，那就是说：一定要既从外面，又从内部，既从工人区，又从芬兰、雷瓦尔、喀琅施塔得等各方面，同时地、尽可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对彼得格勒进攻，要使用全部舰队来进攻，要使集中的力量大大超过那拥有15 000—20 000（也许更多些）人的我国“资产阶级近卫军”（士官生）以及我国“旺代^[174]军队”（一部分哥萨克）等等。

要把我们的三支主要力量——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配合起来，一定要占领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1) 电话局，(2) 电报局，(3) 火车站，(4) 特别是桥梁。

要挑选最坚决的分子（我们的“突击队员”、青年工人和优秀水兵）组

成一些小分队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军事行动，例如：

包围彼得格勒，使之与外界隔绝，用海军、工人和陆军部队的联合进攻把它占领，——这是需要有艺术和三倍的勇敢才能完成的任务。

要把最优秀的工人编成配备枪枝炸弹的队伍去进攻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士官生学校、电报局、电话局等等），口号是：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一个敌人。

我们希望，一旦决定行动，每个领导者都能够很好地运用丹东和马克思的伟大遗训。

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载于 1920 年 11 月 7 日《真理报》
第 250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
第 373—375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1917年10月10日（23日）会议文献^[182]

2 决议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德国海军中的起义^[183]，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发展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危险），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已经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155]）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96]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181]、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

载于1922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10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
第385页

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84]

(1917年10月18日[31日])

同志们！我还未能收到10月18日星期三的彼得格勒报纸。有人打电话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的《新生活报》^[76]上发表的声明全文^[185]告诉了我，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怀疑毕竟是不行了，我只好利用这个机会给党员们写这封信，希望在星期四晚上或者在星期五早上大家都能看到，因为对这种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实践问题愈严重，犯有工贼行为的人愈负责、愈“知名”，工贼行为的危险性就愈大，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念及这些工贼过去甚至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就愈不可饶恕。

真令人难以想象！党内都知道，党从9月份起就在讨论起义问题。谁也没听说这两个人中有谁写过一封信或一篇东西！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夕，这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却出来反对多数，显然也反对中央委员会。这一点没有明说，但这样对事业危害更大，因为含沙射影更加危险。

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声明的行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反对中央的，否则他们的声明就毫无意义了，可是他们究竟反对中央的哪一个决定，这点却没有说明。

为什么呢？

显然是因为中央没有公布那个决定。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20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竟在一家非党的而且正好在这个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携手反对工人政党的报纸上，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的决定！

这可是比普列汉诺夫1906—1907年在非党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受到党痛斥的言论^[186]还要卑鄙千倍，有害百万倍！因为当时涉及的只是选举的问题，而现在涉及的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

在这样的问题上，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后，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没有公布的决定，——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

过去我同这两个从前的同志关系很密切，如果我因此犹豫不决，不去谴责他们，那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我直率地说，我不再把他们两个当作同志了，我将据理力争，要求中央和代表大会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因为，中央已经通过但还未公布的决定居然在非党报纸上遭到非议，从而在战士的队伍中引起动摇和混乱，这样的工人政党就没有能力解决实际生活愈来愈频繁地提到它面前的困难的起义任务。

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19]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工人是不会加入这种政党的，因为它的第一个口号是：

“在中央会议上讨论决战问题遭到失败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在非党的报纸上攻击党没有公布的决定。”

让他们去建立这样的党吧；这样，我们布尔什维克工人党只会得到好

处。

将来所有文件都公布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还会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暂时让工人把下面这个问题考虑一下：

“假定全俄工会理事会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多数决定准备罢工，但是罢工日期等等暂不公布。假定有两个理事以‘不同意见’为借口，在决定通过之后不仅写信给各地组织，说要重新审查决定，而且允许把自己的信告知非党报纸。最后，假定他们本人还在非党的报纸上抨击甚至尚未公布的决定，并且在资本家面前诋毁罢工。

试问，工人会犹豫不决，不把这种工贼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出去吗？”

现在离 10 月 20 日已经很近了，至于说到目前起义问题的情况，我从远方无法判断工贼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使事业究竟受了多大的损失。但毫无疑问，实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要补救这一点，首先必须开除工贼以恢复布尔什维克阵线的统一。

把思想上的反对起义的理由愈充分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理由的弱点就愈加明显。前几天我刚给《工人之路报》^[166]寄去一篇有关的文章，如果编辑部认为不能发表，也许可以让党员看到这篇文章的手稿。

这些“思想上的”（姑且这样说）理由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等待”立宪会议。等等再说，也许我们能熬过去，这就是全部理由。即使有饥荒、经济破坏、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即使罗将柯采取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的步骤，即使有同盟歇业，我们也许还能熬过去。

碰运气，这就是全部理由。

第二，大喊大叫的悲观主义。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不好。资本家的一切都准备得好得出奇，工人的一切都不行。“悲观主义者”就问题的军事方面声嘶力竭地叫喊，而“乐观主义者”却默不作声，因为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面前泄露点什么，除了工贼恐怕未必会有人引以为快。

困难的时刻。艰巨的任务。严重的叛变。

但是任务总归会得到解决的，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农民起义和前线士兵忍无可忍的情绪一定会发生作用！我们把队伍团结得更紧密，无产阶级就必定胜利！

尼·列宁

载于 1927 年 11 月 1 日《真理报》
第 250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
第 411—414 页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390—410 页。——编者注

给中央委员的信^[187]

(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同志们：

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

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资产阶级通过科尔尼洛夫分子发起的攻击、维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说明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立刻夺取政权的好处就是：能保护人民（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人民，首先是军队和农民）免遭科尔尼洛夫政府，即赶走维尔霍夫斯基、策划第二次科尔尼洛夫阴谋活动的政府的蹂躏。

谁应当取得政权呢？

目前这并不重要，让军事革命委员会^[188]“或其他机关”取得政权吧，只要它声明，政权只交给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军队利益（立即提议媾和）、农民利益（立刻夺取土地，废除私有制）和饥民利益的人。

必须立刻把各区、各团、各种力量都动员起来，立即派遣代表团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去，坚决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我们今天夺取政权不是要反对苏维埃，而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夺取政权是起义的任务，起义的政治目的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清楚的。

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

这是各次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革命者明知挽救革命、提出媾和、挽救彼得格勒、摆脱饥饿、把土地交给农民等事业都取决于自己，可是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

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

发表于1924年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

第430—431页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89]

(1917年10月下旬)

1 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10月25日[11月7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绝大多数苏维埃都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代表大会。妥协派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90]的权力结束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已被逮捕。

苏维埃政权将向各国人民提议立即缔结民主和约，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战。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置；将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利；将规定工人监督生产；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191]；将设法把粮食运往城市，把生活必需品运往农村；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

代表大会决定：全部地方政权一律转归当地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

代表大会号召前线士兵要警惕沉着。苏维埃代表大会深信，在新政府向各国人民直接提出的民主和约尚未缔结以前，革命军队定能捍卫革命，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实行向有产阶级征收和课税的果断政策，以保证供给革命军队一切必需品，并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

克伦斯基和卡列金等科尔尼洛夫分子正试图调军队到彼得格勒来。有几支被克伦斯基用欺骗手段调动的部队已经站到起义的人民这一边来了。

士兵们，积极反抗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提高警惕！

铁路员工们，使克伦斯基派到彼得格勒来的所有军车都停下来！

士兵们，工人们，职员们，革命的命运和民主和约的命运完全操在你们手里！

革命万岁！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农民苏维埃代表

载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9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
第5—6页

2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 (10月26日[11月8日])

和平问题是现时紧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多，写得很多，想必你们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讨论得不少了。因此让我来宣读一个宣言，这个

宣言拟将由你们选出的政府来发表。

和平法令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

本政府认为，一切交战国^[191]中因战争而精疲力竭、困顿不堪、痛苦万状的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所渴望的公正的或民主的和约，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俄国工农最明确最坚决地要求的和约，就是立即缔结的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

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到各国和各民族的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全部条件，就立即毫不迟延地采取一切果断步骤。

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的观念，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的观念，认为凡是把一个没有明确而自愿地表示同意和希望归并的弱民族或小民族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不管这种强制归并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制归并或强制留在该国疆界内的民族的发达或落后程度如何，也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

不管哪个民族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内，也就是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示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示的，都完全一样），不让它有权在归并它的民族或较强的民族完全撤军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本民族的国家生存形式问题，这种归并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民族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的、对所有民族都无一例外是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

同时本政府声明，上述和平条件决非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无保留地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各项秘密条约^[192]。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了替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是为了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所兼并的土地。

本政府在建议各国政府和人民立即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公开谈判的同时，表示愿意通过电报往来，通过各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或通过各国代表的会议来进行这种谈判。为了便于进行这种谈判，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权代表前往中立的国家。

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并认为停战时间最好不少于三个月，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使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的代表完成他们所参加的和约谈判，同时也使各国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能召开会议最终批准和约条件。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媾和建议的同

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193]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非常法^[120]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堪称全世界工人楷模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从各方面奋力采取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应当立即开始和平谈判。我们应当既向各国政府，也向各国人民呼吁。我们不能漠视各国政府，否则就可能拖延和约的签订，人民政府不应当这样做，但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不同时向各国人民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都有分歧，所以我们应当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我们要极力坚持我们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全部和平纲领。我们决不放弃这个纲领，但是我们应当使敌人无法抓住把柄说，他们的条件跟我们不同，因此没有必要同我们谈判。不，我们应当使他们无机可乘，我们不应当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条件。所以才写进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将考虑任何和平条件和一切建议。我们将予以考虑，这并不是说将予以接受。我们要把它们提交立宪会议讨论，立宪会议有权决定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我们要与各国政府的欺骗行为作斗争，它们都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没有一个政府会把它想的统统说出来。我们是反对秘密外交的，我们要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行事。我们不忽视，而且也没有忽视过困难。战争不能用拒绝的办法来结束，不能由单方面来结束。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可是我们也不拒绝较短的期限，以便使疲惫不堪的军队可以得到哪怕是短暂的喘息，同时，一切文明国家也有必要召集人民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在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的同时，我们也向那些对开展无产阶级运动有过许多贡献的国家的觉悟工人呼吁。我们向进行过宪章运动的英国工人呼吁，向屡次在起义中充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力量的法国工人呼吁，也向经历过反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艰苦斗争并建立了强大组织的德国工人呼吁。

在3月14日的宣言^[79]中，曾提出要推翻银行家，可是我们自己不但没有推翻本国的银行家，甚至还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银行家的政府推翻了。

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可是三年战争已使群众获得了充分的教训。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苏维埃运动，在德国有过海军起义^[183]，尽管它被刽子手威廉的士官生镇压下去了。最后，要记着，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的一切可以很快地让人们都知道。

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掌声经久不息）

载于1917年10月28日（11月10日）《真理报》第171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9号；和平法令载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

《真理报》第 170 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208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9—13 页

3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

我不打算谈宣言的一般性质。你们的代表大会将要建立的政府，对于一些不大重要的条款可以修改。

我将坚决反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和平要求。最后通牒的方式会葬送我们的整个事业。我们不能坚持我们的要求毫无变通的余地，这会给帝国主义政府以口实，它们会说，我们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所以无法进行和平谈判。

我们把我们的宣言散发到各地去，大家就会知道。谁想隐瞒我们工农政府提出的条件，就办不到了。

要想隐瞒我国推翻了银行家地主政府的工农革命，是不可能的。

如果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各国政府就可能置之不理，如果采用我们那样的措辞，它们就不得不答复。要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政府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不希望有什么秘密。我们希望政府时刻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

如果由于我们采取最后通牒的方式，某边远省份的某农民无从知道别国政府想些什么，那他会怎样说呢？他会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让别人有提出各种和平条件的机会呢？我倒要琢磨琢磨，看看各种条件，然后再告诉我们那些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怎样做。如果别国政府都不同意，我决心用革命的手段为争取公正的条件而斗争；不过，某些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条件，我愿意让这些国家的政府自己去继续斗争。我们的想法，只有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农民可能会对我们说的话，他还会责备我们在细节上太不通融，因为我们当前主要是要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派去充当政府首脑的戴皇冠的和不戴皇冠的刽子手的一切卑鄙行径。

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让各国政府把我们毫不通融的态度当作借口，向人民隐瞒它们驱使人民互相厮杀的目的。这不过是一滴水，但是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放弃这一滴可以滴穿资产阶级掠夺行为顽石的水。最后通牒方式会缓和我们敌人的困难处境。我们要把一切条件都告诉人民。我们要使各国政府正视我们的条件，让它们去回答本国的人民。我们要把一切和平建议提交立宪会议决定。

同志们，条文中还有一点你们应当十分注意。秘密条约一定要公布。关于兼并和赔款的条款一定要废除。同志们，有各种各样的条款，各个强盗政府不仅达成了关于掠夺的协议，而且还就经济问题以及关于睦邻关系的其他各种条款达成了协议。

我们既不用条约来束缚自己，也不让别人用条约来束缚我们。我们拒绝一切关于掠夺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关于睦邻关系的条款和经济协定，这些我们是不能拒绝的。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我们选择一个长的期限，是因为各国人民已被拖了三年多的流血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渴望休息。我们应当懂得，必须让各国人民在议会参加下讨论和平条件，表明自己的意愿，而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要求长时间停战，是为了让前线部队得到休息，停止恶梦似的无休止的厮杀，可是我们也不拒绝较短时间的停战

的建议，我们要研究这种建议，而且应当接受这种建议，哪怕向我们提出的是停战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建议。我们的停战建议也不应当是最后通牒式的，因为决不能让敌人把我们毫不妥协的态度当作借口，向人民隐瞒全部真相。这种建议决不应当是最后通牒式的，因为不愿停战的政府就是犯罪的政府。如果我们不把停战建议变成最后通牒式的，我们就能使各国政府成为本国人民眼里的罪犯，而人民对于这样的罪犯是决不会客气的。有人反驳我们说，我们不采用最后通牒方式，就是表示我们软弱；可是现在该是抛弃资产阶级所谓人民力量的一切谎后的时候了。在资产阶级看来，只有当群众听从帝国主义政府指使，盲目去进行厮杀的时候，才算是有力量。只有当一个国家能运用政府机构的全部威力，把群众派遣到资产阶级当权者想叫他们去的地方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认为这个国家有力量。而我们对力量的理解却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我们丝毫用不着害怕说出疲乏的真情实况，试问现在哪一个国家不是疲乏不堪，哪一国人民不在公开谈论这一点呢？就拿意大利来说吧，那里由于疲乏不堪而产生过要求结束这场厮杀的长期的革命运动。难道在德国没有发生过工人的群众性示威运动，提出停止战争的口号吗？难道被刽子手威廉及其奴仆残暴地镇压下去的德国海军起义不是疲乏不堪引起的吗？既然在德国这样纪律严明的国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开始说疲乏，说要停止战争，那我们就丝毫用不着害怕公开讲出这一点，因为这无论对于我们，对于一切交战国，甚至对于非交战国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实情。

载于 1917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10 日）《真理报》第 171 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209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4—16 页

4 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

我们认为革命已经证实和表明，把土地问题提得很明确是十分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经清楚地证明，应当把土地交给农民。已被推翻的政府，以及妥协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16]犯下了罪行，它们用各种口实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国家陷于经济破坏，激起了农民的起义。他们大谈农村里的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显然是撒谎和玩弄怯懦的欺骗手腕。试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明智的措施造成过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呢？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但是政府所采取的、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唐恩领导的苏维埃所赞同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对农民的，逼得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

这个政府引起了起义，却又对它自己引起的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大叫大嚷。政府本想用铁和血来镇压起义，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武装起义扫除了。工农革命政府首先应当解决土地问题，——能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的问题。现在我向你们宣读拟由你们的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令的条文，其中一条附有根据^[242]份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委托书拟订的给各地土地委员会的委托书。

土地法令

(1) 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

(2) 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时为止。

(3) 任何毁坏被没收的即今后属于全民的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革命法庭应予惩处。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在没收地主田庄时遵守最严格的秩序，确定达到多大面积的土地以及哪些土地应予没收，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对转归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产业，包括一切建筑物、工具、牲畜和储存产品等等，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

(4) 下附农民委托书是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44]编辑部根据^[242]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订的，公布于该报第 88 号（彼得格勒，1917 年 8 月 19 日第 88 号），在立宪会议对伟大的土地改革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各地应该以这份委托书作为实行这一改革的指南。

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

“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

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公正的办法应该是：

(1) 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禁止买卖、出租、典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转让土地。

一切土地：国家的、皇族的、皇室的、寺院的、教会的、工厂占有的、长子继承的、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等等的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因财产变革而受到损失的人，只有在适应新生活条件所必需的时间内，才有权取得社会帮助。

(2) 所有地下资源，如矿石、石油、煤炭、盐等等，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流，归国家专用。一切小的河流、湖泊和森林等等交给村社利用，但必须由地方自治机关管理。

(3) 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如果园、种植园、苗圃、养殖场、温室等等，不得分割，而应改为示范农场，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城乡的宅地连同家用果园和菜园，仍归原主使用，其面积和税额，由法律规定之。

(4) 养马场，官办和民营的种畜场和种禽场等等，一律没收，变为全民财产，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赎金问题应由立宪会议审议。

(5) 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

土地少的农民的耕畜和农具不在没收之列。

(6) 凡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依靠家属的帮助或组织协作社从事耕种的一切俄国公民（不分性别），均享有土地使用权，但仅以有力耕种的期间为限。禁止使用雇佣劳动。

村团成员一时丧失劳动力在两年以内者，村团在该成员劳动力尚未恢复的这段时间，有责任通过共耕制的办法予以帮助。

农民因年老或残废而不再能自己耕种土地时，便丧失其土地使用权，但可向国家

领取赡养费。

(7) 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当地条件，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

使用土地的方式应完全自由，究竟采用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还是按劳动组合的方式，由各乡村自行决定。

(8) 一切土地转让后都归入全民地产。在劳动者中分配土地的事宜，由地方的和中心的自治机关（从按民主原则组成的无等级的城乡村社起到各区域中心的机关止）负责主持。

根据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率和经营水平的提高等情况，土地应定期重新分配。

改变份地地界时，原份地的基本地段应予保留。

因故离村者应交还其土地，但其近亲及其所指定的人，有取得该段土地的优先权。

施肥和改良土壤（根本改良）投入的价值，由于在交还份地时尚未用尽，应予补偿。

如果个别地方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当地全体居民需要，过剩人口应迁往他处。

组织移民和移民费用以及农具供应等等概由国家负责。

移民应按下列次序办理：首先是自愿迁移的无地农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员、逃兵等等，最后，才采取抽签或协商的办法。”

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尽可能立即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步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

(5) 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

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就让它这样吧。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即使农民还继续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即使他们使这个党在立宪会议上获得多数，那时我们还是要说：就让它这样吧。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已被武装起义推翻的旧政府，曾想依靠没有撤换的沙皇旧官僚来解决土地问题。可是这些官僚不去解决问题，反而一味反对农民。农民在我国八个月的革命当中，已学会了一些东西，他们想要亲自解决一切有关土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反对对这个法案作任何修改，我们不希望规定得很详细，因为我们写的是法令，而不是行动纲领。俄国幅员广大，各地条件不同；我们相信农民自己会比我们更善于正确地妥当地解决问题。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热烈鼓掌）

载于 1917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10 日）《真理报》第 171 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209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 第 17—21 页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94]

(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

1. 在工人和职员(共计)人数不少于5人,或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

2. 企业较小,可由全体工人和职员直接实行工人监督者,则直接实行,否则,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实行,代表应立即在全体大会上选出,作出选举记录,并将当选人名单报告政府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3. 非经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许可,绝对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生产部门(参看第7条)停工,以及对生产进度作任何改变。

4. 一切帐簿和文据,以及一切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

5. 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所作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只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加以撤销。

6. 在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一切企业主和一切由工人和职员选出实行工人监督的代表,均应对国家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凡玩忽职守、隐瞒存货和报表等等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判处5年以下的徒刑。

7. 凡为国防服务以及与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

8. 工人监督细则,由各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以及职员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联席会议制定。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2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4—2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宣言

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
(1917年11月5—6日[18—19日])

同志们：

大家知道，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89]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占了多数。

这一事实是理解刚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在全俄各地发生并获得胜利的革命所必需的基本事实。一切拥护资本家和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家帮手的人，这些破坏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新革命的基本原则的人，常常忘记和回避的也正是这个事实。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不应当有别的政府。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同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建议他们参加新政府。我们极为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们拒绝了 this 建议，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然而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对人民负有义务组织政府。

大家知道，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委员名单，而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成员名单。

因此，说什么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是苏维埃政府，这种骗人的鬼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都是来自人民的敌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也只能出自他们的口。恰恰相反，现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直到苏维埃改选，或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新政府时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府方能被认为是苏维埃政府。

同志们！我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李可夫、米柳亭以及其他几个人昨天，即11月4日，退出了我党中央委员会，后面三人还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党里，虽然我们的政策方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但也难免有个别同志在反对人民公敌的斗争中表现得不够坚定，不够果敢。现在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于是有几个以前担任重要职务的我党党员在资产阶级进攻的面前动摇了，从我们的队伍中逃跑了。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帮手都因此而欢天喜地，幸灾乐祸，高喊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瓦解，预言布尔什维克政府必将覆灭。

同志们！不要相信这些谎话。这些退出的同志不仅抛弃了托付给他们的岗位，而且还违反了我党中央要求他们至少等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后再退出的明确决定，他们的行为和逃兵一样。我们坚决斥责这种

临阵脱逃的行为。我们深信，一切身为我党党员或同情我党的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也都会坚决斥责这种逃兵行为。

可是，我们声明，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一分钟也不会，丝毫也不会动摇拥护我们党的群众的团结，因而也不会动摇我们的党。

同志们总还记得，其中两个逃兵，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还在彼得格勒起义以前就有过逃兵行为和工贼行为，因为他们不仅在 1917 年 10 月 10 日那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中央会议上投票反对起义，而且竟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鼓动党的工作人员反对起义。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不敢站到工人方面来、更多地倾向于资产阶级方面的报纸（如《新生活报》^[76]）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一起大喊大叫起来，说什么我们党“瓦解了”，“起义破产了”，如此等等。可是实际生活很快就驳倒了一些人的谎话和诬蔑，另一些人的怀疑、动摇和怯懦。利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破坏彼得格勒起义的行为所掀起的“风波”，原来不过是杯水风波而已，群众的伟大热情，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前线，在战壕中和在农村里所表现的伟大英勇精神，好像火车抛弃木屑一样，轻而易举地抛弃了这些逃兵。

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听信于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像一个人，坚定地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

资产阶级的下流作家和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的人齐声责备我们，说我们不肯让步、不愿和解，说我们不愿意同别的政党分掌政权。同志们，这都是谎话！我们曾经建议，而且还在建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分掌政权。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可见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开始了谈判，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我们又在谈判中作了种种让步，甚至有条件地同意容纳彼得格勒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巢穴的一部分代表。如果万恶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如果士官生这些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弟，像他们上星期日在彼得格勒所干的那样，像他们现在打算再干的那样（这已由破获普利什凯维奇阴谋和昨天即 11 月 3 日在他那里搜获的文件证实了），还试图反抗人民的意志，那么人民首先就要铲除这个巢穴。但是，那些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背后，通过他们来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先生们，却把我们的让步说成是软弱的表示，乘机向我们提出新的最后通牒。阿布拉莫维奇和马尔托夫两位先生出席了 11 月 3 日的会议^[196]，并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停止逮捕，不停止查封资产阶级报纸，就不进行任何谈判。

我们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拒绝接受这个显然出自卡列金、资产阶级、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拥护者的最后通牒。普利什凯维奇阴谋，以及第 17 军某部的代表于 11 月 5 日来到彼得格勒，说要向彼得格勒进攻，对我们进行威胁（这种威胁是可笑的，因为这些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先头部队已被击溃，在加契纳附近溃散了，而其中大部分都拒绝反对苏维埃），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阿布拉莫维奇和马尔托夫两位先生的最后通牒，实际上是由谁发出的，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为谁服务的。

但愿全体劳动者都能沉着而坚定！苏维埃中的少数派被资产阶级吓倒了，不管他们抱着怎样“良好的愿望”，事实上都是科尔尼洛夫分子手中的傀儡，我们党决不会向他们提出的最后通牒让步。

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掌握政权的原则；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享政权，但这个少数派必须诚心诚意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然而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可是，对于那些没有群众拥护，实际上只有科尔尼洛夫分子、萨文柯夫分子、士官生等拥护的知识分子集团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是决不会屈服的。

但愿全体劳动者都能沉着而坚定！我们的党，苏维埃中多数派的党是团结一致地保卫着他们的利益的，而千百万城市中的工人、前线的士兵和农村中的农民一如既往地拥护我们的党，决心无论如何要使和平成功，使社会主义胜利！

载于 1917 年 11 月 7 日（20 日）《真理报》第 182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67—71 页

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

今天，11月18日星期六，我在农民代表大会^[197]上发言时，有人当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立刻作了答复。这个问题以及我的答复必须立即让所有读者都知道，因为，从形式上说，我只是以个人名义讲话，而实质上我是代表整个布尔什维克党讲话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讲话中提到工人布尔什维克同目前许多农民所信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的联盟问题时作过论证，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相反地，以被剥削劳动阶级为一方同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联合”（联盟），由于两者的利益是根本相悖的，不可能是“真诚的联合”。

我说过：假定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占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少数，甚至只有一个农业人民委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是不是能够实现真诚的联合呢？

能够，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护国派）的斗争中固然决不调和，但在就有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89]所批准的土地纲领中纯社会革命党的条文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则应当弃权。例如，土地平均使用和在小业主中间重分土地就属于这样的条文。

布尔什维克在表决这样的条文时弃权，丝毫没有违背自己的纲领。因为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对工厂实行工人监督，接着是剥夺这些工厂，实现银行国有化，建立调节国内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人们必须同意被剥削劳动农民小农提出的过渡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我说过：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1899—1909年），他多次肯定，大农业的国家和小农业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在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这类条文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弃权，因为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农民）同意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等条件下，土地平均使用不过是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无产阶级硬性规定这样的过渡办法是荒谬的；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它在选择这些过渡办法的时候，必须向被剥削劳动农民小农让步，因为这些办法不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当时有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费奥菲拉克托夫同志）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在立宪会议中，农民希望通过关于土地平均使用的法律，而资产阶级反对农民，如何解决取决于布尔什维克，这时布尔什维克将采取什么态度？”

我回答说：在实行了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等措施、社会主义事业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必须投

票赞成农民，反对资产阶级。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提出自己的特别声明，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等等，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弃权，那就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而出卖自己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出卖农民。只要政权掌握在工农政府手里，只要实行了工人监督，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建立了指导（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工农最高经济机构等等，土地平均使用等办法是决不会危害社会主义的。

这就是我的答复。

尼·列宁

载于 1917 年 11 月 19 日（12 月 2 日）《真理报》第 194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3 卷第 98—100 页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

1. 过去把召集立宪会议^[19]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因为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建立预备议会^[163]时，曾用许多违反民主制的办法搞了假选举。

2.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3. 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4. 按照1917年10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我国革命中的立宪会议，就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不可能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意志的情况下召集立宪会议。

5. 第一，只有在各党派名单符合人民真正分属于这些名单所反映的各党派的实际情况下，比例选举制才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在我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从5月到10月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农民中最受拥护的党是社会革命党^[16]，它在1917年10月中旬提出了统一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在1917年11月，即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会议召开之前，这个党发生了分裂。

因此，立宪会议的当选代表的比例，即使在形式上也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大多数选民的意志。

6. 第二，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之所以不符合人民意志，特别是不符合劳动阶级的意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根源，而是社会经济的根源，即阶级的根源，这就是在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时，绝大多数人民还无法知道在1917年10月25日，即在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以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十月苏维埃革命的全部规模和意义。

7. 十月革命为苏维埃夺取了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治统治权，并把它交给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我们看到这次革命正经历着自身循序发展的各个阶段。

8. 革命是从10月24—25日在首都取得胜利开始的，当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无产者和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农民的先锋队——第二次代表大会^[189]，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政权。

9. 然后，在11月和12月间，革命席卷了军队和农民的全体群众，这首先表现为撤销和改选旧的上层组织（集团军委员会、省农民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所代表的是革命已经走过的、妥协的阶段，即资产阶级的阶段，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段，因此这些组织必然要在更深更广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退出舞台。

10. 直到现在，即1917年12月中旬，被剥削群众的这种改造自己组织的

领导机关的强大运动还没有结束，而还没有闭幕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198]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11. 因此，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俄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划分情况，在 1917 年 11 月和 12 月间，实际上根本不同于 1917 年 10 月中旬各党派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所反映的情况。

12. 最近乌克兰的事件同样也说明（芬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的事件也部分地说明），在乌克兰拉达^[199]、芬兰议会等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各该民族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力量正在重新划分。

13. 最后，立宪民主党人^[5]和卡列金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农政府的反革命叛乱所挑起的内战，使阶级斗争达到最尖锐的程度，使历史向俄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向工人阶级和农民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完全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14. 只有工农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叛乱（其表现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运动）只有用武力无情地镇压这种奴隶主的叛乱，才能真正保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在革命中，事变的进程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已经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考虑工农革命的成果，不考虑苏维埃政权，不考虑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200]的决议等。全体人民已经完全明白，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15. 和平问题是人民生活中特别尖锐的问题之一。争取和平的真正革命斗争，在俄国只是在 10 月 25 日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的，这个胜利产生的初步成果就是公布秘密条约^[192]，缔结停战协议，开始就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普遍和约进行公开谈判^[201]。

广大人民群众只有现在才真正地、充分地、公开地得到机会，看到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的政策，并研究它的结果。

在立宪会议选举时，人民群众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显然，就从这一方面来看，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在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意志也是必然的。

16. 上述所有情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按照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以前、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存在的那些党派所提的候选人名单召集的立宪会议，必然同 10 月 25 日开始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这个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何况这些形式上的权利由于立宪会议法没有规定人民有权随时改选自己的代表而已经遭到破坏。

17. 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来考察立宪会议问题，而不考虑到阶级斗争和内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能正确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错误。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责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错误。

18. 由于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唯一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让人民尽量广泛

地、迅速地实际行使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立宪会议自己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这种改选的法令^[202]；立宪会议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监督问题上的政策；立宪会议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势力的营垒中来。

19.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

载于 1917 年 12 月 13 日（26 日）《真理报》第 213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63—167 页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203]

(不早于 1917 年 12 月 14 日[27 日])

粮食的紧张情况，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以及整个经济破坏所造成的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

为了使全国公民，首先是一切劳动阶级，能够在自己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立即从各方面，不惜采取最革命的手段来展开这种斗争并着手安排全国正常的经济生活，特制定下列条例：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1. 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

2. 各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以及一切属于富有阶级(即全部财产在 5000 卢布以上或每月收入在 500 卢布以上者)的股东，都必须继续有条不紊地经营企业的业务，执行工人监督的法令，向国家银行交出一切股票，并且每周向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报告本人的活动情况。

3. 国家的内债外债一律废除(勾销)。

4. 债券和各种股票的小额持有者，即属于各劳动阶级的小额持有者的利益，完全予以保护。

5.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凡 16 岁至 55 岁的男女公民，都必须执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其他苏维埃政权机关所指定的工作。

6. 规定下列办法作为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第一个步骤：凡属于富有阶级的人(见第 2 条)都必须备有劳动消费手册或劳动收支手册并如实登记，必须把上述手册送交相应的工人组织，或当地苏维埃及其机关，以便每周登记各人完成工作的情况。

7. 为了正确地计算和分配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某个消费合作社。粮食局、供给委员会和其他类似机关，以及铁路工会和运输工会，都必须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监督本法令的执行。特别是属于富有阶级的人，在组织和管理消费合作社的业务方面，必须执行苏维埃所指定的工作。

8. 各铁路职工工会必须火速制定并立刻实行各种非常措施，以便更合理地安排运输工作，特别是粮食、燃料以及其他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的输送工作，首先要听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嘱咐和指令，其次要听从苏维埃授予全权的机关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嘱咐和指令。

责成各地铁路工会协同当地苏维埃采取最积极的办法直至革命手段来坚决制止私贩粮食，并无情打击一切投机倒把分子。

9. 各工人组织、职员联合会和地方苏维埃，必须立即促使即将关闭和即将复员的企业以及停产的企业转到进行有益的工作和生产必需品方面来，必须立即寻找订货、原材料和燃料。在没有接到上级特别指令以前，各地工会和苏维埃无论如何不得拖延这项工作以及开展城乡产品交换的工作，必须严格遵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示和命令。

10. 凡属于富有阶级的人必须将其全部现金存入国家银行及其分行或储蓄所，每周取作消费用的数目不得超过 100—125 卢布（按照当地苏维埃的规定），而取作生产和商业用的数目，必须具有工人监督机关发给的书面证明。

为了监督本法令的切实执行，将颁布用现行纸币兑换其他纸币的条例，犯有欺骗国家和人民的罪行者，没收其全部财产。

11. 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怠工者、罢工的官吏以及投机倒把分子都应给予上述处分，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强迫劳动。各地苏维埃及其所属机关，必须火速制定最革命的办法来对付这些真正的人民公敌。

12. 工会及其他劳动者组织应协同地方苏维埃，组织若干流动检查小组，其中须有党和其他组织所推荐的最可靠的人参加，监督本法令的执行，检查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并把违反或规避本法令的犯罪分子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收归国有的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竭尽全力，采取非常措施来组织好工作，巩固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监督机关必须每周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报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凡贻误工作和玩忽职守的犯罪分子，交由革命法庭制裁。

载于 1918 年 11 月《国民经济》杂志第 11 期（非全文）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76—179 页

全文载于 1949 年《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26 卷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经济破坏所造成的地狱。”资本家同他们的自觉的和半自觉的拥护者就是这样写，这样说，这样想的。

我们回答说，布尔什维克执政虽然才两个月，可是已经向社会主义迈出了一大步。只有那些不愿意联系起来看历史事件或者不善于联系起来评价这些历史事件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愿意看到，军队、农村和工厂里的各种不民主的制度，在几个星期内就几乎被彻底摧毁了。不经过这种破坏，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不愿意看到，那种在拖延战争、用秘密条约掩饰掠夺和侵略的对外政策方面的帝国主义谎言，在几个星期内就被争取真正民主和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代替了。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实际成果，即实现了停战和百倍地加强了我们的革命的宣传力量。他们不愿意看到，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

有些人看不清历史的前景，他们被资本主义的陈规所束缚，他们被旧事物的急剧破灭、被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建筑崩溃倒塌的折裂声、巨响和“混乱”（表面上的混乱）弄得目瞪口呆，他们被发展到极端尖锐程度的，即变成了内战的阶级斗争吓坏了，而这是唯一合理的、唯一正义的、唯一神圣的战争，这不是神父所说的神圣战争，而是凡人所说的神圣战争，即被压迫者要推翻压迫者，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实质上，所有这些受到束缚的、被弄得目瞪口呆的、被吓坏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手下的职员”，常常不自觉地以那种“道听途说”的、陈旧的、荒谬的、温情的、知识分子庸俗的关于“实施社会主义”的观念为指导，抓住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鳞半爪，重复着被那些不学无术和一知半解的人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把这种“实施”社会主义的思想，甚至计划，硬加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头上。

这种思想是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容的，更不用说这种计划了。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实施”的；社会主义是在最激烈的、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同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这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的前提和含意就是被抑制着的战争的状态，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斗争措施的状态。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责备过公社，认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运用自己的武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时不够坚决。

实质上，知识分子对于镇压资本家的反抗而发出的这种种号叫，说得“客气”一点，不过是旧的“妥协主义”的复活。如果使用无产阶级的直率的说法，那就得说：是继续向富人讨好的奴才行为，这就是反对现在工人对资产

阶级、总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可惜还太弱，还不够坚决）的号叫的实质。一个妥协派的部长，好心肠的彼舍霍诺夫在 1917 年 6 月曾经宣布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这个好心人甚至没有怀疑过，反抗确实应该被粉碎，它一定会被粉碎，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这种粉碎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就是镇压资本家的反抗，因而也就是系统地对整个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使用暴力。

富人的贪婪，肮脏的、狠毒的、疯狂的贪婪，他们的食客的那种惊惶万状和奴颜婢膝，这就是现在从《言语报》^[145]到《新生活报》^[76]的知识分子大肆叫嚣，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使用暴力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叫嚣，他们的抱怨的话，他们关于“自由”（资本家压迫人民的自由）的虚伪叫喊等等的客观意义就是这样。假如人类能够来一次精彩的跳跃，一下子就跳到社会主义，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没有剥削者的切齿痛恨，没有剥削者用迂回办法维护或恢复旧制度的多种尝试，没有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对这种尝试作出的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是“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食客，正如德国一句有名的谚语所说的，只要毛皮一刻不湿，他们“愿意”进水洗一洗。

当资产阶级和惯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官吏、职员、医生、工程师等等采取最极端的反抗手段时，这些知识分子就吓坏了。他们怕得发抖，他们更加凄厉地哀号必须回到“妥协主义”上去。我们和所有被压迫阶级的真诚朋友对剥削者所采取的极端的反抗手段只能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并不期待通过商议和规劝，通过甜蜜的宣传或夸夸其谈的说教，而是通过生活的锻炼、斗争的锻炼，使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掌握好政权。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且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应该学会这一点，因为它不能立刻得到这种本领。必须在斗争中学到本领。只有严酷的、顽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无产阶级。剥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剥削者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他最后的藏身之所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滋生（而且必然滋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厚颜无耻的肥壤沃土。

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食客们的反抗的加强，无产阶级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农民的力量也在增长。随着被剥削者的敌人——剥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剥削者也在成长壮大、学习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旧亚当”^[204]。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载于 1929 年 1 月 22 日《真理报》第 18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96—199 页

怎样组织竞赛？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私人进取心及其他绝妙的品质和魅力。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品质的意义和不顾“人的本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稍微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意味着空前残暴地压制广大的、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而且还意味着排斥竞赛，而代之以社会阶梯上层的金融诈骗、任人唯亲和阿谀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的、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富人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下一步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由国家垄断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开辟了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性。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

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当然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不能不对那些顽固的寄生虫及其走卒采用暴力。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工人都不抱什么幻想。工人和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替剥削者做苦工，受到了剥削者无数的欺侮和凌辱，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他们经受了这些磨炼，他们知道要粉碎剥削者的反抗是需要时间的。工人和农民丝毫没有染上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161]和其他废物的幻想，这些人力竭声嘶地“高喊”反对资本家，“指骂”资本家、“痛斥”资本家，可是一到要真正行动，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去掉资本家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像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用全国广大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世界的范围内）有计

划地组织起来的为自己的劳动取代被迫劳动，——这种伟大的更替除需要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作出组织方面的即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同采取军事措施无情地镇压昨天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已经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发号施令的，我们仍旧要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富人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工具。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的。从一己私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神父、录事、果戈里笔下的那类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且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赋予劳动者的那种伟大的、在世界历史上是真正豪迈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遍”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自我安慰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学问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劣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

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到了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的卑鄙私利的支持。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借掠夺来管理，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困于饥饿贫穷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破除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

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只求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一把，——这种旧习惯必须破除。先进的有觉

悟的工人已经开始了这场斗争，坚决反击有些新进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因为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像从前那样，一心想“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头脑的农民和劳动群众，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么，实行计算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只要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这个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愿地和诚挚地进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因为俄国有足够的粮食、铁、木料、羊毛、棉花和亚麻，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是必须正确地分配劳动和产品，对这种分配建立切实可行的全民监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其次是骗子、懒汉和流氓。

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斗争，向骗子、懒汉、流氓开战。这前后两种人，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在这种社会中，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中，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欺骗也行；为了躲避和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少干一分钟也行；为了不挨饿，为了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捞到一块面包也行。

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种主要寄生虫，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章和法律，就要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任何动摇、任何怜悯，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犯罪。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地积极地用满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计算和监督。而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做到和完全能够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工作方面实行竞赛，并在全国范围内把这种竞赛组织起来，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学问的人请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监督那些“有学问的”人所常有的懈怠是另一回事。

这种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

替工作，干什么事都是开一个头但又半途而废，——这是“有学问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们天性低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可悲的、但在目前不可避免的特点，由于工人对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作缺乏应有的监督，因而产生了一些错误、缺点和失策，这些东西在我国革命的错误、缺点和失策中占了不小的地位。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没有知识分子、专家这些有学问的人的建议和指导性的意见是不行的。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抱怨工农对他们不够重视，对他们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建议和意见是一回事，组织实际的计算和监督又是一回事。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建议和意见，可是他们“笨手笨脚”到了可笑、荒谬和丢脸的地步，没有本事去实行这些建议和意见，切实监督怎样把言论变成行动。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惩治、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比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更重要。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必须组织来自工农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骗子，知识分子中间的懒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放开手脚，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须使苏维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供给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这种计算和监督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谁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守上结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让一个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逍遥自在，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牢，或者给予最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处分；不让一个违反社会主义规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编者注

见约·沃·哥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和法律的富人逃脱理所当然与骗子同样的命运。“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这就是必须实际安排好的事情。我们的“公社”、我们的来自工农的组织工作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应当为这些实际成就而自豪（这里加上尤其二字，是因为知识分子太习惯于而且过分习惯于以自己的空泛的意见和决议而自豪）。

对富人、骗子和懒汉切实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成千上万种方式和方法，应当由公社本身、由城乡基层组织在实践中来创造和检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可以保证具有活力，保证成功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目标，即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肃清骗子这种跳蚤和富人这种臭虫，等等。有的地方会监禁十来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特别是党的各个印刷所，有许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这同样也是流氓行为）。有的地方会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在他们监禁期满后发给黄色身分证，使全体人民在他们改过自新以前把他们当作危害分子加以监视。有的地方会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还有的地方会想到把不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例如，把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有条件地释放，使他迅速改过自新。方式愈多愈好，方式愈多，共同的经验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看哪一个公社，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挨饿的人，没有失业的人，没有有钱的懒汉，没有资产阶级奴才中的恶棍和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看哪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看哪里为穷人建造新的好的住宅、安置穷人住进富人的住宅、按时供给穷人家小孩每人一瓶牛奶等方面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各个公社、村社、消费生产合作社和协作社以及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应当展开竞赛。正是应当通过这些工作让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实践中脱颖而出，并且把他们提拔上来，参加全国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在人民中间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

载于 1929 年 1 月 20 日《真理报》第 17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00—211 页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205]

(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由资本家争夺赃物而引起的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经济破坏。而罪恶的投机倒把活动和唯利是图的行为——特别是富有阶级的这种行为——使经济破坏更加严重，使几十万几百万人遭到饥饿失业的痛苦。现在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救济饥民并且同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因此工农政府制定下列条例，作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项法律：

全国公民都必须参加当地的（村的、乡的、镇的，或包括城市某一部分、街道某一部分等等的）消费合作社。

各户可以自由联合组成消费合作社，但是每个社至少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户数属于非富有阶级（即工人、完全不用雇佣工人的农民等等）。

每个消费合作社除采购和分配产品以外，还要主持当地产品的销售。由消费合作社理事会设立若干供给委员会，如无有关的供给委员会的书面证明，不许运输任何产品。

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国有化，并且必须无一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

私人可以不在当地货栈而到中心货栈购买产品，但是必须记入所属的地方消费合作社的账簿。

如无供给委员会的证明而私自运输、买卖产品者，应当没收其全部财产，判处半年以上的监禁，并强迫劳动。

运输、买卖产品的证明书，应当一式两份，要有有关的供给委员会理事会理事至少三人签名；一份须交理事会存档。

每份证明书上都应写明：产品是由哪个消费合作社发出的，应当送交哪个消费合作社。

电报局对于供给委员会的电报优先拍发。

各供给委员会都应该在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监督下遵照它的指示办事。

除了对国外进口的商品可能作某些限制性规定以外，每人都可以通过他所属的消费合作社自由购得任何产品，不受任何限制。

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品，必须售给当地供给委员会，不按限价，但法律规定了固定价格的除外。应付的产品价款，记入所有者在当地（村、乡、城市、工厂等等）人民银行分行的往来账户上。

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都必须组织若干监督、检查和指导小组来协助居民组成消费合作社（供给委员会），并检查它们的报表以及它们管理的全部事项。

给供给委员会的关于管理报表和文牒的指示另行发布。

载于1929年1月22日《消息报》第18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206]

(不晚于 1918 年 1 月 3 日[16 日])

立宪会议^[19]决定：

一

1. 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2.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二

立宪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因此决定：

1. 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连同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2. 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3. 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 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 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

三

1. 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使全世界都淹没在这次空前的罪大恶极的战争的血泊之中，立宪会议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要把人类从它们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因此完全赞同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下述政策：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国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争取在各国人民之间缔结以自由的民族自决为基础的、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的和约。

2. 为了同一目的，立宪会议坚持必须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这种政策把不多几个特殊民族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

立宪会议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出军队、宣布亚美尼亚有自决自由的政策^[207]。

3. 立宪会议认为苏维埃关于废除（取消）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所订立的债约的法令，是对国际银行资本即金融资本的第一个打击，并深信苏

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完全胜利。

四

立宪会议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各党所提的名单选出的，当时人民还不可能全体都起来反对剥削者，还不知道剥削者为保护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进行的反抗会多么激烈，还没有实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立宪会议认为，如果它同苏维埃政权对立起来，即使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也是根本不正确的。

而就问题实质来说，立宪会议认为，现在正是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刻，任何政权机关都不能有剥削者立足之地。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立宪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全部任务就是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

同时，立宪会议力求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和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紧密和巩固的联盟，不过它的任务只限于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根本原则，而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

载于 1918 年 1 月 4 日（17 日）《真理报》第 2 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2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24—229 页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208]

(1918年1月6日[19日])

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提供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个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它才能领导这些阶级为争取它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苏维埃一直在增加、发展和巩固，它根据本身的经验打消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形式的欺骗性，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不同这些议会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协行为决裂，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解放。而这种决裂的表现，便是举行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

根据十月革命前拟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立宪会议^[19]，反映了过去在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人^[5]执政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当时，人民在投社会革命党^[16]候选人的票时，还不可能在拥护资产阶级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这个应该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会议，就不能不成为横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

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劳动阶级，因此引起了剥削者的拚命反抗，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充分显示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劳动阶级根据经验确信：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不相容，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现在，反对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反对人民所争得的苏维埃共和国，支持资产阶级议会制和立宪会议，那就是向后倒退，就是要使整个工农十月革命失败。

在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由于前面提到的情况，右派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的党占了多数。当然，这个党拒绝讨论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非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建议，即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这样，立宪会议就割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因此，目前在苏维埃中显然占有绝大多数、并得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退出这样的立宪会议，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在立宪会议外面，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正在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激烈的斗争，它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说劳动阶级为了摆脱剥削而对剥削者的反抗进行必要的武力镇压是非法的暴行，它们替那些为资本服务的总工分子辩护，甚至还赤裸裸地号召采取恐怖手段，而“一些不知名的团体”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手段了。因此，留在立宪会议的那部分人所起的作用，显然只能是给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打掩护。

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解散立宪会议。

载于 1918 年 1 月 7 日（20 日）《真理报》第 5 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5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39—241 页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

(1918年1月7日[20日]—2月11日[24日]以前)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顾不得谈历史。是的，如果在某一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没有不可分割的直接的实际联系，那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关于不幸的和约，即极其苛刻的和约的问题，却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非加以说明不可。因此，我把1918年1月8日我就这个问题在我党近60名最著名的彼得格勒工作人员的会议上宣读过的提纲刊登出来。

下面就是这个提纲：

1918年1月7日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209]

1. 目前俄国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的：几乎全体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无疑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和它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有保证的。

2. 同时，有产阶级的疯狂反抗引起的内战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维护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必须经过一段任何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必然带来的严重破坏和混乱的时期，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下去。

3. 此外，这种反抗还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和非军事的形式，如怠工，收买游民，收买钻进社会党人队伍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来破坏他们的事业，如此等等。这种反抗是这样的顽强，而且能采取如此多样的形式，以致同这种反抗进行的斗争必然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拿几种主要形式的斗争来说，几个月内也未必能结束。不坚决战胜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的这种消极的和隐蔽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4. 最后，俄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任务十分艰巨，因而解决这些任务——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人数众多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又不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5. 总括所有这些情况，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为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必须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几个月，使社会主义政府得以放手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

6.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应当是我们苏维埃政权确定国际任务的基础，因为战争第四年的国际局势使人根本无法估计，大概在什么时候爆发革命从而把某一个欧洲的帝国主义政府（也包括德国在内）推翻。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应当加强和展开我们的宣传工作，特别是组织联欢的工作。但是，如果把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策略建立在预测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不会在最近半年内（或大致这样短的时间内）爆发这种基础上，如果这样做，那就错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预测的，所以一切类似的做法在客观上都是盲目的赌博。

7.到现在,即到1918年1月7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210]已经充分说明,实质上已经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随时都应该预料到而且必须预料到这种最后通牒会正式提出)的主战派,在德国政府(它完全控制了四国同盟中其他几国的政府)内无疑占了上风。这个最后通牒就是或者继续进行战争,或者签订兼并性和约,也就是说和约的条件是我们放弃我们所占领的一切土地,德国人则继续保持他们占领的一切土地,并且要求我们赔款(名义上是支付俘虏的给养费),其数目大约为30亿卢布,分数年付清。

8.现在俄国社会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是立刻接受这个兼并性和约呢,还是马上进行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折中的解决办法。再也无法继续拖延了,因为我们为了故意拖延谈判,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办法。

9.在考察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理由是,单独媾和目前在客观上就是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妥协,是“帝国主义的交易”等等,因此这种和约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但是,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同意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资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资本家得到利益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才是不能允许的。

谁把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称作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实际上却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并且对人民隐瞒同这些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谁才是背叛社会主义。谁一点也不向人民隐瞒,不同帝国主义签订任何秘密条约,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力量继续作战,才同意签订不利于一个弱国而有利于某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者的和约,谁就丝毫没有背叛社会主义。

10.主张立刻进行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签订和约在客观上就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这样不但使德国帝国主义能从我国战线上腾出军队,并且还能获得数百万名俘虏等等。但是,这个理由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进行革命战争,会帮助英法帝国主义达到自己的目的,使我们在客观上变成英法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英国人曾经直接向我军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建议,只要我们继续作战,他们每月可以发给我们每个士兵100卢布。即使我们不拿英法一文钱,但是,由于我们牵制了一部分德国军队,在客观上我们还是帮助他们。

从这方面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完全摆脱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并且很明显,不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联系。因此,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较好这点出发,而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11.有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反对战争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失败主义者”,并且请求我们不要向德国帝国主义让步。但是,我们只承认针对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我们始终反对同“友好的”帝国主义结成正式的或事实上的联盟去战胜其他帝国主义,这种办法是根本不能容许的,也

是完全无用的。

可见，这个理由不过是上述理由的改头换面。如果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我们把缔结单独和约拖延一定的时候，并且保证在这期间在德国发动革命，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许就不同了。但是，德国的左派不仅不这样说，反而正式声明：“你们能坚持就尽量坚持吧，但是，解决问题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因为关于德国的革命，我们无法作出任何肯定的承诺。”

12.有人说：我们在党的许多声明中曾经公开“答应”要进行革命战争，因而签订单独和约就是违背我们的诺言。

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政府在帝国主义时代必须“准备和进行”革命战争；我们这样说是为了反对抽象的和平主义，反对在帝国主义时代完全否定“保卫祖国”的理论，最后，是为了反对一部分士兵的纯粹自私的本能，但是，我们并没有承担不顾时机是否成熟就发动革命战争的义务。

我们就是在今天也绝对必须准备革命战争。我们现在正像过去履行自己的一切诺言那样履行着自己的这项诺言，我们的诺言只要是能够立刻履行的，都已经履行了，例如，我们废除了各种秘密条约，向各国人民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屡次设法拖延和平谈判，以便使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时间来响应。

但是，要解决现在能不能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就只能根据实现这一点的物质条件和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来考虑。

13.如果对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作一总的评价，就应当得出以下的结论：这种政策也许适合人们追求漂亮、动人、鲜明那种欲望，可是完全不顾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客观对比。

14.毫无疑问，我军在目前和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也许在最近几个月内）绝对不能击退德国的进攻，因为第一，大多数士兵疲惫不堪和精疲力竭，加之粮食方面遭到空前的破坏，过度疲劳的士兵无人替换，等等；第二，马匹完全无法使用，因而我们的炮兵必定会被歼灭；第三，我们根本不可能保卫从里加到雷瓦尔的海岸线，因此敌人完全可能占领里夫兰的其余部分，然后占领爱斯兰，并从后方包围我们很大一部分军队，最后占领彼得格勒。

15.其次，同样也毫无疑问，在我们军队中占大多数的农民，现在一定会赞成签订兼并性和约，不赞成立刻进行革命战争，因为依照社会主义原则整编军队、把赤卫队充实到军队中去等工作都还刚刚开始。

在军队完全实现民主化的情况下，违背大多数士兵意志去进行战争将是一种冒险行为，而要建立一支真正可靠和思想上巩固的社会主义工农军队，至少需要好几个月。

16.俄国的贫苦农民有能力支持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立刻在现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严重的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忽略阶级力量的这种客观对比将是致命的错误。

17.因此，对于现在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应当这样来认识：

如果德国革命在最近三四月内爆发并且获得胜利，那么，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策略，也许不致于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德国的革命在最近几个月内不会到来，那么，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事件的发展必然是：最严重的失败将迫使俄国缔结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并且缔结这个和约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某个其他的政府（诸如资产阶级拉达^[199]和切尔诺夫派的联合政府，或者其他类似的政府）。因为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军队受到最初的几次挫折以后，甚至过不了几个月，只要过几个星期，大概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

18.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德国革命可能在近期内，即可以用星期来计算的短时间内开始，就拿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策略。这种策略将是一种冒险。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去冒险。

19. 德国的革命有其客观的根据，即使我们签订单独和约，也决不会增加它的困难。沙文主义的狂热也许会暂时削弱德国的革命，但是德国的处境仍将极端困难，德国同英美的战争将继续拖延下去，双方面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面貌已经被彻底揭穿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例子将成为各国人民的活榜样，而这个榜样所起的使人革命化的宣传作用将是巨大的。一边是资产阶级制度和两个强盗集团之间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另一边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20. 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将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腾出手来继续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在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在城市同农村小农的消费合作社实行实物产品交换的情况下，只要保证有几个月的和平工作，那么，俄国的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改造将使社会主义既在俄国又在全世界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将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

21. 现在，只有明确提出推翻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一目标并得到社会主义军队完全赞同的那种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才是真正的革命战争。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我们显然还不能给自己提出这个目标。如果我们现在进行战争，客观上就是为解放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而战。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为了实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民族的自决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做了它能够做的一切，并且还在继续做下去。但是，既然具体情况是，为了几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等）的自决权遭到侵犯这件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目前受到了威胁，那就很清楚，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更高的利益。

因此，谁要是说：“我们不能签订耻辱的难堪的和约，我们不能出卖波兰等等”，那他就是没有看到，要是签订以解放波兰为条件的和约，那只会更加增强德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去对付英国、比利时、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国家。从俄国方面来看，以解放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也许是“爱国主义的”和约，但是它仍然是同兼并者，同德国帝国主义者签订的和约，这不会有丝毫改变。

1918年1月21日。对本提纲作如下补充：

22. 奥地利和德国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接着柏林和维也纳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最后1月18—20日柏林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和巷战，所有这一切使

人们不得不承认德国革命已经开始这一事实。

根据这一事实，我们还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推迟和拖延和平谈判。

载于 1918 年 2 月 11 日（24 日）《真理报》第 34 号（无第 22 条）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47—255 页

全文载于 1949 年《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26 卷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211]

(1918年1月中旬)

1 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1月11日[24日])

同志们！俄国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已经2个月零15天了。我应该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报告它在这段时期的工作。

2个月零15天，这比以前那个统治过全国，或者说统治过剥削者和资本家的工人政权——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政权存在的时间只多5天。

我们应当首先回顾一下那个工人政权，追溯一下过去的历史，把它同10月25日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作一比较。把以前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现在的比较一下，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尽管在战争和经济破坏的环境中情况空前复杂，国际工人运动还是有了巨大的进步，俄国苏维埃政权所处的环境也有利得多了。

第一次创立了公社这种苏维埃政权萌芽的巴黎工人，仅仅支持了2个月零10天，就被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金分子枪杀了。法国工人不得不为成立工人政府的第一次尝试付出空前未有的重大牺牲，而对成立这个政府的意义和目的，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是不了解的。

我们的情况有利得多，因为俄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创立了已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斗争形式的机构——苏维埃政府。正是这一点，首先是这一点使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处境不同于巴黎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这样的机构，没有为全国所了解，而我们却立即可依靠苏维埃政权，因而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苏维埃政权能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受到他们最热烈、最衷心的拥护，因而苏维埃政权是不可战胜的。

有人对苏维埃政权抱着怀疑的态度，为了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往往有意无意地出卖和背叛苏维埃政权，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是不能在俄国支持下去的。仿佛有哪个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忘记了（哪怕只是一分钟）：在俄国，一个政权要能长期存在下去，就要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农民、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团结成一支彼此密切联系的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力量。

我们从来也不怀疑，只有像我们党纲中所说的工人同贫苦农民这些半无产者的联盟，才能包括俄国人口的大多数，才能保证政权有可靠的支持。10月25日以后，我们一下子——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政权建立在这种稳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了。

是的，同志们，旧的社会革命党^[16]在农民还没有弄清他们当中谁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拥护者的时候，提出过土地平均使用的口号，但它不想知道，这个任务究竟由谁来完成，是否要联合资产阶级来完成。当时我们就说过，这是一种欺骗。这部分人现在发觉自己没有群众，是一个空架子，在当时他们却以为可以联合资产阶级来实现土地平均使用；最大的欺骗就在这里。当

俄国革命在人民生活最重大的关头表明了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经验的时候，当战争一直摧残着人民，使千百万群众遭到活活饿死的命运，而战争的恶果已实际表明了妥协的经验的时候，当苏维埃本身经受了妥协的教训，经历和饱尝了妥协的痛苦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那些想把劳动者农民联合到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方面来的人们的学说中，有着健康的、富有生命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种子。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明确地一提到农民面前，就发生了一个情况：到了要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农民已有可能看清两条基本政治路线——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还是同劳动群众结成联盟，正如农民苏维埃和农民代表大会现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人对这一情况表示怀疑；这时农民明白了，代表农民的真正愿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195]。当我们同这个政党订立我们的政府联盟的时候，一开始就使这个联盟建筑在最明显而清楚的原则上。如果俄国农民愿意同将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建立工人监督制的工人结成联盟来实现土地社会化，那他们是我们忠实的合作者，是我们最忠实和最宝贵的同盟者。同志们，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不言而喻，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点。

每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农民群众认为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才合适呢？这就是现在实际生活摆在俄国农民面前的问题。农民群众自身能怎样来支持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呢？其实，农民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我们对他们是完全信任的。

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的联盟，是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的，这个联盟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巩固，而是每时每刻地在巩固。最初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内还担心派别斗争会妨碍工作，但根据两个月共事的经验，我应该肯定地说，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能作出意见一致的决定。

我们知道，只要实际经验向农民表明例如城乡间应该如何进行交换，农民自己就会根据切身的经验，从下面来建立自己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内战争的经验向农民代表清楚地指出，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剥削者统治的无情镇压，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鼓掌）

同志们！在这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每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会听到会上右派的喊声：“独裁者！”。的确，“当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大家都承认过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党纲上也写上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也曾憎恨过下面这种流行的偏见：似乎可以说服居民，向他们证明，不应该剥削劳动群众，这是有罪的和可耻的，似乎一旦把居民说服了，世界上就会出现天堂。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空想的偏见在理论上早已被粉碎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实践中把它粉碎。

不能这样设想社会主义，不能认为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会将现成的社会主义用盘子托着奉献给我们，这是不会有的事。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用来对付剥削者的，那么我们拥护这种暴力！（掌声雷动）有些人有意无意地站在资产阶

级方面，或者被资产阶级吓坏了，被资产阶级的统治压垮了，以致于他们现在一看见这种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就张皇失措，痛哭流涕，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前提，向我们提出了无法做到的要求，要我们社会主义者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不许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不许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些人的哀号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

早在 1917 年夏天，剥削者老爷们就已经知道：这是“最后的斗争”问题；如果苏维埃取得政权，他们就会失去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失去资产阶级镇压劳动群众的主要基础。

因此，十月革命展开了这场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要使剥削者停止自己的反抗，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对他们中间最开明的人来说也很难）：剥削阶级的统治是再也不会有了，今后发号施令的是大老粗，他们必须听他的，不管感到多么不愉快，也只好如此。

这里会遇到许多困难，遭到许多牺牲，犯许多错误，这是一项历史上没有见过、书本上也读不到的新事业。事情很明显，这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过渡，采用别的方法根本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过渡。俄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个事实表明，最富有革命经验的就是革命群众自身，当千百万人都来援助数十个党员时，他们自己实际上就在掐住他们的剥削者的咽喉。

因此，国内战争目前在俄国占了主要地位。有人提出“打倒国内战争”的口号来反对我们。我从所谓的立宪会议^[19]的右派代表们那里听到过这个口号。打倒国内战争……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同谁进行的国内战争呢？是指同耗资数百万来收买游民和官吏的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里亚布申斯基之流进行的国内战争吗？是指同那些接受这种收买的——不管他们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总工者进行的国内战争吗？毫无疑问，在后一种人中间，有些人思想不开展，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收买，因为他们根本不能设想，可以而且应该彻底摧毁过去的资产阶级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开始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这种人是有。但是，这难道能改变情况吗？

因此，有产阶级的代表们孤注一掷，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只要能摧毁苏维埃政权，他们便会不惜采取任何罪恶手段。全部社会主义史，尤其是非常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法国的全部社会主义史，难道没有告诉我们：在劳动群众自己夺取政权的时候，在问题涉及保护统治阶级自己钱袋的时候，统治阶级便会进行空前的罪恶活动和屠杀。当这些人向我们谈国内战争的时候，我们置之一笑，当这些人在青年学生中间散布他们的口号的时候，我们向他们说：你们在欺骗他们！

阶级斗争采取它的最后的形式不是偶然的，因为被剥削阶级夺取政权的一切手段，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自己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要在俄国这块土地上不仅消灭官吏，而且消灭地主，正像俄国农民在某些省份做过的那样。

有人对我们说，人民委员会遇到官吏和地主的总工，证明人们不愿意走向社会主义。他们似乎不明白，这帮资本家和骗子，游民和总工者，是一批被资产阶级收买来反抗劳动人民政权的匪徒。当然，谁认为可以一下子从资本主义跳到社会主义，谁认为可以使大多数居民相信，经过立宪会议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谁如果相信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的神话，那就让他安然自得地去继续相信吧，可是，当实际生活粉碎这种神话的时候，希望他不要责怪实际生活。

谁懂得了什么是阶级斗争，懂得了官吏们所组织的怠工意味着什么，谁就会知道，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现在还遗留着资产者、资本家，他们希望恢复自己的统治，并且在保护自己的钱袋；现在还遗留着游民，他们是一批被收买的人，完全被资本主义所压倒，不能提高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水平；现在还遗留着这样一些职员和官吏，他们以为保护旧制度符合社会的利益。除了这些阶层的彻底崩溃，除了俄国和欧洲资产阶级的完全覆灭以外，怎么能设想社会主义的胜利呢？我们难道认为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老爷们不懂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吗？正是他们收买怠工者，叫他们不做工。难道他们是单独行动的吗？他们购买有价证券，难道不是同法、英、美资本家们一起行动的吗？不过，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买这些有价证券还能不能给他们很大帮助。难道他们现在所得到的堆积如山的有价证券不会变成一文不值的毫无用处的废纸吗？

因此，同志们，当人们咒骂和责怪我们实行恐怖、专政和进行国内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还远没有实行真正的恐怖，因为我们的力量比他们强大，我们有苏维埃，我们只要将银行收为国有，没收产业，就足以使他们就范，——对有关国内战争的一切指责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公开宣布了任何政府所不能宣布的事情。世界上第一个能够公开谈论国内战争的政府，就是工农兵群众的政府。是的，我们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战争。我们愈是直截了当他说出这一点，这个战争就结束得愈快，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就会愈迅速地了解我们，了解苏维埃政权正在完成一项真正与全体劳动者有切身关系的事业。

同志们，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很快就能得到胜利，可是我们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两个月中，我们获得了很多东西。我们经历了克伦斯基进攻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并看到了这次尝试的彻底破产。我们经历了乌克兰克伦斯基分子组织政权的活动，那里的斗争现在还没有结束，但是每一个留心这个斗争的人，每一个只要听过几次苏维埃政权代表实事求是的报告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乌克兰拉达^[199]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末日快要到了。（鼓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政权将战胜乌克兰资产阶级拉达，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现在谈谈同卡列金的斗争。如果说卡列金有什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那么，那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以剥削劳动者、以资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农民代表大会^[200]清楚地表明，卡列金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它遭到劳动群众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验，以行动进行的宣传，以苏维埃组织为实例进行的宣传，正在发挥作用；现在卡列金在顿河区的内部支柱的崩溃，与其说是起因于外部，还不如说是起因于内部。

因此，考察了俄国国内战争前线的状况以后，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是完全有保障的。同志们，这个苏维埃政权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贯彻社会主义历来的训条，彻底地坚决地依靠群众，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唤醒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受摧残的阶层，让他们投入生气勃勃的生活，起来创立社会主义。因此，旧军队，即对士兵实行严酷教练和严刑拷打的军队已经成为过去。这种军队已经被废除，已经彻底摧毁了。（鼓掌）军队的完全民主化已经实现了。

现在让我向大家谈一件我遇到的事情。有一次，我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听到几个芬兰人和一位老太太谈话。我不能参加这次谈话，因为我不懂芬兰

话。但是有一位芬兰人向我说：“您知道这位老太太讲出一件多么新奇的事情吗？她说，现在不用怕带枪的人了。有一次我在森林中碰到一个带枪的人，他没有夺去我的干柴，还帮我找了一些。”

我听了这番话，我想：让数百份报纸，——不管它们叫作社会党的报纸、准社会党的报纸、还是什么别的报纸，——让数百个喧嚣的喉咙骂我们是“独裁者”、“暴力者”等等吧。我们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现在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心中说：现在不用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统治。（鼓掌）这就是人民的感受。那些没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讲述赤卫队正竭尽全力反对剥削者，这就是在宣传，而这种宣传所以不可战胜，原因也就在这里。这种宣传会传遍千百万群众，会扎实地建立一支19世纪法国公社就开始创建的（不过创建时间很短，因为公社被资产阶级消灭了）、一切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红军全民的武装。这种宣传会造就许多新的赤卫队干部，以便能训练劳动群众去进行武装斗争。

有人议论俄国，说它不能作战，因为它不会有军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正是那些资产阶级军官在观察了同克伦斯基和卡列金作战的工人以后讲过一番话。他们说：“是的，这些赤卫队在技术上差劲透了，但是这些人如果能够稍微学一学，那么，他们就会有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因为参加军队的人虽然没有受过刻板的正规训练，但他们有争取被剥削者解放的思想作为指南，这在世界斗争史上是第一次。一旦我们所开始的工作最后完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将是不可战胜的。（鼓掌）

同志们！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军队方面所采用的办法，在对待统治阶级的另一种更精巧更复杂的工具——资产阶级法庭方面也采用了。自称维持秩序的资产阶级法庭，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被用来无情镇压被剥削者以保护富人利益的精巧工具。苏维埃政权遵照历次无产阶级革命的遗训，立即废除了旧法庭。让别人去叫喊，说我们不进行改良而一下子就废除了旧法庭吧。我们这样做，为创造真正的人民法庭扫清了道路，并且主要不是用高压的力量，而是用群众的实例，用劳动者的威信，不拘形式地把法庭这一剥削的工具改造成了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坚定的原则施行教育的工具。毫无疑问，我们是不能一下子就得到这样的社会的。

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在世界历次极伟大的人民革命的全部经验所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时采取的一些主要步骤。在以往的革命中，劳动群众没有一次不在这条道路上采取步骤，以求创立新的国家政权。可惜，他们总是开了个头，而没有能将事业进行到底，没有能创立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创立了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我并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但如果你们说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那你们是正确的，正如人们把西欧许多资产阶级共和国称为民主共和国是正确的一样，尽管谁都知道，没有一个最民主的共和国是完全民主的。它们只提供一点点民主制，在小事情上削减剥削者一些权利，可是那里的劳动群众仍然和各处一样受到压迫。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说，资产阶级的制度既有旧的君主制，也有立宪共和制。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产生过错觉，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

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多么艰难，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这些话决不是空话。

我们开始实行许多摧毁资本家统治的措施。我们知道，我们的政权应该用一个原则把一切机关的活动联合起来，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用一句后来表达，这就是：“俄国宣布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鼓掌）这是一个以我们应该做的和已经开始做的一切为依据的真理；这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最好的统一，是这种活动纲领的宣布，是对各国被剥削劳动者的号召。这些被剥削劳动者或者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或者，更糟的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式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混合物，而这种混合物，我们在十个月的革命时期内已经尝试过和体验过，并且证实，这是伪造品，而不是社会主义。

因此，“自由的”英国和法国采取了一切手段，在我国革命的十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一张也不许入境。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各国都有大量的工人和农民本能地理解了俄国工人所做的一切。因为在每一个会议上，人们都以雷鸣般的掌声来欢迎俄国革命的消息和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各地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已经同自己政党的上层分子发生矛盾了。这种上层分子的旧式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像我们俄国的齐赫泽和策列铁里那样被埋葬，但是它在世界各国已经被击毙，它已经死了。

现在同这种资产阶级旧制度相对立的，已经有新的国家苏维埃共和国，正在摧毁资产阶级旧壁障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共和国。新的国家形式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有可能去镇压剥削者，有可能去镇压这些因旧日的钱袋和旧有的知识而显得强有力的极少数人的反抗。他们——教授、教师、工程师将自己的知识变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他们说，我要以自己的知识为资产阶级效劳，不然我就不工作。但他们的政权已经为工农革命所摧毁，一个同他们相对立的国家产生了，在这个国家内，群众自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

只有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真正有了这样的政权组织，这种组织清楚地表明，我们正在向完全取消任何政权、任何国家过渡。这一点，只有到没有任何剥削痕迹的时候，即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现在我简单地讲一讲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开始在实行的那些措施。为了在俄国土地上不仅消灭地主，而且要根本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铲除资本压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可能性，苏维埃政府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便是过渡到银行国有化。银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中心。它们汇集空前的财富，又在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内进行分配，它们是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神经。这是一些精巧而复杂的机构，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打击，就是针对这些机构的，它起初在国家银行中遇到了拼命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没有能阻止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组织国家银行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这方面的基本成果已经掌握在工农手里。我们在实行这些基本措施以后（这些措施还需要长期加以完善），就腾出手去搞私人银行了。

我们当时并没有按照妥协派可能提出的建议去做：首先等待立宪会议，也许接着制定一个法案，并把它提交给立宪会议，这样就把我们的意图告诉资产者老爷们，使他们能够找到一条退路，逃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也许吸引他们参加合作，那时你们就能制定国法、——这就会是“国家的法令”了。

这是取消社会主义。我们当时做得很简单：我们不怕引起“有学问”人的非难，更正确地说，是贩卖一星半点知识的没有学问的资产阶级拥护者的非难；我们说，我们有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应当在今天早上占领一切私人银行。（鼓掌）在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在权力已经握在我们手里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早上占领了银行，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通过决议：“宣布银行为国有财产。”银行业就这样实现了国家化、社会化，转交到了苏维埃政权手中。

在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银行这种在资本主义经营制度内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如此奇妙和精巧的机构，可以在几天内被打破或改造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断言过。当学者们或冒牌的学者们摇头晃脑地预言未来的时候，我们说：随便你们怎样去预言未来吧！我们只知道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占领敌人的阵地，从经验中，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执掌政权。我们决不低估我们道路上的困难，可是基本的事情，我们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财富的来源在财富分配方面已被摧毁。在这以后，取消公债，推翻金融压迫，都变得轻而易举。在实行工人监督以后，没收工厂也变得十分容易。有人责备我们，说由于实行工人监督，我们将生产分割成许多单个的车间，我们批驳了这种胡说。我们在实行工人监督的时候就知道，要工人监督普及到整个俄国，须经过不少的时间，但我们想表明，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从下面来进行改造的道路，以便工人自己从下面来创立经济条件的新基础。创立这样的新基础，需要不少的时间。

我们已经从实行工人监督进而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只有这个措施以及近几天就要实行的银行和铁路的国有化，才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深知我们事业的艰巨，但是我们断定，只有信赖劳动群众的经验和本能，切实担负起这个任务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劳动群众会犯很多错误，但是基本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们知道，他们向苏维埃政权求助时，苏维埃政权只会支持他们反对剥削者。任何一种减轻他们劳动的措施，都会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及时完成，它经常会遇到困难的任务。工农群众常常派代表团到政府里来询问，比如说，对于某块土地，他们应该怎样处置。当我看到他们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困难。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就是政权，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支持你们，然而你们要关心生产，要使生产成为有益的生产。当你们着手去做有益的工作的时候，你们会犯错误，不过，你们一定能学会工作。工人已经开始学习，他们已经开始同怠工者进行斗争。有学问的人筑起了一道围墙，阻止劳动者前进。这道围墙一定会被清除。

毫无疑问，战争腐蚀着前线和后方的人们，付给为战争而工作的人以高过任何标准的薪金，诱惑着一切逃避战争的人，诱惑着只想“捞一把”就溜走的游民或二流子。这些分子，这些从资本主义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最坏分子，带来了旧制度的一切恶习。我们应当将他们抛开赶走，而将一切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吸收到工厂企业中来，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主义俄国的核心。实行这个措施是不容易的，它总会引起许多纠纷、摩擦和冲突。我们人民委员会和我个人，都曾遭到他们的抱怨和威胁，但我们处之泰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求助的裁判人。这个裁判人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鼓掌）这个裁判人的话是无可抗辩的，我们永远信赖他。

资本主义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上层分子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同这些上层分子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经过斗争，我们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们已作好了斗争的准备，我们开始了斗争，并且我们要在叫作苏维埃的这个机构的帮助下把斗争进行到底。如果我们将发生的各种纠纷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法庭去仲裁，那么，任何问题都很容易解决。因为不论特权工人集团多么有力，但把他们放到全体工人的代表机关面前的时候，那么这种法庭的裁决，我再重复一遍，对于他们将是无可抗辩的。这种整治方法，现在还刚刚开始实行，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充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由于历代的传统影响，他们非常习惯于等待上面的命令。他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到：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是一个统治阶级；在他们的队伍中，还有一些被吓倒了和压垮了的人，竟认为自己应该进资产阶级的卑劣的学校。这种非常卑劣的资产阶级偏见保留得最为长久，但是现在它正在破除，而且一定会彻底破除。我们相信，随着苏维埃政权一步步前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完全摆脱所谓普通工人和农民不能管理国家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旧偏见。只要动手管理，就能够管理并学会管理！（鼓掌）

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从人民群众中选拔出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一项巨大的工作，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没有这种能够选拔人才的过滤器，那么，要想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仅有关于监督的国家法令，甚至还有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无产阶级试图同工厂主同盟订立合同，以保证工人能够管理整个工业部门。制革工人同全俄皮革业工厂主协会已经开始拟订这种合同，并且差不多就要签订了^[212]；我认为，这种合同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合同表明，工人已逐渐在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同志们！我的报告，并没有谈到特别迫切和特别困难的问题——和平问题和粮食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列为议程上的特别项目，将要进行专门的讨论。

我作这个简短的报告，目的是要说明我个人和整个人民委员会对于我们所经历了的这两个半月历史的总看法，说明在俄国革命的这个新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新的国家政权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政权面临着哪些社会任务。

俄国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行银行国有化，把全部土地交给劳动群众。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但是，同过去的革命比较，我们深信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所走的道路一定能保证完全的胜利。

将同我们一起前进的，还有被掠夺战争分开的那些较先进国家的群众。这些国家的工人，受过较长时期的民主化的教育。有人向我们描绘我们事业的困难；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认为，这些议论只是说明资产阶级及其有意无意的拥护者毫无希望地企图曲解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我国工农队伍，是世界大军的一个支队，这支世界大军现在被世界大战分散了，但它正在力求联合起来。关于我国革命的每一条新闻，每一段报告，每一个人，都赢得无产阶级雷鸣般的同情的掌声，因为他们知道，俄国正在实现他们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起义的事业，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实际行动起来的活榜样的作

用，比任何宣言和任何会议都要大，正是这点使各国劳动群众感到振奋。

1905年的十月罢工——革命胜利的第一步，一下子就传播到了西欧，并在当时，1905年，就引起了奥地利的工人运动，我们当时已在实践中看到，革命的实例、一国工人的行动有多大的价值，而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成熟起来。

如果我们犯些错误，有些失算，如果在我们的道路上发生些摩擦，那么，这对他们并不重要，对他们重要的是我们的实例，正是这个实例在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说：我们会不顾一切，共同前进，取得胜利。（鼓掌）

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需要有全世界工人的合作，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他们并且说过，在19世纪末，“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养成了发起革命行动的奋不顾身的首创精神，从而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西欧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几乎都加入了内阁的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式的政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也没有巩固的基础。我们看到了意大利的实例，我们在最近几天看到了奥地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者强盗们的英勇斗争。^[213]就假定强盗们能够暂时阻碍运动的开展吧，但是要想完全制止这个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个运动是不可战胜的。

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榜样将长期地摆在他们面前。我们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着。在那边是冲突、战争、流血、千百万人的牺牲、资本的剥削，在这边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鼓掌）

载于1918年1月中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62—279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7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214]

(1918年2月21日)

为了使疲惫不堪、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们愿忍受最大的牺牲，向德国人声明我们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我们的军事谈判代表已于2月20日（7日）傍晚离开列日察到德文斯克去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德国政府显然是在拖延答复。它显然是不愿意媾和。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恢复君主制。德国将军们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行动起来和取得胜利之前，俄国工农的神圣义务，就是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庞大军队。人民委员会决定：（1）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国防事业。（2）各级苏维埃和革命组织务必保卫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3）所有铁路组织及与之有关的苏维埃，必须全力阻挠敌人利用铁路设施；在退却时必须破坏轨道，炸毁和烧掉铁路建筑物；全部车辆——车厢和机车——立即开往我国东部内地去。（4）凡有落入敌人手中危险的全部谷物储备和存粮以及一切贵重财物，应当无条件地销毁；责成各地苏维埃监督执行，并由各苏维埃主席亲自负责。（5）彼得格勒、基辅以及新战线沿线所有城镇乡村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动员起来组成挖壕营，在军事专家指导下挖掘战壕。（6）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7）一切反对革命的国防事业而站到德国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以及想利用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出版机关，一律封闭；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挖掘战壕和修筑其他防御工事。（8）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社会主义祖国万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人民委员会

1918年2月21日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8年2月22日（3月9日）《真理报》第3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1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66—369页

奇谈与怪论

(1918年2月28日和3月1日)

我党莫斯科区域局^[215]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拒绝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并在该决议的“说明”中声称，“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免分裂”。

这里既没有怪论，也没有奇谈。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奇谈与怪论是有的。决议后面附有一个“说明”。它的全文如下：

“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免分裂，并且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团结一切既反对单独媾和派、也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我们一如既往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向其他所有国家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坚决实行工人专政，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

这里我们把那些……奇谈与怪论加上了着重标记。

关键就在这句话。

这句话把决议起草人的全部路线引导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句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他们错误的根源。

“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是奇谈，因为在前提和结论之间连一点联系都没有。“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招致苏维埃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败是合适的”，这样的命题不管对不对，却不能称之为奇谈。这是第一。

第二，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就不仅是奇谈，而简直是怪论了。显然，起草人陷入了思想极度混乱的困境。因此必须加以澄清。

关于第一个问题，起草人的意思显然是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战败的准备是合适的，而这种失败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丧失，也就是说导致俄国资产阶级的胜利。起草人说出这层意思，就是间接承认我在提纲（1918年1月8日宣读的、1918年2月24日发表在《真理报》^[23]上的提纲）中说得对：不接受德国向我们提出的和约条件，就会导致俄国的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垮台。

可见，*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真理总是要占上风的！“极端”反对我的，拿分裂相威胁的莫斯科派，正因为已经公开说到分裂，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具体看法和盘托出，而这正是那些用革命战争这种笼统的空谈来支吾搪塞的人讳莫如深的。

我的提纲和论据的全部实质（凡是愿意细心阅读我的1918年1月7日提纲的人都能看出），就是指明在认真准备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在现在、在目

决议全文如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鉴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成员状况，对中央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见本卷第391—399页。——编者注

前这种时刻就接受极端苛刻的和约（这也正是为了认真作好这种准备）。可是那些专门笼统地空谈革命战争的人，却回避了，或者是没有看到，不愿意看到我的论据的全部实质。现在我应当衷心地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保持“沉默的阴谋”。莫斯科派首先对我的论据作了答复。

他们的答复是什么呢？

他们的答复就是承认我的具体论据是正确的：莫斯科派承认，是呀，如果我们马上迎战德国人，失败的确就在眼前。

是呀，这种失败的确会使苏维埃政权垮台。

我再次衷心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即对我指出的如果我们立刻应战将会遇到何种作战条件的具体说明保持“沉默的阴谋”，并感谢他们大胆地承认了我的具体说明是正确的。

其次，既然莫斯科派实质上已被迫承认我的论据是正确的，那反驳我的论据用意何在呢？

用意在于：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应该作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

国际革命的利益为什么要求这样做呢？关键就在于此，那些想驳倒我的论据的人，其立论的真正实质就在于此。可是，无论在决议中还是在决议的说明中，对于这个最重要最主要最根本的一点，偏偏只字未提。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问题，决议起草人找到了时间和场合来谈论——既谈到“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是用丧失苏维埃政权这种政策的手段和办法吗？），又谈到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关于恰恰是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反对媾和的人的立场的实质问题，却绝口不谈！

奇怪！非常奇怪！决议起草人对此避而不谈，难道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特别心虚吗？如果明白地说出为什么（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也许就会揭露他们自己……

不管怎样，我们还得找出决议起草人可能依据的论据。

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不允许同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和约。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反对媾和的人提出过这种意见，可是支持这种意见的，即使在反对单独媾和的人中间，也是极少数。^[216]显然，这种意见就是要否认布列斯特谈判^[210]是适当的，就是要否认“甚至”以归还波兰、拉脱维亚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这种观点的不正确是一目了然的（例如，它遭到了彼得格勒大多数反对媾和的人的反对）。按照这种观点，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能缔结任何经济条约的，如果不飞到月球上去，那就无法生存。

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而强行推动这种革命的只能是战争，决不是和平，和平只会给群众造成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印象。如果是这种“理论”，那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是随着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

有人反驳说，战争反正是躲避不了的。可是事实作了回答：我的提纲是在1月8日宣读的：1月15日以前我们本来有可能得到和平。如果……如果不是由于革命空谈，我们无疑会得到喘息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德国人势必要宣布新的战争）。

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这一观点是一样的。其实，国际革命的利益固然要求已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援助这一革命，不过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即使可能使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甚至从强行推动论中也是引伸不出来的。

也许决议起草人以为，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已经酿成公开的全国范围的内战，所以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德国工人，应当牺牲自己（“丧失苏维埃政权”），拯救已经开始决战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牺牲自己，就可以牵制住德国一部分反革命势力，从而就会拯救德国革命。

当然，在这种前提下，作好可能失败和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不但是“合适的”（用决议起草人的话来说），而且是完全必需的。但是很明显，这种前提并不存在。德国革命正在成熟，但显然还没有到在德国爆发的程度，还没有到在德国发生内战的程度。我们“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妨碍它。我们这样做只会帮助德国反动势力，为他们效劳，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困难，使那些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德国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广大群众更加离开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会被苏维埃俄国的失败所吓倒，如同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把英国工人吓倒一样。

不管怎样找，也找不出起草人推理的逻辑。“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种说法是没有合理的论据的。

“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真是怪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莫斯科决议的起草人竟然说出了这种话。

据说，既然德帝国主义者要向我们索取贡赋，既然他们要禁止我们进行反德的宣传鼓动，那么苏维埃政权便失去了意义，便“完全流于形式”，大概这就是决议起草人的“思”路。我说“大概”，是因为起草人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理由来证实上述命题。

说苏维埃政权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而可以采取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这种“理论”的内容无非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和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是没有救了，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这就是支配人们写出这种怪诞决议的心理。有时用来掩饰这种意思的所谓“经济上的”论据，归结起来也还是这种感到没有出路的悲观主义：既然人家可以向我们索取贡赋，可以要这个要那个，那还叫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呢？

反正要灭亡！除了绝望，没有别的了。

在俄国目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觉悟的革命者有这种心理则是不能“理解”的。莫斯科派的观点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就是这种心理的很好的说明。1793 年的法国人决不会说他们的胜利果实——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应该作好可能丧失共和国的准备。他们不是充满绝望，而是充满胜利的信心。既然号召进行革命战争，可是又在正式的决议中写着“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这是在彻底揭露自己。

在 19 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普鲁士及其他许多国家因失败以及受征服者征服、凌辱和压迫而遭受的困苦，比 1918 年俄国所受的大得无可比拟、难以估量。普鲁士的优秀志士，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比我们现在所受的蹂躏厉害百倍，但是他们没有绝望过，没有说过他们的国家政治机关“完全

流于形式”。他们没有垂头丧气，没有被“反正要灭亡”的心理所支配。他们签订了比布列斯特和约^[217]更苛刻、更野蛮、更耻辱和更具有压迫性的和约^[218]，他们后来善于等待，坚定地忍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起来战斗，再次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签订难堪的、极其难堪的和约，然后再次奋起，终于获得了解放（当然也利用了那些互相竞争的较强大的征服者之间的纠纷）。

为什么类似的事情不能在我国的历史上重演呢？

为什么我们要悲观绝望，要写出比最耻辱的和约实在更耻辱的决议，说什么“苏维埃政权完全流于形式”呢？

为什么同现代帝国主义巨人作战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就不可能在俄国也锻炼人民的性格，加强自觉纪律，杜绝高傲空谈的风气，教给人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引导群众采取普鲁士人被拿破仑打败后所采取过的正确策略：在没有军队时签订最耻辱的和约，以便养精蓄锐，以后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呢？

为什么别国人民能坚定地经受更为惨痛的苦难，而我们却因第一个空前苛刻的和约就悲观绝望了呢？

试问，符合这种绝望策略的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还是小资产者的毫无骨气？无产者懂得，既然没有力量，就得屈从，然而他善于后来在任何条件下都养精蓄锐，无论如何要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而小资产者，在我们这里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为代表，却在空谈革命战争方面打破了纪录。

亲爱的莫斯科“极端”派同志们，这决不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每天的考验都会使最觉悟、最坚定的工人离开你们。他们会说，苏维埃政权没有流于形式，也决不会流于形式，不仅在征服者打到普斯科夫，要我们交纳粮食、矿产、现金等价值 100 亿的贡赋时是如此，就是在敌人将来占领下诺夫哥罗德和顿河畔罗斯托夫，要我们交纳价值 200 亿的贡赋时，也将是如此。

任何时候，任何外国的侵略，都不能使人民的政治机关（况且苏维埃政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机关，它比历史上有过的政治机关要高得多）“流于形式”。相反地，外国的侵略，只会加强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只要……只要苏维埃政权不去冒险。

既然没有军队，拒绝签订最难堪的和约就是冒险，人民有权利指责政权拒绝签订和约的冒险行为。

签订比布列斯特和约苛刻得多、耻辱得多的和约，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如上面所举的），这样做非但没有使政权丧失威信，没有使政权流于形式，没有使政权或人民遭到灭亡，反而锻炼了人民，教会了人民掌握一套困难的本领：即使在征服者的铁蹄践踏下，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也能建立强大的军队。

俄国正在准备新的、真正的卫国战争，即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很可能以后一个时代——像拿破仑战争时代那样——是征服者强迫苏维埃俄国进行多次解放战争（是多次，而不是一次）的时代。这是很可能的。

因此，这种可耻的绝望，比任何一个由于没有军队迫不得已缔结的苛刻的、极端苛刻的和约更加可耻，比任何一个耻辱的和约还要可耻。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起义和战争，我们就是签订十个极端苛刻的和约，也决不会灭亡。只要我们不被绝望和空谈所断送，我们是不会亡在征服者手里的。

号和第 38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416—423 页

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

(1918年3月5日)

我们可怜的“左派”^[219]昨天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共产主义者报》^[220]（应当补充说：马克思以前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想逃避历史教训，逃避多次的历史教训，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也是枉然，他们是逃避不了的。

他们拚命逃避，在报纸上堆砌无数文章，累得满头大汗，“甚至”不惜印刷油墨，把“喘息”“论”说成是毫无根据的坏“理论”。

可惜！他们再卖劲也推翻不了事实。英国的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事实是：自3月3日下午1时德国人停止军事行动时起，至3月5日晚上7时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为止，我们获得了喘息时机，并且已经利用这两天工夫进行了切实的（不是空谈，而是实在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这是事实，群众会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清楚。这个事实就是：当前线军队无力再战、抛弃大炮、连桥梁也顾不上炸毁、慌忙溃逃的时候，保卫祖国和提高国防能力不是靠空谈进行革命战争（主张革命战争的人，在军队这样慌忙溃逃时，连一支部队也没有阻止住。空谈简直可耻），而是靠有秩序的退却来挽救残余的军队，靠为此利用每天的喘息时机来实现的。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

我们可怜的“左派”，为了逃避事实，逃避事实的教训，逃避责任问题，极力对读者掩盖不久前发生的、还很新鲜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而用早已过去了的、无关紧要的事来搪塞。例如卡·拉狄克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他12月间（12月！）在“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写过关于必须帮助军队支持下去的问题。我没有机会把这个报告书读一遍，我问自己：为什么卡尔·拉狄克不把这个报告书全文发表出来？为什么他没有确切而直接地说明，他当时对“妥协和约”究竟是如何理解的？为什么他不回想一下不久前他在《真理报》^[23]上写过自己幻想（最坏的幻想）有可能在归还波兰的条件下与德帝国主义者缔结和约的事实？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可怜的“左派”不能不抹杀那些会暴露他们“左派”对散布幻想应负的责任的事实，因为这种幻想实际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

尼·布哈林现在甚至企图否认他同他的朋友们曾断言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一事实。可是，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是事实，都知道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这样断言过，都知道他们散布过这种幻想从而帮助了德帝国主义，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德国革命现在被削弱了，这是因为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民组成的军队慌忙溃逃时被夺走了成千成万的大炮和价值若干亿的财富。这是我在1月7日提纲中已明确地预言过的。如果尼·布哈林现在只好“抵赖”，那对于他就更坏。凡是记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说过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句话的人，现在看到尼·布哈林不得不“抵赖”他亲口说过的话，只会耸肩表示诧异。

而对于那些不记得这些话的人，没有听说过这些话的人，我们介绍他们看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在目前来说比卡·拉狄克在 12 月所写的东西价值、意义和教益要更大一些。这个文件（可惜，“左派”向他们的读者隐瞒了）就是：（1）1918 年 1 月 21 日我党中央与现在的“左派”反对派一起参加的那次会议的表决结果；（2）1918 年 2 月 17 日中央委员会的表决结果。

1918 年 1 月 21 日，在表决是否立刻中断与德国人谈判这一问题时，赞成的（在可怜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报》的撰稿人中）只有斯图科夫一人。其余的人都反对。

在表决万一德国人中断谈判或提出最后通牒，是否允许准备签订兼并性和约这一问题时，反对的只有奥博连斯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提纲登载出来？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报》对此默不作声？）和斯图科夫，其余的人都赞成。

在表决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应当签订已提出的和约问题时，反对的只有奥博连斯基和斯图科夫，其余的“左派”统统弃权！！这是事实。

1918 年 2 月 17 日，在表决谁赞成进行革命战争这一问题时，布哈林和洛莫夫“由于这种提法而拒绝参加表决”。赞成的一个都没有。这是事实！

在表决是否应当“在德国的进攻还不十分<正是如此！>明显以及这种进攻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暂不恢复和平谈判”这一问题时，赞成的有现在的“左派”报纸撰稿人中的布哈林、洛莫夫和乌里茨基。

在表决“如果德国人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这一问题时，弃权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

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而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哈林否认了德国有进攻的可能，散布了幻想，他实际上——虽不是他所愿意的——用这种幻想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革命空谈的实质也就在于此。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221]

尼·布哈林责难我不具体分析现在这个和约的条件。可是不难了解，对于我的论据而言和从问题的实质来看，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必要来具体分析这些条件。只要证明如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即我们的实际的而不是幻想中的抉择只有一个：或者是承认这样的条件，从而获得哪怕是几天的喘息时间，或者是沦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境地。至少就彼得格勒来说，布哈林是无法驳倒这一点的。他的同事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说新条件恶劣、苛刻、屈辱的程度比布列斯特条件更甚，那么对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负有这方面罪责的是我们可怜的“左派”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之流。这是上面援引的表决情形证实了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是怎样逃避也逃避不了的。给过你们布列斯特的条件，而你们却用装腔作势、吹牛唬人来回答，以至招来更恶劣的条件。这是事实。你们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

我在 1918 年 1 月 7 日的提纲中，极其明确地预言过，由于我们军队的状况（这是空谈“反对”疲惫的农民群众所不能改变的），俄国如果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就一定会缔结更坏的单独和约。

“左派”落入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圈套，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本来就是要把我们拉进对于我们最不利的战争中去。

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主张现在进行战争，显然是脱离了农民，

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也就说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政策的不郑重，正如 1907 年夏季所有社会革命党人所执行的那种似乎“革命的”政策一样不郑重。

最觉悟最先进的工人正在迅速地抛弃这种革命空谈的歪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作出了榜样。彼得格勒市内的优秀工人区，如维堡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已经觉醒起来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主张现在进行战争，它懂得必须准备，并且正在准备^[222]。在 1918 年 3 月 3 日和 4 日举行的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反对革命空谈的人已经获得胜利了。^[223]

“左派”狂妄自欺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这从波克罗夫斯基文章里的一句话就可看出来。他说：“要打仗，就要现在打”（黑体是波克罗夫斯基用的）……趁——听着！听着！——“趁俄国军队包括新组建的部队尚未复员的时候就打。”

谁不逃避事实，那他就会知道，在 1918 年 2 月间，无论在大俄罗斯，无论在乌克兰，无论在芬兰，回击德军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的没有复员的军队。这是事实。因为这个军队已经不能不慌忙溃逃，并且还带红军部队一起溃逃。

谁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视对这种教训应负的责任，不逃避这种教训，他至少会记得拿破仑第一与德国的战争。

普鲁士和德国多次同征服者缔结过苛刻十倍和屈辱十倍（同我们相比）的和约，直到承认由外国人充任警察，直到承担派遣自己的部队去帮助拿破仑第一进行侵略战争的义务。拿破仑第一同普鲁士签订的条约^[218]对于德国的压迫和宰割，比现在兴登堡和威廉对我们的压迫要厉害十倍。可是，在普鲁士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装腔作势，而是签订了极其“耻辱”的和约，他们签订这样的和约，是因为没有军队。他们虽然签署了压迫重十倍、屈辱十倍的条件，但后来终于举行了起义，进行了战争。这样的情形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历史上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和约和战争。有过好几次得到喘息的机会。有过好几次征服者重新宣战的事实，有过好几次某一被压迫民族联合某一压迫民族的事件，这个压迫民族既是征服者的竞争对手，同时自己也是一个征服者（请那些主张不要帝国主义者帮助而进行“革命战争”的人们注意！）。

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

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我们已进入战争频繁的时代。我们正接近新的卫国战争。我们将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成熟的条件下去进行这个新战争。在这艰难的道路上，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一定会纠正装腔作势和革命空谈的作风，一定既能接受极苛刻的和约，也能重新奋起。

我们签订了蒂尔西特式和约。我们也会取得我们的胜利，获得我们的解放，正如德国人在 1807 年签订蒂尔西特和约之后，在 1813 年和 1814 年便达到了从拿破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的。从我们签订蒂尔西特式和约到我们获得解放的距离，很可能要短一些，因为现在历史进展得更快了。

打倒装腔作势的作风！认真进行整顿纪律、加强组织的工作！

载于 1918 年 2 月 21 日（3 月 6 日）《真理报》第 42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432—437 页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224]

（1918年3月）

1 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月7日）

政治报告的内容本来可以是列举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措施，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这种报告，而是关于我国革命的全面概述；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的一切决议提供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我们必须考察前一段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弄清楚为什么后来革命的发展起了变化。我国革命发生了对国际革命将有巨大意义的转折，这就是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最初获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我们在1905年没有能够达到的目的。二月革命时期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自动的、自发的建立，再现了1905年的经验。于是我们宣布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原则。群众根据自身的斗争经验懂得了革命的任务。4月20—21日的事变^[225]是示威游行与某种类似武装起义的运动的特殊结合。这已经足以使资产阶级政府倒台了。接着开始了一种长时期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是从当时执政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本质中产生的。七月事变^[85]还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群众还没有作好准备。所以任何一个负责的组织都没有号召群众这样做。但是，从侦察敌情的意义上说来，七月事变具有很大的意义。科尔尼洛夫叛乱^[96]和接着发生的一些事变都是实际的教训，使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那些到了十月还想让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人的错误^[226]，就在于他们没有把十月的胜利同七月事变、前线进攻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等等事实联系起来，正是这些事实使千百万群众意识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接着就是我们在全俄各地的胜利进军和随之而来的大家对和平的渴望。我们知道，单方面拒绝作战是得不到和平的；早在四月代表会议^[24]上我们就指出了这一点。在4月至10月这段时期，士兵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妥协政策一直在拖延战争，使帝国主义者发动荒唐的、失去理智的进攻，更深地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转而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必须把政权掌握到苏维埃手里，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你们知道，维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仅是克伦斯基，而且还有阿夫克森齐耶夫，他们甚至逮捕了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正是我们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意识中去的这个政策，“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使我们能够在十月间在彼得堡十分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并把最近几个月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一次全面的胜利进军。

内战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在革命初期甚至在战争初期所预言的，当时被很大一部分社会党人所怀疑甚至嘲笑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点，1917年10月25日已经在一个最大而又最落后的参战国中成为事实。在这次内战中，绝大多数居民都站在我们这方面，因此我们非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88—390页。——编者注

从前线归来的军队，把结束妥协主义的最大的革命决心带到了他们足迹所到的每个地方；这样，妥协分子、白卫军、地主子弟等就在居民中间失去了任何支持。同他们进行的战争，由于广大群众和被调来进攻我们的军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就逐渐变成了革命的胜利进军。彼得格勒的加契纳战线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企图用来进攻红色首都的哥萨克发生了动摇；后来在莫斯科、奥伦堡、乌克兰等地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俄国都掀起了内战的浪潮，而我们到处都异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正是因为果实已经成熟了，群众已经领受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全部教训。我们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经过群众长期历史经验的实际检验而成为他们的切身要求。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全面胜利进军的原因。由于这种全面胜利进军，有些人就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所立即碰到的而且不能不碰到的困难忘记了，把它们放到了次要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如果有过 1905 年伟大经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 1917 年 2 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么苏维埃在 10 月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是否具备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政治方面才会有我们后来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即全面胜利进军；因为新的政权形式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一些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奠定下来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的诞生这样容易，是因为 1917 年 2 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过 1905 年的痛苦经验而变得聪明的人民的深刻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当时，战胜国内敌人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任务。建立政权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群众已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政权的骨骼，即基础。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往后会遇到十分困难的任务。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像

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任务本身的性质不允许采用这种解决方式。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我国的卡列金分子，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而只遇到一些甚至不值得严重注意的反抗，那是因为事件的这一进程已经由以往的整个客观发展预先决定好了，我们只要最后说一句话，换一块招牌，把“苏维埃是工会组织”的字样擦掉，写上“苏维埃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就行了。可是在组织任务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每一个愿意深思熟虑地对待我国革命任务的人，立即就会明白：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长期的和顽强的努力才能消灭这种瓦解现象，并战胜助长这种现象的分子，这些人把革命看成是摆脱旧的束缚、尽量为自己捞一把的手段。在小农国家里，在遭受严重经济破坏的时候，这种分子大量出现是必然的，而同这些分子的斗争要困难一百倍，不能指望轻易打开惊人的局面。这个斗争我们刚刚才开始。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还得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里，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像过去和卡列金分子进行斗争时那样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谁要想把这种斗争方式拿来解决摆在革命道路上的组织任务，作为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他就会彻底破产。

当革命具体地碰到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即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些迷恋于革命初期胜利进军的青年同志也准备采取同样的办法。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关于土地社会化和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得以避免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其所以不能，是由于贸易联系，是由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很多自认为是左派的青年朋友们开始忘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其实这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了帝国主义的侵害。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也似乎顾不上帝国主义。而一些帝国主义者当时所以顾不上我们，那只是因为现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全部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内讧当时已分裂成为两个集团。卷入这场斗争的帝国主义强盗都全力以赴，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致无论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无法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反对俄国革命。在10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就是这样），当时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千百万人的生命遭到毁灭；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灾难使各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各交战国都陷入绝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客观形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陷于这种境地的各国人民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只是由于我国革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

时机，即两大强盗集团，无论哪一个都不能马上向对方猛扑过去，也不能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的革命只是由于能够利用而且利用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个时机，才在欧俄实现了光辉的胜利进军，才蔓延到了芬兰，并且开始波及高加索和罗马尼亚。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党的工作人员，一些超人知识分子，他们迷恋这种胜利进军，他们说：我们对付得了国际帝国主义；在这方面也照样会胜利进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而这是不符合俄国革命的客观情况的。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暂时故障，因为向我们冲来的机车暂时抛了锚，它本来一定会像火车碾碎独轮车那样把我们碾得粉碎，可是它抛了锚，原因是两个强盗集团发生了冲突。当时革命运动到处都在展开，但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大都还处在开始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完全不像我国那样。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这个客观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经历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历史转折。我们必须从10月、11月和12月在国内战场上反对反革命势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时的全面胜利进军，转到同真正敌视我们的真正国际帝国主义交锋。我们必须从胜利进军的时期过渡到异常艰难的时期，用空话和漂亮口号避开这种情况（虽然这样做很痛快）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里，群众已经极度疲惫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三年的痛苦的战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完全无力作战了。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有一些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士兵群众的代表，在全体资产阶级面前毫不犹豫地说了真实情况：俄国军队不会再去打仗了。军队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一个遭到战争空前破坏的小农国家，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没有军队，但不得不继续呆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从前是强盗现在还是强盗）身旁，靠宣传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是感动不了强盗的。这正像一只驯顺的家畜同猛虎躺在一起，劝猛虎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一样，而这种和约只有用袭击猛虎的办法才能争取到。关于这样一种前景我们党的一些上层分子（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组织）企图主要用空话和“不应该这样”的托词搪塞过去。他们说，实现这样一种和平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让我们这些一向高举大旗同敌人公开作战、振臂一呼就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人作出让步，接受屈辱的条件。这永远办不到。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首先声明：“德国人无法进攻。”^[227]

这就是这些人聊以自慰的第一个托词。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在进行空前困难的组织工作时必将经受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当我们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但是当我们从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出发，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以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如果你们说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228]，谁不懂得这

个道理，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说得很对的。的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如果说目前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步跨到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十足的空话。“每次都在这个地方”^[229]这句话，我们都听腻了，工人们早就把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抛弃了，因为，毫无疑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这条九头蛇，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硬说每一次罢工都能转变成革命，那就是废话。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成熟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才能被战胜，这样说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下面这种说法却是完全荒谬的，即硬说我们可以把当前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具体困难掩盖起来，说什么“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上，所以什么蠢事我都可以干”。“李卜克内西会搭救我们，因为他反正会取得胜利”。他会给我们提供完善的组织，会把一切预先安排妥当，使我们可以得到现成的形式，就像我们曾经得到西欧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我国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胜利，而为了在西欧取得胜利却已经花了几十年的工夫。总之，把胜利进军这种解决斗争问题的旧方式搬到新的历史时期，是毫无益处的冒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它使我们遇到的不是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腐朽的家伙，而是国际强盗德帝国主义，而德国革命只是刚刚开始成熟起来，显然还没有完全成熟。硬说敌人不敢向革命进攻就属于这种冒险。布列斯特谈判^[210]时我们还不是非接受任何和约条件不可。根据当时客观的力量对比，得到的将不止是喘息时机。从布列斯特谈判本来就应当看到，德国人一定会发动进攻，德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革命还没有达到立即爆发的程度。而我们不能责怪德帝国主义者，说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为革命的爆发作好准备，或者像我国某些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们所说的，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造成使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局面。当我们将这些青年朋友们说，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我们是被迫的，我们决没有忘记在我们驯顺的家畜旁边卧着一只猛虎，——他们却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但我们决没有忘记，单方面下命令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不能结束战争的。

我们党内没有一个派别，没有一个组织，反对复员军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都发疯了吗？当然不是。还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些非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就说过，军队已经不能打仗，让它在前线再留几个星期都不可能了。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看到事实，愿意正视丑恶的令人痛心的现实，而不是躲起来或故意把眼睛蒙上，用傲慢的空话来回避现实，对于这种情况都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无法把军队保住。我们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复员军队。军队是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经历了空前的痛苦，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它在技术装备方面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了战争，最后在一触即溃的情况下退出了战争。这不应该归咎于那些忍受了空前痛苦的人们。士兵们在成百次的决议中，甚至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已经淹没在血泊中，我们没法再打下去了。”当时尽管可以人为地拖延战争的结束，尽管可以像克伦斯基那样进行欺骗，尽管可以把战争的结束推迟几个星期，但是，客观现实还是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军队是俄国国家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不能再承受这场战争的重担了。我们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它在其他部分病情还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就能愈是迅速地得到消除，国家就能愈是迅速地作好准备来

迎接新的严峻的考验。正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才没有任何异议地一致通过了复员军队的决议，通过了这个从对外事件看来好像是荒谬的决议。这是一个正确的步骤。我们说，保住军队是一种轻率的幻想。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整个社会机体也就能愈是迅速地康复起来。因此，“德国人无法进攻”这句革命空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对事态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高估计，而从这句空话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空谈：“我们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但是，如果德国人进攻呢？“不会的，他们无法进攻。”可是你们有权利拿来孤注一掷的不是国际革命的命运，而是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德国人一旦发动进攻，你们岂不成了德帝国主义的帮凶吗？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从1917年10月起成为承认保卫祖国的护国派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帝国主义者断绝了关系：我们废除了秘密条约^[192]，战胜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建议签订公开的、真诚的和约，使各国人民都能从行动上看到我们的一切愿望。真正主张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怎么能采取这种已经带来恶果的冒险行动呢？然而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党现在由于党内形成“左的”反对派^[219]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

这个危机将被消除。无论是我们党或我国革命，都决不会由于这个危机而遭到灭亡，尽管目前这种情况十分逼近，完全可能发生。我们不会由于这个问题而灭亡的保证在于：事变使人们抛弃了解决派别分歧的旧办法，抛弃了那种大量发表文字材料、不停地进行争论、动辄实行分裂的旧办法，而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事实、事件和世界历史的教训来检验一切。你们说，德国人无法进攻。根据你们的策略，便得出了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的结论。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它打破了这种幻想。是的，德国革命在发展，但是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不像俄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快，并不像我国历史在10月发展得那样迅速，——那时，我们无论到哪个城市去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几天以内十分之九的工人都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德国革命的发展，可惜没有这样快。应该谁照顾谁呢？是我们照顾德国革命还是德国革命照顾我们呢？你们曾经希望德国革命照顾你们，而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这是一个教训。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到那里的距离可能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距离要远，但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然而，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脚踏实地地度过最困难的关头。

革命的到来，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承认这是事实，要估计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不可能像革命在俄国这个尼古拉和拉斯普廷统治的国家那么容易开始，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居民对于俄国边疆上居住的是些什么民族，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关心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每个居民提供了民主的文化和组织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准备就开始革命，那是不对的，荒谬的。现在我们还只是

接近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痛苦时期。这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应该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困难，应付特别严重的失败，这些困难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洲的革命还没有开始，虽然它明天可能开始。而欧洲革命一爆发，我们当然就不会再有疑虑，就不会再有革命战争的问题，而只会是全面的胜利进军。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必然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这就是历史教训了我们，严厉地惩罚了我们的一个简单事实，——而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的这种希望——德国人无法进攻，可以高呼“乌拉”——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之后，我们的各级苏维埃组织会很快地使全苏维埃俄国的群众认识到这一教训。他们都行动起来，聚集在一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考虑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进行的争论，不是革命前那种仅限于党的狭隘范围的旧的争论，而是把一切决议都交给群众去讨论，他们要求用经验和事实来检验这些决议，他们从来不会被轻率的言论所迷惑，也不让自己离开事变的客观进程所规定的道路。一个知识分子或左派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回避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他当然可以避而不谈我们没有军队、德国革命尚未到来等问题。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千百万群众看见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知道军队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不是指个别的人，而是指真正的群众）知道：我们已经不能打仗了；前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忍受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群众懂得了一个真理：既然没有军队，猛兽又躺在身边，那就不得不签订极苛刻的屈辱的和约。只要革命还未爆发，你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军队整顿好，还没有让军队复员回家，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以前，病体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我们高呼“乌拉”是不能打败德国强盗的，是不能像打垮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打垮德国强盗的。这就是群众得出的教训，他们并没有提出某些想回避痛苦现实的人强加给他们的保留条件。

起先，俄国革命在10月和11月是全面胜利进军，后来在几星期内突然为德国强盗所击败，准备接受掠夺性的媾和条件。的确，历史的转折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遇到的所有这样的转折都非常痛苦。1907年，我们同斯托雷平签订了空前耻辱的内部条约，我们不得不通过斯托雷平杜马这个牲畜栏，在保皇书上签字^[230]，承担了某些义务，当时我们经受了同样的痛苦，只是程度比现在的小一些罢了。当时优秀的革命先锋队里有一些人说（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对俄国革命充满信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去参加斯托雷平的合法机关。”你们会去参加的。群众生活和历史比你们的信心更有力量。如果你们不参加，历史会强迫你们去参加的。这是一些非常左的人，可是当历史刚一发生转折，他们这一派人就烟消云散了。既然过去我们一直是革命者，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并且又能够摆脱这种处境，那么，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客观的必然性。在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内之所以产生这种必然性，是因为欧洲的革命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迟迟没有爆发，而德帝国主义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发动了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善于退却。用空话掩盖不住令人万分痛心而可悲的现实；我们要说：但愿退却稍微有些秩序。秩序井然的退却我们做不到，——

但愿我们的退却稍微有些秩序，赢得一个短促的时间，使我们机体上的患病部分能够多少得到消除。整个机体是健康的，它一定能战胜疾病。但是，不能要求它转瞬之间立刻就战胜，要想制止军队的溃逃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对一位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说：同志，请你到前线去，看看那里军队的情况吧。他认为我的建议不怀好意，他说：“有人想流放我们，不让我们在这里宣传革命战争的伟大原则。”我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没有要流放反对派的意思，不过是建议他们去看一看军队已经开始大量溃逃的情形。我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形，早就不能不看到，前线军队的瓦解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把我们的大炮廉价卖给德国人。这种情况当时我们就知道，正如现在我们也知道军队已经无法保持住。所以，用“德国人无法进攻”作为借口，是极大的冒险。既然欧洲革命延迟爆发，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十分严重的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军队，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因为这两个任务不可能马上解决。如果不能适应形势，不准备在污泥中爬行，那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空谈家。我建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历史的安排并不那么符合我们的心愿，没有让各国革命同时成熟。

现在的情况是：内战已经开始了，这是同帝国主义冲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证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腐朽，各国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开始行动起来。是的，我们会看到国际范围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这还只是一个非常动听、非常美妙的童话。我很了解，爱听美妙的童话是儿童的天性。但是请问，相信童话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者的天性吗？任何童话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如果你给孩子们讲童话，里面的鸡儿猫儿不说人的话，孩子们对你所讲的童话就不会发生兴趣。同样，如果向人民说，在德国内战一定会到来，并且担保国际的战场革命^[231]将代替同帝国主义的冲突，那么，人民会说你们在欺骗他们。你们这样做，就只能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在自己的愿望里克服历史所造成的困难。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将来能够行动起来，那当然很好。但是，你们是否已经测算好了，是否已经找到一种能够测定德国革命在哪一天爆发的仪器呢？不，这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在孤注一掷。如果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怎么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指望能侥幸遇上这种事态的发展，可是并没有遇上，结果你们就束手无策，无法应付这种国际革命没有到来的局面。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熟。

已经到来的时期，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使我们这个把自己的军队复员（不得不复员）的国家遭到严重失败的时期。我的预言完全证实了：由于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过错，我们签订了一个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军队的缘故才同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我们是同霍夫曼谈判，而不是同李卜克内西谈判，——我们就是这样援助了德国的革命。而现在你们却在帮助德帝国主义，因为你们把价值以百万计的财富（大炮和炮弹）送掉了，——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见到军队的不堪设想的情况的人都应该预料到的。从前线回来的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说，只要德国人稍微一进攻，我们就会一败涂地。我们不出几天就会成为敌人的牺牲品。

我们记取了教训，就会消除我们的分裂，消除我们的危机，不管这种病多么严重，因为最可靠的同盟者——世界革命一定会来援助我们。有人说我们批准的这个和约是蒂尔西特和约^[218]，是空前未有的和约，是比布列

斯特和约更屈辱、更具有掠夺性的和约。我回答说：完全正确。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从群众观点来看问题的。企图依靠自己的幻想，把 10—11 月间一个国家中革命胜利进军时期的策略搬到世界革命的事态发展进程上去，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人们说喘息是幻想的时候，当名叫《共产主义者报》[220]的报纸——这名称大概是从公社这个词来的——连篇累牍地批驳喘息论的时候，我说：我经历过许多次派别冲突和分裂，所以我有许多实际经验，而我要说，我看得很清楚，这种病用党内派别分裂的旧办法是治不好的，因为现实生活会先把它治好。现实生活在迅速前进。在这方面它起着非常出色的作用。历史把它的火车头推动得这样迅速，以致《共产主义者报》编辑部还来不及出版下一号，彼得格勒的大多数工人就会开始对该报的主张感到失望，因为现实生活表明，喘息已经成为事实。而现在我们签订和约，有了一个喘息时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更好地保卫祖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战争，我们的军队就会狼狈溃逃，而这种情形本来是必须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的同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法制止，因为战争比宣传，比成千上万的议论更有力量。既然他们不了解客观情况，他们就无法制止军队的溃逃，他们也制止不了。这支患病的军队使整个机体都受了感染，因此我们遭到了新的空前的失败，遭到了德帝国主义对革命的新的打击，——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轻率地使自己落到了在帝国主义的攻击面前没有机关枪的境地。但是，我们将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战斗，并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觉的纪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还会像现在这样遭受德国人的铁蹄的蹂躏，只要人民还没有学会斗争，没有建立起一支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军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这种蹂躏。”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德国革命还没有爆发，而且也不能保证它明天一定爆发。

因此，《共产主义者报》上的大量文章所坚决反对的喘息论是由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喘息时机已经成为事实，每个人都在利用它。我们曾经设想过，我们在几天以内就会失去彼得格勒，因为当时逼近我们的德国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天的路程，优秀的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尽管斗志高昂，终究是孤军作战。当时情况空前混乱，一片惊慌，军队被迫一直溃退到加契纳，当时我们竟然收复了不曾丢失的地方。事情是这样：一位报务员来到一个火车站，坐在发报机旁发出这样的电报：“未见德军。我们已占领火车站。”几小时以后，交通人民委员部给我打电话说：“下一个火车站已占领，我们正向扬堡逼近。未见德军。报务员照常工作。”这就是当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十一天战争^[232]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是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告诉我们的，应该把他们请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让他们讲讲真实情况。这是一种令人非常痛心和难过，令人感到痛苦和丢脸的真实情况，但是它要有用得得多，俄国人民是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人们向往国际的战场革命是可以的，因为它肯定会到来。时机一到，一切都会到来，可是现在必须建立自觉的纪律，无论如何必须服从指挥，以便建立模范的秩序，使工人们学习作战，哪怕一天只学习一小时也好。这比讲美妙的童话要困难一些。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你们这样做就会帮助德国革命，就会帮助国际革命。喘息时机能持续多，我们不知道。但是喘息时机我们已经得到了。必须尽快复员军队，因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器官；同时，我们还要援助芬兰的革命^[233]。

当然，我们是在违反条约，我们已经违反了三四十次。只有小孩子才不了解，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并且有了很大发展的痛苦而漫长的解放斗争时期，必须进行长期的谨慎的斗争。耻辱的和约引起人们的反抗，但是《共产主义者报》的同志们在谈论战争的时候，却感情用事，忘记了当时人们一直紧握拳头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234]。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绝对不能这样过日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他们的报纸名叫《共产主义者》，其实应该叫作《小贵族》，因为它看问题活像一个小贵族，死到临头还手握利剑，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说：“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谈论问题是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

军队在溃逃，为了不丧失成千上万人不能不溃逃，我在这种时候接受和约，是为了不让情况变得更坏。难道缔结条约是耻辱吗？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农民和工人都会为我辩护，因为他们懂得，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德国人在缔结了蒂尔西特和约以后从拿破仑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这件事我讲过不止一次；我有意把我们的和约称为蒂尔西特和约，虽然我们并没有接受蒂尔西特和约上的那些条件，即承担派遣我国军队去帮助侵略者侵略其他民族的义务，——这是历史上有过的事实，如果我们只是寄希望于国际的战场革命，那么，我们的事情也会弄到这种地步。要当心，不要让历史也把你们变成这种军事奴隶。只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取得胜利，苏维埃共和国就有沦为奴隶的可能。拿破仑曾经在蒂尔西特强迫德国人接受空前耻辱的和约条件。和约签订了好几次。当时的霍夫曼——拿破仑——曾经抓住过德国人违反和约的事，现在的霍夫曼也会在同样的问题上抓住我们。不过，我们要竭力设法不让他很快抓住。

这次战争给了俄国人一个辛酸、痛苦、同时又是很重要的教训：组织起来，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纪律。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否则，我们这个遭到失败的民族就会永远当奴隶。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而且也只能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一点或者更坏一点的和平的手段。在布列斯特，根据力量的对比我们本来可以签订一个战败国的和约，但还不是屈辱的和约。在普斯科夫，根据力量的对比就只能签订一个耻辱的、比较屈辱的和约了。而在下一阶段，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将被迫签订一个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不会说，苏维埃政权只是一种形式，就像莫斯科的青年朋友们对我们说的那样^[235]。我们不会说，为了某些革命原则，可以牺牲内容。我们说：让俄国人民懂得，应该遵守纪律，组织起来，这样就能经受住一切蒂尔西特式的和约。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些战争有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就会很快到来。我们说：既然历史是这么发展的，我们就可能不得不从和平重新转到战争，——这也许就是几天以内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作好准备。如果各报所载属实，纳尔瓦还没有被德国人占领，那么，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正在纳尔瓦城外作准备。德国人不是在纳尔瓦城里就是在纳尔瓦近郊，不是在普斯科夫城里就是在普斯科夫近郊正在集结自己的正规军，修复铁路，以便下一次一跃而夺取彼得格勒。这只野兽很会跳跃，它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还要再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应当作好准备，不要说大话，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因为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可以用来从彼得格勒撤退。如果彼得格勒被占领，我们的几十万无产者就会遭

受空前未有的磨难。我再说一次，我决心签订并且认为有义务签订屈辱二十倍以至一百倍的条约，以便取得哪怕是几天的时间来撤出彼得格勒。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减轻工人们的痛苦，否则他们就会遭受德国人的蹂躏；同时我可以使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火药等等更容易地从彼得格勒运出，因为我是护国派，我主张训练军队，哪怕是在最遥远的大后方训练，我们正在那里治疗目前这支已经复员的患病的军队。

我们不知道，喘息机会继续多久，我们要设法抓住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约束，受牵制，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霍夫曼的行动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方面要击溃苏维埃共和国；另一方面，他要在好几条战线上作战；第三方面，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发展。霍夫曼也了解这一点，正像人们所断定的那样，他不能马上夺取彼得格勒，夺取莫斯科。但是，明天他会这样干，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再说一遍：在军队已经有病，我们尽量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争取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间的时候，每一个联系群众、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群众的严肃的革命者，都应该教育群众遵守纪律，治好群众的疾病，设法唤起群众去进行新的战争。每一个这样的革命者，都会为我们辩护，认为签订任何耻辱的条约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利于复兴俄国和治好它有病的器官。每个神志清醒的人都懂得，我们签订这项和约，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工人革命；谁都知道，我们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也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军事援助。我们正在给芬兰人运去武器，而不是派去不中用的部队。

也许，我们即将应战；可能明天我们把莫斯科也放弃，然后，再转入进攻，调动我们的军队去迎击敌军，但这需要人民的情绪有所转变，这种转变还在酝酿之中，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一定会到来，那时广大群众说的就会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哪怕是极其苛刻的和约，我也不得不接受，因为目前我还不能说，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复兴的时期一旦到来，大家都会体会到这一点，都会看到，俄国人并不是傻瓜；他们看到，他们懂得，应该克制，应该贯彻实行这个口号，——这就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236]的主要任务。

应该学会按新的方式进行工作。这样做要困难得多，但这并不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样做决不会毁掉苏维埃政权，只要我们自己不用愚蠢透顶的冒险行动来毁掉它。将来总有一天，人民会说：我们不能再受人蹂躏了。但是这这就要求我们不去采取这种冒险行动，而要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在日前我们签订的空前屈辱的条约下进行工作，因为这样的历史危机，决不是一场战争、一个和约所能解决的。由于德国存在着君主制的组织，德国人民被捆住了手脚，在 1807 年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在签订这项和约之前就签订过好几次屈辱的和约，这些和约变成了喘息时机之后，每次随之而来的都是新的屈辱和新的违反。群众的苏维埃组织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口号应当只有一个：认真学习军事，整顿铁路秩序。没有铁路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就是十足的叛变。必须建立秩序，必须培养能够取得优异革命成就的最大毅力和力量。

既然得到了喘息时机，哪怕只有一小时，也要紧紧抓牢，利用这个时机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在那里建立新的军队。抛弃幻想吧，这些幻想已经使你们受到实际生活的惩罚，将来还会受到更重的惩罚。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时期，

我们会遭受许多严重的失败，这个时期已经到来，要善于认真地对待它，要作好准备，以便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在完全受德国人奴役的条件下顽强地进行工作。这一切用不着遮遮盖盖；这确实就是一个蒂尔西特和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么，尽管遭到失败，我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胜利。（鼓掌）

载于 1923 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23 页

9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237]

（3月8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 1917 年 4 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通过了看来不会引起很大争论、甚至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作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我们都认为附上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整个事态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也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只有巴黎公社是它的雏型，而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总之，既然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么，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开始消失，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赞成旧形式的民主。

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有人可能因此把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这种意见在中央委员会里马上就遭到了否决，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把自己仅仅称为共产主义者，总是附加一些东西。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改良派、民族社会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混淆起来。

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

其次，同志们，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关于它的实践和政治部分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我们已有了一些材料：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文集^[238]，在我们党的两个主要理论刊物（彼得堡出版的《启蒙》^[239]和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240]）上刊登过论述怎样修改我们党纲理论部分的文章。我们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材料。曾经有过两种基本观点，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丢掉我们纲领^[241]中原有的理论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赞成这个观点。不过应该把关于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述补充进去，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还应当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补充进去。不管我们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运如何，不管革命今后的变化如何，不管怎么样，卷入这场战争并把最先进国家弄到饥荒、破产和野蛮地步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都已经陷入绝境。这里应该用 30 年前（1887 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估计欧洲战争的前途时说过的话。他说，在欧洲，王冠将成打地滚落街头而无人拾取；他说，许多欧洲国家都难免要遭到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欧洲战争惨祸只能有一个结局，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拿自己过了时的谬论来炫耀的人，他们认为在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造成破坏、野蛮、痛苦，使群众遭受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同时，也不能保证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奋起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要恢复它虽然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消灭。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物质残余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文化。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保留旧的纲领，而把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开始的论述补充进去。

我已经在我发表的党纲草案里表明了这个观点。另外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另一种观点反映在我们的一些交谈中，特别是反映在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把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全部删去或者差不多全部删去，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像我们的纲领那样论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论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以及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观点有原则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对的。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67 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481—493 页。——编者注

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曲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历史有过多大的波折，这还是仅就我国来说的；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迅猛，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或敌人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迷失方向，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在理论上设想过的、符合我们愿望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些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看到的是俄国内战怎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以及内战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相互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论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依据的绝对确凿的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必须首先在纲领中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就是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这不仅是作鼓动宣传，而且是展示新的纲领，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按时间先后来说由我们担负了第一个角色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是有绝对确凿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这样就会使这些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策略，同我们所赞同的、每个觉悟工人都熟知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转化为帝国主义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和巴塞尔

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论述，这个论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242]因此，我们应该重申这个主要之点，以便更清楚地告诉西欧的劳动群众，他们的领导人应该在哪一点上受到谴责。

我认为这样的纲领结构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其主要根据就在这里。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当作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质出发，因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如此；所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带民族特色的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却未必必要。我们应该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就能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从这里可以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这样做，始终是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的。

其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尽力说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受到西欧占支配地位的正式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苏维埃革命和俄国建立苏维埃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苏维埃还有许多东西很粗糙，不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细心观察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时期，这种类型的国家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了几个星期，而且人们并没有理解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些创造了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是没有一个法国社会主义派别理解他们所做的东西。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我们之前有巴黎公社，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东西。尽管苏维埃中存在着粗糙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特性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起来了。它已经活动了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好几个月了，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在好几个民族地区。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显示了威力，连芬兰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也接受了，那里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政权类型毕竟也是新的、无产阶级的。^[243]这就证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新的民主制把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使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和武装保卫者，并建立能够重新教育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开始做的有哪些做得不好，我们是能够加以克服的，只要历史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一些时间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对新型的国家的论述在我们的纲领中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得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条件下，在异常匆忙的条件下来制定党纲，我们甚至未能召集自己的委

员会，拟出正式的纲领草案。分发给代表同志们的东西只能称为草稿，这一点大家都会清楚地看到。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而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指给欧洲工人看，我们着手做了什么事情，怎样着手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样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在着手做一件好事，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么我们要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多的具体材料，说明我们试图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我们要竭力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竭力说明，这种还有很多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新型民主制，其活的灵魂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关。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关应该像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同群众要接近得多，它们提供了接近群众的机会，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教育这些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渴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着眼于我们一个国家，而且还号召欧洲工人来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巴黎公社道路的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欧洲工人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一定会来援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要求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这一点也应适用于民主纲领的其他各条。我们应该自己来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审判工作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就在于竭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我们的这些任务，我们就会推动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在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产物，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人民革命的任何一次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靠重复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接触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也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那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

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而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且考验了这个政权，这就不早了。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倒退回去，那是空想。

俄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在历史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一点应该在纲领中写明。我们要制定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来代替最低纲领。对新型国家的论述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

显然，我们现在还制定不出纲领。我们应该拟定纲领的基本要点，交给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去制定基本提纲。甚至可以更简单些，可以根据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议的决议来制定，因为那里已经提供了一个提纲。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这种论述，然后提出实际的改造措施。我觉得，在这里，在纲领的历史部分，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没收土地和工厂^[244]。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银行变成遍布全国的国家机关网，为我们提供公共簿记，提供由居民自己来进行的计算和监督，这是社会主义的下一些步骤的基础。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应该以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要求的形式写出来，即目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银行政策方面，在组织产品生产，组织交换、计算和监督，实行劳动义务制等方面打算进行哪些改革。如果获得成功，我们就要补充说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大大小小的步骤。这里应该十分精确和清楚地说明，什么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的，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做完。我们丝毫不要夸大，不要脱离事实，要非常客观地在纲领中叙述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让欧洲的无产阶级看到真实情况，并对他们说：这是应该做的，——好让他们说：俄国人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们会做得好些。当群众都一心要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不可战胜。在大家眼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纯粹掠夺性的战争。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在大家眼中露出原形，变成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时，这将再一次给西欧无产阶级以新的推动。必须揭露这一点，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争。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同你们谈谈的总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具体建议马上交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然后或许就在这里制定几个基本要点，如果认为这样做有困难，那现在就不这样做，而把党纲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或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委托它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或秘书的详细记录来制定党的纲领，而党的名称应该立即更换。我觉得，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大家都会同意：由于我们遇到了种种事件，我们的纲领在起草工作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我相信，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党的各个派别中有足够的理论人才，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制定出纲领来。当然，纲领中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更不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2—33页。——编者注

说在文字和修辞方面不确切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进行这项工作，而安静却是文字工作所必需的。

所有这些错误我们将在工作过程中加以纠正，而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至少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为民主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剥夺剥夺者”这个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转到银行国有化^[245]和土地国有化这样一些具体的公式，而这些将是纲领的主要部分。

土地问题应该这样进行修改：这里要反映出愿意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愿意帮助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农是怎样在抱有各种偏见、各种旧观点的情况下开始给自己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的。我们不把这一点强加于别的国家，但这是事实。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有人责备我们用暴力实施社会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主要是从小农经济的观点来公平地分配土地。同时我们要优先照顾公社和大的劳动组合^[246]。农民说：我们赞成垄断粮食贸易，我们赞成没收银行和工厂。我们愿意帮助工人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用各种文字出版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正准备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们要在纲领中具体地表达出这个思想，要在理论上谈清楚，同时丝毫不要离开确定不移的具体事实。在西欧将会有另外的做法。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欧无产阶级会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在几个星期内制定我们的纲领，而我们可能犯的错误，实际生活会纠正它，我们自己会纠正它。这些错误与我们将要取得的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载于 1923 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40—52 页

当前的主要任务^[247]

(1918年3月11日)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
你又强大，你又衰弱，
俄罗斯母亲！^[248]

人类历史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最伟大、最困难的转折，这个转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具有解放全世界的巨大意义。它由战争转到和平；由强盗们为重新瓜分最大的强盗已经抢到的赃物而驱使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去厮杀的战争，转到被压迫者为摆脱资本枷锁而反抗压迫者的战争；由痛苦、灾难、饥饿、野蛮化的深渊，转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幸福和持久和平的光明未来；——在这种急剧转折的紧急关头，在周围旧事物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事物又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的时候，有的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陷于绝望，有的人则靠一些漂亮动听的话来逃避那有时令人过分痛苦的现实，这都是毫不奇怪的。

俄国特别清楚地目睹了，特别强烈而痛苦地感受到了由帝国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革命这段历史进程中一些最急剧的转折。我们在几天内就摧毁了一个最古老、最强大、最野蛮和最残暴的君主制度。我们在几个月中就经过了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许多阶段，而别的国家走过这些阶段曾经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就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在内战中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公开反抗。我们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到处实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进军。我们唤起了受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最下层劳动群众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我们创立并且巩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比最完善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高得多和民主得多的新型国家。我们建立了为贫苦农民所拥护的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一系列宏伟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唤醒全世界千百万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燃起他们热情的火焰。我们到处发出了国际工人革命的号召。我们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提出了挑战。

于是帝国主义强盗乘我们手无寸铁的时候进行袭击，在几天之内就把我们打倒在地上。他强迫我们签订了极苛刻极屈辱的和约，这是我们为了敢于从帝国主义战争的铁钳中挣脱出来——哪怕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而付出的代价。而且随着这个强盗的本国工人革命的幽灵愈是可怕地显现在他面前，他也就愈加残暴地压迫、扼杀、肢解俄国。

我们被迫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218]。不要欺骗自己。要有勇气正视未加掩饰的痛苦的现实。要充分地、彻底地认清我们现在所陷入的遭受失败、分割、奴役、屈辱的深渊。我们对此认识得愈清楚，我们争取解放的意志，我们从奴役境地重新获得独立的愿望，我们无论如何要使俄罗斯不再是又贫穷又衰弱而成为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的决心，就会愈加坚不可摧，像钢铁一样坚强。

俄罗斯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广大的国土和天然财富，足以供给所有的人生活资料，虽说不是很丰富，至少是足够的。我们在天然财富方面，在人力后备方面，在伟大革命为人民创造力提供的广阔天地方面，都有足够的材料来建立真正又强大又富饶的俄罗斯。

俄罗斯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只要她抛掉一切颓丧情绪和一切空谈，

只要她咬紧牙关，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只要她振作精神，鼓起劲来，只要她认识到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沿着这条道路迈进，不因失败而气馁，用一块块基石去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固基础，坚持不懈地建立纪律与自觉纪律，处处加强组织性，加强秩序和求实精神，加强全民力量的紧密合作，加强对于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普遍计算和监督，——这就是达到建立军事实力和社会主义实力的道路。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既不当硬充好汉，也不应当悲观失望。说什么我们只能在两种死亡中选择一种，或者是缔结极其苛刻的和约而“无声无息地”（从小贵族观点看来）死去，或者是进行无法取胜的战斗而“壮烈”牺牲，此外别无出路，这是不对的。说什么我们签订“蒂尔西特”和约，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或背叛了自己的朋友，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没有背叛任何事和任何人，我们没有为任何谎言辩护或加以掩饰，我们从来没有拒绝尽自己的所能和所有去帮助任何患难朋友和同志。如果一个统帅率领被击溃的或仓皇溃逃的残余部队向腹地撤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签订极其苛刻极其屈辱的和约的办法掩护这种退却，他这样做并不是背叛他无力援助的、被敌人分割开的那部分军队。这个统帅选择了挽救那尚可挽救的队伍的唯一道路，不同意去冒险，不向人民掩饰痛苦的真实情况，“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利用一切喘息时机，哪怕是最短的时机，来聚集力量，使军队喘一口气，或医治它所患的溃逃病和颓丧病，——这样的统帅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我们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当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强迫普鲁士签订蒂尔西特和约时，征服者把德国人的全部军队都击溃了，占领了首都及一切大城市，设置了自己的警察，强迫战败者提供辅助军替征服者去进行新的掠夺战争，分裂了德意志，同一些德意志国家结盟去反对另一些德意志国家。虽然如此，可是德国人民甚至在签订了这样的和约之后仍然站了起来，能够聚集力量，奋起为自身争得自由与独立的权利。

凡是愿意思索并善于思索的人，都可以从蒂尔西特和约（这不过是那个时代德国人被迫签订的许多苛刻而屈辱的条约之一而已）的例子中明显地看出，那种以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签订极其苛刻的和约都是陷入灭亡的深渊，而进行战争则是英勇行为和得救之路的想法是何等幼稚可笑。各个战争时代都教导我们，和约起到获得喘息时机和聚集力量来准备新的战斗的作用，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蒂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屈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当时历史环境除了提供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出路之外，没有给这个复兴提供别的出路。当时，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处于沉睡状态。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只能是极端缓慢的。

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整个文化，其中包括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苦难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历史现在正以火车头的速度飞驰前进。现在千百万人正在独立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了。

因此，如果说俄国现在是在从“蒂尔西特”和约走向——它无可争辩地是在走向——民族复兴，走向伟大卫国战争的话，那么这个复兴的出路就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主张“保卫祖国”，不过我们准备进行的卫国战

争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保卫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战争，保卫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队伍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

“仇恨德国人，打击德国人”——这始终是通常的爱国主义即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口号。而我们说，“仇恨帝国主义强盗，仇恨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同时又说，“要向德国人学习！要始终忠实于同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会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

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

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结局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衰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

1918年3月11日

载于1918年3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73—77页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249]

(1918年4月)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取得了和平(虽然是条件极其苛刻和极不稳固的和平),因而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方面,即集中到组织任务上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236]1918年3月15日通过的决议第4段(第4部分),在谈到劳动者的自觉纪律以及同混乱和组织涣散现象作无情的斗争的那一段(或那一部分),已经把把这个任务向一切被压迫劳动群众明确地提出来了。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和平不稳固,自然不是由于它现在想要恢复军事行动;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及其应声虫(孟什维克等等)外,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会想到这种事情。和平不稳固,是由于在东西两面同俄国接壤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主战派随时可能占上风,俄国的暂时虚弱使他们跃跃欲试,仇视社会主义和酷嗜抢劫的资本家们也在怂恿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已经白热化的纠纷,对于我们说来,才是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和平保证。这种纠纷一方面表现在西欧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在重新进行,另一方面表现为日美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的帝国主义竞争极其剧烈。

很明显,防御力如此薄弱的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极不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使国防力量真正有所增强。

同样很明显,我们对西欧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能给予多少重大的援助,全看我们对面临的组织任务解决得如何。

顺利解决我们当前首要的组织任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人民的政治领导者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劳动群众中一切觉悟的分子,能够完全理解过去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同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世纪制度这种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即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原因不仅在于受资本剥削的群众由于自身的涣散和不成熟,当时的反抗极其微弱,而且还在于自发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力量。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4—115页。——编者注

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这种革命，只有在人口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大多数进行独立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能够十分积极地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监督和计算，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现在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构成目前政治局势的特点，要求苏维埃政权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说，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

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无论在沙皇制度时代或在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同克伦斯基之流、基什金之流妥协的时期，这个任务都曾占据首要地位。现在这个任务当然还远未完成（而且无论何时都不会彻底完成），但是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因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大多数工人农民明显地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个任务也远没有彻底完成。因此对这个任务不能忽视，因为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5]以及他们的应声虫和走卒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6]，仍然试图联合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可是，镇压剥削者反抗这个任务，在1917年10月25日到（大约）1918年2月或者说到鲍加耶夫斯基投降这个时期中，已经大体上解决了。

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当然，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就已经提出并且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可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剥削者还采取公开的内战形式进行反抗，管理的任务不可能成为主要的中心的任务。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任务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

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做到大体上完成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能够做到直接着手管理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应该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这也是一项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前的总口号

条件极其苛刻和不稳固的和平，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其代表为克伦斯

基和支持他的孟什维克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遗留给我们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失业和饥荒，——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客观形势，必然使广大劳动群众十分疲惫，甚至精疲力竭。他们迫切要求(也不能不要求)一定的休息。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军事失败、投机活动和资产阶级妄图恢复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的行径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苏维埃政权目前只有排除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抗，实际解决这些维持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和最基本的任务，才能保障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看来好像是一种怪论，但事实上，在上述客观条件下，这却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由于当前形势的具体特点，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关于土地社会化、工人监督等等法令，实际解决这些最基本的任务同克服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的组织工作上的困难，已经成为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他们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时受到革命无产者的正当讥笑的口号，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一方面，劳动群众切实实现这些口号，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盗(以克伦斯基为首)弄得半死的国家的唯一条件；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法令来切实实现这些口号，又是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那些鄙夷地拒绝把这些如此“陈腐的”和“庸俗的”口号提到首要地位的人，正是不善于了解这个道理。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仅仅一年、摆脱克伦斯基之流还不到半年的小农国家里，当然还有不少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每一次长期的和反动的战争带来的野蛮残暴行为更加强了这种无政府主义)，还产生了不少悲观绝望和无端愤怒的情绪；如果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走狗(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挑拨政策，那么，非常明显，要使群众的情绪完全转变，要使群众转到正规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劳动，优秀的和最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需要作出多么长期而顽强的努力。只有贫苦群众(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实现了这种转变，才能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尤其是最顽固的和人数众多的农民资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

拿西欧革命的规模来比较，我们现在大约处于 1793 年和 1871 年达到的水平。我们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达到了这种水平，并且在一个方面无疑还超过了一些，这就是用法令确认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最高的国家类型——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因为我们仅仅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计算和监督。而不做到这一点，便谈不到实施社会主义的另

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虽然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也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规定当前任务就会不确切，不具体，其中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特点：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

这一点可以打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在反资本战争中的状况好比一支打胜仗的军队的状况，它已经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比如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地盘，它必须暂停进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弹药的储备，修理和加固交通线，建筑新的仓库，调集新的后备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打胜仗的军队暂停进攻，正是为了夺取敌人其余的地盘，即为了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目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正是要这样“暂停”向资本的进攻，谁不懂得这一点，那他就是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

当然，所谓“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只能是带引号的，只是个比喻。在通常的战争中，可以下一道暂停进攻的通令，可以实际停止前进。而在反资本的战争中，却不能停止前进，也谈不上我们不再继续剥夺资本。这里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在此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进行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我们就能解决这个任务，就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就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整个“战役”。

但是，我们承认必须弥补疏忽了的事情，是否等于承认某些事情做错了呢？丝毫不是。我们再拿军事作比喻吧。如果单用轻骑兵就能够击溃并且击退敌人，那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只能取得一定限度的胜利，那就完全可以想见，要超出这个限度，就有必要调来重炮兵。我们承认现在应该弥补以前没有调来重炮兵这件疏忽了的事情，这绝不是承认轻骑兵的胜利的进攻是一个错误。

资产阶级的走狗常常责骂我们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这种责骂是荒谬的，只能出于富人的走狗之口。因为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是当时的情况所绝对要求的：第一，当时资本是通过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萨文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鲍加耶夫斯基等人进行军事反抗（格格奇柯利直到目前还在进行这样的反抗）。粉碎军事反抗非用军事手段不可，赤卫队正是完成了使被剥削劳动者摆脱剥削者压迫的极其崇高伟大的历史事业。

第二，当时我们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来代替镇压的方法，还因为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当时我们还不可能支配各种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因为他们或者是在鲍加耶夫斯基之流的队伍中作战，或者是还能用怠工不断进行顽强的消极反抗。现在我们已经粉碎了怠工。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收到了成效，获得了胜利，因为我们既战胜了资本的军事反抗，又战胜了资本的怠工反抗。

这是不是说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形势之下

都是适当的，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同资本作斗争呢？这样想是幼稚无知。我们用轻骑兵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有重炮兵。我们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我们也能够用管理的方法获得胜利。形势改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善于改变。我们一分钟也不放弃采用“赤卫队”镇压萨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可是，我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竟在需要用赤卫队进攻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而且已经胜利地结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它绝不能再生长任何资产阶级这种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还把“赤卫队式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代，或者确切些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要彻底战胜资本，就应该善于使我们的斗争形式适合这个阶段的特殊情况。

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社会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具体些说，用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迈进。而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这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迅速地在全民范围内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当时由于战争和俄国的落后，这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在粉碎了怠工以后，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专家也完全服从我们。由于整个计算和监督工作搞得相当“晚”，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但还没有造成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大多数怠工者虽然“上班”了，但是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报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熟悉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仔细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背离，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名利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250]。

自然，资产阶级的走狗，尤其是像孟什维克、新生活派^[161]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帮下等奴仆，会因为我们承认后退了一步而耻笑我们。可是我们丝毫用不着去理睬这种耻笑。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不要掩盖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而要努力及时做完尚未完成的事情。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遭受过局部的失败，在某一方面和某一地方暂时后退过。而我们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役”，比最困难的战役还要困难百万倍，如果因为部分和局部的后退就垂头丧气，那是愚蠢而可耻的。

我们从实际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假设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需要 1000 名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第一流的学者和专家来指导国民劳动，以便尽快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假设应当付给这些“头等明星”——当然，其中大多数叫喊工人腐化叫得最凶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受资产阶级道德腐化最深的人——每年每人 25 000 卢布。假设这个总数(2 500 万卢布)增加一倍(假定对成绩特别优良而迅速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组织技术任务的人给以奖金)，或者甚至再加三倍(假定还要聘请几百个要价更高的外国专家)。试问，为了按照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苏维埃共和国每年花费 5000 万或 1 亿卢布，能不能说是花费过多或担负不起呢？当然不能。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能不损失数十亿卢布，而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能使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明星”人人自愿来参加我们的工作的程度。

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甲既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在急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冒险家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和各种委员当中那些无能的或者无耻的人，也是乐意充当“明星”——盗窃公产的“明星”的)，也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每一个有头脑的正直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的做法，都会认识到：要一下子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是办不到的；要使苏维埃共和国免除 5000 万或 1 亿卢布的“贡赋”(因我们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 000000000000 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赋)，就只有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资本主义遗产”、“拘守资本主义传统”的人，即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公产盗窃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产”)。如果觉悟的先进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苏维埃机关帮助之下，能够在一年内组织起来，有了纪律，振奋起精神，建立起强有力的劳动纪律，那么，一年以后我们便能免除这项“贡赋”，甚至在这之前，随着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的提高，就能缩减这种“贡赋”。我们工人农民通过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最好的劳动纪律和高级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快地免除向这些专家交纳的一切“贡赋”。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对于了解目前时局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任务是一个关键。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心正在转移到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上来。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在银行国有化、垄断对外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征收在无产阶级看来是适当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在实行劳动义务制方面，正确规定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当前任务。

在这些方面(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整个计算和监督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自然，这是最困难的任务中的一项任务，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形下，这项任务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可是，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恰恰是在这里同我们进行最严重的较量，他们破

坏正在建立的监督，例如破坏粮食垄断，夺取阵地进行投机活动和投机买卖。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要继续实行银行国有化，坚决地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簿记的枢纽机关，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做出下列的实际成果：增加人民银行分行的数量，吸收存款，简化储户存款取款的手续，消灭“排队”现象，逮捕和枪毙受贿者和骗子等等。先把最简单的事情切实做好，把目前的事情安排好，然后再准备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巩固并且整顿那些已经实行了国家垄断的事业（如粮食垄断、皮革垄断等等），借此准备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没有这种垄断，我们就不能用交纳“贡赋”的办法“摆脱”外国资本^[251]。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就全看我们能否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用向外国资本交纳一些贡赋的办法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独立。

一般的征税工作，特别是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工作，我们也非常落后。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这是一项在原则上完全可行并且得到无产阶级赞同的措施）表明，我们在这一方面仍然更接近于夺取的方法（为了穷人，从富人手里把俄国夺取回来的方法），而不是管理的方法。可是，我们要想更加强大，要想更稳固地站住脚，就必须转而采用这后一种方法，就必须用常规的、照章征收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的办法。这能给无产阶级国家更多的好处，但也要求我们有更高的组织程度，有更完善的计算和监督。^[252]

我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过迟再一次表明，当前迫切需要着手的正是组织准备工作，这项工作一方面是要彻底巩固已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准备一次“包围”资本并迫使它“投降”的战役所必需的。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但在实行时应当十分慎重，逐步进行，用实际经验检验每一步骤，而且，第一步当然是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对每个资产者（农村资产者也在内）建立劳动消费收支手册，将是进到完全“包围”敌人和建立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真正全民计算和监督的一个重大步骤。

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国家的一切极端仇视和不信任。克服这一点，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在计算和监督的问题上，即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立即面临的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遗产”的影响表现得特别尖锐。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认识（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亲身的苏维埃的经验）并且感受到：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重新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就不可避免。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习惯和传统，也是反对国家监督而主张“神圣的私有财产”和“神圣的”私有企业不可侵犯。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的论点

是多么正确，这些思潮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多么不可调和。努力把由苏维埃即国家实行监督和计算的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力求实现这种思想，力求破除把获得衣食看作“私”事，把买卖看作“只是与我有关”的这种旧时恶习，——这是一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自觉性反对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斗争。

我们已经把工人监督制定为法律，可是它刚刚开始深入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生活，甚至刚刚开始深入他们的意识。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没有表报，没有监督，就是扼杀社会主义的幼芽，就是盗窃公产（因为现在一切财产都属于公家，而公家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对计算和监督漫不经心就是直接帮助德国的和俄国的科尔尼洛夫之流，因为只有在我们解决不了计算和监督的任务的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推翻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全体农民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窥伺着”我们，待机而动，——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在鼓动工作中说得不够，先进的工人和农民也想得不够，说得不够。可是只要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只要先进工人还没有对破坏这种监督或对监督掉以轻心的人组织并开展胜利的和无情的斗争，就不能从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工人监督）进到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7小时或6小时以至更少。这就非搞好对粮食和粮食生产（然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的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不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一种便于过渡到对产品分配实行广泛的计算和监督的群众组织——消费合作社。在俄国，这种组织不像在先进国家里那样发达，可是还是拥有1000万以上的社员。前几天颁布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253]，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清楚地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目前形势和任务的特点。

这个法令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社以及仍然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合作社达成的一种协议。说它是协议或妥协，是因为第一，上述这些组织的代表不仅参加了法令的讨论，而且实际上还取得了表决权，法令中有一部分条文因受到这些组织的坚决反对而删掉了。第二，这种妥协实质上就是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免费入社的原则（这是唯一的彻底无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还放弃了一地全体居民加入一个合作社的原则。放弃这个同消灭阶级的任务相符合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原则，就给了“工人的阶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这种场合叫“阶级合作社”，只是因为它们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继续存在的权利。最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把资产阶级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完全排除出去的条文也大大放宽了，只禁止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的老板进入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如果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政权已经搞好了全国范围内的计算和监督，或者至少是搞好了这种监督的基础，那就不会有作这种妥协的必要。那时我们就能通过各地苏维埃的粮食部门，通过各地苏维埃下设的供给机关，使居民都参加统一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合作社，而用不着资产阶级合作社的协助，用不着对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让步，这种原则使得工人合作社仍然与资产阶级合作社同时并存，而不是使这个资产阶级合作社完全服从自己，把两种合作社合并起来，自己掌握全部管理权，自己监视富人的消费。

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这种协议时，具体确定了自己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策略任务和特殊的工作方法：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对他们作某些局部的让步，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向前进展的条件，这种进展比我们最初预计的要缓慢些，但是会更稳固，能更可靠地保证根据地和交通线，更好地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苏维埃现在能够（而且应该）用一种非常明显、简单、实际的尺度测量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成绩，这就是看合作社的发展有多少村社（公社或村庄、街区等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包括全体居民。

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我们苏维埃政权正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它已经战胜了剥削者——从克伦斯基到科尔尼洛夫，因而有可能立即开始解决这项任务，直接着手执行这项任务。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夺取国家中央政权可以只花几天工夫，在这个大国的各个角落镇压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总工反抗）可以只用几个星期，而要切实地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至少（尤其是在极其残酷和带来极大破坏的战争以后）需要几年的工夫。这个工作的长期性完全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

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需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条件非常优越，甚至在布列斯特和约^[217]以后也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矿石（乌拉尔一带）、燃料（西西伯利亚的煤、高加索和俄国东南部的石油以及中部地区的泥炭）、极丰富的森林、水力、化学工业原料（卡拉布加兹湾）等等。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条件就是：第一，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现在这一工作正在突飞猛进，那些被资产阶级陈腐观念所蒙蔽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了解，由于存在苏维埃组织，现在人民“下层”中的求知热情和首创精神是多么高涨。第二，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这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情况特别不好，要是相信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或为私利而替资产阶级效劳的人的说法，甚至是没有希望的。这些人不懂得，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一种革命是不被旧事物拥护者责骂为崩溃和无政府状态等等的。自然，刚刚摆脱空前残酷压迫的群众，他们的情绪是沸腾激昂的；要群众培植出劳动纪律的新基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没有完全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前，这种工作甚至还不可能开始。

我们绝不受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保住自己旧有的特权已经绝望）所散布的、往往是制造出来的那种悲观失望情绪的影响，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掩盖明显的坏事。恰恰相反，我们要揭发它，加强用苏维埃的方法同它斗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性不能战胜自发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克伦斯基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复辟的真正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便不能设想。

俄国无产阶级最觉悟的先锋队，已经给自己提出了加强劳动纪律的任务。例如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开始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法令草案^[254]。这项工作应该加以支持和全力推进。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255]，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以及使工资同产品的总额或铁路水路运输的经营总额等等相适应。

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在着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要求为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竞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采取强制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致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践中的软弱无力所玷污。

组织竞赛

说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意义，这是资产阶级谈到社会主义时喜欢散布的一种谬论。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通过消灭阶级因而也消灭对群众的奴役，第一次开辟了真正大规模竞赛的途径。正是苏维埃组织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上的民主转到劳动群众实际参加管理，才第一次广泛地组织竞赛。在政治方面实行竞赛比在经济方面容易得多，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重要的正是经济方面的竞赛。

就拿公开报道这样一种组织竞赛的方法来讲吧。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保证这点，实际上却使报刊受资本的支配，拿一些耸人听闻的政治上的琐事供“小百姓”消遣，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256]，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在为经济竞赛而利用公开报道方面，我们几乎还没有做什么事。必须系统地进行工作，除了无情地压制那些满篇谎言和无耻诽谤的资产阶级报刊，还要努力创办这样一种报刊：它不是拿一些政治上的耸人听闻的琐事供群众消遣和愚弄群众，而是把日常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共同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我们差不多还没有着手进行这种艰巨的然而能收效的工作——组织各公社间的竞赛，在生产粮食衣服等等的过程中实行表报制度和公开报道的方法，把枯燥的、死板的官僚主义的表报变成生动的实例（既有使人厌弃的例

子，也有令人向往的榜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合作社的榜样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小资产阶级幻想家，才会梦想用慈善机关示范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在资本主义社会，统计纯粹是“官府人员”或本行专家的事情；我们则应该把它带到群众中去，使它普及，让劳动群众自己能逐渐懂得和看到应该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样休息，休息多久，使各个公社经营的业务成绩的比较成为大家共同关心和研究的事情，使优秀的公社立即得到奖赏（如在一定时期内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提供许多文化或艺术方面的福利和奖品等等）。

一个新的阶级作为社会的领袖和指导者走上历史舞台时，从来没有不经过极大的“颠簸”、震撼、斗争和风暴时期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选择适合新的客观环境的新方法上，也从来没有不经过无把握的步骤、试验、动摇和犹豫时期的。趋于灭亡的封建贵族在报复战胜和排挤它的资产阶级时，不仅施展了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种种图谋暴动和复辟的活动，并且还不断讥笑那些没有王公贵族那种长期执政的素养而胆敢执掌国家“神圣大权”的“暴发户”、“无耻之徒”的低能、笨拙和错误，——现在，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所有这帮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或资产阶级怀疑论的英雄，对于“胆敢”夺取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也正是采用这种报复手段。

不用说，新的社会阶级，而且是以前一直受压迫、被贫困和愚昧无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阶级，要适应新的地位，认清环境，搞好自己的工作，选拔出自己的组织家，这不是几个星期的事情，而是长年累月的事情。显然，领导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过去不可能取得从事大规模的、包括千百万公民的组织事业的经验和技能；要把旧的、差不多完全从事鼓动工作的技能改造过来，是一件很长期的事情。可是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只要我们明确意识到必须转变，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坚定决心，有达到这个伟大而困难的目标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在“老百姓”即工人和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农民中，有大量有组织家才能的人；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被资本摧残、毁灭和抛弃，而我们呢，也还不善于去发现、鼓励、扶持、提拔他们。可是，如果我们能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没有这种革命热忱，便不会有胜利的革命——着手学习这项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学会。

历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强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会有肮脏的泡沫泛起，不免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大王和大喊大叫的人混杂在没有经验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瞎忙乱干、杂乱无章、空忙一阵的现象，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让资产阶级社会的哈巴狗^[257]——从别洛鲁索夫到马尔托夫，为采伐古老森林时多砍下一块碎木片而狂吠吧！既然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无产阶级大象狂吠。让他们去狂吠吧！我们走自己的路，力求尽量慎重而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

才干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只有这样的人，经过多次考验，让他们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然后才应提拔到领导国民劳动和领导管理工作的负责岗位上来。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

“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最近的（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建立“协调的组织”和加强纪律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现在大家都乐意“投票赞成”和“签署”这类决议，但是关于实现这些决议需要强制，而且正是专政形式的强制这一点，人们通常却不去仔细考虑。可是，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胡说。1917—1918年的俄国，也在这方面非常明显、具体、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只有绝顶愚钝或硬不承认真理的人，才会在这方面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如果把科尔尼洛夫看作俄国式资产阶级的卡芬雅克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经过了几次非常急剧的转变而非常迅速地发展的国家，在灾难性的战争造成惨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出路。一切中间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资产阶级不能讲真话，不能说他们需要科尔尼洛夫），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马尔托夫之流的愚蠢念头（他们一味宣扬所谓民主派的统一、民主派专政、民主联合战线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如果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进程都没有使一个人懂得不可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那么对这样的人也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另一方面，不难了解，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这些剥削者的财富，他们在组织能力上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剥夺掉的，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试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外部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内部战争即内战，而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会比外部战争造成的更大，内战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极不明确、极不稳定、极为混乱的状态。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只能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需要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群众革命热忱未能持久的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

就是无产阶级还不强大，而唯有它才能（如果它有足够的数量、觉悟和纪律）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简单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并且长期掌握政权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有害分子。

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已正确地开始实现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苏维埃组织在俄国一切民族地区的胜利进军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这个先进阶级发动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实行新的民主，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他们正根据亲身体认认识到，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

但是，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像铁，却很像浆糊。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部进行活动，采取萨文柯夫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办法，搞阴谋和暴动，以及通过他们污浊的“思想上的”反映，在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不断造谣诬蔑；另一方面，这种自发势力还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

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武力镇压转向管理工作，镇压和典型的典型表现也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在这一方面，革命群众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以后，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证明了革命的生命力，在解散资产阶级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颁布以前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即工农的法院。可是，我们革命的人民的法院还非常非常软弱。还可以感觉到，人民把法院看作一种同自己对立的衙门，这种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而留传下来的观点，还没有彻底打破。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法院正是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因为司法工作是国家管理的职能之一），法院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权力机关，法院是纪律教育的工具。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就决不能凭一时的热情，而只能靠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全民的组织和纪律来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所需要的粮食（燃料），把它们及时运到并且正确地进行分配。因此，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我们现在要最坚决反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表现在对饥荒和失业现象同组织和纪律方面的普遍自由散漫有着国民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一点认识不足，就表现在还牢固地保持着这样一种小私有者的观点：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在铁路这个可以说是最明显地体现着大资本主义造成的机构的经济联系的部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发势力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的这种斗争表现得特别突出。“蹲办公室的”人员中间产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贿者；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为纪律而斗争；而在前后两种人之间，自然有很多动摇

的、“软弱的”人，他们无力抗拒投机活动、贿赂和私利的“诱惑”，不惜破坏整个机构来换取私利，而战胜饥荒和失业是要靠这些机构正确地进行工作的。

在这个基础上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赋予领导者个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展开的斗争^[258]，是很说明问题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觉的（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代表，想把赋予个人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作是背离集体管理制原则，背离民主制和背离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在一些地方利用一些人的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反对关于独裁权的法令。问题变得确实意义重大：第一是原则问题，即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人的这种做法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究竟是否相容；第二，这件事情，也可说是这个先例，同政权在目前具体形势下的特殊任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研究。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这一点上，咒骂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应声虫总是耍弄手腕：一方面，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无政府主义的、野蛮的东西，极力避开我们用来证明苏维埃是民主制的高级形式，甚至是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开端的所有历史对比和理论论据；另一方面，他们却向我们要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民主制，并且说，个人独裁是同你们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

这种论断是十分拙劣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

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像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倒退，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巨大努力，这个过渡才会实现。害了《新生活报》^[76]、《前进报》^[259]、《人民事业报》^[82]或《我们时代报》^[260]那种庸人的歇斯底里症的人，是不肯考虑这一点的。

就拿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来看，把这种心理同他的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比较一下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实际上从来没有看到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真正作出过任何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大的牺牲或做过有利于他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把许诺过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给他，把和平给他，牺牲“大国地位”的利益和大国秘密条约的利益，牺牲资本和利润。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当他自己用强力取得了这种东西，并且必须用强力来保卫这种东西不受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杜托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侵犯的时候，他才看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一定时间内，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喘口气，伸伸腰和舒展一下躯体，取得一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剥削者没有给过他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当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普通的群众才能不仅亲眼看见，不仅信服，而且还会亲身感到：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会助长经济破坏，招致灭亡，导致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卷土重来。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上（因而还有心理上）相应的转变不过刚刚开始。我们的全部任务，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

资产者、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嘲笑“开群众大会”，更常常恶意地加以指摘，认为这只是混乱、胡闹和小私有者利己主义的发作。可是，不开群众大会，被压迫群众永远也不能由剥削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转到自觉自愿的纪律。开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投入新生活的行动，是他们在这样一个活动场所的初步行动，他们自己从这个场所清除了恶棍（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他们自己还希望学会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苏维埃的政权（不是别人的，不是贵族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整顿这个活动场所。正是要有劳动者战胜剥削者的十月胜利，正是要有由劳动者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指挥。

这个过渡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看到，劳动群众怎样在自己中间创造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为推翻剥削者而共同奋斗。1905年10月以及1917年2月和10月这样一些阶段，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唤醒和发动被剥削者推下去的社会“下层”，这些人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才得到了推翻剥削者、开始认识环境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的完全自由。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蹂躏得最厉害的、受教育最少的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到处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便是革命的第二个伟大阶段。

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日常劳动纪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汹涌澎湃，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学会。

这件事我们一定能学会。

昨天，我们曾遇到以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杜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耶夫斯基之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威胁，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种复辟，这种同样的复辟，又以另一种形式威胁着我们，它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必须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能战胜它。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从被剥削劳动群众中，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

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是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过渡。

当然，小资产阶级涣散组织的自发势力（在任何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自发势力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而在我国革命中，由于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落后以及反动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表现得特别厉害），也不能不对苏维埃产生影响。

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 8 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这种转变是新鲜事物，是一件难事，当然会产生许多可说是摸索的步骤，许多错误和动摇，——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任何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十分独特，因为他们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又在两者之间意味深长地加上一个词：“飞跃”（有些人想起从恩格斯著作中看到的片言只语，作了更加意味深长的补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认真加以钻研的大多数所谓社会主义者，都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是从全世界历史上的转变这个角度把那种突然转折称之为“飞跃”的，这种飞跃要延续 10 来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在这样的时期，在所谓“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19]，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之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是同他们如出一辙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都厌恶苏维埃，羡慕体面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如 60 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贵族立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261]一样。

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例如，国民教育委员会，作为苏维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讨论和监督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会议，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赞同和支持的。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是再愚蠢不过的。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3 页。——编者注

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结论

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和危险的；必须随机应变和退却；这是等待西欧极其缓慢地成熟起来的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现在必须用全力抓住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才能顺利解决当前的任务，直至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这下一个环节闪耀着特别的令人向往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

我们可以把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随机应变、退却、等待、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漫这些口号同通常流行的“革命家”这个概念放到一起试试看……有些“革命家”听到这些口号不禁义愤填膺，他们开始“痛斥”我们，说我们忘掉了十月革命的传统，说我们同资产阶级专家妥协，同资产阶级调和，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是改良主义，等等，等等，这有什么奇怪呢？

这些可怜的革命家的不幸就在于，连他们中间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动机并且绝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了解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不愉快的”状态，都缺乏经受住这个艰难过渡中的艰难时刻的坚毅精神。自然，对我们党持这种“正式”反对态度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集团和阶级的代表人物中，个人的例外当然是有的，而且总是会有的。可是，各类社会代表人物始终是存在的。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纯粹无产阶级人口占有巨大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显露出来，而且有时会极其尖锐地显露出来。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事变的每一转折关头都会犹豫和动摇，由 1917 年 3 月间的激烈的革命态度转到 5 月间的颂扬“联合”，转到 7 月间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或者为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主义”痛哭流涕），又转到 10 月底小心翼翼地回避布尔什维克，再转到 12 月间支持布尔什维克，最后，在 1918 年 3 月和 4 月间，这种人物又常常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说：“我可不是那种为‘机关’工作、实际主义和渐进精神唱赞歌的人。”

这种人物的社会来源就是小业主，他们被战争的惨祸、突然破产以及饥荒和破坏的空前折磨弄得暴怒发狂，他们疯狂地东奔西窜，寻求出路和解救办法，他们摇摆不定，时而信任和支持无产阶级，时而又爆发绝望情绪。应该清楚懂得和明确了解：靠这种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只有毫不动摇地走自己的路，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转变时刻也不灰心失望的阶级，才能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不需要狂热。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铁军的匀整的步伐。

载于 1918 年 4 月 28 日《真理报》第 83 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85 号附刊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

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262]

(1918年4月18日和25日之间)

科学院已经开始对俄国自然生产力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调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立即委托科学院成立一系列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尽快制定俄国的工业改造和经济发展计划。

这个计划应当包括：

使俄国工业布局合理，着眼点是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从原料加工转到半成品加工一直到制成成品等阶段时的劳动消耗。

从现代最大工业的角度，特别是从托拉斯的角度，把生产合理地合并和集中于少数最大的企业。

最大限度地保证现在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不包括乌克兰及德国人占领的地区）能够在一切最主要的原料和工业品方面自给自足。

特别注意工业和运输业的电气化以及电力在农业中的运用。利用次等燃料（泥炭、劣质煤），以燃料开采和运送方面最少的耗费取得电力。

注意水力和风力发动机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

载于1924年3月4日《真理报》第5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12—215页论

注意：应当尽力加快出版这些材料，并就此发一个通知给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印刷工人工会和劳动人民委员部。[263]

“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1918年5月5日)

“左派共产主义者”小集团^[219]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264]的出版(1918年4月20日第1期)和他们的“提纲”^[265]的发表,有力地证实了我在论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那本小册子里所谈到的内容。那种有时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辩护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出版物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证明了。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议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这些议论在当前是有代表性的;它们从反面非常清楚地指明了目前形势的“关键”;它们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不了解形势的人中比较好的人,他们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忠诚方面,都远远超过那些犯有同样错误的平庸之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

—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政治——或想起政治作用的——权威的资格,向我们提出了他们的“目前形势的提纲”。把自己的观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则连贯地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有助于揭露我们的“左派”的错误,因为他们一着手进行论证而不是唱高调,就暴露出他们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字里行间以各种暗示的方式拐弯抹角地提起缔结布列斯特和约^[217]是否正确这个老问题。“左派”不敢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滑稽可笑地东拉西扯,堆砌一个又一个论据,挖空心思编造各种理由,罗列种种“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信口开河,废话连篇,毫不理会他们是怎样地自相矛盾。“左派”对于在党代表大会上12票反对和约这个数字津津乐道,尽管赞成和约的有28票^[266],而对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内的好几百票中他们得到的票数还不到十分之一这个事实,却讳莫如深^[267]。他们制造一种“理论”,说赞成和约的是些“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而反对和约的“是经济上比较有生气和粮食比较有保证的南部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这种说法怎能不令人发笑?他们对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赞成和约的表决情况一声不响^[268],对过去反对和约的、俄国的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政治集团(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只字不提。用所谓“有科学根据”这种可笑的解释来掩盖自己的破产,来掩盖种种事实,那是一种十分幼稚的伎俩,只要综观一下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到,用小资产阶级革命空谈的口号来反对和约的,正是一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党内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和上层分子,而赞成和约的正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群众。

尽管“左派”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提出了上述种种声明和狡辩,但是简单而明显的真理毕竟是掩盖不住的。提纲的作者们不得不承认:“和约的缔结暂时削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国际勾结的意图”(“左派”的这种说法不

确切，不过在这里用不着来谈这些不确切的地方)。“和约的缔结，已经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搏斗更加剧烈了。”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反对缔结和约的人客观上成了帝国主义者手中的玩物，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因为在包括几国的、力量大到足以战胜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已经在—个国家中(尤其是在—个落后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使命，不是去同强大的帝国主义作战，而要竭力避免作战，要等待，让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搏斗进一步削弱他们自己，加速其他国家革命的到来。我们的“左派”在1月、2月和3月不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现在，他们还是害怕公开承认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却透过他们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诸如“—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269]等等，而清楚地显示出来。

“左派”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帝国主义体系必定开始崩溃，即令德帝国主义赢得当前战局的胜利，也只能使这个崩溃延缓—下，但那样就会崩溃得更惨。”

这种说法尽管看起来好像很有科学性，实际上是更加幼稚，更加不准确。只有小孩子才这样来“理解”科学：似乎科学能够断定在哪—年内，在春季和夏季或秋季和冬季里，“必定”“开始崩溃”。

想要弄清无法弄清的事情，那是可笑的徒劳之举。任何—个严肃的政治家决不会说—个“体系”的某种崩溃在什么时候“必定开始”(况且，事实上这个体系已经开始崩溃，问题是在各个国家在什么时候爆发)。但是，—个无可争辩的真理透过这种幼稚得可怜的说法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里爆发革命—事，在和约签订以后开始的“喘息时机”已经过了—个月的今天，比—个月或—个半月以前离我们更近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主张缔结和约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曾向那些崇尚浮夸的人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作战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帝国主义者作战，便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不要以此帮助帝国主义者。

但是，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无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多)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他们却看不见这个“关键”，只是“傲慢地”说—些空话，例如：

“……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这是政治形势方面的客观事实……”

这真是奇谈妙论！经过三年最痛苦最反动的战争以后，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正确的不尚空谈的策略，人民得到了—个很小很小的、很不巩固和很不充分的喘息时机。而“左派”知识分子却像自命不凡的纳尔苏修斯^[270]那样神气活现、煞有介事地说：“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我在党代表大会上说过，“左派”的报纸或杂志的刊名不应该叫《共产主义者》，而应该叫《小贵族》，我这种

说法难道不正确吗？

一个稍微懂得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的共产主义者，难道可以采取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充满小贵族情绪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说“和平心理”是“萎靡不振”，而挥舞纸剑倒是“奋发有为”吗？其实我们的“左派”正是在挥舞纸剑，他们回避人所共知的并且为乌克兰战争所再度证明了的事实：被三年残酷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人民，如果得不到喘息时机，就不能继续作战；如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战争，战争所造成的往往就是小私有者的涣散心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们的“左派”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二

但是，也许“左派”关于战争的空谈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热情，而且事关过去，因此并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吧？有些人这样为我们的“左派”辩护。但这是不对的。如果希望起政治领导作用，就要善于周密地考虑政治任务，而“左派”由于没有这种能力，就变成一些毫无定见的传播动摇情绪的人，这种动摇情绪在客观上只有一个意义：“左派”以自己的动摇帮助帝国主义者诱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去投入对自己显然不利的战斗，帮助帝国主义者把我们拖下陷阱。请听吧：

“……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一味地避免战斗，在国际资本的进攻面前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既用言论又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必须同国际社会主义（而不是同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有机联系……”

关于这里在国内政策方面所作的攻击，将另外再谈。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这种言词上的狂热（和实际行动中的畏怯）吧。目前每一个不愿意做帝国主义挑拨工具和不愿意落入陷阱的人，应该执行什么策略呢？每个政治家都应该明确地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目前应该退却，避免作战。我们的“左派”不敢作相反的回答，却放空炮说：“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

这是欺骗群众。如果想现在作战，就请直说吧。如果不愿意现在退却，就请直说吧。否则，就你们的客观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而你们的主观“心理”就是发了狂的小资产者的心理，这种小资产者尽管硬充好汉，夸口吹牛，但心里很清楚：无产者实行退却并力求有组织地退却是正确的；无产者考虑到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应该（在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甚至退到乌拉尔一带，这是正确的，因为在西欧的革命还在酝酿的时期，这是赢得时间的唯一希望，这个革命虽然不是“必定”（不像“左派”空谈的那样）在“春季或夏季”开始，但是它一月比一月更加临近，更加肯定。

“左派”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们不敢宣布现在退却是不必要的。他们拐弯抹角，闪烁其词，玩弄字眼，把目前避免作战的问题偷换成“一味”避免作战的问题。他们光是吹肥皂泡，说什么“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只能意味着：或者是诺兹德列夫习气^[271]，或者是发动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目的的进攻战，二者必居其一。公开说出这种荒唐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不用响亮的十足的空谈来作掩护，以逃避一切觉悟的无产者对他们的讥笑；他们以为，粗心的读者也许看不出“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性”的人，一定会给以惩罚，大概最轻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应该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地向群众讲明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主战派在德国会再一次占上风（就是说很快就会向我们发动进攻），德国和日本将根据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来共同瓜分我们，扼杀我们，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空喊家的意见，我们的策略就应该是：等待，拖延，避免作战，退却。如果我们丢开空喊家，并且“振奋起来”，建立真正铁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纪律，我们就很有希望赢得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就是退到了乌拉尔（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能使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更加有可能来援助我们。更加有可能“跑完”（用体育用语来讲）从开始爆发革命行动到实行革命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策略，也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切实加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支暂时处于孤立的队伍同其余队伍间的联系；而你们呢，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老实说，你们只是在一个响亮词句同另一个响亮词句间“加强有机联系”。这可是一种很不好的“有机联系”啊！

亲爱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因此你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加上引号，想必是要表示你们的讥讽，但实际上这个引号正表示出你们的头脑糊涂。你们惯于把“护国主义”看作卑鄙龌龊的东西，你们记住了、背熟了这一点，你们热心地反复背诵这一点，以致你们中间有些人竟然荒谬到以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只是在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你们没有很好考虑：“护国主义”为什么是并且在什么时候才是卑鄙的。

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合理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争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采取“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就是合理的和“神圣的”。

1917年10月25日以后我们是护国派。我曾十分明确地一再讲过这一点，你们也不敢反驳这一点。正是为了同国际社会主义“加强联系”，就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谁要是对于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的国防采取轻率的态度，他就是在破坏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当我们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时，我们不曾轻率地对待过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问题，我们从原则上否认了这种保卫。当我们已成为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时，我们就要求一切人严肃地对待国防。严肃地对待国防，这就是说要切实备战

并精确地估计力量的对比。如果力量显然不够，那么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就是向腹地退却（谁要是认为这只是临时拿来应急的公式，那么，他可以去读一读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老克劳塞维茨关于这一点的历史教训的总结^[272]）。可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丝毫也不像是懂得力量对比问题的意义。

过去，我们从原则上反对护国主义，所以我们当时有理由讥笑那些好像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想“保护”自己祖国的人。现在，我们已经获得做无产阶级护国派的权利，问题的整个提法就根本改变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慎重估计各种力量，仔细考虑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是否来得及援助我们。资本的利益，就是要在一切国家工人还没有联合起来（实际上联合起来，即开始革命）以前，把敌人（革命的无产阶级）各个击破。我们的利益，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利用甚至是最小的机会，使决战推迟到整个国际大军的各个革命部队实现这种联合的时候（或者实现了这种联合“之后”）。

三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不幸。读一读他们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中的下列词句，实在令人不禁失笑：

“……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总工……”

可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在一起，从而暴露了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从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昨天，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总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碎的，比我们来得及加以计算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

我们的历史功绩，就是昨天（明天也会如此）在实行没收方面，在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总工方面，我们是坚决的。如果今天把这一点写入“目前形势的提纲”，就是面向过去而不懂得转向未来。

“……彻底粉碎总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项任务！但是我们这里的总工已经完全“粉碎”了。我们所缺乏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进行计算，盘算一下应该把哪些总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样组织自己的力量去实施监督，譬如说，派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监督者去监督一百个到我们这里来上班的总工者，在这种情况下，侈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就是胡说八道。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

粉碎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只有疯狂反对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认为这样就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犯这种错误。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引的话使人不禁失笑，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发现就简直使人捧腹大笑了，他们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这可真要把人吓坏了！而且“左派共产主义者”又是多么卖力地在提纲中、在论文中，到处重复着这一骇人听闻的发现啊……

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左派共产主义者”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他们将在工人面前给“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评”。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因此，正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就因为他们看不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第三，他们拿出“国家资本主义”来吓人，这就暴露出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 (1) 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 (2) 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 (3) 私人资本主义；
- (4) 国家资本主义；
- (5) 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

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 125 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粹的空谈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228]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他们要——在 1918 年 4 月！！——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真是胡闹！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像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一味空谈所谓“劳动”农民而看不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真理，但是有谁会认真地对待这些沉溺于空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呢？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 1000 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 200 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 1000 中拿出 300 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 300，而不是 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 100 或 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 1000 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没有一点政治经济学头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永远不会懂得这些真理，但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理。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值得争论，只要指出他们是空谈家的“可憎的样板”就够了；而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应该争论，因为这里是马克思主义者犯了错误，而分析他们的错误，可以帮助工人阶级找到正确的道路。

四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28]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 1918 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 1918 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

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像纳尔苏修斯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76]和《前进报》^[259]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

任何中间级。”（第 27 页和第 28 页）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问题，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我们的威胁的论断，是一个极大的经济错误，它清楚地证明他们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五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显然，这个我们是指“左派共产主义者”>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表明：第一，布哈林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高出一筹，他完全不是不可救药地堕入空谈，恰恰相反，他在极力思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痛苦而艰难的过渡——的具体困难。

第二，这个意见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布哈林的错误。

确实如此。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总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 70 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

见本卷第 265、266 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252—253 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15 页。——编者注

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基本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总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273]所谓的“套中人”^[173]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忍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

这里也应该正视现实：我们还缺少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所必要的无情，而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决性。我们的坚决性是很足的，而是我们没有本领相当迅速地捉到人数相当多的破坏苏维埃措施的投机商、奸商、资本家。因为只有组织计算和监督，才能获得这种“本领”！第二，我们的法庭不够强硬，对于受贿者，不判处死刑，而只判处半年监禁。我们这两种缺点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它的软弱性。

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哪里，它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分掌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19]、无情地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

所以，尽管布哈林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因卡列林和格耶这类人为他“效劳”而马上“感到羞耻”这一点值得赞扬，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人来说，指出他们政治上的战友是些什么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例如，1918年4月25日的那一号《劳动旗帜报》^[167]——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自豪地宣称：“我党现时的立场与布尔什维主义中的另一派（布哈林、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是一致的。”又如，同一天的孟什维克的《前进报》刊登了有点儿名气的孟什维克伊苏夫的“提纲”^[274]：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一开始就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背道而驰，最近更日益公开地走上与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而带有明显的反工人的性质。在工业国有化的幌子下实行培植工业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复国家生产力的幌子下企图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计件工资和泰罗制，搞黑名单和黑籍证。这个政策会使无产阶级丧失经济方面的基本成果，而变成资产阶级任意剥削的牺牲品。”

说得太妙了，不是吗？

为了履行那些许诺俄国资本家兼并别国领土的秘密条约而同克伦斯基一起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克伦斯基的朋友们，打算在6月11日解除工人武装的策列铁里^[122]的同事们，用响亮的词句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李伯尔唐恩^[275]之流，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在指责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妥协”，“培植托拉斯”（即培植“国家资本主义”！），采用泰罗制。

说实在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授给伊苏夫一枚奖章、他的提纲作为资产阶级挑拨言论的一个标本应该拿到每一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去展览。现在，工人们已经认清了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和伊苏夫之流的真面目，已经处处根据实际经验认识了他们，而用心思索一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这些走

狗要挑拨工人们来反对采用泰罗制和“培植托拉斯”，这对于工人们是大有益处的。

觉悟的工人会把李伯尔唐恩先生们和策列铁里先生们的朋友伊苏夫的“提纲”，拿来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提纲作一番仔细的比较：

“在生产中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并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危险，它将不仅激起落后阶层，而且激起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者普遍仇视‘资本家总工者’的情况下，为了推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工人，这就会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毁掉。”（《共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8页第2栏）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它表明“左派”落入了圈套，受了伊苏夫之流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奸细的挑拨。这对于工人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工人们知道，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主张实行劳动纪律，正是小资产阶级拼命破坏这个纪律。像上述的“左派”提纲这样的言论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事实上完全背弃了共产主义，完全转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左派共产主义者”想用这样的话来“辩解”。这种辩解是没有用的，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是在设有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下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的，这些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监督领导人的每一步骤，学习他们的领导经验，不仅能够对他们的命令提出申诉，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来撤换他们。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履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要由它来修改和取消。第三，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作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作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者。而且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真正大型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因为工人们在跨出可能被“左的”词句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资本家对托拉斯的领导，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就是说，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

只有那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因而也是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不了解这一点。奥新斯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

集团中和在他们的杂志上的表现，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写道：

“……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将属于‘托拉斯的组织者’，因为我们不是想教导他们，不是想把他们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向他们学习。”（《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14页第2栏）

在这段话中所卖弄的讽刺，是针对我说的“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的。

在奥新斯基看来，这句话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组织者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如果这种言论是出于诗人所描写的“年方十五，不会超过？”

[276]……这种年龄的人的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不，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

如果不是抱着幼稚的目的要“教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社会主义，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他们的。对于他们，不是应该教导，而是应该剥夺（这一点在俄国做得相当“坚决”），他们的总工应该粉碎，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俄国优秀的工人是懂得这层道理的。他们已经开始向资本家组织者，向工程师领导者，向技术专家学习了。他们已经开始坚定而谨慎地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学起，然后再逐渐学习最难的东西。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这件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那是因为它比较困难。而纺织工人、烟草工人和制革工人，不像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害怕“国家资本主义”，害怕“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这些工人在“制革工业总管理局”、“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这一类中央领导机关内同资本家坐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办理托拉斯，办理“国家资本主义”^[277]。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俄国先进工人的这种工作是同他们实行劳动纪律方面的工作一起进行的，并且在继续进行，他们并不大吹大擂，到处宣扬（大吹大擂对某些“左派”却是必需的），而是非常谨慎，循序渐进，汲取实践中的教训。这项艰难的工作，这项实际学习建设大生产的工作，是我们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保证，是俄国的觉悟工人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反对小资产阶级无纪律现象的保证，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

六

在结束本文时，要作两点说明。

1918年4月4日我们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争论的时候（见《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4页注释），我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你们对铁路法令中哪些东西不满意，请拿出你们的修正案来。这是你们这些无产阶级苏维埃领导人的义务，否则你们的言论就只是空谈。

1918年4月20日《共产主义者》第1期出版了，其中没有一个字讲到“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要如何更改或修正铁路法令。“左派共产主义者”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提纲作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一声不响。他们只讲“组织性”等等。但是，这一点，就是害怕经济关系上的工人专政的小资产者也会承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在这种时候“忘记”这个旨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

的这种沉默就是对自己的谴责。他们只限于用一些暗示性的攻击来反对铁路法令（第 1 期第 8 页和第 16 页），而对于“既然铁路法令不正确，那么应该怎样修正呢？”这个问题，却没有作任何明确的回答。

这不用评注就清楚了。对于铁路法令（这个法令是我们的路线即强硬的路线、专政的路线、无产阶级纪律的路线的榜样）所作的这种“批评”，觉悟的工人会把它叫作“伊苏夫式的”批评，或者叫作空谈。

另一点说明。在《共产主义者》第 1 期里刊载了布哈林同志称赞我的《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的书评。尽管布哈林这样的人的评论对我来说很有价值，但是老实说，这个书评的性质暴露了一个可悲的和值得注意的事实：布哈林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家问题上可能有的共同看法。布哈林偏偏“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地方。

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构，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狂热的小资产者也会愿意这么干的。而从 1917 年 10 月到 1918 年 2 月，我们的革命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我的小册子里还讲到了连最革命的小资产者都不会愿意做的、觉悟的无产者愿意做而我们革命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关于这个任务，明天的任务，布哈林却保持沉默。

而我对此不保持沉默就更有理由，因为：第一，共产主义者应该更加注意的是明天的任务，而不是昨天的任务；第二，我这本小册子是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前写成的，那时，人们还不能以庸俗的小市民的想法来非难布尔什维克，说什么“是啊，在夺得政权以后，当然要高谈纪律了……”

“……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国家与革命》第 77—78 页。可见，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讲到了“起码规则”）

“……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那时“人们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同上，第 84 页，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讲到了“行为守则”）

“……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129]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同上，第 91 页）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同上）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同上，第 95 页）因此，不仅对“极

见本卷第 185 页。——编者注

同上，第 191 页。——编者注

同上，第 198 页。——编者注

同上，第 202 页。——编者注

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而且对那些“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同上，第96页），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同上），都必须做好这种监督。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1918年5月5日

载于1918年5月9、10、11日《真理报》第88、89、90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278]

(1918年5月25日和6月7日)

1 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

人民委员会完全同意和赞成社会主义科学院成立草案的基本精神，责成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根据下述原则修改这一草案：

- (1)——把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出版协会放在首位；
- (2)——特别要大量吸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人才；
- (3)——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
- (4)——立即采取措施，以查明、招聘和利用俄国的教师力量。

2 给委员会的指示

责成委员会：

(1) 详细审查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章程，以便呈报人民委员会，然后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

(2) 立刻就这个问题和组成人员问题同非俄罗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交换意见；

(3) 拟定、讨论适于并愿意担任创办人和教师的人选名单，以便呈报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279]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49—350页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80]

(1918年5月26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代表人民委员会向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表示祝贺。(鼓掌)

同志们，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担负着一项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成果愈扩大，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这个变革愈深入，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愈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作用就愈增大和提高。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将来只有国民经济委员会能够保持自己巩固的地位，我们愈接近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纯行政机构，即实际上只是做管理工作的机构的需要愈减少，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这种地位就愈巩固。在剥削者的反抗被彻底粉碎以后，在劳动者学会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以后，——这种原来意义的、狭义的管理机构，旧国家的机构，必定消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必定成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起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

同志们，所以在研究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以及与它有密切的工作联系的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没有丝毫的根据作出任何悲观的结论，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没有组织就绪。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区域和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这样巨大，这样无所不包，所以根本没有理由对我们大家看见的现象产生忧虑。有很多次——当然，在我们看来，也许次数过多——没有采用俗话说的“七次量衣一次裁”的办法。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组织经济，可惜并不像这个俗语所说的那样简单。

随着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的阶级，而且是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即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我们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不言而喻，在组织任务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当我们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方式来组织亿万人生活的最深基础的时候，十分明显，这里没有可能像俗语所说“七次量，一次裁”那样简单地处理事情。实际上，我们不能预先量很多次，然后再裁剪和缝制已经完全量好的衣料。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中考查这些或那些机关，在实践中观察它们，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经验，而主要是用工作结果的经验来检查它们，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本身中，而且是在剥削者进行殊死斗争和疯狂反抗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接近彻底拔掉资本主义剥削制的最后几个坏牙，这些剥削者也就愈加疯狂)，来建造我们的经济大厦。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根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虽然我们有时甚至在一个短时期内要几次改组国民经济各种部门进行管理的形式、规章和机构，——自然，这是资产阶级和高贵的感情受到侮辱的剥削者老爷们进行恶毒攻击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当然，由于有时三番五次地改变管理的规章、准则和法规，那些最接近和最直接参加这种工作的人，例如水运总局的人，自然有时觉得很愉快，对这样做不可能太满意。可是，如果稍微抛开因法令过于频繁改动而直接引起的不愉快，如果目光稍微放远些去看看俄国无产阶级暂时还只能依靠本身不足的力量去完

成的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么立刻就会明白：甚至作更多次的改动，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和整顿纪律的各种规定进行试验，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决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论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会想到，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先作出的指示立即构思出和一下子规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给我们准确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已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已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当我们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着手改造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论在地主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左右历史的成千上万上层分子的经验都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所以我们知道，作为苏维埃的主要的、根本的和基本的任务的组织工作，必然会要求我们进行许多试验，采取许多步骤，作出许多变动，使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在怎样使人人各得其所方面，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需要我们自己来定出每一个步骤，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错误愈是严重，我们就愈是坚信：随着工会会员人数每增加一次，随着一直遵照传统和习惯生活的被剥削劳动者从他们的营垒转到苏维埃组织建设者营垒的人数每增加几千人，几十万人，能够适应工作需要并能使工作步入正轨的人数也会增加。

拿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经常遇到的一项次要任务——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这项任务来谈。我们大家都知道，至少那些站在科学和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任务只有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劳动的物质技术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学上有造诣的专家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不实现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些社会主义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多读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我们必须依靠敌视这一点的分子来实现它，因为资本愈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工人所受的迫害也愈厉害。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

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不能不看到完成任务会遇到的这些困难以及获得的成绩。在一切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我不记得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见中曾经谈到，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在它着手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时，会遇到哪些具体实际的困难。这用一般的公式，用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容易的，可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并不会马上死亡，而且它愈是接近死亡，就愈是疯狂地进行反抗），这个任务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在这方面进行试验，屡次修改局部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在国民经济的哪一个部门中，马上把专家由资本主义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顾问。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我们并没有闭眼不看这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谁只指出明显的力量不相称的情况，而掉头不顾在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他就像思想僵化的套中人^[173]，他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忘记了没有一次稍微重大的历史变革不出现许多力量不相称的情况。力量是在斗争过程中随着革命的增长而增长的。当国家已经走上了进行最伟大的改造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国家和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功绩，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实践上直接着手实现那些以前在理论上抽象地提出的任务。这个经验是不会被忘掉的。无论如何，不管俄国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会有多么痛苦的曲折，终究不能夺去现在已经联合在工会和地方组织内、正在实践上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安排全部生产的工人们的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已经作为社会主义的成就载入史册，未来的国际革命将根据这个经验来建造自己的社会主义大厦。

我还要指出一个也许是最困难的、要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予以切实解决的任务。这就是关于劳动纪律的任务。老实说，在我们指出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而且应该满意地着重指出：正是工会，工会的最大组织——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这些联合了几百万劳动者的最高工会组织，首先独立地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要了解这个任务，就应该撇开那些个别的小挫折，撇开那些难以相信的困难，这些挫折和困难，孤立地来看，好像是不可克服的。应该站得更高，看到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更替。只有持这种观点才能够看清楚：我们担负起多么巨大的任务，现在社会最先进的代表——被剥削劳动群众把1861年以前农奴制俄国的少数地主解决的一个任务（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主动担当起来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以前，建立全国的联系和纪律是少数地主的事情。

我们知道农奴主-地主们是怎样建立这种纪律的。这就是使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侮辱和空前的苦役的折磨。请回忆一下由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经济的全部过渡过程吧。你们已经看见的（虽然你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能够看见），以及你们从老一辈人那里听到的，1861年以后向新的资产阶级经济的这种过

渡，是由旧的农奴制的棍棒纪律，由最无理性、最蛮横粗暴的侮辱和强制人的纪律，向资产阶级纪律，向饥饿纪律即所谓自由雇佣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奴役制的纪律过渡，这个过渡在历史上看来是容易的，因为这是人类由一种剥削者转到另一种剥削者，因为这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同样是掠夺和剥削人民劳动的少数人，因为这是地主让位给资本家，是在镇压被剥削劳动者阶级广大群众的情况下少数人让位给另外的少数人。但是，就是这种由一种剥削者的纪律代替另一种剥削者的纪律的更替，尚且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地主-农奴主们诚心诚意地认为一切都会毁灭，没有农奴制是无法经营的，而新主人——资本家每走一步都碰到实际的困难，对于自己的经济往往束手无策。可以表明这个过渡的困难情况的一个物质上的标志，一个物证，就是当时俄国从国外订购了一些机器，为的是用机器做工，用最优良的机器做工，而结果是既没有会使用机器的人，也没有管理者。当时，俄国各地都出现优良的机器被搁置不用的情况，可以看出，从旧的农奴制的纪律转到新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纪律是多么困难。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这样观察问题，你们就不会让那些人，让那些阶级，让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走卒把你们弄得思想混乱，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散布惊慌失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制造对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气氛，把全部工作描绘成毫无希望的事情，他们指出每一个别的无纪律和腐化的情况，并因此而鄙弃革命，似乎世界上，历史上有过任何一次真正的大革命，在群众制定新纪律的时候，不曾有过腐化现象、违反纪律现象和不经痛苦尝试的步骤。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第一次接近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即真正由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制定新的纪律，劳动的纪律，同志关系的纪律，苏维埃的纪律。我们并不要求也不指望在这方面迅速获得成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现在，我们正在一个还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内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全体劳动农民正在尽力帮助破坏这种纪律；现在，在群众中正在自愿地、主动地提高这样一种认识：他们不应该等待上面的命令，而应该根据自己生活的经验，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新纪律，用拥有千千万万人口的整个俄国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纪律，去代替那种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上的纪律。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也是一项能收效的任务，因为我们只有切实解决了这个任务，才算是最终埋葬了我们要加以埋葬的资本主义社会。（鼓掌）

载于 1918 年《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书。速记记录》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353—360 页

预 言

(1918年6月29日)

谢天谢地，现在大家都不相信神奇的事情了。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如今在我们周围时常可以看到一种可耻的灰心丧气甚至绝望的情绪，在这种时候提一提下面一段已经得到证实的科学预言是有好处的。

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为西吉斯蒙德·波克罕所著《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一书(这本书就是1888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24册)写的引言中，曾论及未来的世界战争。

请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30多年前是怎样谈论未来的世界战争的：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哭泣的(uns kann es recht sein)。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么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doch)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于伦敦”

多么天才的预言！在这个明确的、简要的、科学的阶级分析中，每一句话的含义是多么丰富！那些现在陷于可耻的信念动摇、灰心丧气和绝望状态的人，如果……如果那些惯于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或让资产阶级吓倒的人还能思考，还有一点思考能力，那么，他们应该从这里吸取多少教益啊！

恩格斯所预料的事情有些发生得不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在帝国主义飞速发展的三十年间，世界和资本主义当然不能不发生变化。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后来很多事情竟同恩格斯所预料的“一字不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而阶级以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仍然

同以前一样。

“……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实际情形正是这样发展的，并且比这更甚，更坏。有一部分“被抛到后面去了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及其毫无气节的“半反对者”即考茨基主义者，竟赞美他们自己的这种倒退，成了直接背叛和出卖社会主义的人。

“……战争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工人阶级的许多“合法”阵地都被夺去了。但是它在种种考验中受到了锻炼，获得了残酷的然而有益的教训，即建立不合法组织，进行不合法斗争，准备本身的力量去作革命冲击。

“……王冠成打地滚……”有几顶王冠已经滚下来了，其中有一顶王冠抵得上整整一打别的王冠，那就是全俄专制君主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王冠。

“……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在四年战争以后，这种绝对无法预料可以说是更加绝对了。

“……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在战争第四年末的时候，这种情形已经在被资本家拖入战争的最大、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俄国完全表现出来了。而德奥两国饥荒的日益严重，衣服和原料的缺乏，生产资料的损耗，难道不证明这种情形也正迅速地临到其他国家头上吗？

恩格斯描写的仅仅是“外部”战争所引起的后果；他没有说到内部战争即内战，但是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不经过内战的大革命，也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不经过内战。如果说，外部战争还可以持续一个相当时期而不致于使资本主义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那么内战要不引起这种后果就显然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

那些继续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我们的新生活派^[161]、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6]等等一类的人，恶意地指出这种“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的表现，把一切都归罪于革命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空想”。这些人显得多么愚蠢，多么没有气节，也许可以说他们是为了私利而为资产阶级效劳。“混乱状态”——用一个绝妙的俄语说法就是经济破坏——是由战争引起的。惨重的战争不引起经济破坏是不可能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必然伴随现象的内战，不引起经济破坏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破坏而离开革命，离开社会主义，那不过是表示自己没有原则和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罢了。

“……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

恩格斯作的这个不容争辩的结论是多么简单而清楚，这对任何一个多少能够考虑一下多年惨重而残酷的战争带来的客观后果的人，都是很明白的。而那许许多多不愿意或不善于思索这个极简单的论断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可怜的“社会主义者”，显得多么惊人的愚蠢。

能够想象军队和人民群众经过多年战争而不野蛮化吗？当然不能。多年战争产生的这种后果，在若干年内，甚至在整整一代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们的那些“套中人”^[173]，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意志薄弱的庸人，都附和资产阶级，把野蛮化现象或为制止特别严重的野蛮化现象而不得不采取的严厉手段归罪于革命，其实

非常清楚，这种野蛮化完全是由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任何一个革命，不进行长期斗争，不采取许多严厉的高压手段，便不能摆脱战争的这些后果。

《新生活报》^[76]、《前进报》^[259]或《人民事业报》^[82]的我们那些讲漂亮话的笔杆子，不反对“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只是这个革命是要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不是经过四年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在鲜血横流的土地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不是在被这次大厮杀弄得备受折磨、痛苦不堪和野蛮化的千百万人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他们听说过并且“在理论上”也承认应该把革命比作分娩，但是一遇到实际，他们就可耻地畏缩起来，这些卑鄙的家伙不再啜泣，而是重新弹起了资产阶级恶意攻击无产阶级起义的老调。就拿那些描写分娩情形的作品来看吧，拿那些想把分娩的一切艰难、痛苦和可怕的情景真实描绘出来的作品，如埃米尔·左拉的《人生乐趣》（《La joie de vivre》）或韦列萨耶夫的《医生笔记》来看吧。人的诞生使妇女备受折磨，痛苦不堪，疼痛昏迷，血流如注，半死不活。但是，如果哪个“个人”认为爱情、爱情的结果和妇女做母亲的意义不过如此，有谁会承认这样的“个人”是人呢？有谁会由于这一点而发誓拒绝爱情和生育呢？

分娩有顺产，也有难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谈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会有长久的阵痛。恩格斯分析世界战争的种种后果时，简单而清楚地描写了一个不容争辩的明显事实：紧跟着战争而产生的、同战争相连的革命（尤其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在战争时期爆发并且不得不在周围进行着世界战争的时期发展和坚持下去的革命）是特别困难的一种分娩。

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特别慎重地说到在世界战争中灭亡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只有一个结果（世界战争的）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造成条件。”

这种思想在我们所分析的这篇引言的末尾说得更加清楚：

“……在悲剧结束时你们<资本家和地主，国王和资产阶级国家要人>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难产使致命病症和致命结局的危险成倍增加。但是，个别的人会死于难产，从旧制度中诞生出来的新社会却不会死亡，只不过是诞生得更加痛苦，时间拖得更长，生长和发展得更慢罢了。

战争的结局还没有到来，而普遍的衰竭却已到来了。至于恩格斯预言中所假定的战争的两种直接结果（或者是工人阶级已经争得胜利，或者是克服一切困难造成胜利不可避免的条件），这两种条件，在目前 1918 年年中都已具备了。

在一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争得了胜利。在其余的国家，由于闻所未闻的痛苦空前加剧，使这种胜利成为“终于不可避免”的条件正在形成。

让那些“社会主义的”意志薄弱的庸人去说丧气话吧，让资产阶级去痛心疾首和暴跳如雷吧。只有闭着眼睛不看和堵上耳朵不听的人，才觉察不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已经开始分娩的阵痛。被事变进程暂时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前列的我国，现在正经受着开始分娩的特别厉害的痛苦。我们有一切根据来极其坚定地 and 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这个未来正在为我们准备新的同盟者，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更先进的国家里

的新的胜利。我们可以自豪并且深以为幸的，就是我们最先在地球的一角打倒了资本主义这只野兽，它使地球沾满了血污，它把人类引到了饥荒和野蛮化的地步，现在不论它怎样凶狠残暴地作垂死的挣扎，它都必然会很快地遭到灭亡。

1918年6月29日

载于1918年7月2日《真理报》第133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41—447页

给美国工人的信^[281]

(1918年8月20日)

同志们：有一个参加过1905年革命、后来在你们国家住过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向我建议，我的这封信由他带给你们。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美国革命无产者正是在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新最强的、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全世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的帝国主义。正是在目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主们，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因为他们赞同英日野兽们为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发动的武装进攻，不管这种赞同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公开的还是伪善地掩盖起来的，都是一样。

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从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这种战争，同那些因帝王、地主、资本家瓜分已夺得的土地或已攫取的利润而引起的掠夺战争（像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较起来，是不多见的。这是美国人民反对英国强盗的战争，这些英国强盗当时压迫美国，使它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就像这些“文明的”吸血鬼现在压迫印度、埃及和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民，使他们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一样。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去了150年。资产阶级的文明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美国就人的联合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就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来说，都在自由文明的国家中间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小撮亿万富翁肆意挥霍，穷奢极欲，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却永远濒于赤贫境地。曾经给世界树立过以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奴隶制榜样的美国人民，竟沦为一个小撮亿万富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充当雇佣刽子手的角色，为了满足富有的恶棍们的愿望，1898年在“解放”菲律宾的借口下扼杀了菲律宾^[282]，1918年又在“保卫”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受德国侵略的借口下来扼杀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四年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并没有白白过去。英德这两个强盗集团的恶棍们对人民的欺骗，已被不可争辩的明显事实彻底揭穿了。四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运用在强盗分赃战争上就是：谁最富最强，他聚敛的财富就最多，掠夺的就最多；谁最弱，他遭到的掠夺、蹂躏、压榨和扼杀就最厉害。

英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拥有的“殖民地奴隶”的数量来说是最强的。英国资本家不但没有丧失“自己的”（也就是他们在数百年间掠夺来的）一寸土地，反而夺取了德国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夺取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扼杀了希腊，并已开始掠夺俄罗斯了。

德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的”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说是最强的，但就拥有殖民地来说是较弱的。他们失掉了所有的殖民地，却抢劫了半个欧洲，扼杀了大批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从交战双方来看，这是多么伟大的“解放”战争！两个集团的强盗们，英法资本家和德国资本家们，同他们的走狗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投靠“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一起，多么出色地“保卫了祖国”！

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处在最安全的地理位置上。他们

聚敛的财富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进贡者。他们掠夺了数千亿美元。每一块美元都有英国和它的“盟国”、德国和它的附庸国缔结的各种肮脏的秘密条约的污迹，为了分赃、为了在压迫工人和迫害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方面互相“帮助”而缔结的各种条约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图的”军事订货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 1000 万死者和 2000 万残废者的血迹，他们在这场为了确定英国和德国强盗谁争得更多赃物、英国和德国刽子手谁在摧残世界弱小民族方面占首位而展开的伟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圣的斗争中血流成河。

如果说德国强盗在军事屠杀的残暴性方面打破了纪录，那么英国强盗不仅在夺得的殖民地的数量方面，而且在玩弄令人厌恶的虚伪手法的高超方面，也打破了纪录。正是现在，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用几百万份报纸来散布诽谤俄国的言论，同时却虚伪地把自己对俄国的掠夺性进攻说成是要“保卫”俄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

要驳倒这种卑鄙龌龊的谎话，用不着多费唇舌，只要指出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就够了。1917 年 10 月，俄国工人刚把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推翻，苏维埃政权，革命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就公开向所有交战国建议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公正的和约，充分保证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的和约。

正是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正是他们甚至拒绝同我们商谈普遍和约！正是他们背叛了各国人民的利益，正是他们延长了帝国主义大厮杀！

正是他们一心指望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而拒绝了和平谈判，从而使得同样是掠夺成性的德国资本家能够为所欲为，把兼并性、强制性的布列斯特和约^[217]强加给俄国！

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把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归“罪”于我们的这种虚伪手法更可恶的了。恰好是当时能够把布列斯特谈判变为各国都参加的缔结普遍和约的谈判的那些国家的资本家们，现在竟来“责难”我们！靠掠夺殖民地、靠各民族间的大厮杀发了财的残暴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布列斯特谈判之后又把战争延长了将近一年之久，却“责难”我们这些曾向所有国家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布尔什维克，“责难”我们这些撕毁了以前沙皇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罪恶秘密条约并把它们公布出来使它们当众出丑的布尔什维克。

全世界的工人，不论他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都欢迎我们，同情我们，向我们鼓掌欢呼，因为我们斩断了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帝国主义肮脏条约、帝国主义压迫的锁链，因为我们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而争得了自由，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虽然遭受过帝国主义者的摧残和掠夺，但仍然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

毫不奇怪，国际帝国主义匪帮因此憎恨我们，“责难”我们，帝国主义者的一切仆从，包括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6]和孟什维克在内，也“责难”我们。这些帝国主义走狗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正如同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的同情一样，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为了把政权转到工人手中，为了开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而且应当不惜任何牺牲，包括牺牲一部分国土，包括在帝国主义面前遭受严重失败，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谁不用行动证

明他有决心为了真正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使“他的”祖国承担最大的牺牲，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英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就是说，为了夺取世界霸权，不惜彻底毁灭和扼杀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到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一大批国家。那么，社会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使全世界劳动人民摆脱资本压迫，为了争取普遍的持久的和平，难道因为找不到一条没有牺牲的道路就应当观望等待吗？难道因为不能“担保”轻易获得胜利就应当害怕开始战斗吗？难道应当把“自己的”、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祖国”的安全和完整置于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之上吗？应当百倍地鄙视抱有这种想法的国际社会主义的败类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奴才。

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们“责难”我们同德帝国主义达成了“协议”。十足的伪君子！一群恶棍！他们看见“他们”本国工人对我们表示同情而吓得发抖，竟诽谤起工人政府来了！但是他们的伪善面孔一定会被揭穿。他们假装不懂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本国和外国的）达成协议来反对工人，反对劳动者；另一种是为了保卫战胜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工人，为了无产阶级能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对立，而同具有一种色彩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来反对具有另一种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

实际上，每一个欧洲人都很清楚这种差别，而美国人民，正像我就要指出的，在他们本国的历史中特别具体地“感受到了”这种差别。协议和协议不同，正如法国人所常说的：fagots et fagots。

当德帝国主义强盗在 1918 年 2 月派兵进攻没有武装的、把军队复员了的、在国际革命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信赖无产阶级国际声援的俄国时，我毫不犹豫地和法国君主派达成了一种“协议”。一位口头上同情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忠心为法帝国主义效劳的法国上尉沙杜尔，领了一个叫让·吕贝尔萨克的法国军官来见我。让·吕贝尔萨克向我声明：“我是一个君主派分子，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德国失败。”我答道，这是很自然的（cela va sans dire）。这丝毫不妨碍我和让·吕贝尔萨克达成“协议”，利用愿意帮助我们的、精通爆破技术的法国军官去破坏铁路线，以阻止德国人的进犯。这是每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赞同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协议”的范例。我和法国君主派分子握手时，明明知道我们当中每一方都很想把自己的“伙伴”绞死。但是，我们的利益暂时是一致的。为了对付向我们进攻的德国掠夺者，为了维护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我们利用了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是掠夺性质的相反利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俄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加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削弱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我们采用了在一切战争中都必须采用的最合理的手段——随机应变，迂回，退却，以便等待一些先进国家中迅速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成熟起来。

不管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怎样凶恶地号叫，不管他们怎样诽谤我们，不管他们怎样花费千百万金钱收买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和其他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报纸，如果英法军队对俄国的进攻需要我和德帝国主义强盗缔结这样的“协议”，我将毫不迟疑地这样做。我很清楚，我的策略将得到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一句话，整个文明世界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赞同。这样的策略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加速社会主义

革命的到来，削弱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正在战胜国际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阵地。

而美国人民早就运用过这一策略，并给革命带来了好处。当美国人民进行反对英国压迫者的伟大解放战争的时候，压迫美国人民的还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现在的北美合众国的一部分领土当时就属于他们。美国人民在争取解放的艰苦战争中，为了削弱压迫者，为了加强从事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的人们力量，为了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也曾和一些压迫者缔结“协议”去反对另一些压迫者。美国人民利用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纠纷，有时甚至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这些压迫者的军队并肩作战，反对英国压迫者。美国人民先战胜了英国人，然后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一部分是赎回的）。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283]。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各国无产者必须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事先必须保证不会遭到失败，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常常会在实际上滚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像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虽然比较少见）那样。

这些老爷喜欢跟着资产阶级责难我们，说我们制造革命“混乱”，“破坏”工业，造成失业和饥荒。这些人明明欢迎和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或同继续进行这一战争的克伦斯基达成过“协议”，却发出这种责难，多么假仁假义！这一切灾难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罪孽。战争所引起的革命，不能不经受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那都是各民族间进行了多年的毁灭性的反动的大厮杀遗留下来的。责难我们“破坏”工业或制造“恐怖”，这是假仁假义，要不就是极其迂腐，不能理解被称为革命的那种尖锐到极点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

实质上，这一类“责难者”即使“承认”阶级斗争，也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往往陷入要各个阶级“协议”与“合作”的小市民空想。因为在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在一切国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没有极严重的破坏，没有恐怖，没有为了战争利益而对形式上的民主的限制，国内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甜言蜜语的牧师，不管是基督教牧师，还是沙龙的议会的社会党人这样的“世俗”牧师，才会看不见、不理解和感觉不到这种必然性。只有僵死的“套中人”^[173]才会因此避开革命，而不在历史要求用斗争和战争来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时以最大的热情和决心投入战斗。

美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美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继承了这种传统，不止一次地表示完全同情我们布尔什维克。这种传统就是18世纪的反英解放战争以及后来19世纪的国内战争。1870年，美国在某些方面，如果只拿某些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来说，是落后于1860年的。但如果有人根据这点而否定美国1863—1865年国内战争的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那该是多么迂腐、多么愚蠢呵！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懂得，为了推翻黑奴制度，为了推翻奴隶主的政权，就是使全国经历多年国内战争，遭受任何战争都避免不了的极严重的破坏和

恐怖，也是值得的。可是现在要来解决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无比伟大的任务时，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辩护人以及被资产阶级吓倒的、躲避革命的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却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国内战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

美国工人是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他们将同我们一起，拥护反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世界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使我坚信这一点。我还记得美国无产阶级最爱戴的领袖之一尤金·德布兹的话，他在给《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284]——似乎是在1915年底——写的一篇文章《我将为什么而战》(《What shall I fight for》)里(1916年初，在瑞士伯尔尼一次公开的工人大会上，我曾引用过这篇文章)说道：

他，德布兹，宁愿被枪毙，也不会投票赞成给现在这场罪恶的反动的战争拨款；他德布兹只知道一种神圣的、从无产者观点看来是合理的战争，那就是反对资本家的战争，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战争。

威尔逊这个美国亿万富翁的头子、大资本家的奴仆把德布兹逮捕入狱，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让资产阶级去残酷地迫害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吧！他们愈是残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日子就来得愈快。

有人责难我们，说我们的革命造成了破坏……这些责难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正是资产阶级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中几乎毁灭了欧洲的全部文化，使欧洲陷入野蛮、粗野和饥饿的境地。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又要求我们不要在这些破坏的基础上、在文化的废墟中间、在战争造成的废墟中间进行革命，不要同那些被战争弄得粗野的人一起进行革命。这个资产阶级多么人道、多么公正啊！

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285]。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而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

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战争中，即在确定由英国强盗还是由德国强盗来称霸世界的战争中杀死了1000万人，使2000万人成了残废。

如果我们的战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战争，要在世界各国一共牺牲50万人或100万人，资产阶级就会说：前一种牺牲是合理的，后一种牺牲是罪恶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现在无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充分地具体地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它是一切革命给我们的教诲，是工人最好的导师、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给工人留下的遗言。这个真理就是：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在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以后，我们的职责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惋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强硬，不够坚决。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47页。——编者注

我们知道，在一切国家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疯狂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愈发展，反抗就愈厉害。无产阶级一定能摧毁这种反抗，在打垮资产阶级反抗的过程中完全成熟起来，最后取得胜利，取得政权。

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尸体，正如我有一次说过的，又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每犯一百个错误就有一万个伟大的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起眼的，是淹没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每一个成就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假定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不符合事实），假定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少数人，不是仅仅由富人、仅仅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由真正的群众、由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的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项工作中，在这项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真心实意地进行的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骗和愚弄劳动者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学会不要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我们的农民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在1917年10月25日（俄历）的一夜之间就一举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并且现在逐月地克服着莫大的困难，自己纠正自己的失误，切实地解决极困难的任務：创造新的经济生活条件，同富农作斗争，保证土地掌握在劳动者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富人手里），向共产主义的大农业过渡。

我们的工人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大工厂收归国有，现正通过日常的艰苦的劳动学习管理整个工业部门的新业务，克服因循守旧、小资产阶级性和利己主义这些巨大的阻力，使国有化企业走上正轨，用一块块基石为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工会对其会员的新的权力奠定基础。

我们的苏维埃，远在1905年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人民群众现在第一次为亿万人解决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

者专政的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让学问们或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或议会制偏见的人们在谈到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时候去摇头耸肩表示不解吧。这些人在 1914—1918 年的大转变时期既没有忘掉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的民主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最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相结合，——这样的结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也是保守的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形式容纳不了的。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以苏维埃共和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毫不奇怪，这个世界不会一生长下来就完美无缺，不会像密纳发那样一下子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286]。

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大书特书形式上的平等和集会权利，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的宪法^[287]则抛弃形式上平等的虚伪词句。当资产阶级共和派推翻帝制时，他们并不关心君主派同共和派的形式上的平等。现在要来推翻资产阶级了，只有叛徒或白痴才会极力为资产阶级争取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如果所有好的建筑物都让资产阶级占去了，“集会自由”对工人和农民来说就一文不值。我们的苏维埃把城市和乡村中好的建筑物从富人手里全部夺了过来，并把所有这些建筑物交给了工人和农民，供他们集会结社之用。这就是我们的集会自由——劳动者享受的集会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意义和内容！

正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深信，不管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会遭到什么灾祸，它是不可战胜的。

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疯狂的帝国主义的每一次打击，国际资产阶级使我们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会激励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斗争，使他们从惨重的牺牲中受到教育，使他们受到锻炼，激发起新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

我们知道，美国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帮助也许还不会很快到来，因为革命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速度（也不能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它近来成熟得多么快，在最近几个星期内还不可能爆发。我们指望国际革命必然发生，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像傻瓜一样指望它在某个短时期内必然发生。我们国家有过两次大革命（1905 年和 1917 年），所以知道革命是不能按定单或协议制造的。我们知道，形势把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队伍推到前面，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功劳，而是由于俄国特别落后；我们知道，在国际革命爆发之前，一些国家的革命遭到失败还是可能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认为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人类不会毁于帝国主义大厮杀，而一定会战胜它。第一个打碎帝国主义战争的沉重锁链的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在打碎这条锁链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但是我们把它打碎了。我们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旗帜。

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像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但这些队伍是存在的，他们比我们人数众多，他们正随着帝国主义继续肆虐而日益成熟起来，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工人们正在同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谢德曼、伦纳之流的社会主义叛徒决裂。工人们正在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毁灭的文化和正在毁灭的人类。

总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

尼·列宁

1918年8月20日

载于1918年8月22日《真理报》第178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63页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

有些简单明了、众所周知、群众已经相当清楚的事情，如资产阶级走狗孟什维克卑鄙地背叛、英国和日本为了恢复资本的神圣权利而发动入侵、美国亿万富翁对德国咬牙切齿等等，为什么不用20—10行，而要用200—400行来报道呢？这些事情要报道，这方面的每一个新事实要指出，但不必长篇大论，不要老调重弹；而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定论的旧政治的新表现，用“电报体”写上几行抨击一下就可以了。

在“资产阶级的美好的旧时代”，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即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在新经济的建设中，大工厂、农业公社^[288]、贫苦农民委员会^[289]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否真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

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散漫、肮脏、捣乱、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有没有呢？没有。然而这样的工厂是有的。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许这样的工厂存在，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成了收破烂的人。我们不善于像资产阶级那样在报纸上进行阶级斗争。请回想一下，资产阶级是怎样出色地在报刊上抨击自己的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他们，侮辱他们，置他们于死地的。而我们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反对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仍然用老眼光看苏维埃国家（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吗？即使是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等工厂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

报刊对这一切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只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像一份革命报刊，不像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尽管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将被它的铁拳所粉碎。

在战争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抨击过那些胆小如鼠的将领和敷衍塞

责的家伙呢？我们是否在全俄国面前揭露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的丑态呢？有一些人毫不中用、玩忽职守、延误军机，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把他们清除出军队，我们是否“抓住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干坏事的具体人进行切实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

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载于 1918 年 9 月 20 日《真理报》第 202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91—93 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今天，我们为世界工人革命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成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所造成的不堪言状的惨祸，无论在哪里都激起被压迫群众英勇精神的高涨，大大加强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力量。

愿一个个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都来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正挺身奋起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通过共同的斗争，我们一定会粉碎资本的压迫，最终赢得社会主义！

载于1924年4月3日《真理报》第7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64—165页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热烈鼓掌)同志们,在庆祝我国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我想谈一谈肃反委员会的艰巨工作。

我们不仅听到敌人而且常常听到朋友攻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肩负着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担负着管理国家的工作,自然难免犯许多错误,而肃反委员会的错误自然最惹人注目。庸俗的知识界抓住这些错误不放,不愿深究问题的本质。在指责肃反委员会错误的叫声中,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不善于从大处着眼提出问题。我国有些人只盯着肃反委员会的个别错误,大哭大闹,纠缠不休。

而我们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问题当然不在于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本身,而在于他们工作的性质;这种工作要求果断、迅速,而主要的是忠诚。我考察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把它同人们的攻击对照了一下,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一文不值的庸俗论调。这使我想起了考茨基关于专政的说教,这种说教等于是支持资产阶级。我们可以根据经验说,剥夺资产阶级是通过艰巨斗争即通过专政来实现的。

马克思说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愈厉害,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愈疯狂。我们知道法国在1848年是怎样迫害无产者的,我们真不理解,那些责备我们残酷无情的人,怎么连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都忘记了。我们没有忘记士官生在十月革命时的暴动^[290],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系列暴动正在策划中。我们只好一方面学习如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一方面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芬兰的白卫军尽管标榜自己很“民主”,却肆无忌惮地枪杀工人。必须实行专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虽然实行专政是艰巨的、困难的。肃反委员会里混进了异己分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运用自我批评一定能把他们赶出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肃反委员会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要解放群众,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别无他法。肃反委员会就是干这个的,它对无产阶级的功绩就在这里。

简要报道载于1918年11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68—169页

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1918年11月20日)

今天《真理报》^[23]登载了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特别注意它。在这封原来登载在《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信^[291]中，皮季里姆·索罗金声明他退出右派社会革命党^[16]，并放弃立宪会议^[19]议员的资格。他写这封信的动机归结起来就是：他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都难以开出政治上的解救药方，因而“不再过问任何政治”。皮季里姆·索罗金写道：“过去一年的革命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政治家可能犯错误，政治可能对社会有益，但也可能对社会有害，而科学工作和国民教育工作永远是有益的，永远是人民需要的……”信末署名：“彼得堡大学、精神和神经病学学院讲师、前立宪会议议员、前社会革命党党员皮季里姆·索罗金”。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文献”。皮·索罗金在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真诚和坦率，是不多见的。几乎是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家在确信自己的路线错了以后，都想掩饰自己的转变，轻描淡写，“编造”一些不大相干的理由，如此等等。公开而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皮季里姆·索罗金说科学工作“永远是有益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方面也常会犯错误，俄国著作界中有一些显然并不反动的人顽固地宣扬反动的观点，比如反动的哲学观点，就是例子。另一方面，一位担任过人所共知的重要政治职务的名人公开声明不再过问政治，这也就是政治。老实地承认政治错误，——如果这种错误牵涉到整个党，而且还是一些曾对群众有影响的党——那对许多人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正是在目前，皮季里姆·索罗金这封信的政治意义特别大。它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应该好好地加以思索和领会。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而介于这两个阶级之间、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一切社会成分，必然在这两种决定性力量之间摇摆不定，——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知道的真理。但是从书本上承认这个真理到能够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根据这个真理得出应有的结论，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皮季里姆·索罗金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个非常广泛的社会政治流派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流派，从他们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来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这一点已经由1917年2月以来俄国革命的事件特别有力特别清楚地证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变种，这就是该流派的经济实质和主要政治特征。先进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流派在其早期往往涂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试问，几个月以前，是什么东西特别有力地促使这一流派的代表离开布尔什维克、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呢？现在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从敌对转为中立呢？非常明显，转变的原因是：第一，德帝国主义的破产，这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有关，也跟英法帝国主义被揭露有关。第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的破灭。

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原因。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217]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和革命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策略至多不过是幻想、狂热和冒险，是沉醉于指望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毫无根据的想法，为此而牺牲亿万人民显而易见的现实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

但结果正像我们所说的那样。

似乎是唯一的敌人的德帝国主义垮台了。似乎是“梦想”（借用普列汉诺夫的著名用语）的德国革命成了事实。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象中的民主的朋友和被压迫者的保护者——英法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一只野兽，它强迫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人民接受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的条件，现在又利用“自由”共和的法美两国的军队来充当扼杀弱小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宪兵和刽子手。世界历史无情地、彻底地、直截了当地揭穿了这个帝国主义。世界历史用事实向那些只知道祖国眼前的（而且是旧观念中的）利益的俄国爱国者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

英国的谚语说：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近几个月来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这些事实迫使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先是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而由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情况，他们本来是仇恨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些曾迫使这样的民主派爱国分子断然离开我们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了。世界上出现了使他们不得不倒向我们的客观条件。皮季里姆·索罗金的转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种不可避免的转变的表现。谁不善于看到和利用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蹩脚的社会主义者。

其次，相信一般“民主”万能，可以包治百病，而不了解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它的有用和必要是有历史局限性的，——这种情况在各国保持了几十年、几百年，而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保持得特别牢固。大资产者有丰富的阅历，他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共和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形式一样，不过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大资产者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真正操纵者和最终的（因而往往是最隐蔽的）发动者有极亲密的关系。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较难懂得这一真理，他们甚至抱着幻想，以为民主共和国就意味着“纯粹民主”、“自由的人民国家”、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民权制度、全民意志的纯粹表现，如此等等。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远离尖锐的阶级斗争、交易所和“真正的”政治，他们的这些偏见很顽固。以为只靠宣传就能在短期内根除这些偏见，那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但是，世界历史在飞速前进，它用威力巨大的锤击和空前猛烈的危机摧

毁着一切习以为常的旧东西，使得最顽固的偏见都支持不住。“一般民主主义者”天真地信赖立宪会议，天真地把“纯粹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立宪会议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西伯利亚和南方的经历，不可能不打垮最顽固的偏见。被理想化的威尔逊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实行最疯狂的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进行最无耻的压迫和摧残的一种形式。处于中间状态的一般“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想：“我们哪能有什么最高类型的国家，什么苏维埃政权！上帝能赐给我们一个通常的民主共和国就不错了！”当然，在“通常的”比较平静的时期，这种“希望”是可以保持好几十年的。

现在，世界事变的进程和俄国一切君主派同英、法、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最严酷的教训都实际表明：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从帝国主义提到历史日程上的问题来看，这种共和国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要么是苏维埃政权在世界上一切先进国家获得胜利，要么是对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已经运用自如的英美帝国主义实行反动，疯狂肆虐，摧残一切弱小民族，在全世界复活反动势力。

二者必居其一。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曾几何时，这种看法还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无知狂想。

但结果正是如此。

皮季里姆·索罗金放弃立宪会议议员的资格，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整个阶级、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的征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可避免要分裂，一部分转到我们这边来，一部分保持中立，一部分自觉地归附把俄国出卖给英美资本并且力图用外国军队来扼杀革命的君主派立宪民主党人^[5]。善于看到并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先从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这一情况，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僵化的特性，甚至在这个口号必须提出时所依据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它还继续对许多人发生效力。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学会防止和克服它，就不能保证党的政策正确。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民主派断然决裂的时期在历史上是必需的；当这些民主派倒向敌人方面并且恢复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同他们进行尖锐的斗争是不行的。这场斗争中使用的一些口号现在往往变成了凝固僵化的东西，妨碍我们正确地估计和适当地利用当前这个新的时机，因为这些民主派已经开始新的转变，倒向我们，这个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局势的极深刻的变化。

支持这个转变，对倒向我们这边的人表示友好，这还不够。一个意识到自己的任务的政治家，既然确信这种转变具有重大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应该学会在广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众的某些阶层和集团中促成这种转变。革命的无产者必须知道应该镇压谁，应该善于同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妥协。对那些把俄国出卖给“盟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不实行恐怖和镇压，是荒唐可笑的。企图“说服”他们，“感化”他们，是十分滑稽的。但是，当局势迫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的时候，还一味对他们采取镇压和恐怖的策略，那同样是（至少同样是）荒唐可笑的。

无产阶级到处都碰到这样的民主派。在农村，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地主，粉碎剥削者和富农投机分子的反抗；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紧紧依靠半无

产者，即“贫苦农民”。但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过去动摇，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争取动摇者的任务和推翻剥削者、战胜猖獗的敌人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因为正是现在，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农必然转到我们这方面来。

这种策略也适用于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适用于具有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或持有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适用于许多职员，适用于军官，特别是适用于全体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我们党内往往有人不会利用他们的转变，这种不会可以克服而且应当克服，把不会利用变为很会利用。

我们已经拥有大多数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者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必须善于吸引那些正在转向我们这边的、无产阶级性最少而小资产阶级性最多的劳动阶层，使他们参加我们的行列，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目前的口号是：不要同他们斗争，而要争取他们，善于影响他们，说服动摇者，利用中立者，用广泛的无产阶级影响来熏陶那些落后的或者最近才开始摆脱“立宪会议”幻想或“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幻想的人。

我们已经拥有劳动群众这样一个相当坚强的后盾。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292]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害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对他们中间恶毒的总工分子和白卫分子我们一分钟也不放松斗争。但是当前的口号是要善于利用他们倒向我们的转变。我们苏维埃政权中还有不少“混进来的”恶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用昨天还自觉敌视我们而今天已完全保持中立的知识分子替换他们，这是目前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所有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任务，也是全体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员的任务。

当然，同中农、同工人中昨天的孟什维克、同职员或知识分子中昨天的总工分子达成协议，如同在剧烈变化着的复杂环境中进行任何一种政治活动一样，是需要本领的。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练就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有长进，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转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包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步。

几天前，我接待了信用合作社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把代表大会关于反对信用合作银行同共和国人民银行合并的决议^[293]给我看了。我对他们说，我主张同中农妥协，对合作社工作者从敌视布尔什维克转为中立，虽然只是开始，我也很重视，但是同他们达成协议的基础只能是他们同意特种银行同共和国统一的银行完全合并。于是代表们换了一个决议，由代表大会通过了另一个决议，把反对合并的内容全都删掉，但是……但是提出了组织合作社工作者特种“信用协会”的方案，而这个协会事实上同特种银行毫无差别！这是可笑的。改换字眼显然只能哄骗傻瓜。但是这样……一次“尝试”的“失败”丝毫也不会动摇我们的政策；我们过去实行而且今后还要实行同合作社工作者、同中农妥协的政策，但要打破企图改变苏维埃政权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的一切尝试。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打了几次胜仗，这些民主派就张皇失措，散布恐慌情绪，投奔“胜利者”，甘愿卑躬屈膝地去迎接他们。当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即使现在，只要英国人、美国人和克拉斯诺夫白卫分子打几次小小的胜仗，这些人也还会产生动摇，张皇失措，而散布恐慌情绪、实行叛变、倒向帝国主义等等情况也还会多起来。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为半无产者支持的苏维埃政权奠定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基础，永远是牢固的。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我们这个队伍不会动摇，我们的军队不会动摇。但是，当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最深刻的变化使得非党的、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民主派必然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应当学会而且一定能够学会利用这一转变，支持这一转变，在相应集团和阶层中促成这种转变，尽一切可能同这些分子达成协议，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减轻由于严重的经济破坏、愚昧、无能而造成的困难，加速社会主义胜利的到来。

载于 1918 年 11 月 21 日《真理报第 252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185—193 页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294]

(1918年10—11月)

序言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公司版,共63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像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党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提到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从战争一开始,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1914—1916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295]和《共产党人》^[296]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已收进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反潮流》文集(1918年彼得格勒版,共550页)。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1915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297]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298]或‘布伦坦诺主义’^[299](就是说,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学说,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俄国著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 and 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300]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6]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像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

理论上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说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

最后，我在1917年8月和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6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中，我着重谈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详细揭露过的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机会主义歪曲。

这几点事先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并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这样提出问题：“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3页）

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6]称为社会党人，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即根据字眼，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啊！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所谓“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这一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对比、无产阶级民主

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651—656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219页。——编者注

同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像个照本宣读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顽固地背对 20 世纪，面向 18 世纪，在许多章节中无数次地枯燥无味地搬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专制制度、同中世纪制度对比的旧道理！

真像是在说胡话，听来叫人生厌！

简直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 11 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拼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们这位空谈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 63 页中的 20 页，来大谈其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听了很舒服，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正在于此，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
——第 20 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 60 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如下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 1875 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用的就是 des Wörtchens！！）。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至 1891 年这 40 年间，考虑到 1848 年革命尤其是 1871 年革命的经验而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战争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大有长进，他那一套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20页）

我们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什么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认真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提出自己的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明确和直截了当。考茨基却不是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想回避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要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谁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间的民主，即对奴隶主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没有。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骗人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给专政下定义。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话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像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在这里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说明了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明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喜欢从20世纪转向18世纪，又从18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以空

谈专制来回避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欺骗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小抽屉”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者实质相同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像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这帮上层分子）都朗朗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第二国际领袖们奴才气十足，他们已经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作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像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21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像“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加以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我们倒需要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谈论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拙劣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分明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可怜的词。

循词之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并不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而有些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有军阀和官僚。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篡改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的回答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東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次，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点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和官僚，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导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 19 世纪 70 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这两种机构没有！（而现在，这两种机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马脚。他说：“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了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十分无耻地篡改历史，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 19 世纪 70 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而帝国主义，即只是在 20 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机构。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遁词之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第 21 页）

考茨基的这个论据异常滑稽可笑，真使人感到有 *embarras derichesses*（驳不胜驳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去了。在凡尔赛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说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都参加了公社是骗人。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营垒，其中一个营垒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

积极的资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全民投票”的“纯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吗？

第二，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既然法国的命运决定于巴黎，怎能谈得上“纯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当马克思认为公社没有夺取属于全法国的银行是一个错误的时候，难道他是从“纯粹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出发的吗？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们“聚众”发笑的国家里写书，不然考茨基真是会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纯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评价：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

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以及1914—1918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

够了，要把考茨基所有的谬论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

难怪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8月4日^[301]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了！

遁词之三。“如果我们说专政是管理形式，我们就不能说阶级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是“组织”或“政党”。

“糊涂顾问”先生，您在胡说，完全胡说八道！专政不是“管理形式”，您这是可笑的胡说。马克思讲的并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说阶级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对的；这种胡言乱语，只有除了资产阶级议会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执政党”什么也看不到的“议会迷”才说得出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给考茨基提供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例子，如中世纪地主的例子，虽然他们的组织程度还不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编者注

同上，第372页。——编者注

同上，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

够。

总之，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概念的“解释”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斯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

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28 日给倍倍尔的信）“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 1918 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像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像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像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 15 页。而在第 16 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 18 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302]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太之

同上，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同上，第 2 卷第 336 页。——编者注

同上，第 4 卷第 169 页，——编者注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5 页和第 376 页。——编者注

吻^[303]，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 18 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304]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305]中，在 1917 年 4 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306]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 20 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述 18 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 1912—1914 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307]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像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 and 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看不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看不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

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像夏洛克^[128]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1）“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14页）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2）“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21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罗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

(第 22 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就来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

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

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正如自由主义者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或者说带着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小事一桩！

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55—556 页。——编者注

同上，第 554 页。——编者注

同上，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胆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遇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像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啊！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像奥吉亚斯的牛圈^[308]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从他书中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犯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

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并且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小册子的书名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截了当地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的小册子一般地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6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主要实行（彻底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论述。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俄国革命的经验，谈谈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同立宪会议^[19]之间的分歧——导致解散立宪会议和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分歧。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一个著书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真正研究过这个现象（而不是重复小资产阶级对专政的哀怨，像考茨基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那样），就会先给专政下一个一般定义，然后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苏维埃，把苏维埃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加以评论。

既然考茨基对马克思的专政学说作了一番自由主义的“加工”，当然不能期望他会提出什么重要见解。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样研究苏维埃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十分有意义的。

他在回想 1905 年苏维埃的产生时写道：苏维埃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所有组织形式中最能包罗一切的（umfassendste）组织形式，因为它包括了全体雇佣工人”（第 31 页）。1905 年苏维埃还只是地方团体，而在 1917 年却成了全俄国的联合组织。

考茨基继续说：“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还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面对金融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versagen；德语这个词的意思比“不够”稍强，比“无力”稍弱）。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产生一些任务，用这些方法不能解决，而只有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实力手段集中起来，才能奏效。”（第 32 页）

接着他谈到群众罢工，谈到“工会官僚”同工会一样是必要的，但“不适于领导那些日益成为时代标志的强大的群众战斗……”

考茨基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 年 11 月（指公历，按俄历为 10 月）革命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消灭了俄国人民在 3 月（指公历，按俄历为 2 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与此相适应，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第 33 页，黑体是考茨基用的）

凡是看过俄国孟什维克著作的人，立刻就会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样盲目照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施泰因之流的言论。的确是“盲目”照抄，因为考茨基为了迎合孟什维克的偏见，竟把事实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顾到向他的情报员，如柏林的施泰因或斯德哥尔摩的阿克雪里罗得打听一下，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具有国家组织的作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做了这样简单的查问，他就不会写出这段令人发笑的话来，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4 月提出的，例如我的 1917 年 4 月 4 日的“提纲”^[309]就提出过，就是说，是在 1917 年十月革命（更不用说 1918 年 1 月 5 日解散立宪会议）以前很久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来的考茨基的这段议论，就是整个苏维埃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于：苏维埃是应该力求成为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4 月已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年同月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24]上又声明他们不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满足，他们需要的是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工农共和国），还是不应该力求这样做，不应该夺取政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而应该照旧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马尔托夫就是这样说的，他是用天真的愿望来粉饰这样一个事实：在孟什维克领导下苏维埃是使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复马尔托夫的话，抓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理论争论中的片断，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将这些片断搬到一般理论问题、一般欧洲问题上去。结果弄得一团糟，使俄国每个觉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议论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们向欧洲所有的工人说明事实真相，考茨基也一定会遭到他们（极少数顽固不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除外）同样的嘲笑。

考茨基像熊那样给马尔托夫帮忙^[310]，十分明显地把马尔托夫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请看考茨基究竟说了些什么。

苏维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面对金融资本，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苏维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好极了。“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是不是要解决这两个阶级中哪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呢？

完全不是。绝对不是。

在“决”战中，包括全体雇佣工人的苏维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

国家是什么呢？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总之，一个被压迫阶级，现代社会中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应该努力去进行“资本同劳动的决战”，但不应该触动资本用来镇压劳动的机器！不应该摧毁这个机器！不应该用自己的包罗一切的组织来镇压剥削者！

好极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就像一切自由派那样承认它，就是说不要推翻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里，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已经很明显了。这实际上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什么都能允许，就是不能允许受它压迫的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在这里，考茨基已经完全无法挽救他那调和一切、用空话避开各种深刻矛盾的立场了。

考茨基要么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要么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都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

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 1891 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对这点资产者也“同意”，因为工人反正都在斗争，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把他们利剑的锋芒磨去），——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去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谁真正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谁多少琢磨过这个真理，他就决不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说什么能够战胜金融资本的无产阶级组织不应当变成国家组织。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出了小资产者的原形，小资产者正是认为国家“终究”是一种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可以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去同那不仅统治着无产阶级而且统治着全体人民、全体小资产阶级、全体农民的资本进行决战，却不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把自己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呢？因为小资产者害怕阶级斗争，不能把它进行到底，直到实现最主要的东西。

考茨基说得乱了套，结果露出了马脚。你们看，他亲口承认，欧洲正去迎接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而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由此可见？……

考茨基不敢进一步去想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由此可见，只有反动派，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只有资产阶级的走狗，才会在现时把脸朝着已经过去的时代，去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侈谈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么，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别可笑的窘境，因为他重复马尔托夫的论据，却没有觉察到马尔托夫的这个论据是以考茨基所没有的另一个论据为依据的！马尔托夫说（而考茨基则跟着他重复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把苏维埃从斗争机关变为国家组织，为时尚早（应读作：在孟什维克领袖们帮助下，把苏维埃变成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机关，倒是适时的）。而考茨基却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欧洲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考茨基在 1909 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写道：现在不能害怕革命为时过早，谁因害怕失败而拒绝革命，谁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点。结果得出了一个把小资产者的极度愚蠢和极度怯懦暴露无遗的谬论：一方面，欧洲已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正在走向资本同劳动的决战；而另一方面，却不能把战斗组织（即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组织），即把被压迫者的先锋队、组织者和领袖无产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作为战斗组织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变成国家组织，——这一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比在理论方面还要荒谬得多。甚至在有革命形势的平时

期，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寻常的斗争热情，也会使资产阶级经常搬出他们的老一套，说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像苏维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劳动的贫苦的农村居民的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由于简单的攻守“逻辑”，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想采取中间立场，“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在俄国，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说教已经遭到破产，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苏维埃稍微广泛地发展起来，能够联合并巩固起来，这样的说教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破产。对苏维埃说，斗争吧，但不要亲自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不要变成国家组织，这就是宣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要是以为在剧烈的斗争中，这种立场除了可耻的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那就很可笑了。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在理论上，他假装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同意机会主义者，其实在实践上，他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上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问题。他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这部著作满篇都在暗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民主”（见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话）。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经实际地摆在革命面前了。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考察这个问题的。

他引用了我所写的发表在1917年12月26日《真理报》^[23]上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这看来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讨论问题的最好证明了。不过还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吧。他没有说这个提纲有^[19]条，没有说这个提纲既提出了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的分歧有其历史的问题。所有这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谈，他只简单地对读者说，“其中<在这个提纲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但在立宪会议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5条）；二、一般说来，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3条）。

就是这第3条，考茨基才完整地引用了它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论点：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

见本卷第363—367页。——编者注

附带说一下，考茨基多次引用了“痛苦最少地”过渡这几个字，显然是想来讽刺、讽刺。可是他用的方法不中用，所以在几页之后，他就作假，把引文伪造成“无痛苦地”过渡！当然，用这种方法把荒谬的话加到论敌身上是不困难的。作假也能帮助回避论据的实质，即只有把全体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为苏维埃），只有国家政权的中坚（无产阶级）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像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 31 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像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 1917 年 4 月 4 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 年 1 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311]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 年 4 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312]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

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有关决议和声明的译文，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 30 页上是直接提到过我 1917 年 12 月 26 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 3 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 2 条。

第 2 条是：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 1917 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

附带说一下：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谎话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怀着仇恨的孟什维克写的诽谤性的小册子。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低于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共和国，这对不对呢？这是问题的中心，而考茨基却避而不谈。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所说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记了”。他还“忘记了”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写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特别明白易懂地表达了跟马克思同样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请看，这就是第二国际最卓越的理论家，他写了一本专著《无产阶级专政》，专门谈到了俄国，却闭口不谈俄国曾经直接地多次地提出过的比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国家形式的问题。这实际上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什么区别呢？

（附带说一下：在这里，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国孟什维克跑的。在孟什维克中间，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种引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然而从1917年4月至1917年10月，再从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竟没有一个孟什维克作过一次尝试去研究一下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只好默不作声吧。）

很明显，同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主要问题即巴黎公社类型国家问题上却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谈论解散立宪会议，简直是对牛弹琴。只要在本书附录中把我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全文刊印出来就够了。从这个提纲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1917年12月26日就已从理论上、历史上和政治实践上提出来了。

如果说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他作为历史学家也许会来考察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斗争的问题吧。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即使作为历史学家也背离了真理，忽视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成了一个逢迎献媚的奴才。他想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就说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曾怎样试图缓和同立宪会议的冲突。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要否认的；现在我把提纲全文刊印出来，提纲上明显不过地写着：盘踞在立宪会议中的动摇的小资产者先生们，或者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或者是我们“用革命手段”战胜你们（提纲第18条和第19条）。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向来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

样。考茨基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的。在我的提纲里曾多次明白地说过，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见提纲第16条和第17条）。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考茨基也许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是某一个阶级的机关。但是现在考茨基需要（为了进行背弃革命的卑鄙勾当）忘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提出俄国立宪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关的问题。考茨基不分析具体环境，不愿看看事实，根本不向德国读者说：我的提纲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问题（提纲第1—3条），不仅谈到了使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提出的名单同

1917年12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具体条件（提纲第4—6条），而且谈到了1917年10—12月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提纲第7—15条）。我们根据这段具体历史得出了结论（提纲第14条）：“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5]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

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历史学家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听说过，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立宪会议的阶级内容问题，在我的提纲中已经直接提出和解决了。也许我解决得不对。假使有人对我们的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来就应该进行这种批评，而不应该去写那些十足的蠢话（这种话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说有人在阻碍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可是问题正在于考茨基没有进行这种批评。他甚至没有提出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因此，无法同考茨基展开争论或辩论，只好向读者表明，为什么只能把考茨基称为叛徒。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有它的历史，这段历史，就连不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考茨基连这段实际历史也不愿涉及。他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心怀恶意的孟什维克才隐瞒这个事实）：苏维埃即使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在1917年2月底至10月，也是同“全国性的”机构（即资产阶级的机构）有分歧的。实际上，考茨基所持的观点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不管考茨基怎样否认，但他的这种观点终究是事实，他那一整本小册子就是证据。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就等于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一直在干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财产资格的人”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1917年2—10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一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说成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力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试验，使人民看清了他们的努力毫无所获，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如此，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像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1917年2月28日（俄历）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

了两次代表俄国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还不算许许多多各级地方的（县、市、省、区域的）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连一次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143]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70]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年1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年10月）代表大会^[189]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会^[211]，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因此，单从苏维埃的表面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看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 人数	其中布尔什 维克的人数	布尔什维克 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	675	343	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	710	434	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 ^[236]	1232	795	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 ^[313]	1164	773	66%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像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苏维埃宪法^[287]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96]，——这一切造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不顾历史事实，无视那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

地……天真，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这种天真倒很可爱，但如果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蠢才的人，这种天真就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 33 页）……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是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的意志的。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 34 页及其他许多页）。

啊，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您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像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不是像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314]那样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用“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像“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昏头昏脑地把组织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315]并且付给总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作合法的“反对派”。啊，多么深刻的思想！

考茨基只是对问题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兴趣，所以一读到他对苏维埃宪法发表的议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尔的一句话：法学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考茨基说：“实际上，单把资本家变为无权的人是不行的。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有产者吗？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进步、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也会使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 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三大部门中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属于职员和雇佣工人这一类的约有 3500 万人，属于独立经营者这一类的有 1700 万人。可见，党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可以成为多数，但在全体居民中间则占少数。”（第 33 页）

这是考茨基的典型议论之一。这难道不是资产者反革命的抱怨吗？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国极大多数农民不雇用工人，因而也没有被剥夺权利，你为什么把全体“独立经营者”都算作没有权利的人呢？这难道不是捏造吗？

您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数字，1907 年德国同一个统计材料里关于农业中各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数字呢？您为什么不把德国统计材料的以上数字给那些读您的小册子的德国工人看，让他们知道剥削者有多少，知道剥削者在“农户”总数中只占少数呢？

这是因为您的叛徒立场使您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

你们看，资本家原来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于是考茨基在好几页上攻击苏维埃宪法的“专横”。这位“郑重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其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

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学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释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普通农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一天比一天更纯粹的“纯粹民主”。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开来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受到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炽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一帮吸血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大叫起“专横”来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智练达的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 1918 年 4 月 28 日的讲话 中引了一句话：“……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于是“纯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每个选民会议大概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

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 37 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谓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勤勉工人这种叫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

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昏头昏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温和谨慎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们这位极其博学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316]义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说，1918 年 6 月 14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们开除出苏维埃。^[317]义愤填膺的犹杜什卡·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了某种罪行的某些个人……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不受侵犯的问题。在这里，被开除出苏维埃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 37 页）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是不可容忍地背弃纯粹民主，而我们这位革命的犹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规则干革命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应该先保证萨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恩^[275]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

派”^[318]) 不受侵犯, 然后再制定刑法, 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 应受惩治”, 只有这样做了以后, 我们才有权根据这个刑法并依照“ 纯粹民主” 把“ 某些个人” 开除出苏维埃。不言而喻, 通过萨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恩之流或依靠他们的鼓动从英法资本家手里领取金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 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帮助之下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 在我们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乖乖地坐在那里, 并且会像最纯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 反对派” 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 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 的人们的选举权, 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愤。他写道: “ 带一个学徒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 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 但是他没有选举权。” (第 36 页)

这是怎样地背弃“ 纯粹民主” 啊! 这是怎样地不正义啊! 固然, 直到现在,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 小业主剥削雇佣工人是最不讲良心和最贪得无厌的, 但犹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 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谁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论?), 而是某些个人, 是那些“ 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 的剥削者。人们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 节俭的阿格尼斯”, 又在考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 纯粹” 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希特尔虚构出来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 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 从法律上看, 什么是资本家呢? 他以被凶恶的“ 无产阶级专政者” 剥夺得分文不剩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 节俭的阿格尼斯”) 为例。有一个时期, 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个“ 节俭的阿格尼斯” 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时倍倍尔还活着, 他曾坦白直爽地说, 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319];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 “ 节俭的阿格尼斯” 又在“ 带一个学徒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 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 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 在苏维埃共和国中, “ 任何一个选举大会”, 像同一个考茨基所说的那样, 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 只要他(作为例外) 不是剥削者, 只要他真正是“ 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够指望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 真可怕呀!) 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 与其去冒险, 使工人有可能欺侮“ 节俭的阿格尼斯” 以及“ 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 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 给一切雇用工人的人, 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欢迎的实行背叛的小人去痛骂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吧。这样很好, 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 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压迫阶级的群众, 他们的觉悟的忠诚的领袖革命无产者, 一定会赞成

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320] (1918年10月22日第293号) 的社论。这篇社论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十分满意。当然啦! 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 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在一篇专论^[321]上说, 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

我们。只要让这些无产者和这些群众了解了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们立刻会说：这才真正是我们的人，这才真正是工人政党，真正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像上述一切领袖们欺骗我们那样用改良的空话欺骗工人，而是认真同剥削者进行斗争，认真实行革命，真正为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既然苏维埃在一年的“实践”之后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卖身给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既然苏维埃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不是小资产阶级同资本家妥协的机关，不是进行议会空谈（如考茨基、龙格和麦克唐纳之流的空谈）的机关，而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剥削者作你死我活斗争的机关。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几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书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让他们来声讨这个早已成了“发臭的死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先生在书末（第61页和第63页）伤心地说：“新理论（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不敢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像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也找到了拥护者。”“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论”，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的严重教训使得革命群众愈来愈讨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们”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们忽然又要抛弃它！

“我们”，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当时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将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322]只有这种观点才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任何人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中都看得出来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国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论，他们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议会制，讳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贯彻到底。

“我们”对资产阶级说过：你们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谈民主，同时却在各种场合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们抓住你们的话，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把群众训练好去进行打倒你们这些剥削者的革命。如果你们剥削者企图反抗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无情地镇压你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和还要说的话，这就是被压迫

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同我们在一起，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

什么是国际主义？

考茨基极端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他宣布谢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会党人”。考茨基既然为孟什维克辩护（他没有公开说支持他们，但是在全力宣扬他们的观点），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国际主义”是哪一类货色了。考茨基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在第二国际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法国的龙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诺布斯、格里姆、格拉贝和奈恩，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等），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强调孟什维克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57]（这无疑是一张文凭，不过……是一张陈腐的文凭），并且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维克观点描述如下：

“……孟什维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依照这个观点，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战备状态。布尔什维克却要求无论如何要立刻媾和，必要时准备单独媾和，他们力图强行实现这一点，于是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第27页）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而应该满足于立宪会议。

总之，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就是：要求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改良，但在所有交战国没有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以前，继续支持这个政府，继续支持它所进行的战争。无论屠拉梯派也好，考茨基派（哈阿兹等）也好，龙格派也好，都屡次表示过这种观点，声称他们是主张“保卫祖国”的。

从理论上说，这完全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不清界限，这完全是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混乱观点。从政治上说，这是用市侩民族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是转到改良主义方面去，背弃革命。

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认“保卫祖国”就是为现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而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论是在君主国或在共和国，也不管此刻敌军是在我国境内或在他国境内），所以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就是完全背叛社会主义。在俄国，即使是在克伦斯基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争也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前沙皇同英法资本家订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孟什维克把这样一场战争称为防御战争或革命战争，就是卑鄙地欺骗人民，而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政策，就是赞成欺骗人民，赞成小资产者愚弄工人、把工人绑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车上为资本效劳。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实，并向群众灌输这种荒谬思想。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对比，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

话，而要彻底弄清阶级现实。要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依靠骗子、空谈家或市侩庸人提出甜蜜的“口号”，而只有实际打倒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甚至千绳万索的）经济联系的阶级，只有真正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起来掌握政权。不然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和平。

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对外政策，宣布这个政策是国际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政策，第一，这样他就充分表明了机会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腐朽（难怪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39]当时就同这个多数派划清界限了！），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考茨基就从无产阶级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立场，从革命的立场转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

无产阶级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争取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例如在1909年写《取得政权的道路》的时候，他坚持的正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这一思想，说革命纪元正在临近。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正是德英两个集团间的那种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果然在1914年爆发了）将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可是当1918年战争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革命的时候，考茨基却不去说明它们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认真考虑革命的策略，考虑准备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策略叫作国际主义。难道这不是叛徒行径吗？

考茨基赞扬孟什维克主张军队保持战备状态，责备布尔什维克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这也就是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因为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保持战备状态，就等于保持而且确实保持了资产阶级（虽然是共和派资产阶级）指挥的军队。大家知道，而且事变的进程也明显地证实，这支共和派军队由于保留了科尔尼洛夫的军官而保持了科尔尼洛夫的精神。资产阶级的军官不能不是科尔尼洛夫式的，不能不倾向于帝国主义，倾向于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照旧保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基础，保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基础，在小处进行修补粉饰（“改良”），——孟什维克的策略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得“瓦解”军队，而且不这样做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坚硬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服从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胆小的市侩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6页。——编者注
同上，第374页。——编者注

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基却忘记了这一点。

既然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么权利称谢德曼之流为“政府派社会党人”呢？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加入他的内阁，同样也是政府派社会党人。只要考茨基一提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统治阶级的问题，他就绝对回避不了这个结论。然而考茨基避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提出的关于统治阶级的问题，因为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叛徒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这样推论说：社会主义是以各民族的平等、自由、自决为前提的，所以当我们国家遭到进攻或者敌军侵入我国领土时，社会主义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保卫祖国。从理论上讲，这种推论或者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嘲弄，或者是骗人的遁词；而从政治实践上看，这种推论同那些对战争的社会性即阶级性，对革命政党在反动战争期间的任务连想也不会去想的十分无知的庄稼汉的推论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一般是反对对人使用暴力的。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323]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笼统地谈论“暴力”，而不分析那些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对民族使用暴力的问题也是这样。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战争有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问题。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价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种估价。谁不这样看战争，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威廉统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统治下的法国人说，既然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义务保卫祖国，——如果这样说，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推论，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推论，不是革命无产者的推论，而是市侩民族主义者的推论。因为在这种推论中，工人反对资本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不见了，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角度对整个战争的估价不见了，就是说，国际主义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偏狭的顽固的民族主义。我的国家受欺凌了，其他我一概不管——这就是这种推论的结论，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这正像一个人明明看见在对个人使用暴力，却说：社会主义是反对暴力的，因此，我宁可叛变，也不坐牢。

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说，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就要起来自卫，——假如这样说，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因为这种人只看见自己的“国家”，把“本国的”……资产阶级看得高于一切，而不考虑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链条的一环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市侩和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正是像考茨基派、龙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那样推论的：敌人在我的国家，其余我一概不管。

社会沙文主义者（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龚帕斯之流等等）在战争期间根本不谈“国际”。他们认为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赞成本国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社会和

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当考茨基从赞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国的哈阿兹派）的策略转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时，他的叛徒行径就更加明显了。请看他的批评：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全欧洲的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既然这样假设，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给俄国人民造成多少苦难和领土损失<原文为 Verstümmelungen，词义是肢体残缺或残废>，对民族自决将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当然都无所谓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

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设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很有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种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要谁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行动负责呢？”（第 28 页）

往下考茨基不厌其烦地补充说，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不止—次地对他们所期待的革命的来到估计错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第 29 页），而布尔什维克却“把—切都押在全欧洲的革命这一张牌上”。

我们故意摘引这样长的一段话，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怎样“巧妙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用卑鄙的反动的市侩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

第—，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使用的手法。如果布尔什维克真是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那当然是愚蠢的。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蠢事。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 年 8 月 20 日）中直接同这种愚蠢思

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市侩和平主义者）表现出种种“国际主义的”情感，奋起反对兼并等等，但实际上继续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两类人的差别很小，正像凶言恶语的资本家和甜言蜜语的资本家的差别—样。

想划清了界限，我说，我们指望美国革命，但并不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和“左派共产主义者”^[219]论战的时候（1918年1—3月）不止一次发挥过这种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的。他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内但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搅和在一起。这是一个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捏造！

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革命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须采取的，其所以必须，因为只有这种策略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估计战争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客观形势，只有这种策略才符合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考茨基用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可能犯但并没有犯的一种错误的小问题，偷换了关于整个革命策略的原则的大问题，从而安然无事地背弃了整个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论上甚至不能提出关于革命策略的客观前提的问题。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如果欧洲有革命形势存在，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指望欧洲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势时和没有革命形势时是不可能一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他就会看到，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反对他的。在战前很久，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欧洲战争一定会造成革命形势。当考茨基还不是叛徒的时候，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明确地承认过这一点。用整个第二国际的名义发表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难怪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即动摇于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中派”）都像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地害怕巴塞尔宣言中有关的声明！

可见，期待欧洲革命形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痴心妄想，而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见。考茨基大谈布尔什维克“向来相信暴力和意志的万能”，以此来回避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正是用无聊的空话来遮盖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势问题的可耻行为。

其次，革命形势真正到来了没有呢？这个问题考茨基也没有能够提出来。经济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在各地造成的饥荒和经济破坏就意味着革命形势。政治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15年起，陈旧腐朽的社会党分裂的过程，无产阶级群众离开社会沙文主义领袖向左转，转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绪、革命领袖方面来的过程，在所有国家里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在1918年8月5日考茨基写他的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只有害怕革命、叛变革命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些事实。现在呢，在1918年10月底，大家都看见，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在极迅速地发展。希望人家照旧把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分近视的庸人（像马克思所讥笑的1847年的庸人一样），看不见日益迫近的革命！！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在欧洲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革命策略有什么特点呢？变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这个问题。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庸人市侩或无知的农民那样推论：“全欧洲的革命”来到了没有呢？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正像现在有时混进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队伍里的坏蛋一样）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考茨基丝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侩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向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说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帮助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

考茨基把谬论加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指望欧洲革命将在一定时期内到来，把一切都押在这一张牌上。这种谬论正是反对考茨基自己的，因为从他的话里正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欧洲革命在 1918 年 8 月 5 日以前到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正确的！考茨基提到的这个日子正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日子。而在 8 月 5 日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出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正在到来，于是考茨基的全部叛徒行径，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行为，他在用革命观点推论问题、甚至用革命观点提出问题方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考茨基写道：有人责备欧洲的无产者叛变，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您错了！您拿镜子照一照，就会看到这个矢所对准的“的”究竟是谁。考茨基做出天真的样子，假装不知道，是谁在这样责备，这个责备又是什么意思。其实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国的“左派”，斯巴达克派^[40]，即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在责备，而且现在还在这样责备。这种责备表示一种明确的认识：德国无产阶级扼杀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斯兰，也就是背叛了俄国的（和世界的）革命。这种责备首先和主要不是针对一向受压抑的群众，而是针对谢德曼和考茨基这类领袖，因为这些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克服群众的保守心理，因为这些领袖的活动实际上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一直蕴蓄着的革命本能和革命倾向。谢德曼之流公开地、粗暴地、无耻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考茨基派和龙格派也是这样干的，不过他们犹豫动摇，畏首畏尾地看着当前的强者的脸色行事。考茨基在战争期间写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发扬革命精神，而是扑灭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责备”欧洲无产者出卖了俄国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这一点完全可以成为表明德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中间”领袖像市侩那样愚钝的历史见证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的书报检查条件下，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党人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几乎只有通过这种“责备”，才能表示他们是在号召德国工人打倒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踢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睬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去进行革命！

考茨基不理解这一点。他怎么能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呢？难道能指望一个根本背弃革命的人会考虑和估量革命在一种最“困难”场合的发展条件吗？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

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只顾保卫“自己”祖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其余一切都“无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愿望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的（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认的）估计上面。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巨大的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这决不是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功劳，而是由于世界各地群众对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在具体内容、实际内容上有别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彻底粉碎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麦克唐纳之流的陈旧腐朽的国际；这些人今后只会互相妨碍，步调不一，虽然他们梦想“统一”，使死尸复活。布尔什维主义为第三国际建立了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计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计到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经验。

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先从拉丁文译成俄文，以后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经验、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组织习惯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一整年内，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高得多和广得多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创造活动。

布尔什维主义在实际上十分有力地促进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是迄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日益清楚地看到，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没有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充当雇佣奴隶的处境，这种策略不能成为供世界各国效法的典范；同时，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

不仅全欧洲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在成熟，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则帮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个国家，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即使世界帝国主义通过德帝国主义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勾结，明天摧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即使出现这种最坏最坏的情况，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

上面已经说过，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作《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的旧调重弹》。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理论”，即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旧歪曲（1905年被考茨基驳倒的歪曲！），现在又被我们这位理论家捡了起来。不管这个问题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枯燥无味，我们还是

得谈一谈。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1905 年以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他们得出结论说：可见，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说，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束缚”。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联合一般农民，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接着，布尔什维克当时就补充说，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我在 1905 年写的《两种策略》一书，重新刊载于 1907 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

1905 年考茨基间接参加了这次争论^[324]，他就当时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质问发表了实质上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特别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刊物的讥笑。现在考茨基只字不提那时的争论（害怕他自己的话揭露他自己！），从而使德国读者根本无法了解问题的实质。考茨基先生在 1918 年不能告诉德国工人，他在 1905 年曾怎样主张工人同农民联合而不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他当时根据什么条件维护这种联合，他为这个联合拟定了什么纲领。

开了倒车的考茨基，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为让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引证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来反复解释孟什维克的陈旧的自由主义观点；引证是用来证明关于俄国落后的新思想的，而从这种新思想得出的却是旧结论，其精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应该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这根本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较 1789—1793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1848 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说的一切！

谈到考茨基的“经济分析”的主要“论据”和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作者开头几句话就表现出思想的混乱或浅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们这位“理论家”一本正经地说：“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正是小农生产。以此为生的居民约占 4/5，甚至可能占 5/6。”（第 45 页）第一，可爱的理论家，您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当然，不超过总数的 1/10，而在城市中还要少，因为城市的大生产较为发达。极而言之，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产者是剥削者，没有选举权，那也可以看出，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占百分之六十六的布尔什维克是代表大多数居民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大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拥护苏维埃政权，就是说，基本上是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到 1918 年 7 月，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冒险进行暴动^[325]，原来的党也就发生分裂，另外组成了两个新党，即“民粹派共产党”和“革

见本版选集第 1 卷第 527—643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21—323 页。——编者注

命共产党”^[326]（组成这两个新党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曾经由旧党推举出来担任国家要职，例如属于前一党的有扎克斯，属于后一党的有柯列加耶夫）。可见，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无意中推翻了！——他所说的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似乎是少数居民这种可笑的童话。

第二，可爱的理论家，您是否想过，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呢？这个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记了”，因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复的孟什维克的全部“理论”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

现在来看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的“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吧。

考茨基说，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第34页）

“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那个被人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说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第35页）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满意这个很深奥很机智的推论，于是就想挖苦一下，他说：“这样看来，痛苦最少地实现社会主义，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第35页）

我们这位理论家引用了半自由主义者马斯洛夫许多非常深奥的话，来极详细地证明一种新思想：对农民有利的是粮价高，是城市工人的工资低，等等。附带说一下，对于战后时期真正的新现象注意得愈少，这种新思想的叙述就愈是枯燥无味；这些现象就是：例如农民出卖粮食不是要钱而是要商品，农民的农具不够，而且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所需数量的农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特别讲到。

总之，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责备无产阶级政党，说它把专政、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交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手里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据您的高见，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家想必是记起了“开口为银，闭口为金”的格言，觉得还是默不作声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论中露出了马脚：

“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第48页）

多么厉害的讽刺啊！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我国在四年毁灭性的战争之后还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

再往下看吧：

“……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裕农民的余粮。这些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第48页）

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区以外（现在这种办法在我国已推行到全国了），自然是愤慨得很。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带着庸人那种无与伦比的、令人叫绝的冷淡（或

愚钝)态度,用教训的口吻说道:“……这种办法<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把内战带进“生产过程”,这真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49页)

是的,是的,为了那些隐藏余粮、破坏粮食垄断法、使城市居民挨饿的剥削者和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当然是该叹息和流泪的。考茨基、亨利希·维贝尔(维也纳)、龙格(巴黎)和麦克唐纳(伦敦)之流先生们,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都赞成工人阶级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坏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而且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援引“生产过程”来掩盖这种为资本家效劳的卑鄙龌龊的行为……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向资产阶级阿谀献媚呢?

请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竟说了些什么。他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农民专政冒充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责备我们把内战带进农村(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功绩),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往农村,去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帮助贫苦农民,剥夺投机者、富裕农民违反粮食垄断法而隐藏起来的余粮。

一方面,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纯粹民主,主张革命阶级即被剥削劳动者的领袖服从多数居民(因而也包括剥削者在内)。另一方面,他反对我们,说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的,其所以是资产阶级性的,是因为农民整个说来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同时他又自以为是在维护无产者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头等的混乱。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支离破碎的自由主义学说,是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富农献媚。

这个被考茨基搅乱了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就完全阐明了。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拼命想在这一点上“揭露”我们,结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观点上的混乱,揭露了他害怕回忆起他在1905年还不是叛徒时所写的东西。

可是,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顺便指出，苏维埃所以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斋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强加给劳动群众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正是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认的那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财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这是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有考茨基那样的傻瓜或叛徒，才会认为这两种人是社会党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独立行动。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分析俄国革命时，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帮助资产阶级掩盖它的统治、欺骗群众的“民主”概念来支吾搪塞，忘记了“民主”实际上有时表现资产阶级专政，有时表现服从这个专政的市侩的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等等。照考茨基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资产阶级政党，有领导无产阶级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但是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阶级根源，没有小资产阶级根源！

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启发了群众，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一切“下层”、一切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离开了这样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优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

这个过程在1918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的浪潮遍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财主、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反映了群众的动摇，并且正是在1918年夏天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跟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流合污（在莫斯科举行暴动，普罗相占据了电报局，——占据了一小时！——向全国宣告布尔什维克已被推翻；后来，讨伐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集团军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又实行叛变^[327]，等等）；上面讲过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由于城市缺粮情况严重，粮食垄断问题（理论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经济分析中重弹十年前马斯洛夫的旧调，“忘记了”粮食垄断这件事！）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393页。——编者注

地主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民主共和制的旧国家，常常把实际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武装队伍派到农村去。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他不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尤其是资产阶级议会赞成这样做的时候！在 1917 年夏秋两季，阿夫克森齐耶夫、谢·马斯洛夫伙同克伦斯基、策列铁里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逮捕过土地委员会委员^[328]，这件事考茨基“没有听说过”，他对这件事只字不提！

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民主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这个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说真话，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话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维埃吸引他们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苏维埃共和国从两个首都把一队队武装工人，首先是比较先进的武装工人，派到农村去。这些工人把社会主义带到农村，把贫苦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况和到过农村的人都说，我国农村本身只在 1918 年夏秋两季才经历“十月”（即无产阶级）革命。转折点到了。富农暴动的浪潮被贫苦农民的奋起、“贫苦农民委员会”^[289]的发展所代替。在军队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员、工人出身的军官、工人出身的师长和集团军司令多起来了。正当傻瓜考茨基被 1918 年的七月危机^[329]和资产阶级的狂吠所吓倒，在资产阶级后面“使劲跟着跑”，写了一整本小册子，深信布尔什维克快要被农民推翻的时候，正当这个傻瓜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退出看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范围“缩小了”（第 37 页）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拥护者的实际范围却在无限地扩大，因为千百万贫苦农民正在觉醒起来，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摆脱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监护和影响。

我们失去的是几百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富农，得到的却是千百万贫苦农民。

在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一年以后，在这个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下，穷乡僻壤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它最终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最终地证明了国内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

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要附带说一句，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

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8 年 11 月 6—9 日）上，有表决权的代表有 967 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 950 人，有发言权的代表有 351 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 335 人。加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占总数 97%。

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未能准备好这种分化并使之实现，在1917年10—11月就立刻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20]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在这个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把一切都弄乱了，而在实践上简直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个极有意义极重要的问题，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样混乱，甚至更加混乱。这个问题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改革这一极困难的也是极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动，在原则上是否提得正确，其次，实际进行得是否恰当？西欧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是在看了最重要的文件之后对我们的政策提出批评，我们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也是对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帮助。但考茨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极大的理论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在实践方面则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庸俗的攻击。让读者来判断吧：

“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一看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了……”（不对，考茨基先生，您用您认为“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不同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革命历史证明，资产者同小资产者即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执行的是保持大地产的政策。谢·马斯洛夫的法令^[330]和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就战胜不了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地主。）

“……但是这应当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不同的解决办法。<考茨基最关心的是“社会党人”的“一致”，而不管自称社会党人的是谁。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一定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却忘记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一直在这些企业里当雇佣工人的农民，由他们用协作社的形式经营这些大田庄。但是采取这个办法要有农业工人，而俄国没有农业工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考茨基仍像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269]。他把各种解决办法罗列出来，不去考虑——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地考虑——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些怎样的过渡。俄国有农业雇佣工人，但人数不多，至于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怎样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协作社耕种制的问题，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考茨基一贯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么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革。

对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一点，考茨基则默不作声。更有甚者，他还玩了一套难以置信的偷梁换柱手法，在摘引苏维埃政权的法令

时，把最重要的地方丢掉。

考茨基声称：“小生产力求生产资料完全私有”，立宪会议会成为能够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权威”（这种论断在俄国只会令人捧腹大笑，因为大家知道，工农认为只有苏维埃有权威，立宪会议已经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地主的口号）。他接着说：

“在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规定：1. 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2. 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

考茨基仅仅引了这两条就作出结论说：

“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这始终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乡农民可以任意处理土地。”（第47页）

请看，这就是考茨基的“批评”的范例！这就是十分近乎伪造的“科学”作品。他向德国读者暗示：布尔什维克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向农民投降了！布尔什维克让农民各自（“各乡”）任意处理土地了！

其实，考茨基引用的1917年10月26日（俄历）颁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两条，而是五条，外加“委托书”八条，其中并指出这份委托书“应该作为指南”。

法令第3条说：产业转“归人民”；必须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委托书中说：“永远废除土地私有制”；“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不得分割”；“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一切土地都归入全民地产”。

其次，在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的同时，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现在已纳入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言第2条第1项说：“废除土地私有制”，“模范田庄和模范农业企业属于国家财产”。

可见，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并没有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另一个在农民看来有无比巨大权威的全民代表机构负起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责任。

其次，1918年2月6日（19日）公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331]。这个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全部私有农具和耕畜交给苏维埃当局支配，由联邦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法令对支配土地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

“减少个体经济，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来说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11条第5项）

这个法令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时对“谁有权使用土地”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第20条。）“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地表的为：（一）用于文化教育方面：（1）国家即苏维埃政权（联邦、区域、省、县、乡、村等各级政权）机关。（2）社会团体（由地方苏维埃政权监督和批准）。（二）用于经营农业方面：（3）农业公社。（4）农业合作社。（5）村团。（6）单个家庭和个人……”

读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实，他向德国读者介绍的俄国无产

阶级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基本问题，考茨基甚至提都提不出来！

这些问题就是：

(1) 平均使用土地以及

(2) 土地国有化。这两种办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系。

(3) 共耕制是从分散的小农业到公共的大农业的过渡；苏维埃法令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能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下列两个基本事实：（一）布尔什维克在估计 1905 年的经验时（例如见我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著作）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具有要求民主的进步意义、革命意义，1917 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明确地说过这一点。（二）布尔什维克在通过土地社会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是这个法令的“灵魂”）时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我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而大多数劳动者的主张和要求应该由他们自己抛弃，因为这种要求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跳过”。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帮助农民抛弃小资产阶级口号，使他们能尽量迅速、尽量容易地从这种口号过渡到社会主义口号。

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学分析帮助工人革命，就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具有要求民主的革命意义，具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意义，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第二，布尔什维克投票通过（并十分忠实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资产阶级法令，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从理论上说，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考茨基永远也无法否认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这个革命只能到此为止。当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它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众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的不足，必须超出这个范围，过渡到社会主义。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农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止摆脱了地主、摆脱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农民去实现这种理想。无产者对农民说：我们要帮助你们达到“理想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产者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同时我们要向你们指出这种办法的不足和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样试图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这种领导的正确性，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考茨基宁愿回避问题……

其次，考茨基公开欺骗德国读者，对他们隐瞒了这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令中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了它们直接的优先权。

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这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乱套了，连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一方面，他不敢说无产者

在平均使用土地问题上应该同农民分道扬镳，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荒谬的（而且考茨基在 1905 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曾明确而直接地坚持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自由主义庸俗言论，这位马斯洛夫“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却不说小资产阶级争取平等、争取平均使用土地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来看是进步的 and 革命的。

考茨基的观点混乱到了极点。请看，他（1918 年）坚持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他（1918 年）要求不要超出这个范围！而同一位考茨基又认为把小块土地租给贫苦农民这种小资产阶级改革（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含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还暴露出他和庸人一样不善于考虑一定政党的实际政策。他摘引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却不愿意看到孟什维克党 1917 年的实际政策；当时孟什维克党同地主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坚持实行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坚持同地主妥协（证据就是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和谢·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没有看见，彼·马斯洛夫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是反动的和空想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掩盖孟什维克主张农民同地主妥协（即让地主欺骗农民）而不许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

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 and 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考茨基枉费心地重复着自由派的蹩脚的俏皮话：“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影响下过渡到集体生产。”（第 50 页）

多么俏皮啊！

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大国的小农都没有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

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没有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用宣传、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援助贫苦农民的条件下，碰到过贫苦农民同富裕农民公开的阶级斗争以至国内战争。

无论何时何地，投机者和富人没有在农民群众这样破产的情况下这样大发战争财。

考茨基重弹老调，搬弄那些旧道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任务连想也不敢想。

请问可爱的考茨基，如果农民缺乏经营小生产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国家帮助他们取得集体耕种土地的机器，这难道是“理论说服”吗？——

现在来讲土地国有化问题。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否认我们实行的办法是土地国有化。他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既然我们还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土地私有制的废除就是土地国有化。“社会化”一词不过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愿望和准备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国有化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考茨基在这里也是连理论问题都提不出来，或者是（这就更糟）故意回避问题，虽然从俄国文献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

土地国有、土地地方公有（将大田庄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土地分配问题上早就有过争论。

考茨基硬说，将大田庄交给国家，然后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就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笑。我们已经指出，这里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这里也没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听信了孟什维克的话。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考茨基为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辩护，责备布尔什维克妄想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自己又拿自由主义的改革冒充社会主义，而且不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将土地占有方面的中世纪制度完全肃清！结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维克顾问一样，不是维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维护害怕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

究竟为什么只把大田庄收归国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呢？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用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旧东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彻底），最容易恢复旧东西。激进派资产阶级，即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却是土地国有的口号。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差不多在 20 年前，曾写过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杰作，他不会不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土地国有正是资产阶级最彻底的口号。考茨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战以及他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

被考茨基不恰当地选为自己的顾问的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曾认为俄国农民不会赞成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在内）国有化。马斯洛夫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论（这个理论重复着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意见），即否认绝对地租、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或如马斯洛夫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事实”）的观点有联系的。

其实，早在 1905 年革命中就已经表露出，俄国大多数农民，无论村社社员或单独农户，都赞成全部土地国有化。1917 年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它就实现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企图（同考茨基对我们的凭空指责刚好相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民思想家中最激进、最革命、最接近无产阶级的分子，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了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的办法。从 1917 年 10 月 26 日起，即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国土地私有制就被废除了。

这就造成了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好的基础（如果考茨基不背弃马克思学说，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也建立了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完全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才为促进和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见，考茨基献给读者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混乱思想，他指责布尔

什维克不懂得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己却暴露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闭口不谈土地国有化，同时把最不革命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当作“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这里已经接触到了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对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认识得够不够。考茨基在这里又玩弄了一套近乎伪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关于向集体耕种制过渡的任务的“提纲”！我们这位“理论家”引了其中一条之后，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任务，并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页）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像考茨基那样堕落到用文字骗人。他摘引“提纲”，而不提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他谈论“理论说服”，而不提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既掌握工厂，又掌握商品！1899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国家拥有使小农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手段时所写的一切，被1918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干干净净。

当然，几百个由国家维持的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即由国家出资、由工人协作社耕作的大农场）是很不够的。可是考茨基回避这个事实难道能够叫作“批评”吗？

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最充分地保证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胜利会使土地国有化退到土地分配（关于这一点，我在论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内作了专门的分析）。此外，土地国有化为无产阶级国家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总之，考茨基在理论上真是一塌糊涂，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是向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卑躬屈膝。他的批评真是妙不可言！

考茨基对工业所作的“经济分析”是用下面这段妙论开场的：

俄国有资本主义大工业。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呢？“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厂矿拿来当作自己的财产<直译就是据为己有>，以便每个工厂单独经营，那是可以这样设想的。”（第52页）考茨基补充说：“正是今天，8月5日，当我写这段话时，莫斯科报道了列宁8月2日的一篇讲话，说他在讲话中提到：‘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第52—53页）

我们把这段议论全部抄下来，好让从前尊敬过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国工人亲自看看投降资产阶级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真难以设想，8月5日俄国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工厂国有的法令，而且没有一个工厂被工人“据为己有”，所有工厂都归共和国所有，可是在这个8月5日，考茨基竟用明显的欺骗手法来解释我的讲话中的一句话，想使德国读者相信俄国把工厂交给了一个个工人！接着考茨基在好几十行里喋喋不休，说不能把工厂交给单个工人！

这不是批评，而是资本家雇来诬蔑工人革命的资产阶级奴仆所使用的手

法。

工厂应该交给国家，或者交给地方自治团体，或者交给消费合作社，——考茨基再三这样说，最后他补充道：

“在俄国，人们现在也试图走这条道路……”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8月吗？为什么考茨基不能请他的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或俄国资产阶级的其他朋友哪怕译出一个工厂法呢？

“……在这方面走了多远，现在还看不出来。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方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但是这一方面现在还完全处于朦胧状态。法令并不缺……<因此考茨基忽视了或对读者隐瞒了法令的内容！>可是关于这些法令实施的情况，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全面的、详尽的、可靠的、报道迅速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建立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而且根本无从核对。这也是实行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第53页）

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考茨基从资本家和杜托夫分子的“自由”报刊上会得到关于工厂交给工人的消息……这个超阶级的“郑重的学者”真是妙不可言！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是苏维埃政权设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愿意提起。他像套中人^[173]那样顽固，口口声声说：给我和平的民主，没有内战、没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统计（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统计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统计人材，当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统计，还是不可能的）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没有革命的革命，没有激烈斗争的革命，没有暴力的革命。这同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请把这种“社会主义者”同庸俗的自由主义官僚区分区分看！

考茨基根据这种“实际材料”，也就是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故意避开无数事实，得出“结论”说：

“俄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真正实际果实（不是法令），是不是会比它从立宪会议——后者也同苏维埃一样，大多数代表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多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第58页）

这不是妙得很吗？我们奉劝考茨基的信徒们把这段名言拿到俄国工人中间广为传播，因为这是考茨基提供出来说明他在政治上堕落的最好不过的材料。工人同志们，克伦斯基也曾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历史学家考茨基只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据为己有”的那个称号。至于证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时期支持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抢劫行为的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至于正是这些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在立宪会议中占了多数的事实，考茨基则很谦虚地隐讳不谈了。这还叫作“经济分析”呢！……

最后还举一个“经济分析”的范例：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9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第41页）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让我们听惯了这种议论。俄国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说：9个月过去了，你们拿出普遍福利来吧，就是说要在四年毁灭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总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绝无差别，丝毫没有差别。用“社会主义”作

招牌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在重述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话。

上面这些，是我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写的。当天午夜得到了从德国传来的消息，说已经开始的革命首先在基尔和北方沿海一带的其他城市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已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随后在柏林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了。^[332]

本来还要给这本论述考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写个结束语，现在也就多余了。

尼·列宁

1918 年 11 月 10 日

附录一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333]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我读了考茨基的这本书之后，才看到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1918年巴黎版），禁不住要把两本书作个比较。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思想领袖；王德威尔得是社会党国际局主席，是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饰，以老练的记者的圆滑手腕“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前者特别清楚地表明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笨拙，好发空论，粗暴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后者典型地表现了在罗马语国家——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特点，即比较圆滑，不那样笨拙，比较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所用的基本手法则与前者相同。

他们两人都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问题谈得多些。他们两人都抹杀这两个问题极其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两人都丝毫没有那种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丝毫没有那种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面目全非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丝毫没有说明革命的任务不同于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奴隶的体系或秩序、制度这种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享一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这种作用。

现在我们举出王德威尔得几个最重要的论断来证实我们的看法。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非常热中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把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引了不知多少，因为这一点已被他们的实践纳入纯议会斗争的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认为必须对部分过时的《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即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打碎这个机器。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约而同闭口不谈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区别开来的东西。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考茨基通过粗暴的伪造来干这件事。王德威尔得则用比较巧妙的手法来干同样的勾当。他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一节即第4节中，专门用（b）分节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问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再说一遍：他恰恰把最主要的地方，即讲到打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地方丢掉了），并作出结论说：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象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公社，但这次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获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中心获得胜利。

这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因为目前已经看得很明显，许多国家在战后时期必将发生空前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说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革命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无产阶级没有充分作好准备来利用那由于情势的发展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政权以前，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第 73 页）

涉及问题实质的，仅此而已！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代表人物！1912 年，他们签署了巴塞爾宣言，在宣言中直接谈到后来在 1914 年爆发的那种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明确宣告这种革命将要到来。但是，当战争已经发生、革命形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却开始拒绝革命了。请看，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只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议的假设！这同考茨基关于苏维埃在欧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论断毫无二致。

但是要知，一切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现在一定会同意说：新的公社“并非不可思议”，苏维埃将起很大的作用，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应该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新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对这个问题作过许多详细的说明，王德威尔得对它们却一概不提。

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实践家和政治家应当说明，现在只有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拒绝下列任务：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类型的，苏维埃类型的，或者什么第三种类型的）的必要性，说明作好进行这种革命的准备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驳斥反对革命的市侩偏见等等。

无论考茨基或王德威尔得都根本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他们的社会主义者声誉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

我们从理论上提出问题。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认并赞成这个真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问题：当无产阶级争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镇压哪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用什么手段镇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认、赞成并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他的书第 72 页），但是……他只字不提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资本家先生们）问题！！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完全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叛徒行径之所在。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编的词典——没说的，真是渊博的著作！——王德威尔得的书第 87 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摘抄这个渊博的庸俗论调，称赞这种论调，把这种论调和马克思的言论放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说，“国家”一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构、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ê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的代表的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过于绝对的论断，会有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第156页）

请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否认绝对真理，是要阐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折中主义者不愿意要“过于绝对的”论断，为的是暗中贯彻他们那种市侩庸人的愿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之后将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径。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辩证法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同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区分开来。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和诡辩家，比考茨基巧妙，精细，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语，可以避开任何革命问题，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因为，有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资产者会想到“一般地”否定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王德威尔得写道：“我同意盖得的意见，如果不预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1. 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变成门格尔所说的劳动的人民国家。

2. 把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象圣西门所说的，把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分开。”（第89页）

王德威尔得把这段话加上了着重标记，来特别强调这些论点的意义。其实这是最纯粹的折中主义的糊涂观念，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决裂！要知道，“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语，不过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斥责为无稽之谈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旧调重弹^[334]。“劳动的人民国家”的说法是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词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论，而没有觉察到这只能造成糊

涂观念。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涂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忽视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视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其次，只有在任何国家都消亡了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失而让位给对物的管理。王德威尔得用这种比较遥远的未来，去掩盖和冲淡明天的任务——推翻资产阶级。

这种伎俩还是等于替自由派资产阶级效劳。自由主义者同意谈谈对人用不着管理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不能沉醉于这种无害的空想呢？至于无产阶级镇压抗拒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那就闭口不谈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是王德威尔得恭维无产阶级。恭维是不难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善于恭维自己的选民。但掩藏在“恭维”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王德威尔得详细地转述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言论^[335]，说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公然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

1918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

论“民主”和专政

(1918年12月23日)

莫斯科收到的几期柏林出版的《红旗报》^[336]和维也纳出版的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呐喊报》(Weckruf)^[337]向我们表明,社会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支持者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遭到了德奥两国革命无产者的真正代表的应有的回击。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两家机关报,它们显示了第三国际的活力和它的成长。

看来,现在不论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这样一个问题: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政权?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的所有代表人物,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拥护立宪会议,并称自己的观点是捍卫“民主”(考茨基甚至说是“纯粹民主”)反对专政。对于考茨基的观点,我已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刚出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小册子中作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把这个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简要地阐述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实际地提上了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程。

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企图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整个国家政权机构吧!让一小撮剥削者继续利用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吧!资产阶级喜欢把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选举叫作“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选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用来掩盖真相,掩盖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仍然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因而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对资产阶级来说,在人民面前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利的,必需的;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重复这个论调,实际上是抛弃无产阶级的观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次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这是在1872年),认为必须特别提醒工人注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叛徒考茨基写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本小册子,对工人隐瞒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本小册子受到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的热烈赞扬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的人就是这样赞扬的。

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不仅被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且被四年掠夺战争弄得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而资本家和投机商继续掌握着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

见本卷第587—682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

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遗憾的是现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在帮他们的忙）赞同这种谎言、这种伪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予以揭穿，直接而公开地向工人和劳动群众说明真相：民主共和国、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彻底认清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富人的民主是谎言、欺骗和伪善，才能实行穷人的民主，也就是使工人和贫苦农民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下）大多数劳动者事实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这些好处的。

例如拿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来说。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硬要工人相信，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民主”的。这是撒谎，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农村的长工和日工实际上被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这种权利是由考茨基和伦纳之流先生们来捍卫的，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跑到他们那边去了）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法官等等排除于民主之外。目前德意志“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谎言，就是伪善，因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占有”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等等的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

于是，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和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些外国的同道者，如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就大叫起来，说这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粹的”民主！

我们回答说：不对！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人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人即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在世界历史上空前地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而资本使任何一种、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变得面目全非和残缺不全。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完全消亡的唯一道路。

资产阶级的伪善的朋友们即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天真的小资产者和庸人们问道：为什么不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粹”民主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小业主必然始终动摇不定，软弱无力，愚蠢地幻想“纯粹”民主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因为，要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只能靠被压迫阶级的专政。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这是由于只有无产阶级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了并

且“训练出来了”，只有它能够把那些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摇摆不定的劳动群众吸引过来，或者至少能使他们保持“中立”。因为，只有甜蜜蜜的市侩和庸人才会幻想不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镇压剥削者反抗的过程就可以推翻资本的压迫，并用这种幻想欺骗自己，欺骗工人。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反抗还没有公开地展开，因为对剥夺者的剥夺暂时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剥夺一经开始，剥夺者就会拚死地、疯狂地进行反抗。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对自己和工人隐瞒这一点，就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紧要关头放弃进行阶级斗争和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立场而采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采取“社会和平”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调和的立场。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迅速地教育着人们。德奥两国的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农很快就会明白，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利茨和伦纳之流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一定会唾弃这些“社会主义叛徒”，这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主义叛徒，就像俄国无产阶级唾弃了同样的一些小资产者和庸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6]一样。无产阶级一定会看出，——上述这些“领袖”统治得愈厉害，无产阶级就会愈快地看出——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关于这种国家，马克思谈得很多，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歪曲和背叛了他的思想）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和战争。

1918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1月3日《真理报》第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83—388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编者注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1918年底或1919年初)

《贫苦农民报》^[338]编辑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好书。应该把这本书尽量介绍给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这本书用生动的例子精辟地加以说明的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吸取。这本书就是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在当地出版的、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同志写的《持枪扶犁的一年》^[339]。

作者介绍了韦谢贡斯克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领导者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先是国内战争，当地富农的暴动及其被镇压，然后是“和平建设”。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写得非常朴实生动，别人来转述，只会使原书减色。应该广泛传播这本书，并希望有尽量多的从事群众工作、深入实际生活的人来介绍自己的经验。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哪怕几十部最真实、最朴实、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实际内容的佳作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大量发表那些热中于写作、往往埋头书斋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著作家的报刊文章和成本著作要有益得多。

现在从亚·托多尔斯基同志的书中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里谈的是不要让“商人”“失业”，而要迫使他们“干工作”的问题。

“……为此目的，执行委员会叫来了三个年富力强、特别能干的厂主——E.E.叶弗列莫夫、A.K.洛金诺夫和H.M.科兹洛夫。在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的胁迫下，他们参加了建立锯木厂和制革厂的工作。于是两个厂的建厂工作立刻就开始了。

苏维埃政权没有找错人。厂主们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几乎最先懂得了，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牢牢掌握着政权的真正主人。

完全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努力去执行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到现在，韦谢贡斯克已经有了一个全部开工的锯木厂，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全部需要，并在为重建中的铁路完成定货。

至于制革厂，厂房已经落成，正在安装从莫斯科运来的发动机、鼓轮以及其他机器，不出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韦谢贡斯克就会有本地出产的皮革了。

用‘非苏维埃的’人手建设了两个苏维埃的工厂，这很好地说明了应该怎样同敌对的阶级作斗争。

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

每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机关，每个工厂、土地局，都应该把这个精辟的、完全正确的论断刻在木板上挂起来。因为偏僻的韦谢贡斯克的同志们明白了的道理，往往是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经常有一些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一提到合作社，他们就轻蔑地嗤之以鼻，一本正经地（又是极其愚蠢地）说：这不是苏维埃人，这是资产者、小店主、孟什维克；例如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合作社工作者就曾用自己的资金周转活动掩盖他们对白卫分子的援助；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供应和分配机关应该由纯粹的苏维埃人来建立。

这种论调是混淆真理和谎话的典型，其结果是严重地歪曲了共产主义的任务，对我们的事业贻害无穷。

不错，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是在“赚钱第一”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领导人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熏陶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机构里白卫分子或白卫分子的帮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把一个无可争辩的道理简单化，加以滥用，从而作出荒谬的结论，那就糟糕了。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共产主义，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因为这里说到的人才是文明机构的一部分）来建立共产主义。这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所在，但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建立和顺利建立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成性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建设新社会，而愿意用在特别的温室和暖房里培养出来的特别高尚的人建设新社会。现在，这种可笑的想法，人人都觉得可笑，人人都加以唾弃。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善于认真思考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真思考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用千百年来被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和细小分散的经营所败坏的，为争夺市场上的一块地盘、为了自己的产品或劳动能卖个好价钱而进行的混战所败坏的大批人才来建设共产主义。

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的机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在政治上不可信赖；但决不当得出结论说，可以不利用它来进行管理和建设。所谓政治上不能信赖，就是不能让非苏维埃人员担任政治上的要职，就是肃反委员会要严密监视那些倾向于白匪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成员。（顺便说一下，并不一定要走过头，像拉齐斯在他那个喀山杂志《红色恐怖》上那样讲荒唐话。拉齐斯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他本想说，红色恐怖就是对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剥削者实行暴力镇压，但他却在他那个杂志第1期^[340]第2页上说：“在审理案件时，不必寻找<!!?>被告是否用武器或言论来反对的苏维埃的罪证。

在政治上不信赖资产阶级机构的人员，是合理的，必要的。拒绝利用他们来进行管理和建设，却是愚蠢之极，对共产主义极为有害。谁想举荐孟什维克，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政治领导者，甚至是政治顾问，那他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每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都会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政治流派，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同时不仅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而且文明资本主义的、在大资本主义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合作社、知识分子等，也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甚至在落后的俄国，也产生了许多如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之类的、善于利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的资本家。难道我们比这些资本家还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

载于 1926 年 11 月 7 日《真理报》第 258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401—404 页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341]

(1919年3月上旬)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3月4日)

1. 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342]用各种方式重复这一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它是欺人之谈。

2. 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3. 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4. 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一个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那些现在大反专政而维护民主的人中间，没有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又改变腔调，说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恩赐给了劳动者，说资产阶级已不再反抗，愿意服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说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资本镇压劳动的国家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编者注

机器。

5. 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限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6. 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7. “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8. “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

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9. 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304]，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

10.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平等”之名发了一大笔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

11. 在欧洲大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得到的共和制自由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使德国工人和全世界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343]，不仅因为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件使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的情况下，军官和资本家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者即受到国家政权监护的人，这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些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表示愤慨，但又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不是迟钝，就是伪善。在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所谓“自由”，就是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只是使它更加尖锐。而

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

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则发生了蹂躏布尔什维克的大暴行，如此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称为野蛮和罪恶之乡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简直是笑话。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12.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13. 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 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

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344]，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

(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 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 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

17. 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而且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8. 苏维埃国家组织便于无产阶级这个由资本主义高度集中起来和教育出来的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

19. 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

20. 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21. 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345]刊载了“独立党”^[346]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Träger und Schützer der 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

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

22. 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6]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

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24]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347]。

2月1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月9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

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博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348]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

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19]。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349]。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滕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336]上看到一篇文章^[350]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滕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像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289]，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

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主要任务是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政党，我们力争并且应当力争在苏维埃中占多数。那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革命。不然的话，就不大容易取得胜利，胜利了也难以持久。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

提纲载于 1919 年 3 月 6 日《真理报》第 51 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51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485—501 页

报告载于 1920 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

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3月18日)

同志们！在全世界工人纪念巴黎公社的英勇起义及其悲惨结局的日子，我们来安葬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在革命胜利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比谁都更充分更完整地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而且正是这一点，远比他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更能显示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用。

同志们！在认识肤浅的人看来，在我国革命的大量敌人和至今还动摇于革命和革命敌人之间的人看来，革命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对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敌人的坚决无情的镇压。毫无疑问，没有这一特征，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这个革命无比深刻的、久恒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在斗争进程中就涌现了这样一些领袖人物，他们最能体现以前的革命从没有过的一个特点，即组织群众。也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出现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这样一位首先是和主要是组织家的人物。

同志们！特别是在对革命者来说处境困难的时期，在艰难持久、有时是痛苦而极其漫长的革命准备时期，我们俄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理论、原则、纲领同实践脱节，我们最常犯的毛病是过分埋头于理论而同直接的行动脱离。

在几十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有很多先烈忠于革命事业，但未能找到实践自己革命理想的办法。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为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提供了真正的土壤，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环境，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正是那些做实际组织工作的领袖，他们赢得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已经赢得并理应享有的那种特别突出的地位。

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在活动初期，他还完全是个青年，那时，他刚有了政治觉悟，就全心全意地从事革命了。在这个时期，即20世纪初，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突出的典型：他抛弃了家庭，抛弃了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舒适生活和习惯，全心全意投身于革命，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从监狱到流放地，从流放地到监狱，磨炼出了使革命者能经受住长期考验的那些品质。

这位职业革命家一时一刻也没有脱离过群众。沙皇专制的条件曾迫使他和当时所有的革命家一样主要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但就在秘密的地下工作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也始终同先进工人肩并肩、手携手地共同前进，而这些先进工人恰好是从20世纪初就开始接替知识分子出身的老一代革命家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先进工人成百成千地参加了革命工作，磨炼出了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意志，没有这种坚强意志，没有同群众的牢固联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长期进行秘密工作，但像他这样一个人还一直参加斗争，从不脱离群众，从来没有离开俄国，始终同优秀工人一起行动。尽管对革命者的迫害迫使他同实际生活隔绝，他仍然把自己锻炼成了不仅是受工人爱戴的、对实际工作十分熟悉和精通的领袖，而且是先进无产者的组织家。有些人，特别是我们的敌人或动摇分子，常常认为，职业革命家一心一意地进行秘密工作的这种特点会使他脱离群众，可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进行革命活动的榜样，正好向我们表明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其实相反，正是那种通过多次坐牢，多次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造就出了这样一些领袖，我们无产阶级的精华。有了这种忠诚，再加上识别人才和进行组织工作的秉赋和才能，就锻炼出来了大组织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只是通过秘密小组，通过革命的地下工作，通过秘密政党（谁也没有像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完整地体现了这个政党），只是通过这个实践的学校，通过这一途径，才成了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头号人物，才成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头号组织家。

同志们！凡是和我一样天天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起工作的人，都特别清楚，全靠他的非凡的组织才能，我们才取得了我们至今都引以自豪而且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成就。他使我们完全能够同心协力地卓有成效地进行无愧于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真正有组织的工作，没有这种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工作，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成就，我们就不能克服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中的任何一个困难，就经受不住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严重考验中的任何一次考验。

在革命这种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在每一个革命者所处的特殊岗位上，当一个哪怕是人数不多的领导集体进行工作总是争论不休的时候，在斗争过程中赢得的巨大的无可争辩的道义上的威信，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当然这种威信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道义上，而是建立在革命战士的道义上，建立在革命群众的道义上。

一年多来，我们能够肩负起落在少数忠心耿耿的革命家身上的力不胜任的重担，领导集团能够如此坚定、如此迅速、如此齐心地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完全是由于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这样一位才华超群的组织家在他们当中担任了最主要的职务。只有他兼备了对无产阶级运动领导人员最深刻的了解，只有他通过多年斗争（关于这个斗争，我在这里只能谈得极简短）锤炼出了实践家的惊人的敏感、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最高的威信，而靠了这种威信，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一个人就完全领导了要一批人才能领导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最大的工作部门。只有他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在解决许多极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时，只要他说一句话，不必召开任何会议，不必进行任何形式上的表决，问题就得到了明确的彻底的解决，而且大家完全相信，问题是靠实际知识和组织家的敏感解决的，不仅成百成千的先进工人而且群众也认为这样解决是彻底的。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其斗争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谁也不会相信，从秘密小组和地下工作这样的学校中，从受迫害的小小政党和图鲁汉斯克监狱这样的学校中，会产生

这样一位拥有最高威信的组织者，这样一位俄国全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这样一位就其知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的工作的组织者，这个党建立了苏维埃，实现了苏维埃政权，而这种政权现在正在通过艰难的、痛苦的、流血的、然而胜利的进军向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扩展。

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如果把代替理解为能够找到一个具备同样能力的同志的话。凡是熟悉和观察过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经常工作的人，都不会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的确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强大，正在于它有着无穷无尽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为了接替忘我地献身革命并在斗争中牺牲的人们，革命会造就出一批批新人，这些人刚踏上路途时也许经验较少，知识较浅，素质较差，但他们与群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选拔一批批人才来接替那些去世的最有才华的人，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创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深信，俄国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一定会从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当中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为数众多的人才，他们将贡献出实际的生活知识，贡献出个人的或至少是集体的组织才能，没有这种知识和才能，无产者的千百万大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形象将不仅是一个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象征，不仅是把冷静而熟练地处理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同善于领导群众结合起来的典范，而且也是愈来愈多的无产者群众一旦仿效这种范例就能不断前进、直到取得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

载于 1919 年 3 月 20 日《真理报》第 60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69—74 页

俄共（布）纲领草案^[351]

（1919年2月）

1 俄共纲领草案初稿

纲要：党纲由下列部分组成：

1. 引言。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已经开始并在各地迅速发展。要了解这个革命，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不可避免性。2. 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分重申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即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241]的主要部分，以便附带阐明我们的世界观的“历史渊源”。3. 帝国主义。根据1917年5月的党纲草案。4.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和新国际。根据1917年5月的草案改写。5.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根据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的草案。6. 这些任务在政治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7. 在民族、宗教、教育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8. 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9. 在土地问题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10. 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具体化（施米特正在写）。11和12. 对其他方面的补充（还没有写）。

这个初稿有许多地方还写得不完善，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因此有些地方暂时用了解释性的表述而没有用纲领的表述方式。

（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首先需要弄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即基本性质，弄清它们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其次需要弄清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并把无产阶级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并且已经引起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 and 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478页和第34卷第65—71页。——编者注

(6) 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 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8) 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困难加剧。

(9)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11) 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12)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 20 世纪初开始) 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集中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13)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8 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

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 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16)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 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 1914—1918 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几乎一切先进国家都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拿出一小部分这样得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保证这些上层分子能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

(18) 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相当广泛而具有国际性，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和腐朽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国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现时的基本任务是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把一切工厂、铁路、银行、船队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

利用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而坚定地过渡到共耕制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这个联盟已使土地私有制废除，已使关于由小农经济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已站在无产者方面的现代农民思想家把这种形式称为土地社会化）的法令^[331]得以颁布；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高得多和进步得多的民主形式，而根据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 1905 年和 1917—1918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唯一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国家类型；

全面地和充分地利用已在俄国燃起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以便制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企图干涉俄国内政或联合起来公开反对和进攻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使革命蔓延到比较先进的国家以至所有的国家中去；

用一系列逐步而坚定的措施彻底消灭私人贸易，组织起统一的经济整体（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这样一个整体）中各生产公社和消费公社之间的正

确的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政治方面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为了从政治上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特别是议会制曾经是（必需的）必要的，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的情况下，任何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步骤都是为剥削者即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绝对反动的行为。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

苏维埃共和国——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如下：

（1）建立和发展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群众性的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对他们的组织设置无数的实际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像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2）苏维埃国家组织使那一部分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社会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经受过锻炼最多的劳动群众，即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实际的优越地位。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这种优越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为了把工人分裂成互相竞争的集团而在他们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影响，组织和教育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

（3）资产阶级民主制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而实际上却伪善地掩盖剥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够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群众。苏维埃国家组织戳穿了这种欺骗和伪善，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一切劳动者的真正平等，把剥削者排除出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之外。全部世界史的经验、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苏维埃国家组织适合于镇压这种反抗，否则就谈不上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4）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5）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

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国家机构同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的先进无产者群众的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系，除了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外，也为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

（6）苏维埃组织使我们建立了一支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农武装力量。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即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

（7）苏维埃组织无比深入地和广泛地发展了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制比中世纪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即居民参加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因为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而实际上又加以限制。同时苏维埃组织还屏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这一制度巴黎公社已开始废除，其狭隘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苏维埃把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而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这道围墙，因为资产阶级议会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投机家的金融勾当和交易所勾当，保障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国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摧毁了官僚主义这座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忙于几乎超过人力所及的极度紧张的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9）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这一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不断变换这些工作，以便能接触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全部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10）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束缚。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民族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俄共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使各民族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在先前加入俄

罗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中正在迅速消失，正在随着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而消失，但这种不信任并不是在所有民族和所有劳动阶层中都已完全消失。因此，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认真地实行各民族的真正的平等和分离的自由，以便消除这种不信任的基础，而使各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一个自愿的最紧密的联盟。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协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启发他们去反对中世纪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协助那些在此以前受压迫的或不平等的民族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

在宗教政策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俄共）的任务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助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 1917 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

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

（1）对未满 16 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2）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3）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4）加强对教师的鼓动和宣传工作。

（5）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师骨干。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学自修（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8）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2）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

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决不能墨守成规。一方面应当用实际试验的结果来检查每一步骤，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工会应该密切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其他国家管理部门的联系，并且巩固这种联系。另一方面，工会应当更加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以便在工人先锋队的监督下把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普及到比较落后的工人中去。

（3）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进行长期的工作来教育群众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还要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在通常情况下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的科学技术专家。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像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

同时，要不断努力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而且不要一看到个别不可避免的失利就无所措手足，要耐心地启发有科学素养的人，使他们意识到把科学用于个人发财和人剥削人是极其卑鄙的，意识到使科学为全体劳动群众所了解则是更为崇高的任务。

（4）要实现共产主义，绝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因为这种散漫性和分散性是使资本有力量而劳动没有力量的根源之一。反对行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反对行会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与消灭城乡对立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进行这一斗争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不预先大力提高国民劳动的生产率，要广泛地开展这一斗争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开始时不妨在地方上小范围试办，以便把各行业各地区要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措施的效果加以比较。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远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负一定的社会工作。

（5）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

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合作社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过渡手段。利用合作社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同类的任务，因为领导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合作社机构的是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头脑和经营作风的人。俄共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生产消费公社的过渡。

(6)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得到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这一项措施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残余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准备和实行这些和诸如此类的措施所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 在财政方面，俄共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多数工厂和其他企业的私有制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一定部分的收入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进行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后者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土地问题方面

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剥夺了地主和实施了承认大规模地共同经营土地的优越性的土地社会化法令以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在这方面寻找和试行各种最合理最实际的过渡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的基本路线和指导原则仍旧是力求依靠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首先应该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289]是这方面的步骤之一，建立农村党支部，改选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以清除富农分子，建立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应当严格地予以执行。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社会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决不能把镇压手段扩大到他们身上；中农就其阶级地位来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盟者，或者至少是中立者。因此，尽管有不可避免的局部的失利，尽管中农动摇，但必须坚定不移地力求同他们妥协，关心他们的一切愿望，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在这方面，

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工会帮助下或采取其他办法建立起更严格的监督，反对那些打着共产党员招牌、实际上执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政策而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政策的苏维埃政权代表的违法乱纪行为，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驱除出去。

至于向共产主义的农业过渡的办法，俄共将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三个主要措施，即国营农场、农业公社^[288]和共耕社^[352]（以及协作社），注意更广泛更正确地运用它们，特别是注意发动农民自愿参加这些新式共耕组织的方式，组织劳动农民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同志纪律。

在粮食政策方面，俄共坚持要巩固和发展国家垄断，同时也不拒绝在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的条件下，为了把工作组织得很好而利用合作社和私商或商业职员，并实行奖励制度。有时不得不采取的部分让步纯粹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且国家决不会因为这种让步而放弃实行垄断的坚定意向。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实行国家垄断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和一系列过渡措施的试验，目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普遍地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并正确地发挥它们的作用，把一切余粮交给国家。

载于 1919 年 2 月 23 日《彼得格勒真理报》第 43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76—93 页

2 俄共（布尔什维克）纲领草案

（1）1917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它通过帝国主义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的旧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正确的（如果不算社会民主党这个不确切的名称）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

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 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8) 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困难加剧。

(9)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11) 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12)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消灭着自由竞争，在 20 世纪初造成了下列情况：资本家的强大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银行资本与大量集中的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资本加紧向外国输出；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包罗愈来愈多的资本主义列强集团的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个金融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空前剧烈的时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13) 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1914—1918 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和破产，

——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 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16)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 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 1914—1918 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这个骗人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拿出一小部分靠这种掠夺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保证这些上层分子能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特别是现在，当他们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武力来镇压本国和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

(18) 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这个国际不仅在名称上回复到马克思主义，而且正以它的全部思想政治内容和全部行动来实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歪曲清除干净。

载于 1919 年 2 月 25 日《真理报》第 43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94—98 页

3 党纲政治部分的补充

同时，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作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涉及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针对剥削者，只是针对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之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

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权^[353]。

载于 1930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13 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99 页

4 党纲政治部分的片断^[354]

苏维埃宪法^[287]保证工农劳动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罢免代表,同时也就消灭自巴黎公社时起就已暴露出来的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议会脱离群众等缺点。

苏维埃宪法还用下述办法使国家机构同群众接近,即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按生产单位(工厂)划分。

在苏维埃制度下,由于国家机构同群众有更紧密的联系,可以建立……

载于 1919 年 2 月 26 日《真理报》第 44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00 页

5 党纲中民族关系方面的条文

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而是坚定不移地真正使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完全解放殖民地民族和其他被压迫的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使他们有分离的自由,这样才能保证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劳动群众的不信任和被压迫民族工人对压迫民族工人的愤恨完全消失,而代之以自觉自愿的联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是压迫者的那些民族的工人,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例如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对犹太人,鞑靼人对巴什基尔人等等),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

载于 192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3 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01 页

6 党纲中民族问题条文的最后草案的补充^[355]

对于谁是民族分离的意志的代表者这一问题,俄共持历史的和阶级的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它的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苏维埃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等。在任何情况下……

载于 192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3 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2页

7 党纲中军事方面的条文的引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苏维埃共和国在军事任务和军事工作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正如我们党早已预见到的那样，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没能由公正的和约而结束，而且根本没能由资产阶级政府简单地缔结一个稍许稳定的和约而告终。民主派即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幻想已为事变进程完全推翻。实际正好相反，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变为而且我们眼看着正在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反对剥削者、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剥削者的反抗随着无产阶级加紧进攻而不断增强，并由于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而特别加剧，同时，资产阶级在国际上还互相声援并组织起来，这一切必然会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同无产阶级国家和维护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由于这些战争的阶级性质，防御战和进攻战之间的区别已完全失去任何意义。

总的说来，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从1918年底特别迅速地展开的这一国际性的国内战争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经阶段。

因此，俄共坚决屏弃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他们自称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废除武装的反动的市侩幻想，坚决反对实际上只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一切类似的口号，而提出以下的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彻底地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既在国内战争中也在国际的革命战争中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根据一年多的军事工作，以及全体劳动群众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之后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实际经验，俄共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3—104页

8 党纲中关于法院的条文的第一段

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共产党抛弃民主主义的口号，彻底废除旧式法院之类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关，而代之以阶级的工农的法院。无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以后，抛弃以前那种含糊不清的“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公式，而提出“法官完全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中选举产生”的阶级口号，并把这个口号贯彻到整个法院组织中去。共产党只是把不使用雇佣劳动榨取利润的工农代表选进法院，对妇女同样看待，使男女无论在选举法官或履行法官职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了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以后，党向苏维埃选民选出的法官提出以下的口号：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没有相应的法令或法令不完备时，要屏弃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而遵循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5页

9 党纲中国民教育方面的条文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

（1）在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帮助下，进一步发挥工人和劳动农民在教育方面的主动性；

（2）不仅像现在这样把教师的一部或大部彻底争取过来，而且要把全体教师彻底争取过来，做到不再混有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保证认真地贯彻共产主义的原则（政策）；

（3）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4）把教育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5）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或附于（2）内）使教师同俄共宣传鼓动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

载于1919年2月26日《真理报》第4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6—107页

10 党纲中宗教关系方面的条文

俄共对宗教的政策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

党力求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要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

载于1919年2月26日《真理报》第4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8页

11 党纲中经济部分的条文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 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 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

8.^[356] 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还要求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像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

同样，必须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资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

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

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存在着把不同的原则结合起来的多种过渡形态的现时期中，特别重要的是苏维埃粮食机关要利用合作社这种由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实行计划分配的唯一群众性的机构。

俄共认为，这样按共产主义原则进一步发展这种机构而不把它抛弃，在原则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

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消费公社的过渡。

(6)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继续利用仍为私人所有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得到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这一项措施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残余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放到银行等等。准备和实行这些和诸如此类的措施所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 在财政方面，俄共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多数工厂和其他企业的私有制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一定部分的收入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进行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后者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载于 1919 年 2 月 27 日《真理报》第 45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09—112 页

12 党纲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条文

苏维埃政权在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已着手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办法是建立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大农场），鼓励农业公社（即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自愿联合）以及共耕社和合作社；无论谁的土地，凡未播种的，一律由国家组织播种；由国家动员一切农艺人才来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等等。

俄共认为，这些措施是使绝对必须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唯一方法，因此俄共力求尽可能完满地实现这些措施，把它们推广到国内较落后的地区，并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办法。

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而在目前危机如此深重的时代，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危险，俄共认为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同时认为除上述措施以外，必须广泛地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加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建设，扩大苏维埃政权为此而成立的全国性的“工人协助委员会”^[357]的活动等等。

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农村党支部、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

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载于 1919 年 2 月 27 日《真理报》第 45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13—114 页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358]

（1919年3月）

3 关于党纲的报告

（3月19日）

（鼓掌）同志们，根据我和布哈林同志谈好的分工，我的责任是说明委员会对于一系列具体的、争论最多的或当前全党最注意的条文是怎么看的。

我首先简单地谈谈布哈林同志在他报告结尾时说到的、我们在委员会内部争论过的那几点。第一点就是纲领总纲部分应该怎样写。关于委员会大多数为什么不同意删掉党纲谈及旧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这一点，在我看来，布哈林同志叙述得不完全正确。布哈林同志是这样说的，照他说来，人们有时以为委员会的大多数怕别人非难，怕别人责备他们不够尊重旧东西。毫无疑问，照他那样说来，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立场是太可笑了。但这与事实相去很远。委员会大多数不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这种做法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把金融资本主义描写成似乎没有任何旧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是把涉及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切论述作了不正确的概括。

这是不正确的。这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时代是特别不正确的。恩格斯在一次谈到未来战争的时候就曾说过，未来战争引起的破坏要比三十年战争^[101]厉害得多，人类将大大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造机构将遭到破产。战争开始时，社会主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曾吹嘘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嘲笑我们是“狂热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看，这种预言并没有实现。事变证明，这仅仅对于很少几个国家、对于很短时期才是正确的！”现在，不仅在俄国，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各战胜国这种现代资本主义也开始遭到大破坏，其结果往往是取消这类人造机构，恢复旧资本主义。

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说，可以试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作一完整的描写，那时我们反驳过他，在这里我还要予以反驳：您去试一试，您就知道是不会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曾作过一次这样的尝试，结果他自己也只好把它放弃了。我完全相信，假如有人能做到这点，那么最合适的是布哈林同志，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作过很多的很详细的研究。我敢断言，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因为课题出的就不对。我们俄国现时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时期。同时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隔绝的俄国许多地区内，资本主义往往正在复活，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要想跳出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假若照布哈林同志所想的那样来写党纲，这个党纲便会不符合实际。它至多是把关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描写重述一遍，但决不是现实的再现，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中恰恰没有这种完整性。由不同的部分凑成的党纲是不完美（这当然并不重要），可是另一种党纲会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7页。——编者注

完全不符合实际。不管这种庞杂性、这种由不同材料组成的结构如何不顺眼，如何不够严谨，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还跳不出这种状况。当我们跳出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制定出另一个党纲。可是那时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了。硬要那时也像现在一样，那是可笑的。

我们现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许多最基本的现象已经复活。就拿运输瘫痪来说吧，这是我们很好地，或者确切些说，很痛苦地感觉到的事情。这是其他国家甚至战胜国也有的现象。而在帝国主义制度下，运输瘫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退回到最原始的商品生产形式。我们很清楚什么是私贩粮食者。这个词外国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而现在呢？你们同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341]的同志们谈谈吧。原来在德国和瑞士也开始有这类的词了。可是你们不能把这个范畴归到任何无产阶级专政中去，而一定要归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商品生产的低级阶段上去。

用制定漂亮完整的党纲的办法来跳出这个可悲的现实，就等于跳到九霄云外，制定出不符合实际的党纲。决不是像布哈林同志所委婉地暗示的那样，由于尊重旧东西，我们才把旧党纲中的一些条文写进来。在他看来，1903年在列宁的参加下写成的党纲^[241]，无疑是不好的党纲，不过因为老年人最爱回忆过去，为了尊重旧东西，就在新时代制定的新党纲中重复了旧东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怪人倒是可以拿来讥笑一番。我敢断言，事情并不是这样。1903年所描写的那个资本主义，正好由于帝国主义的瓦解和破产，还继续存在于1919年的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离莫斯科不很远的萨马拉省和维亚特卡省就可找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当国内战争把国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状况，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私贩粮食的现象。因此把党纲写成另一个样子是不正确的。应当说出实际情况，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

布哈林同志在理论上完全了解这一点，他说，党纲应该具体。但了解是一回事，实际来做又是一回事。布哈林同志所谓的具体，就是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书本式的叙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每个农业省份内，我们都看到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工业同时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写出这样的制度，就是写出脱离实际生活的不真实的制度。既然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是普遍的小生产的上层建筑，那么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认为存在着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就是把愿望当作现实。

这是很容易犯的一种很自然的错误。假如在我们面前真的有把资本主义彻头彻尾改造过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千百万倍了。那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一切都服从于一个金融资本。那时只要把顶部拆掉，把其余一切交给无产阶级就行了。这倒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可惜这是现实中所没有的。现实的发展情况要求完全不同的做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当帝国主义遭到破坏的时候，就会看到顶部破坏，根基则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的党纲要想成为正确的党纲，就应该说出实际情况。存在着旧资本主义，它在许多部门中成长到了帝国主义。它的趋势只能是帝国主义

的。各种根本问题只能从帝国主义存在的观点来考察。没有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可以不顾这种趋势而得到解决。现在党纲说的不是这一点。在现实中，还存在着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帝国主义这个上层建筑是有的，它引起了战争，而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要想跳出这个阶段是办不到的。这个事实说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何种速度发展，并且这个事实在许多年内仍将是事实。

西欧革命也许会顺利一些，可是为了改造全世界，为了改造大多数国家，毕竟还需要很多很多年。这就是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过渡时期中，我们无法跳出这种纷繁复杂的现实。这个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现实决不能抛弃，不管它如何不漂亮，也丝毫不能抛弃。用另一种方式制定的党纲将不符合实际。

我们说我们取得了专政，可是应当知道我们是怎样取得的。旧事物千头万绪地拖住我们，缠住我们，不让我们前进一步，或者迫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前进，正像我们现在这样。所以我们说，为了懂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就必须说出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引我们来的是帝国主义，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诸如对中农的态度这类问题。的确，在纯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怎么能有中农呢？要知道甚至在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没有中农的。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几乎是中世纪现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那我们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并且还会碰很多钉子。如果我们要改变对中农的态度，那就请在理论部分说清楚，中农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中农。中农是小商品生产者。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常识，是必须指出的，因为我们终究还没有越出这个初步常识。如果把这一点置之不理，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金融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来研究这种初步常识！”——那是极不严肃的。

对于民族问题我也要这样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把愿望当作现实。他说，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混在一起。我们无产者竟要承认某个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真是岂有此理！不对，请原谅，这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您把这一条删掉，那您就是沉溺于幻想。您提到民族内部发生的分化过程，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过程。但是，我们还要看看这种分化究竟怎么样。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40]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346]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干吗要民族自决权！”他在1917年夏季提议取消最低纲领而只留下最高纲领时，我曾驳斥过他，现在我应当把驳斥他的话再说一遍。我当时回答说：“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只要我们夺得

政权，再稍微等等，我们就要这样做的。果然我们夺得了政权，也稍微等了一些时候，现在我同意这样做了。我们已经完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打退了威胁我们的第一次进攻，现在这样做就适当了。关于民族自决权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这就是说，你所愿意承认的是除了俄国以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

看看芬兰吧。芬兰是个民主国家，是比我们发达、比我们文明的国家。那里正在发生无产阶级分离出来、分化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特殊，比在我国痛苦得多。芬兰人受过德国专政的压迫，现在又受着协约国^[359]专政的压迫。可是，由于我们承认了民族自决权，那里的分化过程就容易些了。我在斯莫尔尼宫把正式文件交给起过刽子手作用的芬兰资产阶级代表斯温胡武德（译成俄文，就是“猪头”的意思）时的情景^[207]，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很殷勤地握了我的手，我们彼此客套了几句。这是多么不好啊！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芬兰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欺骗劳动群众，说莫斯卡里^[360]、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要消灭芬兰人。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昨天我们对于巴什基尔共和国不也是这样做的吗^[361]？当布哈林同志说“对于某些民族可以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甚至记下来了，他所开的名单中有霍屯督人、布西门人、印度人。听他这样列举时，我就想：布哈林同志怎么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记了巴什基尔人呢？布西门人在俄国是没有的，关于霍屯督人，我也没有听说他们想要成立自治共和国，但是在我国有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是不能拒绝承认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居住在前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民族都不能拒绝这一点。就假定巴什基尔人推翻了剥削者，而且是我们帮助他们这样做的。但这只是在变革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且要做得很谨慎，以免我们的干预会阻碍我们所应当促进的无产阶级分化出来的过程。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362]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能做些什么呢？在我们俄国，居民有过和神父打交道的长期经验，所以他们帮助我们把这些神父打倒了。但你们知道，关于非宗教婚姻的法令^[363]至今还执行得很差。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受自己的毛拉的控制。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离，这种发展必然会来到。

布哈林同志不愿意等待。他忍耐不住：“干吗要等待！既然我们自己推翻了资产阶级，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干吗我们还要这样做！”这是带鼓舞性的号召，其中指出了我们的道路，但如果我们在党纲中只宣布这样一点，结果那就不是党纲而是传单了。我们可以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完全鄙视那些该受万分鄙视的资产阶级，可是在党纲中应当绝对确切地写出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我们的党纲才是无可争辩的党纲。

我们采取严格的阶级观点。我们写在党纲上的东西，是肯定自我们规定一般民族自决那时以来所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共和国。当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

这种共和国出现之后，而且只有按它们出现的程度，我们才能写出像我们现在写在纲领中的条文：“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苏维埃类型还不等于俄国存在的那种苏维埃，但是苏维埃类型正在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类型。我们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再往前去，哪怕是再进一步，再进一分，就会不正确了，所以就不宜写在党纲里。

我们说：必须考虑到该民族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哪个阶段。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大可不必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门人专门提出来。这个论断对于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对于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适用，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这是必由之路。再多说一点也不行，因为再多说就会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勾去民族自决而写上劳动者自决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没有考虑到各民族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困难，如何曲折。在德国，分化的情形和我国不同。在某些方面快些，而在某些方面则慢些，并且要经过流血的道路。在我国，把苏维埃和立宪会议^[19]结合起来的这种怪思想是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接受过的。要知道我们还得和这些民族毗邻居住。现在谢德曼分子已经在说我们想征服德国。这当然是很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报刊，这些发行千百万份的报刊，向全世界叫喊这一点，而威尔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予以支持。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拥有庞大的军队，想用征服的手段在德国培植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优秀人物——斯巴达克派——告诉我们，有人挑拨德国工人反对共产党员说：你们看，布尔什维克那里的情形多么糟！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很好。于是我们的敌人在德国就用这样的理由去影响群众，说什么在德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造成和俄国一样的混乱状态。我们的混乱状态是我们长期的病症。我们是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中在我们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只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德国工人，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建立自己的制度”这种恐吓的影响，“劳动者自决”的公式就不会使情况好转。我们应当做到，使德国社会主义叛徒们无法说布尔什维克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万能制度，似乎这种制度可以靠红军的刺刀推行到柏林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自决原则，人家就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党纲不应当说劳动者自决，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党纲应当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曲折，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这会促进劳动者的自决。在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离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突出和深刻的。那里的一切绝不会和我国相同。如果我们说不承认什么芬兰民族，而只承认劳动群众，那就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不承认实际情况是不行的，因为它会强迫你承认它。在不同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循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极端谨慎。尤其是对于各个民族要特别谨慎，因为没有比对一个民族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9页。——编者注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9页。——编者注

不信任更坏的事情了。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在自决。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364]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 333 人，共产党员 297 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日历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 1917 年的 8 月或 9 月。但是，第一，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第二，现在的情形是，比我国工人先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波兰工人，大多数都持有社会护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必须等待。这里决不能说劳动群众自决。我们应当宣传这种分化。这点我们已经在做，但毫无疑问，现在不能不承认波兰民族自决。这是很明显的。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和我国一样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可是前进的方式却不相同。在那里，人们恐吓工人说：向来压迫波兰人的莫斯卡里、大俄罗斯人，想在共产主义招牌的掩盖下，把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移植到波兰来。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我向一个优秀的波兰共产党员同志说，“你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他回答我说，“不，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不过要比你们做得好些”。对于这种说法，我根本无法反驳。应当让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个谦虚的愿望：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不能不估计到那里所走的道路的一些特殊性，决不能说：“打倒民族自决权！我们只让劳动群众有权自决。”这种自决过程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现在除了俄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自决，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提议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我们拟订的计划，现在我来谈谈我应当说明的以下几点。我把小私有者和中农问题放在第一位。关于这一点，党纲第 47 条说：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我觉得，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中农问题多次说过的。这一条文的缺点只是不够具体。在党纲中，我们未必能写得更具体些。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应当提出的不仅仅是纲领性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农问题要给予加倍的注意。我们掌握的材料表明，某些地方发生的暴动显然是有一个总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显然是和白卫分子决定在 3 月举行总进攻并组织一连串的暴动的军事计划有联系的。大会主席团拟订了一个就要向你们提出的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365]的草案。这些暴动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和一部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曾在布良斯克组织暴动）是白卫分子的直接代理人。白卫分子总进攻，农村暴动，铁路交通断绝，——难道这样还不能把布尔什维克推翻吗？这里，中农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特别重大。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不仅应当特别强调我们对中农让步的态度，而且要想出许多尽量具体的、能使中农直接得到一些好处的办法。为了自卫，为了反对我们的一切敌人，这些办法是迫切需要的，这些敌人知道中农动摇于我们和他们之间，因而竭力诱使中农离开我们。就我们的现状看来，我们拥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这些革命会给我们以无产阶级后备力量，会减轻我们的困难而大大巩固我国目前还很薄弱的无产阶级基地。这可能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但我

们还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发生。你们知道，现在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因此，中农问题现在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

其次，我想谈谈合作社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纲第 48 条。这一条已经有些陈旧。我们在委员会写这一条时，我国只有合作社而没有消费公社，但几天之后便通过了把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合并为统一的消费公社的法令^[366]。我不知道这个法令是否已经公布，到会的大多数人是否已经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法令明后天会要公布的。这一条在这一方面已经陈旧，但我仍然觉得它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从法令颁布到执行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从 1918 年 4 月起我们就忙着解决合作社的问题，虽然我们已取得很大成绩，但这还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成绩。在吸收居民参加合作社方面，我们有时达到了这样的规模：许多县份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村居民参加了。但这些都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已存在的合作社，完全习惯于资产阶级社会那一套，而领导它们的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6]，是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还无法使这些合作社服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法令，在建立消费公社的意义上说，是前进了一步，法令中指出，全国的各种合作社必须实行合并。但是这个法令，即使我们全部执行，也会在将来的消费公社中保留工人合作社这个自主的部分，因为实际熟悉情况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们证明说，工人合作社这种较为发展的组织应当保留，因为它的活动是需要的。我们党内合作社问题上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合作社里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过摩擦。我觉得，在原则上，这个问题无疑地应当这样来解决：这个由资本主义在群众中准备好的唯一机构，在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农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唯一机构，无论如何要保留，要发展，而决不能加以抛弃。在这里，任务是困难的，因为充当合作社领导者的大半是资产阶级专家，而且往往是真正的白卫分子。由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仇恨，正当的仇恨，由此就产生了反对他们的斗争。当然，这个斗争应该进行得很巧妙：要制止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反革命阴谋，但这不应当成为反对合作社机构的斗争。我们一面要排除这些反革命分子，同时应当使机构本身服从我们。这里的任务同对待资产阶级专家是一样的。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是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

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引起不少的摩擦和分歧。几天前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作报告时，递给我的条子中有几个是关于工资的。有人问我：难道在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工资可以高到 3000 卢布吗？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写进了党纲，因为这方面的不满已经很厉害了。在军队中，在工业中，在合作社中，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使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而要这样来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把工作人员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我们在党纲中有意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很详细，以便得到彻底解决。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决不是因为法律造成了障碍，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

反，我们的法律有助于这样做。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本届代表大会应当对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作出极明确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会使那些无疑是倾听这次代表大会意见的同志们有可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信进行工作，并知道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样的决定会帮助那些处处碰到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至少来参加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斯巴达克派的代表同志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告诉我们说，在工业最发达、斯巴达克派在工人中的影响最大的德国西部，虽然斯巴达克派还没有获得胜利，可是许多最大的企业的工程师和经理已经来向斯巴达克派说：“我们跟你们走。”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形。显然是那里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较高，技术人员较无产阶级化，也许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造成了这种与我国有些不同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我们应当不等待其他国家的援助立刻提高生产力。要做到这点，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是不行的。这应当斩钉截铁地说清楚。当然，这些专家大多数是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去工作。想用棍棒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这一点我们已深有体会。可以迫使他们不积极地参加反革命，可以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伸手去拿白卫分子的宣言。在这一方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很坚决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也做得很够了。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这一点。但是，要用这种办法来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习惯于文化工作，他们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推进了文化工作，就是说，他们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推进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中的有组织的先进阶层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帮助在群众中普及文化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当医生看到无产阶级发动劳动者主动进行防疫工作时，他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我们。我国这个由资产阶级的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合作社工作者所组成的阶层是很广大的，当他们实际看到无产阶级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这种事业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那时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些了。那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吸收到我们机构中来，成为它的一部分。为了这点，必须作些牺牲。为了这点，哪怕付出 20 亿卢布也算不了什么。害怕这种牺牲就是幼稚，因为这就是不懂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运输业的解体，工业和农业的解体，直接威胁到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我们在这里应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个亿，却可能造成用几十个亿也不能补偿的损失。

当我们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同志谈论工资问题时，他举出了以下的事实。他说，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任何

地方也没有做过而且用几十年时间也不能做到的。例如战前的工资：粗工每天1卢布，每月25卢布，而专家每月是500卢布（不算那些拿几十万卢布的人）。专家领的工资是工人工资的20倍。我们现在的工资幅度是从600卢布到3000卢布，相差只有5倍。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已做了很多工作。当然，我们现在给专家的工资是过高的，但为了向他们请教，多给一点不仅值得，而且是应当的，从理论上讲也是必要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党纲上规定得十分详细。必须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仅要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使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回到各地后，在向自己组织作报告时，在进行自己的全部活动时，都能贯彻这一点。

我们已经在动摇的知识分子中促成了巨大的转变。如果说我们昨天谈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化，今天就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么，在这种变动中，我们执行的完全是既定方针。这种变动贯彻着一条最坚决的路线：反革命要清除，资产阶级文化机构必须利用。孟什维克是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披着无产阶级的外皮，而实际上是非无产阶级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只有极少数的上层分子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个阶层本身是由小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阶层在靠近我们。我们要把整个阶层争取过来。每当他们靠近我们时，我们总是说“请来吧”。每动摇一次，这个阶层都有一部分人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161]是这会长久地左右摇摆，怨天尤人，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对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通过这一切动摇，我们会得到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参加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队伍，而排除那些继续拥护白卫军的分子。

按照分工我应当说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僚主义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的问题。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种埋怨无疑是有根据的。我们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那种彻头彻尾都是官僚的和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机构（甚至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仍然是这样的机构）已被我们彻底摧毁。单就法院来说吧。的确，这里的任务比较容易，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因为根据劳动阶级的革命法律意识来裁判是谁都会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把任务贯彻到底，可是在许多方面已把法院照应有的那样建立起来了。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机关，从而不仅使男子而且连妇女即最落后最不活跃分子也人人都能参加工作。

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样一批人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要这样一批人。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像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

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应当取得后援，就各种征象来看，国内的这种后备力量正在增长。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是非常巨大。一切征象表明，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后备力量，用以代替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那些劳累过度的人，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因此官僚们还占据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每个人民委员部实行的这类办法，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谈了。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剥夺选举权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西欧纯粹民主派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在实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摆脱由于群众文化程度不够而碰到的困难。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假设：无产阶级专政将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宪法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只是说，谁认为不必镇压资产阶级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我们不愿意给资产阶级以自由，我们不承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但我们在党纲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像工人和农民不平等之类的办法，根本不是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是在这些办法实施之后才把它们记载下来的。苏维埃宪法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就拟订的，其实是反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按照实际生活所造成的情况拟订了这个宪法。组织无产阶级比组织农民快得多，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往后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工农平等。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谁也没有把资产阶级赶出苏维埃。资产阶级自己离开了苏维埃。

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根本不是为我们的行动表示歉意，而是如实地摆出事实。我们的宪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们的组织工作差。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在革命后过了 17 个月的现在，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在讨论党纲时必须谈到以供大家今后讨论的主要几点。（鼓掌）

载于 1919 年 3 月 22 日《真理报》第 62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37—157 页

8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3 月 23 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我应当表示歉意，我没能参加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农村工作问题小组^[367]的所有的会议。因此，一开始就参加该组工作的同志们的发言，也就是对我的报告的补充。该组终于拟订了一个提纲，交给了委员会，并且有人要向你们报告提纲的内容。我只想说说这个问题的一般意义，这个问题是怎样经过该组的努力而提到我们面前的，以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现在是怎样提到全党面前的。

同志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这是十分自然的。革命总是触动而且不能不触动最深刻的生活基础和最广大的群众，所以在革命时期，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甚至最接近群众的政府，也绝对不能一下子把握住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如果现在我们来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并特别注意中农状况，那么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看，并没有什么奇怪和反常的地方。当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解决两个敌对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开始。基本任务是使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保证工人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这种根源无疑是阻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障碍。我们都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来不怀疑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的缘故，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孟什维克阵营中的人）硬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时期可能有一般民主的统治。完全和社会革命党人唱一个调子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好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或者取消民主，并不是依怎样对自己有利而定的！实际上却正是如此，所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一般民主。令人惊讶的只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假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我们的孟什维克）多么迅速地就揭穿了自己的面目，多么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本性，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性。

马克思一生中抨击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和资产阶级的民

主制度。马克思讥笑得最厉害的是关于自由平等的空话，因为这些空话掩盖了工人饿死的自由，掩盖了出卖劳动力的人和好像是在自由市场上自由平等地购买工人劳动等等的资产者之间的平等。马克思在他的所有经济学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点。可以说，马克思的整部《资本论》是专门阐明如下这个真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领导者，推动者；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中，未必找得到一章不是阐明这个问题的。可以说，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人都曾无数次地向工人赌咒发誓，说他们懂得这个真理。但是一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真正为争夺政权而进行决战的时候，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世界老社会党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个真理，纯粹机械地重复那些关于一般民主制度的庸俗论调。

在我国，有时人们为了使这些话听起来更“有分量”，往往说到“民主派的专政”。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从历史上明明知道，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是对起义工人的镇压。从 1848 年起，至少从 1848 年起就是这样，但个别例子在此以前也可找到。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广泛而自由地开展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最尖锐的斗争。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真理是正确的。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真理，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真理，正因为这样，在一切根本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从 1917 年 10 月起所采取的步骤都是很坚定的。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解决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群众反对资产阶级。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我们似乎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了。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

自然，在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革命家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实行无产阶级统治，打败资产阶级来保证这个统治，保证资产阶级不能复辟。我们深深知道，资产阶级至今还占有优势，他们在其他国家内还有自己的财产，有时甚至在国内还握有大量金钱。我们清楚地知道，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停止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

但这还远不是一切。资产阶级最崇尚的原则是：“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从金钱的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始终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现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比我们强大。它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它看到了诸如匈牙利革命这样的例子（昨天我们很荣幸地把匈牙利革命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今天我们又得到了证实这一点的消息）^[368]，它已经开始懂得它的统治在动摇。它已经不能自由行动。但是现在，如果估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财富，就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在物质方面还比我们强。

正因为这样，在过去，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这是十分自然的、合理的、必需的，而且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我们应当把其他阶层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应当把整个中农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我们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中得出的共同结论，而且我

们相信全党工作人员都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只不过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罢了。

当然，总会有人不去考虑我国革命的进程，不去思索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任务，反而利用苏维埃政权的每一步骤来讥笑，进行所谓批评，像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那样。这些人至今还不了解，他们应当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对于这些人多次容忍，甚至多次宽大，我们还要再一次提供机会让他们感受我们的这种宽大，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结束这种容忍和宽大了。如果他们再不作出选择，我们就要十分严肃地向他们提议，叫他们到高尔察克那里去了。（鼓掌）我们并不期望这些人会表现出了不起的智能。（笑声）但是可以预期，这些人亲身尝到高尔察克的残暴滋味以后，定会懂得，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在我们和高尔察克之间作一选择。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有许多幼稚的人抱着愚蠢的想法，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现象，那么现在，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定懂得，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所引起的斗争中，是有一种合乎规律的东西的。

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谁读了一切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那他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丝毫也不懂得社会主义，而只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罢了。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他们一个短期限去考虑，要求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所以提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现在说，或者将来会说：“布尔什维克提出中农问题，是想讨好中农。”我深深知道，这类论据以及比这还要坏得多的论据在孟什维克报刊上有广大的地盘。我们唾弃这些论据，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认为敌人的胡说有什么意义。这些一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跑来跑去的人可以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决定我们道路的首先是对各种力量所作的阶级估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日益发展。只要这个斗争没有结束，我们就要集中力量把它进行到底。这个斗争现在还没有进行到底。在这个斗争中，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我们的农村建设已经超出一切为了夺取政权这一基本要求的范围。

这一建设经过了两个主要阶段。在 1917 年 10 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我已经说过，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 1918 年夏天才开始的。假使我们不掀起这个革命，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不完全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城市中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管理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在农村中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分离出来，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资产阶级；这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基本的，不承认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这个阶段基本上也已结束。我们最初为此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即贫苦农民委员会^[289]，已经非常巩固，我们已有可能用正式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替它们，就是说，改组村苏维埃，使它成为阶级统治的机关，成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大家当然都知道，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369]，这些措施是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对过去阶段所作的总结。

主要的事情，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我们已经做到了。

正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更复杂的任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谁以为提出这个任务，就好像我们政权的性质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了，就好像我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即使是认为部分的改变，稍微的改变），谁这样想，谁就是完全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我相信，在我们党内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只是想提醒同志们，在工人政党之外是会有这种人的，他们要这样说，并不是从某种世界观出发，而只是为了破坏我们的事业，帮助白卫分子，简单地说，就是唆使中农反对我们，因为中农一直是动摇的，他们不能不动摇，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动摇。为了唆使中农反对我们，他们会说：“看，他们讨好你们了！可见他们重视你们的暴动了，他们动摇了”，等等，等等。必须使我们所有的同志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反对这种煽动。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同志是会武装起来的。

十分明显，解决怎样正确地确定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这个基本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而迫切的任务。同志们，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困难，大多数工人都领会了这种理论。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例如考茨基曾写了一本论土地问题的书^[370]，那时他还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学说，并被公认为土地问题的权威，他在这本书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说：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就是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使农民不去积极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我们。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时期内，农民总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注意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它的政治统治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指望中农立刻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但如果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经过一个时期，这种动摇就会停止，农民就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同马克思一道奠定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党时时刻刻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所遵循的学说）基础的恩格斯，就已经把农民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这种分法直到现在还适合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恩格斯说：“甚至对于大农，也许不是到处都要用暴力镇压。”至于我们有朝一日可能对中农使用暴力（小农是我们的朋友）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过的。恩格斯在 1894 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在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就是这样说的。这个观点所表明的真理有时被人们遗忘了，但在理论上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是完全剥夺。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裕农民，我们也不能像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裕农民和富农。在我们党纲中是作了这种区分的。我们说：镇压富裕农民的反抗，镇压富裕农民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和对待中农的基本区别，就是完全剥夺资产阶级，同不剥削别人的中农结成联盟；这条基本路线在理论上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遵守这条路线，在地方上，人们还没有学会遵守这条路线。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从各方面着手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中农问题就提到第一位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建设共产主义在有农业的大国和有小农业的国家是不同的。这是最初步最起码的常识。从这个常识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建设的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13—316 页。——编者注

任务，我们就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农身上。

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对中农的态度。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但我们深深体验到，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我们已经接近到法国大革命时出现的这种区别，那时法国国民公会^[172]颇有气魄地宣布了许多措施，但它没有实行这些措施的应有的支柱，甚至不知道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时应该依靠哪一个阶级。

我们处于无比幸运的环境。由于整整一世纪的发展，我们知道依靠什么阶级。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阶级的实际经验还非常不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来说，基本的一点是很清楚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把政权交给工人。但是怎样做到呢？大家都记得我们克服了哪些困难，犯了多少错误，才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到工人管理工业。而这还是我们的阶级即我们经常接触的无产阶级内部的工作。现在我们要确定我们对一个新的阶级，对城市工人所不熟悉的阶级的态度。必须确定对这个没有一定的稳固的地位的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反对社会主义，——要确定这两个阶级间的关系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农这样一个阶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他们是不剥削其他劳动者的。他们在数十年内受尽千辛万苦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因此，我们对待这个动摇的阶级是有很大困难的。根据我们一年多的经验，根据我们半年多在农村中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根据农村中已经发生的阶级分化，在这方面我们尤其应当切忌急躁，不要死搬教条，不要把我们正在制定而还没有制定出来的东西当作完善的东西。下面发言的人会向你们宣读农村工作问题小组选出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决议，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这一点已严加告诫。

从经济上看，显然我们需要帮助中农。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习惯，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由于我们可以派到农村去的文化和技术力量不够，由于我们处理农村问题往往软弱无力，于是我们的同志往往使用强迫手段，把整个事情搞坏。就在昨天，有一个同志交给我一本俄共（布尔什维克）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出版的《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在这本小册子里，例如在第41页上，我看见有这样一句话：“特别税的法令就是要把全部负担放在富农、投机者和全体中等农民身上。”这些人真可以说是“弄懂了”！也许是印错了，但出这样的错是不能容许的！也许是工作太匆忙了，那正说明，在这种事情上任何匆忙都危害极大。也许是根本就没有弄懂，这是最坏的推测，是我不想加之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同志的。很可能，这不过是一种疏忽罢了。^[371]

在实践中常常发生一位同志在委员会内谈到的那样的事情。有一次，农民围住他，每个人都问：“请你确定一下，我是不是中农？我有两匹马和一头奶牛。我有两头奶牛和一匹马”，等等。你们看，这个到各县去工作的鼓动员必须有一只准确的温度计，把它放到农民身上测量一下，然后告诉他是不是中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这个农民的全部经营史以及他同下等户和上等户农民的关系，而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切知道。

这里需要很多实际的本事，需要熟悉当地情况。这种本领我们还没有。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来不是空想家，我们从来没有想用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培养出来的纯洁的

共产党人的纯洁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是童话。我们要用资本主义的破砖碎瓦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且只有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受过锻炼的那个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很清楚，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同本身的缺点作斗争。无产阶级优秀的先进的部分，既然几十年内在城市中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也就有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学到城市和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这种文化。你们知道，甚至在先进国家中，农村总是愚昧无知的。当然，我们会把农村的文化程度提高，但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同志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而地方上来的人的每一句话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机关人员（这些人的话我们听得很多了），他们是实际观察过农村工作的人。正是他们的话，对我们农村工作问题小组特别宝贵。我相信，他们的话现在对整个党代表大会也是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些话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法令中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去把我们对中农的态度弄得尽量明确些。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明确性在生活中是没有的。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要想立刻一下子解决是办不到的。有人说“用不着写这样多的法令”，并责备苏维埃政府，说它只会写法令，而不知道怎样实行这些法令。实际上这些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怎样滑到白卫分子方面去了。假使我们指望写上 100 个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但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上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的宣传是讲大道理，现在我们是通过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的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法令，这是号召群众实际行动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使这些法令有许多不合适的东西，有许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可是这些法令为实际行动提供了材料，而法令的作用在于使倾听苏维埃政权意见的那成百、成千、成百万人学会采取实际步骤。这是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行动的尝试。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从法律、法令和决定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会把它们当作无论如何要立刻一下子就实现的绝对的命令。

必须避免一切会在实际上助长某些违法乱纪现象的事情。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党人，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原则，极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而实际上却有时会使农民们说：“苏维埃政权万岁，但要打倒康姆尼！”（即共产主义）。这样的事不是捏造，而是来自实际生活，来自各地同志的报告。我们不应当忘记：任何过分，任何鲁莽急躁，都会造成莫大的害处。

我们曾经需要拼命跳跃，不管怎样要赶紧摆脱使我们遭到破产的帝国主义战争，需要拼命努力把资产阶级和要打倒我们的力量打垮。这一切是必需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农，那就是愚蠢，迟钝，毁灭我们的事业，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愿意这样做。现在

的任务完全不同。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粉碎明显的剥削者的反抗，战胜他们，推翻他们。不是的，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主要任务，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更复杂的任务。在这里暴力毫无用处。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

在夺取政权时，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那时全体农民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同地主作斗争。但是直到现在，农民对大农场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一想到大农场就咬牙切齿，就想起地主压迫人民的情景。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没有那样一种顶层，把它削去之后还能留下整个基础，整个建筑物。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顶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当然，如果农村里出现了鲁莽的人，那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从城里跑到农村去，去了以后，吹上一通，闹几次知识分子的有时是非知识分子的意气，等到吵翻了脸，就一走了事。这是常有的情形。这班人不会受人尊敬，只会引起讥笑，而且讥笑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指出，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农民的学生，而不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一些人对农业及其特点一窍不通，他们跑到农村去，只是因为听说公共经济好，只是因为厌倦城市生活而想到农村工作，并且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处理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

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准则。（全场鼓掌）这就是我们在决议草案中所力图说明的准则，因为在这一方面，同志们，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过去我们没有经验。同剥削者作斗争本身也是我们从经验中学来的。如果人们有时因此责难我们，那我们就说：“资本家先生们，这是你们自己的罪过。假使你们不这样野蛮地、这样疯狂地、这样无耻地拼命反抗，假使你们没有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那么，革命也就会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现在，打退了各方面的疯狂进攻之后，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小组，而是领导千百万人的政党。千百万人不能一下子懂得方针的改变，因此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这是不奇怪的。不过必须懂得，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这种历史条件业已消失，新的条件以及对待这个阶级的新任务要求有新的心理状态。

我们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对任何一个法令感到后悔。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在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些法令是正确的，

它们指出道路，号召人们采取实际措施。我们说“鼓励联合”，我们是发出指令，这些指令应当经过多次试验，以便找到实行这些指令的最终形式。既然说必须自愿，那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通过实践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这样做是很对的。要是他们一听到法令和鼓动传单的内容就相信，那倒不好了。假使这样可以改造经济生活，整个这种改造就是一钱不值的。首先要证明联合起来好些，要使人们真主联合起来而不吵架散伙，——要证明这样做有好处。农民是这样提问题，我们的法令也是这样提问题。如果我们以前不善于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

我们暂且只是解决了对任何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来说都是一项基本的任务，即战胜资产阶级的任务。这个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极其困难的半年方才开始，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作最后的努力要掐死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们自己已经懂得，这半年过去后，他们的事情就会毫无希望。或者他们现在趁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来打败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将不仅在我国一国获得胜利。在这半年中，粮食危机和运输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列强又想从几条战线上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必须继续竭尽全力，去同进攻我国的外部敌人作斗争。

但是，说到农村工作的任务时，尽管困难重重，尽管我们的全部经验集中在直接镇压剥削者这一方面，我们应当记住而不要忘记，在农村中如何对待中农完全是另一种任务。

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莫斯科的到过农村的觉悟工人都向我们讲述过这样的事：许多看来是无法消除的纠纷，许多看来是非常重大的冲突，一当通情达理的工人出来说话，就解决了或缓和了。这些工人说话不是用书本的腔调，而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不是像虽然不懂得农村生活却要发号施令的指挥官那样，而是像同志那样说明实际情况，激发农民的那种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感情。这种用同志态度解释问题所达到的结果，是俨然以指挥官或上司自居的成百上千的人所不能达到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整个决议的精神。

在这个简短的报告中，我是想说明这个决议的原则方面，这个决议的一般政治意义。我是想证明（我想我已经证明了）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来看，我们的路线没有任何变动，没有任何改变。白卫分子及其帮凶现在和将来都会叫喊我们的路线有了改变。让他们叫喊吧。这影响不了我们。我们要最彻底地发展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转到安排中农生活的任务上去。我们应当同中农和平相处。只有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供给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

农民需要城市工业，没有城市工业，农民是不能生活的，而城市工业是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农民就会感谢我们从城市里供给他们工业品、农具和文化。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不是剥削者，不是地主，而是与他们一样的劳动同志，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些同志，但他们是从实际上重

视，只重视这些同志的实际帮助，却拒绝（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命令和自上而下的“训令”。

首先要帮助，然后是取得信任。如果把这件事情正确地进行下去，如果在县里，乡里，在征粮队^[372]里，在任何组织里，我们每个小组的每个步骤都很正确，如果能够根据这个观点来把我们的每个步骤都仔细地加以检查，那我们一定会取得农民的信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应当给农民以帮助，给他们以忠告。这不是指挥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这样做下去，农民是会完全拥护我们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决议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将决定我们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那我们定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伟大任务。

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我们学会了，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调整好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承认。但是我们已经了解这个任务，我们已经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有把握、有决心地说：这个任务我们定会完成，那时社会主义就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了。（长时间鼓掌）

载于 1919 年 4 月 1 日《真理报》第 70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78—194 页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1919年4月15日)

“协约国”^[359]帝国主义者封锁俄国，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传染病的发源地，竭力使它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这些夸耀本国制度的“民主精神”的人，由于仇恨苏维埃共和国而失去了理智，竟没有察觉到怎样把自己变成了可笑的人物。不妨想一想，这些先进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国家，武装到了牙齿，在军事方面称霸全球，却像害怕火那样，害怕从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饥饿的、落后的、据他们说甚至是半野蛮的国家散播出来的思想传染病！

单是这个矛盾就擦亮了各国劳动群众的眼睛，帮助我们揭露了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等帝国主义者及其政府的虚伪。

但是，不仅是资本家因仇恨苏维埃而失去理智，而且他们之间互相争吵，互相掣肘对我们都有帮助。他们彼此商定了一种用沉默进行抵制的大阴谋，他们极端害怕传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真实消息，特别是害怕传播它的正式文件。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时报》^[373]却刊载了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消息。

为了这点，我们应向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向法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位领袖表示极崇高的谢意。我们很想给《时报》写一封公函，感谢它这样成功、这样巧妙地帮助我们。

从《时报》如何根据我们的无线电讯来编成自己的消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家富人的报纸的动机。它本想挖苦威尔逊，刺他一下：看，您是在同什么样的人谈判！这些遵照富人的意旨来舞文弄墨的聪明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拿布尔什维克来恐吓威尔逊，在劳动群众看来，就是替布尔什维克作广告宣传。再说一遍，我们应向法国百万富翁们的报纸表示极崇高的谢意！

第三国际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成立起来的：不管“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或德国的谢德曼之流、奥地利的伦纳之流这类资本主义的奴才颁布何种禁令，玩弄何种卑鄙手腕，都不能阻碍全世界工人阶级听到关于这个国际的消息并同情这个国际。这种环境是由各地迅速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这种环境是由劳动群众中间的苏维埃运动造成的，苏维埃运动已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运动了。

第一国际（1864—1872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组织，这个运动当时是向横的方面发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暂时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暂时加强，而终于使第二国际遭到可耻的破产。

第三国际实际上是在1918年创立的，那时，由于多年来特别是战争期间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作了斗争，许多国家都已成立了共产党。第三国际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341]上正式成立的。这个国际最突出的特点、它的使命就是执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训戒，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理想；这个特点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因为新的国际即第三个“国际工人协会”现时就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吻合了。

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压迫的运动的政党的国际联盟，现在有了空前巩固的基地：有了几个苏维埃共和国，它们在国际范围内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天才的预见，这个天才的理论正在变为现实。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拉丁词现在不仅译成了现代欧洲各民族的语言，而且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

人类已在摆脱最后一种奴隶制：资本主义奴隶制即雇佣奴隶制。

人类正在摆脱奴隶制，第一次走向真正的自由。

为什么第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竟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呢？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成了西欧人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的原因之一（除社会主义运动大多数领袖受到机会主义习惯和庸人偏见的束缚这个原因以外）。

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本能地领会到了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但是为机会主义所腐蚀的“领袖们”还继续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一般“民主”。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落后和它越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奇怪吗？假使历史让我们不通过许多矛盾而实现新式民主，那倒是奇怪了。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懂得现代科学的人，如果有人问他“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均匀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

当法国实现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促使整个欧洲大陆走向历史上新的生活时，资本主义比法国发达得多的英国竟成了反革命同盟的首领。而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却英明地预示了未来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东西。

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193]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手段把无产阶级队伍各个击破了。

英国，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起造成了极

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上层的典型国家。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看，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竟落后了几十年。法国工人阶级在 1848 年和 1871 年先后两次举行了反资产阶级的英勇起义，对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两次起义中，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好像是用尽了。这以后，即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工人运动国际中的领导权转到了在经济上比英法都落后的德国。而到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德国在经济方面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时候，领导德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这个全世界的模范政党的，已是一小群十足的恶棍和卖身投靠资本家的最卑鄙的坏蛋，是从谢德曼和诺斯克到大卫和列金这些工人出身的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

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

当卡尔·考茨基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因为主张与谢德曼之流保持统一、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反对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而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时候，他曾在 20 世纪初写了《斯拉夫人和革命》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由于某种历史条件，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可能转入斯拉夫人的手中。

果然如此。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 19 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

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 20 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在 1917 年 10 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马克思在 1856 年谈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布尔什维克从 1905 年初起，就坚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第三，1905 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既使他们的先锋队了解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成就”，又使他们自己懂得了革命行动的意义。没有 1905 年的“总演习”，1917 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第五，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第六，罢工斗争的长期锻炼和欧洲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有助于苏维埃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形式在深刻而迅速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下产生出来。

以上所述当然是不完备的。但暂时可以就列举这几点。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已在俄国产生。与巴黎公社比起来，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共和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它是不会灭亡的。它现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8 页。——编者注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4 页。——编者注

在已经不是孤立的了。

要继续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要把这种工作进行到底，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文化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比重和影响较大的国家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只要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有一切可能超过俄国。

破产的第二国际正在死去，活活腐烂着。它实际上是替国际资产阶级当奴仆。这是真正的黄色国际。它的最大的思想领袖，如考茨基之流，都颂扬资产阶级民主，把它称为一般“民主”，甚至更愚蠢更荒唐地称为“纯粹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过时，正如第二国际已经过时一样，虽然当必须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训练工人群众的时候，第二国际曾做过历史上必要的有益的工作。

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能实现过，因为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自由来准备力量，以推翻资本，消灭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照例是不能实际享受民主的。

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给了劳动者，给了工人和小农。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属于大多数人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属于大多数人的政权。

这个政权压制剥削者及其帮手的“自由”，剥夺他们实行剥削的“自由”、发饥荒财的“自由”、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勾结外国资产阶级来反对本国工农的“自由”。

让考茨基之流去维护这种自由吧。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社会主义的叛徒才做得出来的。

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如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破产，最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它同巴黎公社的关系，它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必然性。

德国“独立的”（请读作市侩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346]的机关报《自由报》^[345]在1919年2月11日第74号上，登载了《告德国革命无产阶级》这篇宣言。

这篇宣言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民议会”即德国“立宪会议”的整个党团签字发表的。

这篇宣言斥责谢德曼之流力图取消苏维埃，而提议把苏维埃与立宪会议（别开玩笑吧！）结合起来，给予苏维埃一定的国家管理权，让它在宪法中占一定的地位。

把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统一起来！这是多么简单！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庸人思想！

不过可惜的是，在俄国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这种思想已经由联合起来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6]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试验过了。

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每一个紧急关头，

在每一次严重的阶级冲突发生时，都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都一窍不通。

但是要把2月11日的这篇极美妙、极滑稽的宣言内所充满的经济政治谬论尽行揭露，就需要对希法亭和考茨基之流的把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和平结合起来的了不起的庸人思想专门作一次分析。这一点只好留待另文去做了。

1919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5月《共产国际》杂志第1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89—297页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374]

(1919年5月)

2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5月19日)

同志们，大概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谈谈目前形势，但是，请允许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来回答几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整个苏维埃革命阶段的特点，这些问题最能引起争论，最能引起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们的攻击，最能引起以民主派自居并特别喜欢责备我们和到处责备我们违背民主制的人们的疑虑。我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在目前一切宣传和鼓动中，在一切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版物中，几乎经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当然，这种出版物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味撒谎、诬蔑和谩骂比起来，要稍微高明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稍微高明一点的出版物拿来看看，那我认为，关于民主同专政的关系、革命阶级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当前一切政治性争论的最主要的内容。也许你们觉得，说明这些问题有些离开当前的急务，但是我认为，说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总的主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我根本不能奢望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我只从中选几个问题，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

—

我所要谈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过渡的困难的问题。一些以社会党人和民主派自居的人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我认为《永远前进报》^[375]和《人民事业报》^[82]这两个文人集团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这两家报纸被查封，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有利于革命的，这两家报纸的代表在攻击中经常采取理论性的批评，它们被我们的政权机关认定是反革命的刊物，它们攻击我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个阵营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那你们就会看到，在许多责难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者们，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但是，他们既没有给你们面包，也没有给你们和平与自由，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背弃了民主。”关于背弃民主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谈到。我现在来谈这种责难的另一面：“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给的却是继续战争，是特别残酷特别激烈的斗争，是协约国即所有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反对受苦受难的、落后的和疲惫的俄国的战争。”我再再说一遍，这些责难，你们会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报纸上看到，你们会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他们认为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谈话中听到，你们会不断地在庸人们的每一次讲话中听到。我请你们考虑的正是这类责难。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

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诲，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的斗争和战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俄国和全人类摆脱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进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同样毫无疑问，正是谋求摆脱这种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行动引起了所有文明国家对俄国的进军。因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的，尽管它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尽管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之流作了这样的保证，尽管他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知道，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协约国军舰正封锁着黑海沿岸一带，甚至还向克里木半岛上有他们的志愿兵活动的刻赤一带进行轰击。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给你们。即使志愿兵对付不了你们，我们也不会把克里木半岛上这块地方让出来，不然你们就会控制亚速海，切断我们同邓尼金联系的通路，使我们无法支援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开攻势，昨天我们的一艘雷击舰就同敌人的四艘雷击舰打了一仗。这就是武装干涉，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在这里参加战斗的不是英国的舰队吗？难道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西伯利亚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吗？整个文明世界现在都在反对俄国，事实就是这样。

试问，我们号召劳动者进行革命，答应给他们和平，却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向软弱落后和筋疲力尽的俄国进军，这是我们自相矛盾还是那些无耻地责难我们的人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问题正在这里。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我们谈的是革命阶级，是人民的革命政策，我请你们拿一位革命家来看看。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一事无成。”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他那样闭塞无知，不能结合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也许不能怪他；要不然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那些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牺牲，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么，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我现在请你们放下个别革命家来看看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使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讲话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句话。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结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323]，那就应该可怜他们的神经失常，有什么办法呢，跟他们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场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1915年就是这样

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同样是艰难的流血的、痛苦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就必然引起同样的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时候，听到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庄稼汉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懂得存在着不同的战争，懂得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哪怕是一点点革命史。对于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我们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派、社会党人自居，要公开登台演讲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是称作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16]、真正的社会党人或是伯尔尼国际^[376]的拥护者——各种称号多得很，称号是不值钱的——如果这种人责备我们说：“你们许诺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该怎么回答他呢？能不能设想，他像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愚昧，连各种不同的战争都不能区分呢？能不能设想，他竟不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而且现在已被彻底揭穿呢（在凡尔赛和约^[377]缔结之后，只有根本不能进行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出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能不能设想，还有哪个识字的人，竟不懂得掠夺性的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懂得我们的战争所以具有世界规模，是因为世界资产阶级知道这是一场同他们的决战呢？我们没有根据作这种种设想。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作什么样的民主派或社会党人，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面前责备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许以和平，现在却拖长国内战争，拖长这个艰难的战争，痛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像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惊讶地说：“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们，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们，很遗憾的是，你们不愿想通这个问题，也不想知道可以从得出一定结论的普通政治常识。你们硬说你们反对高尔察克。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来说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论、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绪来说吧。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的差别。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冒这种风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可能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者、剥削者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极端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最险恶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

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这些责难的确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愚昧无知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不管进行战争是为的什么，他们都同样受苦。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我一点也不奇怪。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就要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

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

二

对我们目前这个由于革命而必然出现的艰难困苦时期作了估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看到过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斯维亚季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也在《消息报》^[74]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认为自己恰恰是别人无法指责他们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他们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公民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估价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在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以后，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察克叛乱的关系，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在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恕我直言，有人等待我们悔悟，认为我们将要悔悟。我们不会悔悟什么的，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359]、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布列斯特和约^[217]又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碰到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这些民主派，社会党人，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

和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我们彼此彼此。”我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老根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一个革命家而是拿一个普通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难道能找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会区别不了这两种协议吗？你们一定会说，如果真能找到，那大概也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强盗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强盗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1000人中至少有999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从这个例子进而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真诚提议媾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要先去推翻德国资产阶级，那是可笑的！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条约，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条约，斥责了它，甚至拒绝立即签订这个和约，指望得到德国工人的帮助。当暴徒把手枪对准我们的太阳穴时，我们说：请把武器和金钱拿去，我们以后再用的方法同你们算帐。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德国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能不能把我们同帝国主义达成的这个协议和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称号愈激进就愈响亮）同协约国达成的对付本国工人的协议相提并论呢？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这样摆着，现在也是这样摆着的。要知道，现在还侨居欧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响的全欧洲闻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同协约国订有协议。这种协议是不是签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没有签字，聪明人干这些事是会不声不响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们捧出来，发给他们护照，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消息，说今天发表演说的是阿克雪里罗德，明天是萨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齐耶夫，后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那就很清楚，这种协议是有的。虽然这是默契，难道这就不是协议吗？难道这种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也和我们的一样吗？表面上是一样的，正如一个人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从表面上看，是和任何

类似行为一样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不管是何情况，不管我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是为的什么，是我受匪徒袭击，不把手枪交给他们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枪和金钱交给他们以求解脱呢，还是我明明知道匪徒们要去行劫而想同他们分赃呢。

“当然，我说这就是使俄国摆脱暴徒的专政，我无疑是个民主派，因为我拥护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民主制，我自然是在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不该怀疑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为匪徒们，为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者效劳，那我也是为了民主、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的利益呀，是为了使各个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为了打倒暴徒、篡夺者、布尔什维克呀！”

当然，目的是极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判断政策不是根据声明，而是根据实在的阶级内容？你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如果你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那你是不是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呢？

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曾顺便指出，在18世纪革命的美国人民争取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在他们进行解放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之一）时，争取解放的伟大的美国革命人民就曾经同当时在美洲、在美国人民家门口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美国人民同这些强盗结成联盟，击败了英国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有哪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是否见过有哪个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代表（或者叫什么别的名称，直到孟什维克），竟敢公开责备美国人民，说他们违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则呢？这样的怪人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他们给自己安上了这些称号，甚至自以为应该和我们呆在一个国际里，说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共产国际，而不愿参加伯尔尼那个老的、美好的、共同的、统一的国际，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在捣乱，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一些捣乱分子！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你们同威廉达成协议，我们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

我可以断言：假使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那他们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否认，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厌恶高尔察克叛乱，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甚至已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不能设想他们会不懂得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在全部革命史上被剥削阶级在同剥削者作斗争中常常被迫达成的协议，一种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主派、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来反对他们所说的本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对他们只能采取像觉悟的革命者对待高尔察克分子的态度，不容许采取任何别的态度。

三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普通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我们对此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让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像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像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又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要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过的、或者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很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天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的无线电讯。就在最近几天，我有机会看到法国强盗政府发出的无线电报，说什么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他们把什么叫作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诸如集会自由叫作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因为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像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我们说，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1649 年在英国、1792—1793 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作大革命，是因为它不像 1848 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有利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族，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会再想到当

一名非工作者的社会成员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快到来，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的到来），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种自由。

我们在投入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这些童话供自己和别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集会自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字眼更崇高更美好的呢！没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发展及其觉悟的提高能够想象吗？没有集会自由，人道的原则能够想象吗？但是，我们说，英国和北美合众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它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束缚劳动群众的手脚，因为我们很清楚，资产阶级将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一开始就很不寻常很“怪诞的”政权。在那些考虑过阶级斗争和稍微具体而明确地想到起义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人看来，只能是这样。资产阶级已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但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被推翻，正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推翻，它现在才以更为狂怒的姿态投入战斗。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就万事大吉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派和社会党人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因为资产阶级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蔼可亲地嘲笑过我们；米留可夫嘲笑过，切尔诺夫嘲笑过，新生活派^[161]也嘲笑过。他们嘲笑说：“好吧，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请你们组阁吧，你们亲自掌握一两个星期政权看看，——你们会帮我们一个大忙的！”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这样写过，米留可夫在《言语报》^[145]上这样写过，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76]也这样写过。他们所以嘲笑，是因为他们认为事情并不严重。现在他们看到事情严重了，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自己的护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资产者先生们现在也看到并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所以他们大家都在武装起来。你们最好能够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里的每个资产者都在武装起来，建立白卫军，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已经关系到他们能不能保持特权，使千百万人继续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现在斗争具有世界规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站在有产阶级一边，都是欺骗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现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

当劳动者受资本奴役、为资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集会自由是什么呢？是骗人的东西。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战胜剥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级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向这个阶级许诺自由、平等和由多数人作决定。

四

谈了自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没有专门谈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制。富人房产的所有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权拿过来，你试试看吧。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

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敌人中间引起了最多的责难，在没有经验和缺乏思考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最多的怀疑，同时也最容易把我们同那些想以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自居的人分开，他们埋怨我们，说我们不把他们看作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而把他们叫作资本家的拥护者。也许由于愚昧无知，但他们确实是资本家的拥护者。

就农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

这是事实。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货币和交换，就需要无产阶级多年的稳固统治，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平等的破坏者，你们不仅破坏了同剥削者的平等——这一点我也许还愿意同意，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说这种话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破坏了‘劳动民主派’的平等，你们是罪犯！”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并且肯定地说，你们主张这种平等，你们就是高尔察克的拥护者。”不久以前我在《真理报》^[23]上看到格尔曼诺夫同志写的一篇漂亮的文章，其中引证了最“社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一舍尔公民的提纲^[378]。这个提纲是在我们的一个合作社机关中提出的。这样的提纲真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员会里，并在末尾写上：“此人是高尔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舍尔公民及其同伙会因此把我叫作诽谤者，或者说得更坏些。可是，我要请那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入门和政治常识的人仔细地分析一下谁是谁非。舍尔公民说：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根本行不通，要先逐渐地然后广泛地转到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

我认为，这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我肯定地说，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读过《资本论》第1章的人，哪怕只是读过考茨基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人，都一定会认为：确实，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时候，当被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闹饥荒的时候，粮食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这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因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

只是谴责高尔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女教师，那是十分愚蠢的。这是庸俗地维护民主，这样控诉高尔察克是愚笨的。高尔察克现在正用一切方法进行活动。但是，他在经济上靠什么来支持呢？他靠贸易自由来支持，他为贸易自由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都因此而拥护他。你们说：“我已经离开了高尔察克，我不是高尔察克分子。”这当然使你很光彩，但这并不能证明你有一个能够判断事物的头脑。我们这样回答这些人，丝毫也没有伤害那些认清高尔察克是一个暴徒而离开了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面子。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同高尔察克进行殊死搏斗的国家里，继续为“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斗争，为粮食贸易自由而斗争，那

也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过他还不通这个道理，想不通这个问题。

高尔察克（不管他叫高尔察克还是邓尼金，不管军装如何不同，实质都一样）是靠占领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区之后，在那里准许粮食贸易自由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来维持的。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名称多得很）这班先生们的这种“自由”和“平等”，那么，在我们这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目前在乌克兰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匪帮，每个匪帮都起一个称号，一个比一个自由，一个比一个民主。

把工农平等奉献给我们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像舍尔公民那样，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指出，许诺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虽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国家的具体条件，特别是一个遭到完全破坏的国家的条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硬说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党人”经常责备我们，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说，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低下的”共产主义。这纯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们看书，读书，反复背诵，但是一点也不懂得书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甚至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考茨基甚至现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两天看了一份我们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纸，上面谈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379]考茨基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读报告）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没有生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维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怜的德国工人！他们正在同谢德曼和诺斯克作斗争，同刽子手作斗争，竭力要推翻仍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刽子手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权，他们认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343]。俄国的一切资产者说（这曾登载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报纸上）：“就应该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都很清楚，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主张这样做。应当进行自卫。谢德曼和诺斯克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战争毕竟是战争。德国工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内战时期，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该使工人有饭吃。考茨基却认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

哦，聪明绝顶的先生们！但是在一个被帝国主义者所掠夺所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煤、没有原料、没有工具的国家里，你们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发展生产”！不过，我们人民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380]每次开会都在分配残存的几百万普特的煤或石油，我们很苦恼，每个委员只拿到残存的一点物资，感到不够，不得不决定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业，——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但是只能这样做，因为没有煤。煤在顿涅茨煤田，由于德寇的侵犯，煤被毁掉了。请你们看看比利时和波兰，这是个典型现象，到处都同样呈现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这就是说，失业和饥饿现象还要存在很多年，因为有些被淹的矿井过许多年也是恢复不起来的。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

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鼓掌）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当然不会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老爷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老爷们也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的。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派和多数人的意志这一套市侩的空谈，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类“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愚蠢的市侩空谈来看，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来谈什么和平发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拿法国来说。法国是个战胜国，然而那里的粮食生产减少了一半。在英国，我从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人们说：“我们现在是乞丐了。”而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竟责备共产党人使生产陷于停顿！说这种话的人，尽管再三自称是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我们还要忍受许多年的贫困，许多年的倒退，向野蛮方面的倒退。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倒退，使我们向野蛮方面倒退。如果我们能够拯救劳动者，拯救人类的主要生产力——工人，我们就能挽救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拯救工人，我们就会灭亡；因此，再说一遍，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者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只会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像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生命，拯救工人，而工人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工厂停工，工厂之所以停工是因为没有燃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完全不合理，工业同原料产地隔绝。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棉纺织厂需要的原料，要从埃及和美国运来，再近也要从土耳其斯坦运来，当反革命匪帮和英国军队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诺沃茨克的时候，请你们从土耳其斯坦运看！当铁路无法运输，遭到破坏，没有煤陷于停顿的时候，请你们从埃及从美国运看！

必须拯救工人，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工作。如果我们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就会倒退，退回到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们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有人走来对我们说：“我们主张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你们共产党人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平等”；那我们回答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

你们说，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吧？那让我们来衡量一下，计算一下。拿 60 个农民和 10 个工人来说。60 个农民有余粮。他们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有粮食。而 10 个工人呢，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衣衫褴褛，受尽折磨，没有粮食、燃料和原料。工厂停工。怎么样，你们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吗？60 个农民有决定的权利而 10 个工人应当服从吗？好一个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和由多数人作决定的伟大原则！

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回答说：“你们是一些小丑，因为你们用一些动听的话来回避和掩盖饥饿的问题。”

请问你们：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工厂停工的国家里，如果农民不把余粮拿出来，挨饿的工人是不是有服从多数农民的决定的权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们有没有甚至用暴力取得这些余粮的权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问题的实质，他们就转弯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国的工业都遭到破坏，而且这种状况将继续好几年，因为烧掉工厂或淹没矿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炸毁车厢、捣毁机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傻瓜，不管他是德国军官或法国军官，做这种事都是很能干的，特别是他有了进行爆炸、射击等等的优良装备的时候；然而恢复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农民千百年来受到的熏染就是，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谁以为用一个说服另一个，另一个说服第三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在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机关之后，发现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这就是习惯势力。我们愈坚决地摧毁一切支持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即习惯的势力就表现得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我们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下解放了出来，摧毁了束缚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由出卖粮食是“自由”，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余粮是不自由。农民愤慨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要“交售”；特别是在我们的机构还很糟的时候，他们更是这样说，而机构很糟，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都站在苏哈列夫卡^[381]那边。显然，这种机构应该依靠那些正在学习、即使是忠诚老实也至少要学几年才学得会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学会，我们的机构还是糟的，有时甚至会有各种自称为共产党人的骗子混进来。这种危险威胁着任何一个执政的党，威胁着任何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因为既不能一下子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机构。我们很清楚，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还很糟。不久以前，对非农业省份的工人的食物供应情况作了科学的统计调查。原来他们的一半粮食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是从投机商那里得到的，前一半占他们全部购粮支出的十分之一，后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收集和供给的，当然在收集上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收集的。收集这一半粮食

是靠战胜了投机商，而不是靠同投机商作交易，这样做有利于挨饿的工人，而牺牲了社会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先生们所夸耀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诸位先生，你们死守着你们的“平等”吧，而我们则要跟被我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挨饿的工人在一起。不管孟什维克怎样责备我们破坏“平等”，事实却是这样的：我们在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解决了粮食任务的一半。所以我们说，如果 60 个农民有余粮，而 10 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是一般“平等”和“劳动者的平等”，而是 60 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10 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整个 19 世纪全部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他们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些民主派听来也许是不堪入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恶意诬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们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读一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读一读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的叙述，去想一想 18 世纪和 19 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 19 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

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

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们出卖粮食这种必需品，谁要没有这种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财产去换它。饥饿是无情的，为了买到粮食，花一千卢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农民的过错，农民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他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取货币。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货币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要消灭货币，必须组织好亿万人的产品分配，——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往坏处说则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如果资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收买他们，用恢复自由贸易引诱他们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所有俄国白卫分子的经济纲领就是自由贸易。他们是懂得这一点的，舍尔公民不懂得这一点，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并不因某个政党不懂得它们就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自由贸易。有人竭力欺骗农民说：“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是更好吗？难道靠自由出卖农业劳动来生活不是更好吗？什么比这更公平呢？”自觉的高尔察克分子是这样说的，从资本的利益来看，他们是说得对的。为了恢复俄国资本权力，需要依靠传统——依靠农民的偏见而反对他们的理智，依靠自由贸易的旧习惯——需要用暴力镇压工人的反抗。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高尔察克分子是对的，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中说得头头是道，懂得从何开头从何结尾，懂得农民的自由贸易和对工人的残暴枪杀之间的联系。

联系是有的，虽然舍尔公民不了解这种联系。粮食自由贸易是高尔察克分子的经济纲领，枪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如在芬兰）是实现这个纲领的必要手段，因为工人不会白白放弃他们已获得的果实。联系是密切的，而那些一点不懂经济科学和政治的人，那些由于自己市侩的懦怯心理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企图用“平等”、“自由”的空谈使我们忘记这种联系，他们大喊大叫，说我们破坏“劳动民主派”内部的平等原则，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公平的”。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念。这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派。在我们看来，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同心协力而外，用其他办法是不能打倒资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万农民一下子就巩固地联合起来去反对资本、反对自由贸易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农民十分自由并有高得多的文化。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其他的经济条件，需要多年的准备。那么，谁来进行这种准备呢？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们可能动摇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他们也可能发牢骚，讲怪话，咒骂无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少数。可以咒骂他们，可以高谈多数，高谈你们劳动民主派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高谈纯粹民主。要讲多少话都可以。但这些话只是掩盖一个事实：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饿、工业停顿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转变时期，那些不是按照较公平的价格而是按照“自由的”价格，按照资本主义的和生意人的价格帮助工人得到粮食的人，不管他们本人怎样替自己否认，不管他们怎样真心地相信他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实行自己的纲领，他们都是在实行高尔察克分子的纲领。

五

现在我来谈我所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失败和胜利的问题。我曾经向你们提到考茨基，作为老而腐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他责备我们说，按多数人意志作出的决定才是能够保证和平结局的决定。靠专政作出的决定是一种用军事手段作出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你们用军事手段得不到胜利，你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因为内战不是俘虏人，而是消灭人。被吓倒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吓唬”我们的。

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事实。我们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国内战争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严重更残酷的战争。在历史上，自古罗马的国内战争起，一直都是如此，因为国际战争总是以有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而告结束，唯有在国内战争中，被压迫阶级才集中全力来彻底消灭压迫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

我要问你们，有些“革命家”用革命可能遭到失败来吓唬开始了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家”有什么用处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不冒失败危险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在多少有些觉悟的社会党人中间，是没有观点上的分歧的。当我分析了考茨基所写的这些东西的全部叛卖性之后，我在一年以前写道（这是去年9月的事情）：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因为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失败，它也是胜利的。看起来这可能像是玩弄字眼，但是为了说明这是事实，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上的具体例子。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蒙蔽了。

我们的革命一年半来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情，要比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们所做的事情多得多。

他们支持了两年，后来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击下灭亡了，在全世界的联军的打击下灭亡了，这些反动势力打败了法国革命家，在法国恢复了正统的合法的君主——那个时代的罗曼诺夫，恢复了地主的统治，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扼杀了法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

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定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

一年半来，我们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我们奋斗的目的，为打倒资本统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国革命为本阶级所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们说，即使出现某种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我们的话可以从下列一点得到证明：这次革命建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中已经取得道义上的胜利，现在就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遭到灭亡，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斗，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尤其是先进的英国都起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的革命仅仅经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年半的统治，就使它所创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组织成了全世界工人所理解、所熟悉、所欢迎的组织，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绝对必需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

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因此，我在代表大会开幕的简短贺词中强调了这一基本的、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因此，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我现在拿组织常识来反对这些臆造。分配粮食和煤时，要爱惜每一普特煤和每一普特粮食，——这是无产阶级纪律的任务。这不是农奴主用棍棒来维持的纪律，也不是资本家用饥饿来维持的纪律，而是同志的纪律，工人联合会的纪律。解决了这个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摇摆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农民，那时一定会完全跟我们走。而现在，农民不知道，他应该跟着他还不相信但又不能否认他们在实行一种没有剥削的较为公平的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危害国家的罪行）的人走呢，还是跟着那些照旧许以似乎意味着劳动自由的粮食贸易自由的人走。如果农民看到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政权时善于建立秩序（农民需要秩序，希望有秩序，在这一点上农民是对的，虽然农民这种追求秩序的意愿还和许多模糊的东西、许多反动的东西、许多偏见分不开），农民在多次动摇之后，终于会跟工人走的。农民不可能简单地、轻易地、一下子就摆脱旧社会而走向新社会。他们知道，他们从旧社会得到“秩序”的代价是劳动者破产，是劳动者沦为奴隶。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能不能给他们秩序。对于闭塞、愚昧、散漫的农民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相信任何言论，不相信任何纲领。他们不相信言论倒很好，要不然他们就摆脱不了各种欺骗。他们只会相信行动，相信实际经验。要向他们证明，你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善于分配粮食和煤，不糟蹋一普特粮食和一普特煤，能够使每一普特余粮和每一普特余煤都不拿去做投机买卖，不为那些苏哈列夫卡的英雄们所利用，而是拿来作公平的分配，供给挨饿的工人，甚至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时候拿来援助他们。一定要证明这一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任务。在没有经济根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但历史注定它是要失败的。但依靠先进阶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秩序和组织的更高原则，是可以使用暴力的。那时暴力也可能暂时遭到失败，但它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向农民表明：制度是正确的，劳动和粮食的分配是公平的，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是爱惜的；我们工人能够靠同志的纪律，联合组织的纪律来实现这一切；我们用暴力进行斗争，只是为了保护劳动的利益，只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我们准备把我们现在所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他们，——如果农民看到了这一切，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会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现在正朝这方面去做。

我有点离开了本题，现在应该回到本题上来。目前在所有国家中，已经不像我们不久以前只是重复而不懂得“义和团”这个名词那样，把“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看作怪诞的字眼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名词由世界各种语言重复着。觉悟的工人都看到各国资产阶级每天怎样在千百万份报纸上诬蔑苏维埃政权，他们正从这种谩骂中学习。我最近看了几份美国报纸。我看到一个美国牧师的演说，他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些缺德的人，他们实行共妻，他们是强盗，是掠夺者。我也看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回答：他们以五分钱一份推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287]，推销这个不实行“劳动民主派的平等”的“专政”的宪法。他们是援引这些破坏劳动民

主派的统一的“篡夺者”、“强盗”、“暴徒”的宪法中的一条来回答的。这里顺便谈一下，当欢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的时候，纽约一家最大的资本家报纸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到达的那天用特大号的字登着：“欢迎老夫人到来！”美国社会主义者转载了这条消息说：“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美国工人们，你们是不是因为资本家赞扬她而感到惊讶呢？”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为什么他们要赞扬她呢？因为她反对苏维埃宪法。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你们看，这一条是从这些强盗的宪法中引来的。”他们引来引去总是那一条：凡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苏维埃政权正是由于它公开地讲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新类型的国家组织，它才博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这种新的国家组织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困难千万倍，但这对于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组织来说，又有益千万倍。当无产阶级的组织解决了这个任务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获得最终胜利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在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里，但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拉丁词，以前任何一个劳动者听到它时，都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怎样实现它。现在这个词已由拉丁文译成现代的各种语言了，现在我们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政权下，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的组织高于一切；任何一个非劳动者，任何一个剥削者都没有权利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要全力以赴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任何虚伪的口号，任何‘自由’、‘平等’之类的偶像，都骗不了我们。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派，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我们已把这一点载入苏维埃宪法，并已博得全世界工人对这部宪法的同情。他们知道，不管新制度的诞生多么困难，不管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考验甚至失败是多么严重，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人类拖向后退。（热烈鼓掌）

载于 1919 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9 年 5 月 6—19 日）》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322—358 页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1919年5月27日)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368]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得多（现时匈牙利有800万人口，300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领袖，无论是社会沙文主义派或考茨基派的领袖，都死死抱着几十年来较为“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制所养成的纯粹市侩的偏见，根本不可能懂得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把这些领袖抛弃，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使命。这班人完全或部分地相信了资产阶级关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谎言，不善于把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劳动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

这些死死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的盲人，不懂得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他们把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发展史的某些特点同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意义混为一谈。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现在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种政权是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者拥护的。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这些阶层的动

摇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在这里，像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样，空谈一般“民主”，空谈“统一”或“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等等，是无济于事的。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巩固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因循守旧的习气。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阶级斗争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和犹豫动摇，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组织影响，“中立”那些害怕离开资产阶级而很不坚定地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阶层，巩固新的纪律即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加强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牢固联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用这种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基础去代替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纪律，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饥饿纪律，“自由”雇佣奴隶制的纪律。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不仅如此。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所享用，它经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与过去决裂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极有希望但极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协约国^[359]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制止这种动摇。枪毙，这是胆怯者在战争中应得的命运。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

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列宁

1919年5月27日

载于1919年5月29日《真理报》第11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74—378页

注 释

[1] 《远方来信》是列宁在瑞士为《真理报》写的一组文章（共5封信）。列宁获悉俄国发生革命的确实消息以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组成情况以后，就开始写这些文章。这里选收了第一封信。——1。

[2] 《远方来信。第一封信》在《真理报》发表时被编辑部删去了约五分之一，主要删去了列宁对妥协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首领们趋奉资产阶级并试图掩盖英法政府代表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一起参与推翻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一事实的评述，以及对临时政府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君主主义和帝国主义意图的揭露。——1。

[3] 指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俄国二月革命中，彼得格勒各工厂企业先后选举了苏维埃代表。2月27日（3月12日）晚上，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的领导人尼·谢·齐赫泽当选为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马·伊·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安·扎卢茨基。社会革命党最初反对组织苏维埃，后来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弗·米·晋季诺夫。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它是工人和士兵代表的机关。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年6月）以前，它实际上是全俄的中心。3月1日（14日），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两名布尔什维克——亚·尼·帕杰林和安·德·萨多夫斯基，工人代表苏维埃从此改称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齐赫泽、尤·米·斯切克洛夫、波·奥·波格丹诺夫、彼·伊·斯图契卡、彼·阿·克拉西科夫、格沃兹杰夫等。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于2月28日（3月13日）发表了《告彼得格勒和全国居民书》，号召人民团结在苏维埃周围，把管理全部地方事务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它派遣特派员到全市各区建立人民政权机关。3月3日（16日），苏维埃成立了粮食、军事、城防、书刊等专门委员会。

尽管苏维埃的领导权掌握在妥协派手中，但是在革命工人和士兵的压力下它还是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逮捕旧政权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苏维埃还着手组织民兵，每1000名工人中有100人参加民兵。3月1日，苏维埃发布了《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戍部队的第1号命令》，规定军队在政治行动中服从苏维埃，各种武器转交给选举产生的连委员会和营委员会支配和控制，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和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予以执行等。

当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苏维埃手里。但是在关键时刻，3月1日夜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妥协派领导人却自愿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同意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这种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行为，列宁在国外无法得知。他是在回到俄国后才获悉这一情况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36页）。——4、19、101。

[4] 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

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4。

[5]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

[6]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又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5、588。

[7]组委会分子指俄国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

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6、15、42。

[8]指 1917 年 3 月 2 日（15 日）成立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同把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协议成立的，起初称“第一届社会内阁”，3 月 10 日（23 日）定名为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十月党人）、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财政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司法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劳动派）、正教院总监 . . . 李沃夫、国家监察长 . . . 戈德涅夫（十月党人）。——7、76、97。

[9]和平革新党人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1906 年 7 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 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 1912 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8。

[10]劳动派分子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劳动派（劳动团）的成员。劳动派于 1906 年 4 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 年 6 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面。——8、38、99、319。

[11]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 1915 年 5 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 年 7 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除讨论经济问题外，还提出了建立得到国家杜马信任的政府等政治问题。大会选出十月党人亚·伊·古契柯夫（任主席）和进步党人亚·伊·柯诺瓦洛夫为首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1915 年 7 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 244 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 76 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 58 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 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 年 7 月 24 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8、236。

[12]《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包含了著名的《四月提纲》。4月4日(17日),列宁在塔夫利达宫的两个会(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提纲。——13。

[13]指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

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召开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于1917年3月27日—4月2日(4月9—1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又称三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约70个党组织的120多名党的工作者,他们是出席全俄苏维埃会议的代表和各地地方党组织的特邀代表。会议讨论了战争问题、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以及组织革命力量同反革命斗争等问题。会议的决议反映了列宁回国以前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各地地方组织在某些重要策略问题上缺乏明确性。4月1日(14日),会议接受孟什维克提议,讨论了没有列入议程的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并决定为了解情况而参加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13、23。

[14]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于1917年4月4日(17日)举行。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还有: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真理报》、《统一报》、《工人报》、《消息报》的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历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各民族社会党的代表和地方代表。在会议上,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在弗·萨·沃伊京斯基、尼·谢·齐赫泽和伊·格·策列铁里的支持下,发言呼吁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接着列宁作了报告,反对在当时情况下统一的主张。他的报告遭到孟什维克策列铁里、戈尔登贝格、费·伊·唐恩等人的攻击。亚·米·柯伦泰发言维护列宁的纲领。为了表示抗议,布尔什维克退出了会议,同时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布尔什维克将不参加任何统一的尝试。——13、23。

[15]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15、258。

[16]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

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脑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

[17] 《统一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翼集团统一派的报纸，在彼得格勒出版。1914年5—6月出了4号。1917年3—11月为日刊。1917年12月—1918年1月用《我们的统一报》的名称出版。编辑部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尼·瓦·瓦西里耶夫、列·格·捷依奇和尼·伊·约尔丹斯基。该报持极端沙文主义立场，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用下流报刊的手法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6、31、241、292。

[18] 《俄罗斯意志报》（《 》）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亚·德·普罗托波波夫创办，1916年12月起在彼得格勒出版。该报靠大银行出钱维持。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大肆诽谤布尔什维克。列宁称它是最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1917年10月25日被查封。——17。

[19]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一直拖延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不得不于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8月9日（22日），临时政府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

立宪会议是议会式机关。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最早提出的，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也列入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诱使群众放弃革命斗争，断言立宪会议能通过立法方法解决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害怕比社会革命党左的农民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又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布尔什维克党在不否定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的同时，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下，现实生活和革命本身将把立宪会议推到后台。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17、96、222、312、333、338、363、386、389、404、505、532、578、615、706、761。

[20] 布朗基主义者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1872年秋天，在伦敦的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发表了题为《国际和革命》的小册子，宣布拥护《共产党宣言》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对此，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予以肯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7—595页）。——21、30、162、274、662。

[21] 《论策略书》这本小册子在1917年内由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波涛出版社出了3版，每一版都附有列宁的《四月提纲》。小册子的第1版是在4月27日（5月10日）前、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29日（5月12日）表决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案的前几天出版的。——23。

[22]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于1917年3月29日—4月3日（4月11—1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会议的有139个苏维埃的代表以及一些在前线和后方的部队的代表，共480名，其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会议讨论了对战争的态度、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组织革命力量同反革命斗争、准备召开立宪会议、土地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布尔什维克就议程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会议就战争问题通过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护国主义的决议案（327票赞成，57票反对，20票弃权），同意临时政府否认战争具有侵略目的的声明。以列·波·加米涅夫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小组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立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补充了革命民主派监督和影响临时政府及其地方机关的内容以后，撤回了自己的决议案，而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会议通过了在立宪会议上支持全部私有土地无偿转归劳动人民的决议，但反对各地“擅自解决”土地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讨论摆脱战争的出路问题的决议。会议将 10

名地方代表和 6 名陆海军代表选进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从而使它在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成为全俄苏维埃的中央机关。

——23。

[23] 《真理报》(《 》)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 年 4 月 22 日(5 月 5 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 年，《真理报》刊登了 300 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 年出版的总共 645 号报纸中，就有 190 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 8 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4 年 7 月 8 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 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 3 月 5 日(18 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 4 月 3 日(16 日)回到俄国，5 日(18 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 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 7 月 5 日(18 日)被士官生捣毁。7 月 15 日(28 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 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 貳 段 蕙 紕 貳 豆と巳毡 貳 豆と酥 繁 貳*1917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 年 3 月 16 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23、90、176、247、421、429、578、622、817。

[24]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917 年 4 月 24—29 日(5 月 7—12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

由于中央内部在对革命的估计、革命的前途以及党的任务问题上有分歧，根据中央的一致决定，全党在代表会议召开以前，围绕列宁的《四月提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公开争论。这样，地方组织就有可能预先讨论议程中的问题，并弄清普通党员对它们的态度。出席代表会议的有 151 名代表，他们代表 78 个大的党组织的约 8 万名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的代表，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民族组织的代表。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的议程是：目前形势(战争和临时政府等)；和平会议；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同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各地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是主席团的成员，他领导了会议的全部工作，作了目前形势、修改党纲和土地问题等主要报告，发言 20 多次，起草了代表会议的几乎全部决议草案。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以《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波·加米涅夫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副报告，他和阿·伊·李可夫企图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认为只能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监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各民族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的口号。他们的错误观点受到了会议的批判。在讨论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时，会议通过了格·叶·季诺维也夫提出的继续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里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错误决议案，列宁投票反对这一决议案。代表会议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伊·捷·斯米尔加、斯大林、 . . . 费多罗夫共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24、69、435、617、702。

[25] 陛下的反对派一语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讲话。1909年6月19日（7月2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1909年6月21日（7月4日）《言语报》第167号）——29。

[26]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亚·李·帕尔乌斯在1905年提出的，后来成了俄国托洛茨基分子的一个论点。——29。

[27]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该书最初于1894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31。

[28] 容克是德语 Junker 一词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35、264、300、525。

[29] 有关《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一著作写作和出版情况，见《后记》（本卷第69—71页）。——37。

[30] 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6—20日（4月19日—5月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会议在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下，采取了护国主义立场，声明完全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代表会议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和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实际问题的委托书。布尔什维克伊·阿·泰奥多罗维奇是在4月8日（21日）的会议上发言的。《统一报》说他的发言给代表会议带来一些不协调的空气。——42。

[31]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厨子看见猫儿瓦西卡在偷鸡吃，便唠唠叨叨地开导它，责骂它，而瓦西卡却边听边吃，全不理睬，直到整只鸡被吃完。——43。

[32] 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54。

[33] 费边社分子即费边派，是1884年成立的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

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201 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为名。费边派虽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改良来逐渐改造社会，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 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6 卷第 322—327 页和第 26 卷第 278—284 页）。——55、110。

^[34]拉布分子即英国工党党员，列宁在这里指工党领袖。工党于 1900 年成立，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 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从 1924 年起，工党领导人多次组织政府。——55。

^[35]工作小组是德国的中派组织，由一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议员组成，1916 年 3 月成立。领导人为胡·哈阿兹、格·累德堡和威·迪特曼。工作小组出版《活页文选》，1916 年 4 月以前还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中派分子被排除出《前进报》以后，工作小组把在柏林出版的《消息小报》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得到柏林党组织中多数的支持，是 1917 年 4 月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56。

^[36]米诺利特（法文 Minorité 的音译，意为少数派）即龙格派，是 1915 年形成的法国社会党内的少数派，社会改良主义者让·龙格的拥护者。该派持中派观点，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妥协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派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的政策，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1920 年 12 月在图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龙格派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拒绝服从，另行成立一个党，仍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56。

^[37]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 年 1 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 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56、219。

^[38]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

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费·罗特施坦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56。

^[39]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根据列宁倡议建立的国际组织，于1915年9月4日，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左派社会党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一名称，则是1915年11月该组织出版刊物《国际传单》时开始正式使用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最初参加者即9月4日会议的出席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瑞士代表弗·普拉滕，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尤·博尔夏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安·别尔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卡·伯·拉狄克，瑞典代表卡·霍格伦，挪威代表图·涅尔曼。9月4日这次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批评了多数代表的中派和半中派观点，提出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叛卖行为和指出积极进行反战斗争的必要性等决议案。他们的决议案被中派多数所否决，但是经过斗争，决议案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仍写入了代表会议的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对宣言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个特别声明中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它将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独立的工作。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选举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组成的领导机关——执行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刊物——德文《先驱》杂志共出了两期，发表了列宁的几篇文章。在1916年4月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有所发展，它在40多名代表中占了12名，它的一系列提案得到半数代表的赞成。1917年初，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公开背叛，列宁向左派提出了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的问题。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本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参看列宁的《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2—52页）等文。——57、640。

^[40]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

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7、649、758。

[41]《工人政治》杂志（《Arbeiterpolitik》）是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周刊），以约·克尼夫和保·弗勒利希为首的不来梅左翼激进派（该派于1919年并入德国共产党）的刊物，1916—1919年在不来梅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尼·伊·布哈林、昂·吉尔波、亚·米·柯伦泰、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安·潘涅库克、卡·拉狄克和尤·米·斯切克洛夫等人。杂志反对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沙文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杂志广泛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发表过列宁的几篇文章和讲话。在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它刊载过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和《国家与革命》两著作的一些章节。——58。

[42]《明日》杂志（《Demain》）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作家昂·吉尔波创办的文 掌缆盆院驼 涡钥 铮彳驴 *1916年1月—1919年先后在日内瓦和莫斯科出版（1917年1—4月休刊）。为它撰稿的有作家罗曼·罗兰、斯·茨威格等。该杂志反对沙文主义，宣传齐美尔瓦尔德的纲领，刊载过列宁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从1919年9月起，成为法国共产主义者莫斯科小组的刊物。——58。

[43]《工联主义者报》（《The Trade-Unionist》）是英国带国际主义倾向的工 岂日剑*1915年11月至1916年11月在伦敦出版。——58。

[44]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世纪70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衷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90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58。

[45] 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 1897—1898 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 年 7 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 1912 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 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58。

[46] 《国际主义者周报》（《The Internationalist》）是美国左翼社会党人的报纸，1917 年初由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在波士顿出版。——58。

[47] 论坛派是 1907—1918 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 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 年 2 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 3 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 年 11 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

《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 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从 1909 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 1918 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 年停刊。——58。

[48] 瑞典青年党或左派党是列宁对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称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党人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 年 5 月，他们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 年，该党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改名为瑞典共产党。——58。

[49] 丹麦社会民主党原为第一国际的支部，1871 年创立，1872 年被政府解散。1876 年该党重建，称为社会民主同盟，1884 年起定名为丹麦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丹麦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但是改良派在党的领导中处于优势。1884 年起是国会党。1889 年参加第二国际。20 世纪初，以弗·伯格比尔、E.安森、托·斯陶宁格为首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势力有了加强。1913 年该党代表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站在维护“国内和平”的立场上。1918—1919 年，在丹麦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党内左派退出，于 1920 年参与创建丹麦共产党。——58。

[50] 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 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和它对立的派别叫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和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

主义战争。1919年，该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58。

[51]《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58。

[52]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和总执行委员会都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4月，该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由于党的领导成员扬·梯什卡等人在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1911年12月该党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在国外的总执行委员会，称为总执委会派；另一派拥护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称为分裂派。分裂派主要包括华沙和洛兹的党组织，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赞同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1916年该党两派合并。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59。

[53]指《关于修改军事问题的决议的建议》。这个决议是由列宁拟定、以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提交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52页）。——59。

[54]这里说的《开姆尼茨报》指《人民呼声报》。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1年1月—1933年2月在开姆尼茨出版。1907—1917年担任该报主编的是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恩·海尔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钟声》杂志（《Die G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60。

[55]指《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这个宣言号召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斗争，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宣言发展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的思想，指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制止战争的唯一手段，但是对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明确的口号避而未提。——60。

[56]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的第三篇《法国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和平主义》里专门批判了法国社会党和劳动总联合会的这些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33—238页）。这两项决议都欢迎美国总统伍·威尔逊以调解人身分敦请各国“公开说明自己关于结束战争条件的意见”，即敦请各国缔结帝国主义的和约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法国社会党是由 1902 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 1901 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 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 1920 年 12 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

劳动总联合会（工会总同盟）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成立于 1895 年。总联合会长期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其领袖们仅承认经济斗争，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实行阶级合作，鼓吹“保卫祖国”。——61。

^[57]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 1915 年 9 月 5—8 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 11 个欧洲国家的 38 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61、639。

^[58]指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代表会议）于 1916 年 4 月 24 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 4 月 25—30 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 40 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3 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 2 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左翼的 3 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共有代表 12 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 12—19 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的变化。在昆塔尔会

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

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

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原则，列宁仍然称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代表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后来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倡议，这些国际主义分子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61。

[59] 《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在《青年国际》一文中对它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87—291页）。

1919—1941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61。

[60] 指瑞士社会民主党。

瑞士社会民主党（在瑞士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称瑞士社会党）成立于1870年，加入过第一国际，1888年重新建立。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很大势力，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6年秋，该党右翼（格留特利联盟）从党内分裂出去。以罗·格里姆为首的多数党员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党内左派则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该党左翼增强。左派于1920年12月退出该党，1921年3月同1917—1918年出现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一起组成了瑞士共产党（现称瑞士劳动党）。——62。

[61] 《工人报》（《 a 》）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7日（20日）—11月30日（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月30日（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波·奥·波格丹诺夫、库·安·格沃兹杰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涅·切列万宁等。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63、76、228、246。

[62] 俄国临时政府为了抵补不断增加的战争支出和支付外国贷款的利

息，发行了数达 60 亿卢布的战争公债，即所谓“自由公债”。1917 年 4 月 7 日（20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 21 票对 14 票通过了积极支持发行“自由公债”的决议案。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发行公债，提出了详细阐明自己立场的决议案。有一些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执委会成员也投了反对票。问题提交苏维埃全会讨论，结果 2000 名代表赞成发行公债，123 名代表反对。在苏维埃全会讨论前，各个党团内预先进行了讨论。——63。

[63]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一个信徒请求耶稣准许他回家埋葬了父亲再跟随耶稣外出行道，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了他。意思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信仰，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63。

[64] 指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该党于 1901 年 6 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 1869 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67。

[65] 《士兵真理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 年 4 月 15 日（28 日）在彼得格勒创刊。它起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从 1917 年 5 月 19 日（6 月 1 日）第 26 号起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发行 50000—75000 份，其中一半送往前线。1917 年七月事变后被临时政府查封。1917 年 7—10 月改用《工人和士兵报》和《士兵报》的名称出版，并一度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起恢复原名。1918 年 3 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定，《士兵真理报》以及《农村贫民报》、《农村真理报》停刊，由《贫苦农民报》代替。——69。

[66] 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原定于 1917 年 5 月 31 日召开，后一再延期，最终于 1917 年 9 月 5—12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国社会党左派（瑞典左派、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左派、斯巴达克派、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中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党、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保加利亚独立工会）和社会沙文主义派（以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俄国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派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投了反对票，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应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断绝关系，立即着手组织第三国际。他只同意为了解情况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的是瓦·瓦·沃洛夫斯基和尼·亚·谢马什柯。代表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主要议程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罗·格里姆事件（指原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格里姆充当瑞士部长阿·霍夫曼的密使，在俄国进行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的试探一事）；对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为在各国争取和平和开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斗争。由于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会议的

决议和宣言也就具有模棱两可的妥协性质。

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他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罪行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

代表会议的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反对战争和保卫俄国革命的国际总罢工，但是没有写进革命社会民主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各交战国政府遭到失败等口号。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声援被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以及囚禁在克伦斯基监狱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亚·米·柯伦泰等。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可参看《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64—266页）。——70。

[67] 联合内阁即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这届内阁是四月危机的产物。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照会盟国政府，声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它们签订的一切条约。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20日和21日（5月3日和4日），游行示威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士兵运动。临时政府为了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免去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的职务，并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违背了它3月1日（14日）通过的关于苏维埃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于5月1日（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为了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5月2日（15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以多数票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5月5日（18日）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有5名社会党人参加联合内阁。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帕·尼·佩列维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 . . 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 B.H. 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本卷第94—108页）。——70、75、102、227、235。

[68] 指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1917年5月11日（24日）发布命令，颁发《士兵权利宣言》一事。这个宣言实际上取消了士兵群众在二月革命中争得的权利。为了对付拒绝进攻的士兵和军官，宣言规定：长官在战时可以对不执行命令的下属使用武力。在发布命令的同时，克伦斯基动手解散

一些团队，并把“煽动抗命”的军官和士兵送交法庭审判。——71。

[69]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4—28日（5月17日—6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由各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军队农民组织选出的代表1115名，其中社会革命党人537名，社会民主党人103名（大部分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团只有9人），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其中由米·瓦·伏龙芝组织的14名“无党派人士集团”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有联合临时政府问题、粮食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等。

代表大会成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争夺农民群众的舞台。在大会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列宁十分重视农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他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和他发表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避免他们自己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遭到否决，不得不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决议草案中写上“一切土地应当毫无例外地交土地委员会管理”（第2条）。大会表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赞成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主张把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和在前线发动进攻，同意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把土地问题拖延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的主张。大会选出了由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72、80。

[70]这里选收了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90名，代表305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个作战部队组织，8个后方军队组织和5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有革命民主和政权问题、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立宪会议的筹备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12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在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讲到俄国没有一个政党准备单独掌握全部政权时，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即席声明说：“有的！”接着在自己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时刻准备掌握全部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每个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2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大撤退》一文中列宁指出，这次代表大会非常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已经退出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78页）。——74、282、629。

[71]指1917年5月14日（27日）《工人报》第56号上《国家在危急中》一文中的话。列宁于1917年5月31日（6月1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资本家在嘲弄人民》一文，对该文进行了详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1—204页）。——76。

[72]指土耳其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个海峡统称为黑海海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站在德国方面参战以后，英法于1915年同俄国签订一个秘密协定，允诺把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划归俄罗斯帝国，以鼓励它把对德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废除了这一协定。——79。

[73]沙俄陆军上校弗·普·利亚霍夫以镇压高加索和伊朗民族革命运动的刽子手而臭名昭彰。1906年，他被派往伊朗北部，在那里积极执行了沙皇的反动政策，所以列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对波斯的政策。——79。

[74]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7年5月16日（29日）第67号发表《没有兼并》一文的事。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于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最初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从3月2日（15日）第3号起成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起初有：波·瓦·阿维洛夫、弗·亚·巴扎罗夫、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约·彼·戈尔登贝格和格·弗·策彼罗维奇。由于编辑部内部意见分歧，阿维洛夫、邦契-布鲁耶维奇和策彼罗维奇于4月12日（25日）退出了编辑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费·伊·唐恩、弗·萨·沃伊京斯基、A.A.郭茨、伊·瓦·切尔内绍夫随后进入编辑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该报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名称出版。决定该报政治方向的是当时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联盟的代表人物。十月革命后，该报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该报更换了编辑部成员，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该报迁至莫斯科出版。从1923年7月14日起，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38年1月26日起，改称《苏联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80、229、235、302、805。

[75]这里说的是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俄国未来政治制度的决议。——80。

[76]《新生活报》（《 》）是俄国报纸（日报），由一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年鉴》杂志周围的作家创办，1917年4月18日（5月1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8年6月1日起增出莫斯科版。出版人是阿·谢列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编辑部成员有马·高尔基、谢列布罗夫、瓦·阿·杰斯尼茨基、尼·苏汉诺夫，撰稿人有弗·亚·巴扎罗夫、波·瓦·阿维洛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等。在1917年9月2-8日（15—21日）被克伦斯基政府查封期间，曾用《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十月革命以前，该报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时而反对临时政府，时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该报对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查封。——81、282、332、357、373、501、527、554、814。

[77]指1917年6月4日（17日）《新生活报》第40号刊载的弗·亚·巴

扎罗夫的《今后怎样？》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坚持所谓为挽救革命而继续单独进行战争的论点。——81。

[78]指英国政府发给英国独立工党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去俄国的护照一事。麦克唐纳是应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邀请到俄国访问的，因英国海员工会拒绝为他开船而未能成行。——82。

[79]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这个号召书是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多数在要求停止战争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在1917年3月14日（27日）的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第二天发表于《真理报》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号召书充满关于和平的华丽词句，但没有揭露战争的掠夺性质，没有提出争取和平的任何实际措施，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辩护。——82、343。

[80]1917年6月，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宣布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受意大利事实上的保护。同年6月11日，协约国在希腊策动政变，迫使反对参战的希腊国王君士坦丁一世逊位，而把曾被国王撤职的亲协约国的首相埃·威尼齐洛斯重新扶上台。希腊终于站在协约国方面参了战。

波斯（伊朗）在战争期间北部被俄军占领，南部被英军占领，完全丧失了独立。

所有这些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都得到了临时政府外交工作人员的支持。——83。

[81]指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和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委员会要求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首先提出前线进攻这一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这次进攻是由帝国主义盟国的资本巨头指使的，俄国反革命集团则指望借此把权力集中于军人、外交家集团和资本家集团手中，打击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和俄国民主派所争得的阵地。声明呼吁工人阶级、军队和农民注意国家面临的危险，要求大会立即回击反革命的进攻。声明中提出的建议被代表大会所否决。——83。

[82]《人民事业报》（《 》）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B.B.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83、151、283、501、554、799。

[83]指1917年6月1日（14日）《人民事业报》第63号的社论《希腊的“自决权”》中的话。——83。

[84]希瓦是16世纪初在中亚阿姆河下游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希瓦汗国），居民有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卡拉卡尔帕克人等，1873年被沙皇俄国征服，成为它的属国。

布哈拉是16世纪在中亚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布哈拉汗国），居民有乌

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等，1868 年被沙皇俄国征服，成为它的属国。——84。

[85] 这里说的是七月事变以后的形势。七月事变是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后，继四月危机和六月危机而发生的又一次危机，是达到全国性危机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 年 7 月 3 日（16 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 月 3 日（16 日）下午 4 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 月 3 日（16 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 7 月 4 日（17 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 月 4 日（17 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 50 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 56 人，伤 650 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 5 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 月 5—6 日（18—19 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 月 6 日（19 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86、103、275、293、435。

[86] 黑帮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以及和平革新党等。他们力图保持旧的专制制度。这些党派和组织的成员通称黑帮分子。——88、97、135。

[87] 唐·吉诃德精神意思是徒怀善良愿望而行为完全脱离实际。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心要做一个扶危济困、锄暴安良的游侠骑士，但由于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幻想成骑士小说中的东西，结果干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88。

[88] 《〈真理报〉小报》（《 < > 》）是布尔什维克合法日报《真理报》在遭受临时政府迫害时使用过的名称之一，1917 年 7 月 6 日（19 日）出了一号，以代替当天应出的《真理报》。——90。

[89] 《新时报》（《 > 》）是俄国报纸，1868—1917 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 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 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 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 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90。

[90] 《现代言论报》（《 》）是俄国一种低级趣味的黑帮报纸（日报），1916年起在彼得格勒出版，A.M.乌曼斯基任编辑。该报最初称为《新小报》，1917年3月8日（21日）起改称《现代言论报》，1917年8月起改名《言论报》，后又改为《新言论报》。该报曾对布尔什维克掀起疯狂的诽谤运动。1917年10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90。

[91] 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三次危机中的表现。

1917年4月18日（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照会英、法两盟国政府，保证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这一照会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极大愤慨。他们于4月20—21日（5月3—4日）举行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既没有群众支持，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苏维埃完全能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而不会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抗。但是，苏维埃中的妥协派多数却在这种形势下直接同资产阶级串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表示，只要临时政府对米留可夫照会作出“解释”，苏维埃就保证给它以支持。4月21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了临时政府解释照会的公告，宣布“解释令人满意”，“事件已经结束”。随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妥协主义政党的代表于5月5日参加了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挽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

1917年6月初，为抗议临时政府拖延战争、准备在前线发动进攻以及粮食匮乏，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自发地上街游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在6月10日（23日）举行有组织的和平游行示威。这一决定引起临时政府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惊慌。为了阻挠这一游行示威，6月9日（22日）晚，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三天内禁止举行任何游行示威的决议。孟什维克领袖伊·格·策列铁里公然诬蔑准备在6月10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阴谋”，要求解除工人的武装。

在1917年的七月危机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7月4日群众游行示威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拒绝了群众向它提出的由它夺取全部政权的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事先知道并同意临时政府派反革命的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对这次游行示威进行武力镇压。（参看注85）——91。

[92] 俄国临时政府于1917年7月12日（25日）在前线恢复死刑。按照沙皇时代战地法庭的样式，军队在师一级建立了“军事革命法庭”，其判决在公布以后立即生效，并必须立即执行。——95。

[93] 联络委员会是1917年3月8日（21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立的，成员有马·伊·斯柯别列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尼·苏汉诺夫、B.H.菲力波夫斯基和尼·谢·齐赫泽（后又增加维·米·切尔诺夫和伊·格·策列铁里）。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要“影响”和“监督”临时政府的活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却是帮助临时政府利用苏维埃的威信来掩饰其反革命政策，并制止群众进行争取政权转

归苏维埃的革命斗争。1917年4月中，联络委员会被取消，其职能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100、288。^[94]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和狐狸》。狐狸看到乌鸦噙着一块乳酪停在树上，就用各种赞美的词句诱骗它唱歌。乌鸦被恭维得忘乎所以，不禁张嘴大叫。乳酪立时从乌鸦嘴里掉了下来，被狐狸叼走。——100。

^[95]埃尔泽鲁姆即埃尔祖鲁姆，是土耳其东部山区的最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俄国军队占领。

特拉布宗是土耳其东北部的一个城市，黑海东岸的一个港口。——104。

^[96]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的领导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107、222、275、312、331、435、630。

^[97]《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写于1917年8—9月，1918年5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在此以前，1917年12月17日（30日），《真理报》发表了它的序言和第1章的头两节。

为了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著作，列宁于1916年秋和1917年初在苏黎世精心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并把收集到的材料汇集成了一本笔记，取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30—222页）。因笔记本封面为蓝色，通称“蓝皮笔记”。1917年4月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后，由于忙于革命实际活动，不能立即进行国家问题的著述，但也没有把这一计划完全搁置一边。1917年6月，他曾拟了一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书单，并了解过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工作制度。1917年七月事变后，列宁匿居在拉兹利夫，才得以着手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为此他请人把“蓝皮笔记”送到拉兹利夫，后又请人送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和俄文版）等。8月上旬到芬兰的赫尔辛福斯后，他继续专心写作。按原定计划，本书共7章。列宁写完了前6章，拟了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详细提纲和《结束语》的提纲（同上，第230—231页和第241—242页）。列宁曾写信告诉出版者，如果第7章完稿太晚，或者分量过大，那就有必要把前6章单独出版，作为第1分册。本书最初就是作

为第1分册出版的。

在本书手稿的第1页上，为了应付临时政府的检查，作者署了一个从未用过的笔名：弗·弗·伊万诺夫斯基。但是这本书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也就没有使用这个笔名而用了大家都知道的笔名：弗·伊林(尼·列宁)。1919年本书再版时，列宁在第2章中加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109。

[98] 乔·威·弗·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的结尾部分阐述了国家的理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这一理论的详细分析和批判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5—404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页)。——113。

[99] 氏族组织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内部严禁通婚。若干氏族为一个部落，若干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在氏族组织中，人们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生产资料公有，集体从事生产，产品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氏族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为母权制，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逐步过渡到父权制。氏族组织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而解体。关于氏族组织，可参看马克思的《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28—571页)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75页)。

克兰是克尔特民族(主要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对氏族的称呼。——115。

[100] 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第4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5、320和26—33页)。——126。

[101] 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26、754。

[102] 哥达纲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在德国两个社会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哥达纲领比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倒退了一步，可是爱森纳赫派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合并、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的产物。纲领宣布党的目的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回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并写进了一系列拉萨尔主义的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所谓对无产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普选权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国家”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草案作了

彻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认真考虑。哥达纲领于1891年被爱尔福特纲领代替。——128。

[103] 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时还不知道马克思在1871年以前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笔记中曾写道：“查对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以前是否说到过‘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没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49页）在《国家与革命》出版以后，列宁才看到了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

《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列宁作了相应的补充。——130。

[104] 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132。

[105] 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通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炼的譬喻。——132、296。

[106] “掘得好，老田鼠！”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使用善于掘土的老田鼠这一形象来比喻为新社会开路的革命。——133。

[107]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138。

[108]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多种多样形式的论点，列宁最早是在1916年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732—784页）一文中提出来的。但这篇文章直到1924年才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列宁在191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和1923年写的《论我国革命》（同上，第4卷第59—69、775—778页）中也都涉及了这一问题。——140。

[109]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和《再论我们的处境（致X同志的信）》两篇文章（载于1905年11、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3、4期）中发表的意见。——141。

[110] 指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393页）。——141。

[111] 指1910年的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共和派在陆海军部队支持下举行起义，迫使国王逃亡英国。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实行了某些民主改革，但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赋税和高利贷盘剥没有减轻。这次革命是一次极不彻底的

资产阶级革命。——144。

[112]指 1908—1909 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史称青年土耳其革命。1908 年 7 月，驻马其顿的军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发动了革命。他们提出恢复 1876 年宪法的口号，希望把封建神权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国。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密德二世被迫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 年 4 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了叛乱。叛乱被击败后，议会废黜了阿卜杜尔-哈密德二世，选举马赫穆德五世为苏丹，青年土耳其党人组织了新政府。新政府同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表者。这次革命没有发动也不敢发动广大群众，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上层的革命。——144。

[11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2 页。——145。

[114]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 356 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55。

[115]吉伦特派是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吉伦特派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158。

[116]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162。

[117]指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和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55—560、551—554 页）。——163。

[118]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71—198 页）。——168。

[119]爱尔福特纲领指 1891 年 10 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 1875 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63—280 页）。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170。

[120]反社会党人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72、342。

[121]列宁谈到伊·格·策列铁里在1917年6月11日(24日)的演说中声言要解除工人武装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拿法国将军路·欧·卡芬雅克的行为来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4—317页)。——178。

[122]1917年6月11日(24日)，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在1917年6月10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夺取政权的阴谋”。策列铁里声称要解除工人的武装，说什么“对于那些不善于恰当掌握手中武器的革命者，要从他们手中把武器夺走。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让他们迄今拥有的过多的技术兵器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关枪和武器留在他们手里”。——178、533。

[123]与教会分离的运动，又称退出教会的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发生的群众性的反教会运动。1914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修正主义者保尔·格雷的《与教会分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开始就党对待反教会运动的态度问题展开讨论。格雷断言党应当对这一运动取中立态度，应当禁止党员以党的名义进行反宗教和反教会的宣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们在讨论过程中始终没有批判格雷的错误。——179。

[124]这里说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纸币。俄国的纸卢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贬值得很厉害。——180。

[125]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订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75年，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3。

[126]指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先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受警察迫害迁移到伦敦继续进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大会一致批准了《火星报》编辑部拟定的党纲(一票弃权)，并基本批准了列宁拟定的党章，但是在党章第一条这个有关党员资格的重要问题上，却以微弱多数通

过了尔·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的”火星派发生了分裂。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由于崩得和经济派分子退出了大会，列宁派获得了多数票，从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机会主义分子获得了少数票，从此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这次代表大会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列宁曾经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从1903年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派别和一个政党而存在的。——184。

[127]“七月事变”后，布尔什维克被加上了“力图占领城市”、“强奸”苏维埃意志、“侵犯苏维埃的权力”等等罪名。反革命势力炮制了所谓列宁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的案件，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发出逮捕列宁的命令。与此同时，《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22日（8月4日）的报纸登载消息说，将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审讯列宁和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列宁从7月5日（18日）起被迫转入地下。——184、275。

[128]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198、608。

[129]指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于1862—1863年所写的《神学校特写》。——198、539。

[130]学理主义者指盲目地拘守某种学理，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的人，意思同“教条主义者”相近。——205。

[131]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205。

[132]《曙光》杂志（《 》）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第1期曾刊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略论最近一次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批评了卡·考茨基在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206。

[133]指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的代表791名。俄国代表团由24名代表组

成，在大会上分裂为以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派。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与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的瓦尔维克-卢梭政府这一事件有关的“夺取公共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俄国代表团多数派投票赞成考茨基的这个含糊其词的“橡皮性”决议案，少数派支持茹·盖得提出的谴责米勒兰主义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建立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局和在布鲁塞尔设立国际局书记处的决议。——206。

[134]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07。

[135] 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0—691页）。——208。

[136] 指1872年6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229页）。——209。

[137]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的俄译本是1918年出版的。——211。

[138] 这句话出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0页）。《告同盟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底写的，1885年恩格斯把它作为附录发表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214。

[139] 指悉·维伯和比·维伯的著作《产业民主》（德文版和俄文版的书名译为《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217。

[140] 《社会主义月刊》派是围绕《社会主义月刊》杂志而形成的集团。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19。

[141] 饶勒斯派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

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219。

[142]指意大利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处于多数地位的中派拒绝同改良派决裂，拒绝完全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该党左翼代表于21日退出代表大会并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219。

[143]指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竭力压缩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而扩大各小资产阶级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名额，从而使自己在会上占了多数。例如城市自治机关在会有300名代表，地方自治机关有200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合作社有120名代表，而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230名代表。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职能的决定。这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而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并在10月7日（20日）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布退出。预备议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被赤卫队解散。——223、236、277、289、629。

[144]《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是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日报），1917年5月9日

(22日)—1918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为璫·雅·贝霍夫斯基。该报代表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敌视十月革命。因进行反革命宣传被苏维埃政权查封。——227、349。

[145]《言语报》(《 》)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229、259、282、373、814。

[146]《俄罗斯言论报》(《 》)是俄国报纸(日报),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第1号为试刊号,于1894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1902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1918年1月起,该报曾一度以《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1918年7月最终被查封。——230。

[147]《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在印成小册子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232。

[148]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里用作工商界大亨的代称。——236、299。

[149]《日报》(《 》)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241、325。

[150]卡德里尔舞是一种有四人参加、分为两对的民间舞蹈,在欧洲颇为流行。——251。

[151]《自由生活报》(《 》)即《新生活报》(见注76)。1917年9月2—8日(15—21日)《新生活报》被临时政府封闭期间,曾用这个名称继续出版。——259。

[152]《交易所小报》(《 》)是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交易所新闻》的别称。该报于1880年在彼得堡创刊,起初每周出两次,后来出四次,从1885年起改为日刊,1902年11月起每天出两次。这个报纸的特点是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1905年该报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曾改用《自由人民报》和《人民自由报》的名称。从1906年起,它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实际上继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1917年二月革命

后，它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1917年10月底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被查封。——259。

[153] “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263。

[154]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雅各宾派（山岳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269。

[155] 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治决议案首次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通过。1917年8月31日（9月1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0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坚决否定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号召将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并提出了在国内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几天后，9月5日（18日），莫斯科苏维埃也以355票的多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9月25日（10月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苏维埃选出的主席团基本上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列·达·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同时，维·巴·诺根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列·米·欣丘克。——272、275、331。

[156]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是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5日（28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封信，决定于最近期间召开会议来讨论策略问题。列·波·加米涅夫提出了下述决议案：“中央讨论了列宁的信，不接受信中提出的实际建议，号召所有组织只遵循中央的指示，并重申中央认为目前任何上街的行动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中央同时要求列宁同志专门写一本小册子，详细分析他在信中提出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党的政策问题。”决议案被会议否决。——274。

[157] 亚历山大剧院是1917年9月全俄民主会议会址。

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即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隔涅瓦河与冬宫相望，拥有一个大军火库，是彼得格勒的战略要地。沙皇时代是政治犯监狱。——279。

[158] “野蛮师”是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的高加索土著骑兵师的绰号。该师由北高加索的山地居民组成，辖6个冠以民族名称的骑兵团以及若干附属单位，军官中既有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主，也有俄罗斯人，主要是近卫军军官。二月革命后，该师由沙俄将军德·巴·巴格拉季昂任师长。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于1917年8月举行反革命叛乱时，利用这个师广大士兵缺乏政治觉悟，把它作为反革命的支柱。布尔什维克派遣山地民族代表前往该师进行工作，挫败了科尔尼洛夫的这一阴谋。——279。

[159]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是在维堡写的，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出版过单行本。——281。

[160] 1917年6月4日（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发言中说：“现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们，你们走开吧，我们将取而代之。俄国没有这样的政党。”列宁当即在席位上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反驳说：

“有的！”接着又在自己发言时讲到这个问题，宣布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见本卷第77页）。——282。

[161]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参见注76。——284、376、483、553、769、814。

[162]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温良的诗人是幸福的》（见《涅克拉索夫作品集》1950年俄文版第18页）。——287。

[163]预备议会是根据全俄民主会议主席团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的决定，由参加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的常设机关。参见注143。——288、363。

[164]通体漂亮的太太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以制造流言、搬弄是非为能事的女人，见于该书第1部第9章。——288。

[165]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谏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以上法令和条例，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多数居民，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许多被压迫民族、妇女、军人、学生等被剥夺了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谏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89。

[166]《工人之路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17年9月3日—10月26日（9月16日—11月8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查封的《真理报》。该报共出了46号。从10月27日（11月9日）起，《真理报》用本名继续出版。——290、334。

[167]《劳动旗帜报》（《 》）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17年8月23日（9月5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担任该报编辑的有B.B.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达·卡姆柯夫和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该报起初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17年11月1日（14日）第59号起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机关报，1917年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第105号起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3月15日迁往莫斯科。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后被查封。——290、533。

[168]合作社派指合作社工作者。在俄国，合作社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到1917年1月，俄国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63000个，社员2400万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年3月25—28日（4月7—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合作社代表大会表示赞同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9月，资产阶级合作社派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的工作。十月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拒绝同苏维埃政权合作，遭到了中、下层合作社人员的反对。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革命前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逐步转变为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291。

[169] 《人民意志报》（《 》）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的机关报（日报），1917年4月29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皮·亚·索罗金、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1917年11月被查封后，曾以《意志报》、《自由的意志报》、《人民的意志报》、《国家意志报》、《独立意志报》等名称出版。1918年2月最终被查封。——292。

[170]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孟什维克党内持不彻底国际主义立场的人数不多的一翼，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尔·马尔托夫、尤·拉林、亚·马尔丁诺夫等，1917年4—6月出版过《国际》杂志（月刊）。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采取中派立场，既批评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又不敢在组织上与其决裂，同时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的列宁主义策略的基本原理。布尔什维克几次试图把国际主义者联合起来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共同行动。列宁于1915年2月在给《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的复信中，曾经提出关于把国际主义者的力量联合起来并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的宣言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80—83页），但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不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坚决决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以及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都曾提出同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由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首领马尔托夫和阿斯特罗夫提出了许多不能接受的条件，致使联合未能实现。但有些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尤·拉林等）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一部分人流亡国外，转入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阵营，这个集团的个别代表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了苏维埃机关的工作。——295。

[171] 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1870年9月1—2日，在这里进行了普法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交战。交战以法国帕·莫·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沙隆集团军被击溃和投降、随军督战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俘而结束。——299。

[172] 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存在于1792年9月21日—1795年10月26日。在雅各宾派执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是雅各宾专政的最高机关。这一专政完成了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如组织全国力量战胜反革命，清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通过1793年民主宪法等。——301、780。

[173]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0、531、547、554、564、674。

[174]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315、329。

[175] “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是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323。

[176] 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

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他夸耀自己有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323。

[177]指1917年8月24日（9月6日）《人民事业报》第135号上的文章《中央杜马的选举》。——325。

[178]这里所说的材料，见1917年8月24日《日报》第144号的文章《选举总结》。——325。

[179]2月28日（3月13日）指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9月30日（10月13日）是临时政府最初规定的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这个日期后来被它改为11月28日（12月11日）。——327。

[180]这句话出自《新生活报》上刊登的俄国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的《雷声又响了》一文。

斯莫尔尼学校即斯莫尔尼宫。1917年8月4日（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塔夫利达宫迁到这里。它的一个房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办公处。1917年10月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也设在此地。列宁在这里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27。

[181]俄国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原定于1917年10月8日（21日）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召开。10月5日（1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这次会议延期至10月10日（23日）并改在彼得格勒召开。代表大会于10月11—13日（24—26日）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彼得格勒、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旧鲁萨、博罗维奇、雷瓦尔、尤里耶夫、阿尔汉格尔斯克、喀琅施塔得、加契纳、皇村、谢斯特罗列茨克、维堡、赫尔辛福斯等地苏维埃的代表，共94人，其中布尔什维克有51人。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宣称这次代表大会只是某些苏维埃的非正式会议，孟什维克党团示威性地退出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各地的报告；目前形势；土地问题；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列宁很重视这次代表大会。10月8日（21日），他写了《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76—382页）。布尔什维克党团于10月11日（24日）讨论了这封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强调：只有立即把全部政权交给中央和各地苏维埃，才能拯救国家和革命。代表大会通过对农民的号召书，要求他们支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7人组成的北方区域委员会，其中11人是布尔什维克，6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组织和动员一切力量夺取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328、331。

[182]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0日（23日）会议的一件文献。

1917年10月10日（23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是七月事变以后列宁参加的第一次党中央会议。会议秘密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列·达·托洛茨基、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莫·索·乌里茨基、费·埃·捷尔任斯基、亚·米·柯伦泰、安·谢·布勃诺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奥波科夫）。

候补中央委员瓦·尼·雅柯夫列娃作记录。会议由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会议的议程是：罗马尼亚战线；立陶宛人；明斯克和北方战线；目前形势；区域代表大会；撤出军队。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会议以 10 票赞成，2 票反对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把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投反对票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对起义实行政治领导，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等 7 人组成的政治局。——331。

[183]指发生在 1917 年 8 月的德国水兵起义。这次起义由以“弗里德里希大帝号”军舰水兵马克斯·赖希皮奇和阿尔宾·克比斯为首的革命水兵组织领导。6 月中旬，这个组织通过了争取民主和平和准备起义的决议。8 月初开始公开行动。停泊在威廉港的“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战列舰上的水兵自行登岸，要求释放早些时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8 月 16 日，“威斯特伐利亚号”军舰上的司炉拒绝工作。与此同时，正在海上航行的“纽伦堡号”巡洋舰全体人员举行了起义。水兵运动扩大到了威廉港几个分舰队的舰艇。这次起义遭到残酷镇压，领导人赖希皮奇和克比斯被枪决，约有 50 名积极参加者被判处长期苦役。——331、343。

[184]1917 年 10 月 11 日（24 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通过举行武装起义决议的次日，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一个声明，并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区域委员会、芬兰区域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名为《论时局》的信，申述他们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理由。他们的信曾在 10 月 15 日（28 日）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但是，不论在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还是在 10 月 16 日（29 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们都没有得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加米涅夫于 10 月 18 日（31 日）在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上用他们两人名义发表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列宁对此极为愤慨，当天写了《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第二天又写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415—419 页）。在这两封信中，列宁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称作工贼，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1917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2 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决定接受加米涅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辞呈，并责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得发表任何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和它规定的工作路线的声明。中央委员会还决定，任何中央委员都不得反对中央通过的决议。

列宁不同意中央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决定。在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他把这个决定称作妥协（同上，第 429 页）。——332。

[185]1917 年 10 月 18 日（31 日），《新生活报》第 156 号以《尤·加米涅夫谈“发起行动”》为题发表了列·波·加米涅夫的声明，全文如下：

“弗·巴扎罗夫昨天的文章提到了以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出的一份反对发起行动的传单。

尤·加米涅夫就此宣布：鉴于发起行动的问题在加紧讨论，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给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芬兰的我们党的各大组织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党在最近期间主动发起任何武装行动。

应当说，我并不知道我们党有什么定于某某时间举行某某行动的决议。

党的这样的决议是没有的。大家懂得，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下，并不是搞什么类似‘武装游行示威’的事情的问题。问题只能是武装夺取政权，而对无产阶级负有责任的人不会不懂得，只有清楚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了武装起义的任务，才能举行某种群众性‘行动’。不仅仅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并且还有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在目前，在现在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主动发起武装起义，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极端危险的步骤。

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越来越集中着群众希望和信任的党，决不会不力图掌握政权，通过国家政权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纲领。任何一个革命的党，尤其是我们的党，无产阶级、城乡贫民的党，决不会也无权利放弃起义，起誓永不起义。举行起义来反对祸国的政权，是劳动群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某种时刻也是那些得到群众信任的政党的神圣义务。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起义是艺术。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现在，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有责任反对一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的企图，因为这种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会给党、给无产阶级、给革命的命运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把一切都押在近日发起行动这张牌上，这就是采取绝望的举动。而我们党是强有力的，是有远大前途的，决不会采取这种绝望的举动。”——332。

[186]指 1906—1907 年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叶·德·库斯柯娃出版的接近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同志报》上发表言论，主张在选举第二届杜马时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333。

[187]列宁写完这封信以后，于当天深夜秘密地来到斯莫尔尼宫，承担起了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职责。——336。

[188]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是十月革命准备和实行期间的公开的军事作战司令部。十月起义就是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夺取政权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于 1917 年 10 月 9 日(22 日)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最初是以巩固城防的名义建立的，曾称作彼得格勒城防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10 月 12 日(25 日)通过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条例也规定，由军事革命委员会确定保卫首都所必需的不得撤离的战斗部队的数量，统计和登记卫戍部队全体人员和装备，制订城防计划等。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议规定的，这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保证起义的军事技术准备，统一赤卫队、卫戍部队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作战行动。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 10 月 16 日(29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军事革命总部作为领导核心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还有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党的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铁路工会，邮电工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组织的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最初是帕·叶·拉济米尔(当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 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后改由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担任。

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反革命和维护革命秩序。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 13 名代表加入后，曾正式改称为全俄中央执

行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随着苏维埃机关的建立和巩固，军事革命委员会逐步把所属机构人员移交给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相应部门。1917年12月5日（18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停止活动。——336。

^[189]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四件文献。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

根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在9月中旬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决议实行怠工。他们打算用民主会议来代替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才不得不于9月23日（10月6日）通过决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日期先定在10月20日（11月2日），后来改为10月25日（11月7日）。10月21日（11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委托列宁就政权、战争、土地等问题作报告。

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前线废除死刑、在军队中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逮捕前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等决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338、355、361、364、629。

^[190]指1917年6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338。

[191]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国家。协约国方面，除英、法、俄外，还包括相继加入的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日本、中国等。四国同盟的参加者是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这次大战期间卷入战争漩涡的国家共有33个，人口在15亿以上。——340。

[192]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了俄国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341、365、444。

[193]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342、792。

[194]《工人监督条例草案》于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基本上通过，随后于10月27日提交人民委员会审查。人民委员会委托弗·巴·米柳亭和尤·拉林在两天之内制定出工人监督条例的详细草案。但他们制定出来的草案违背了列宁提出的革命工人监督的任务，例如草案没有写进企业主必须服从工人监督机构的决定这一最重要的条款。列宁的草案是后来制定工人监督法案的基础，这一草案经过补充之后于11月1日（14日）发表在《工农临时政府报》第3号上，标题为《工人监督法草案（提交劳动委员会审查稿）》。在进一步讨论草案的过程中，有人提议由国家机关代替正在各地成立的工人监督机构和只在最大的工厂、铁路等企业建立工人监督机构。列宁坚决主张普遍实施工人监督，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精神。草案的定稿工作委托给了在11月8日（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专门委员会。11月14日（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了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并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这一法令。列宁草案的基本原则都体现在这个条例中。这个法令发表于11月16日（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7号。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对准备工业国有化起了重大作用。——353。

[195]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 and 铁路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355、360、389、402、426、431、499、511、563、646、764。

^[196]指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就建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问题进行谈判的会议。——358。

^[197]指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1917年11月11—25日（11月24日—12月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第一届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企图阻挠大会的召开，但没有得逞。出席大会的有各省、县农民苏维埃和各方面军、集团军、军、师农民委员会的代表330名（据11月18日（12月1日）的统计），其中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名、布尔什维克37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65名。会议议程包括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粮食问题和其他问题。

代表大会左翼同右翼之间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场不坚定，影响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代表大会关于政权问题的决议里，包含了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于成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但是这项决议承认成立政府是为了实现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并规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

11月15日（28日）下午，代表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大会主席团关于它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共同拟定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

埃执行委员会合并的条件的报告。然后，大会全体代表前往斯莫尔尼宫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合并的报告，还通过了承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人监督法令的决议。

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以平均使用土地的原则为基础的决议。

代表大会委托主席团于11月26日（12月9日）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非常代表大会的代表全部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360。

[198]指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

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于1917年12月12—30日（1917年12月25日—1918年1月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大会是根据莫斯科枢纽站和彼得格勒枢纽站铁路工会的倡议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00名左右，其中半数以上是布尔什维克。列宁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听取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讲话、关于粮食状况的报告、关于工会建设的报告和关于普遍成立地方铁路代表苏维埃的报告。出席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拥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认为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帮助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对它表示不信任。大会选派78名代表出席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定于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召开的全国铁路员工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364。

[199]乌克兰拉达（中央拉达）是1917—1918年乌克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联合机关，1917年3月4日（17日）在有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以及各社会团体参加的乌克兰社会联邦党总委员会会议上成立。1917年6月，产生了称为小拉达的执行机关，主席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思想家米·谢·格鲁舍夫斯基，副主席是弗·基·温尼琴科和谢·亚·叶弗列莫夫。中央拉达在1917年3月9日（22日）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中号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6月10日（23日），它宣布乌克兰自治，建立了名为总书记处的政府，但很快就同临时政府妥协，赞成将自治问题搁置到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解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央拉达于11月7日（20日）宣布自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1918年1月11日（24日）宣布乌克兰独立。1917年11月—1918年1月，中央拉达同苏俄人民委员会举行谈判，同时却支持阿·马·卡列金等白卫将军，并违背自己的诺言，不解决土地问题、工人问题及民族问题。中央拉达既向协约国寻求财政上的支持，又同德奥同盟进行秘密谈判。12月11—12日（24—25日）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拉达不受法律保护。乌克兰人民逐渐认清了中央拉达的反革命政策，于1917年12月—1918年1月在乌克兰全境举行了反对中央拉达的武装起义。1918年1月26日（2月8日）苏维埃军队占领基辅后，中央拉达逃往沃伦。次日，它与德奥同盟签订了叛卖性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并于3月1日与德奥占领军一起返回基辅，成了武装占领者操纵的傀儡。由于中央拉达无力镇压乌克兰的革命运动和往德国调运粮食，1918年4月29日德军指挥部将它解散，而以君主派地主、乌

克兰盖特曼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傀儡政府代之。——365、397、407。

[200]指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9—2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除有来自各地的代表外，还有参加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在79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303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91名布尔什维克。大会是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采取妥协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到自己方面去。大会在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和对待人民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人民公敌的法令的态度问题上，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大会起初以不多的票数通过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把国家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和谴责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议。在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决要求下，大会对这个决议重新进行表决，结果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在土地问题上，大会也通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决议，表示欢迎苏维埃政府废除土地私有制，但要求按社会革命党纲领的精神解决土地问题。右派和部分中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大会。此后，代表大会表示赞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并同意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选出了由250人组成的新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中108人（布尔什维克20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81人，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人，无党派人士6人）被选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对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具有重大意义。——365、407。

[201]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颁布以后，苏维埃政府就开始采取使交战国之间签订普遍的民主和约的实际步骤。1917年11月7日（20日），人民委员会发布特别命令，责成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尼·杜鹤宁将军向敌军司令部提出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11月8日（21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各盟国大使发出照会，建议在各条战线立即签订停战协定并开始和平谈判。11月9日（22日），协约国大使在彼得格勒美国大使馆开会，通过了不理睬苏维埃政府照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委员会不得不与德国单独进行和谈。11月14日（27日），苏维埃政府收到了德国最高统帅部同意进行停战谈判的通知。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谈判推迟5天开始，以便在这段时间内再次建议各盟国政府决定自己对媾和问题的态度。11月15日（28日），苏维埃政府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发出呼吁，建议它们参加和平谈判。这一呼吁没有得到盟国的回答。11月19日（12月2日），阿·阿·越飞率领的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中立区，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在那里会见了包括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代表在内的德奥同盟的代表团。11月20—22日（12月3—5日），双方进行谈判，达成了临时停战10天的协议。苏维埃政府利用停战的机会，再一次试图把同德国的单独谈判变成签订普遍的民主和约的谈判。11月24日（12月7日），重新给各盟国大使发出建议参加谈判的照会。照会没有得到答复。12月2日（15日）双方恢复谈判，同日签订了停战28天的协定。停战协定中规定要召开的和平会议，于12月9日（22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幕。——365。

[202]指《罢免权法令》，该法令草案是列宁在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2—103页），由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1日（12月4日）会议上提出。讨论

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原则上同意罢免权，只有两人反对，一人未表示意见。草案随后交给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协商委员会最后定稿。定稿中对列宁的草案作了一些补充，如决定改选的权力不归苏维埃而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是苏维埃可以根据相应选区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决定改选。协商委员会提出的法令草案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公布于11月23日（12月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3号。

根据罢免权法令，一些农民和军队的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罢免了立宪会议中的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代表，包括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帕·尼·米留可夫等。——366。

[203]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是列宁1917年12月14日（27日）前后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的。——368。

[204] “旧亚当”意为旧的人。《旧约全书·创世记》说，亚当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374。

[205]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是列宁在芬兰度假期间写的。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个草案拟了一个详细的法令草案，由粮食人民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签署，公布于1918年1月19日（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草案遭到了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机关领导。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现有的合作社机构来开展商业工作和搞好对居民的粮食分配，不得不对合作社工作者作了一些让步。1918年3—4月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和粮食组织三方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制定了法令草案。4月9日和10日，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经列宁作了补充和修改后通过。法令的第11、12、13条完全是列宁写的。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同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指出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是妥协的产物，有一些重大缺点，因而是作为过渡性措施通过的。法令公布于4月13日《真理报》第71号和4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5号。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对这个法令作了评价（见本卷第488—489页）。——384。

[206]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草案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月3日（16日）会议上提出的。草案以多数票（有两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后，交协商委员会最后审定。《宣言》发表于1月4日（17日）《真理报》第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号。1月5日（18日），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了《宣言》，并建议批准。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拒绝予以讨论。《宣言》于1月18日（31日）被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后来被写入191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作为它的第1篇。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宣言时，删去了原稿中涉及立宪会议的地方。

斯大林和尼·伊·布哈林参加了草案的起草：列宁手稿的第2部分中，有斯大林的修改；第4部分第2段是由布哈林起草、列宁审定的。——386。

[207] 1917年12月6日（19日），芬兰议会通过了宣布芬兰为独立国家的宣言。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芬兰独立的法令。列宁亲自把法令文本交给了芬兰政府代表团团长、芬兰政府首脑佩·埃·斯温胡武

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1917 年 12 月 22 日（1918 年 1 月 4 日）批准了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

1917 年 12 月 19 日（1918 年 1 月 1 日），苏维埃政府根据 12 月 2 日（15 日）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停战协定，向波斯政府提出了关于制定撤退波斯境内俄军的总计划的建议。

1917 年 12 月 29 日（1918 年 1 月 11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并公布于 1917 年 12 月 31 日（1918 年 1 月 13 日）《真理报》第 227 号。——387、759。

[208] 人民委员会 1918 年 1 月 6 日（19 日）会议审议了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在会议前一天，列宁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451—452 页）。在会议召开前，列宁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了法令提纲。会议逐条宣读和批准了提纲。根据人民委员会记录，对第 2 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并指出穆斯林党团的一部分人也退出了”。对其余各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

1 月 6 日（19 日）深夜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多数票（有 2 票反对、5 票弃权）通过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列宁发表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同上，第 242—246 页）。列宁的草案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法令的基础。——389。

[209]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于 1918 年 1 月 8 日（21 日）由列宁在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出席会议的共有 63 人。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只留下了列宁所作的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列·达·托洛茨基、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列·波·加米涅夫等人发言的简要记录。

提纲第 21 条结尾（从“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起）是由列宁在会上口头叙述、会后补写的。在提纲手稿中，列宁在该处画了三条竖线，并在页边上写道：“缮写员：请在缮写时也打上这三条竖线。”

列宁在中央委员会 1918 年 1 月 11 日（24 日）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那次会议的参加者中有 15 人投票赞成这个提纲，32 人支持“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16 人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

提纲到 2 月 24 日才发表。这时在签订和约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已站到列宁的立场上来了。——391。

[210]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于 1917 年 12 月 9 日（22 日）开始。苏俄代表团首先提出以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和约的原则为谈判基础，德方（以德国为主的同盟国）虚伪地声明同意，但以协约国也承认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随后德方就以协约国拒绝参加谈判为由而宣布其声明失效，并于 1918 年 1 月 5 日（18 日）向苏俄方面提出领土要求（所谓霍夫曼线），将原属俄国的约 1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以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大片地区——划出去。苏俄方面要求暂停谈判。

面对德方提出的掠夺性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内在是否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列宁权衡国内和国际形势，主张接受德方的条件，签订和约，以便得到喘息时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国际帝国主

义宣布革命战争。列·达·托洛茨基则主张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即所谓不战不和。列宁的主张暂时未能得到中央多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月11日（24日）中央会议上提出了竭力拖延谈判的提案，以12票对1票获得通过。1月14日（27日），在当时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动身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列宁和他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页）

谈判重新开始后，德方拒绝同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而在1月27日（2月9日）同乌克兰中央拉达代表团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拉达同意向德方提供大量粮食、牲畜等物资，以换取德方的军事援助。德方随后即以最后通牒口气要求苏俄立即接受德方条件。1月28日（2月10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同列宁的约定，书面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即退出谈判。德方利用这一点，于2月16日宣布停战协定失效，2月18日发起全线进攻。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在2月18日晚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同意签订和约的决定。2月23日上午，苏俄方面收到了德方提出的新的、条件更为苛刻的最后通牒。当天中央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同意签订和约。2月24日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德方的最后通牒。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和约。——393、423、442。

^[211]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件文献。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起初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有1046名代表。1月13日（26日），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加上陆续到会的其他方面的代表，大会结束时共有有表决权的代表1647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860多名），有发言权的代表219名。

在代表大会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全俄中共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讨论这两个报告时，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中，专门批判了他们的立场。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并对它们表示完全信任。

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赞同人民委员会在和平问题上的政策，授予它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广泛的权力。

代表大会听取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制度的基础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并宣布俄国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代表大会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

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土地法令制定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代表大会赞同解散立宪会议，并把苏维埃政府的名称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

大会选出了由322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305人，

候补委员 17 人。——400、629。

[212]指全俄制革工人工会和企业主的谈判。这一谈判是 1917 年 12 月开始的，主要问题是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在十月革命以前成立的制革业总委员会，增加其中的工人代表。1918 年初，根据多次谈判的结果，制革业总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都进行了改组，工人在委员会中得到了三分之二席位。1918 年 4 月 6 日向各地苏维埃发出了列宁签署的关于制革业总委员会的地方机关必须民主化和制革业总委员会和各地区委员会的指示必须严格执行的电报。——414。

[213]指 1917 年 8 月在意大利都灵爆发的工人反战总罢工和 1918 年 1 月奥地利工人在布列斯特和平谈判期间举行的要求缔结全面和约和改善粮食状况的罢工。——416。

[214]《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这一法令于 1918 年 2 月 21 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2 月 22 日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并印成了单页。——418。

[21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是党中央的全权代表机关，从 1917 年 3 月起领导下述中部工业地区各省的党组织：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特维尔、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沃罗涅日、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图拉、梁赞、坦波夫、卡卢加和奥廖尔，稍后还包括库尔斯克。在 1918 年春季以前，莫斯科区域局实际上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派别组织的中心。——420。

[216]指 1918 年 1 月 21 日（2 月 3 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各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投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任何和约的有两名“左派共产主义者”——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和英·尼·斯图科夫。大多数“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表决时采取骑墙立场：他们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可以缔结和约，另一方面又反对立刻和德国签订和约。——423。

[217]布列斯特和约是 1918 年 3 月 3 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 月 15 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 14 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 100 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 1904 年的关税税率。1918 年 8 月 27 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 60 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

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425、490、512、559、580、805。

[218]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

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425、432、449、470。

[219]指“左派共产主义者”。

“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左派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4月发表《目前形势的提纲》来对抗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见本卷第511—540页）。1918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428、444、511、646。

[220]《共产主义者报》（《 》）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别组织的报纸（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郊区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11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1918年3月20日决定，《共产主义者报》停刊。代表会议宣布以《彼得格勒真理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428、449。

[221]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431。

[222]1918年2月24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通过决议，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决议，同时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组织军队开往前线。——432。

[223]1918年3月3日，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厂委员会、工会、区苏维埃的代表和负责工作人员等。大多数与会者赞同签订和约。3月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讨论和约问题，以10票对7票通过了赞成签订和约的决议。3月4日深夜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和约问题上的立场。——432。

[224]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的两件文献。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6—8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最终解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

在签订对德和约的问题上，当时党内斗争非常尖锐。列宁和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力主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的立场的基本原则最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见本卷第391—399页）。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掌握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乌拉尔等地的党组织的领导权，激烈反对列宁的路线。列·达·托洛茨基的立场接近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口号遭到了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的驳斥。到召开代表大会时，列宁的缔结和约的路线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党组织的支持。

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4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59名，共代表17万左右党员。当时俄共（布）有30多万党员，由于大会召开过分紧急和某些地区暂时被德国占领，一部分党组织未能选派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组织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

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他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参加了所有问题的讨论，总共发言18次。

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之后，布哈林作了副报告，他仍然坚持其对德作战、反对签订和约的立场。会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18位代表发言。支持列宁的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伊·捷·斯米尔加、雅罗斯拉夫尔的代表罗扎诺夫以及其他代表。列宁的富于说服力的论据使得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否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作为决议提出的《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而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这一和约随后在3月14—16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准。

代表大会接着讨论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列宁写的《党纲草案草稿》在大会开幕时就分发给大会代表，他的报告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的。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把党的名称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为了制定新党纲，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七人委员会。

代表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了由15名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434。

[225]指1917年4月20—21日（5月3—4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为抗议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举行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参看注91。——434。

[226]指十月革命后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关于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一事（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0—42、43—45页）。——435。

[227]这项反对按德国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的论据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1月8日（2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和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来

的。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断言：“德国兵不会进攻”，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力图证明，德国军队“从技术上说无法进攻，因为时处严冬，没有道路……”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一文中揭露了这些论断的错误和危害（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53—364页）。——441。

[228] 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441、523。

[229] 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列宁套用这句话来讽刺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441。

[230] 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必须在其上签名的效忠沙皇宣誓书。由于拒绝签名会失去动员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杜马讲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杜马其他代表一起在宣誓书上签了名。——447。

[231] 国际的战场革命一词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纲》中使用的，这个提纲是提交1918年1月21日（2月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载于1918年3月14日《共产主义者报》第8号。奥博连斯基在这个提纲里写道：“革命战争是战场上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具有那些进行战略性战役的全民族军队的正规军事行动的性质。在这里，和资产阶级国家（德国）的民族军队对峙的是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这些队伍不只是作战，而且还以显示自己的阶级立场来‘瓦解’敌人，呼唤他们不是向柏林而是向资产阶级进攻。军事行动具有游击斗争（类似街垒战）性质并和阶级的鼓动相结合。这些军事行动是群众性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武装表现。革命战争就是‘国际的战场革命’。”——448。

[232] 这里说的11天看来是指从1918年2月18日德国军队开始进攻到1918年2月28日苏俄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这一段时间。但实际上，德国军队的进攻一直延续到1918年3月3日签订和约那一天。——451。

[233] 芬兰革命是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的。1918年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内战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451。

[234] 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鲍里斯·戈都诺夫阴谋杀害了九岁的王子季米特里，自己当了沙皇，但他常常惊慌不安，说他总是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人们的厌战心理。——451。

[23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1918年2月24日决议所附的“说明”。这个“说明”里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

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对它作了分析和批判（见本卷第420—427页）。——453。

^[236]指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为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召开的。

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讨论了和约问题，列宁在会上讲了话。党团会议以453票赞成、36票反对、8票弃权赞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由于代表还没有全部到达，党团的人数不齐。

3月14日，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232名，其中布尔什维克79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83名，中派社会革命党人25名，孟什维克2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1名。副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代表大会介绍了和约的内容后，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批准和约问题作了报告。波·达·卡姆柯夫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作了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

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经过辩论，大会以784票赞成、261票反对、115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不顾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决定以及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作出的党员不得反对党的决定的规定，投了弃权票。和约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

大会还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2月底作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决定，选出了由207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454、474、629。

^[237]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党纲。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问题，党中央组织局发表公告，宣布紧急代表大会定于1917年10月17日（30日）召开，其议程为：（1）修改党纲；（2）组织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代表选举问题向党组织发了通告信。1917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纲草案。1917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制定新的党纲，以确定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任务。1919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草案的所有主要部分都是列宁起草的。

更改党的名称问题是列宁在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提出的。以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见本卷第16、64—68页）以及在1917年发表的其他许多著作和讲话中都论证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审议。直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才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

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决议。——456。

[238]指 1917 年出版的两本有关修改党纲的文集。一本是列宁编辑并作序、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472—493 页）。另一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载有弗·巴·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中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同上，第 32 卷第 344—372 页）。——457。

[239]《启蒙》杂志（《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 年 12 月—1914 年 6 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 27 期。

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 1913 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 28 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 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见本卷第 281—327 页和《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344—372 页）。——457。

[240]《斯巴达克》杂志（《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从第 2 期起）的理论刊物，1917 年 5 月 20 日—10 月 29 日（6 月 2 日—11 月 11 日）在莫斯科出版。该刊编辑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该刊工作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恩·奥新斯基、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457。

[241]指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这个党纲的草案是《火星报》编辑部于 1901 年底至 1902 年上半年制定的。党纲理论部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负责起草。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提出了批评，自己另写了一个草案。为了编写出共同的纲领草案，《火星报》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委员会以普列汉诺夫草案作为它的草案的基础，同时，在草案中写入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论点。党纲实践部分中的土地问题的条文和结束语是列宁写的。1902 年 4 月《火星报》编辑部苏黎世会议批准了全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包括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火星报》编辑部的党纲草案在 1903 年 7—8 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略加修改后通过。

这个党纲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的理论部分，根据列宁的建议，写入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458、715、755。

[242]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即 1912 年 9 月 15—21 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号召工人阶级“加倍努力

来反对帝国主义”。

巴塞尔代表大会即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违反这个宣言和历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这种变节行为，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见本版选集第 2 卷第 454—506、507—550 页）等著作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461。

[243]指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它是在推翻斯温胡武德资产阶级政府以后于 1918 年 1 月 28 日建立的。除人民代表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工人组织总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有组织的工人选举产生的各工人组织议会构成了国家政权的基础。——463。

[244]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通过 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的土地法令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逐步把工业和基本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到 1918 年春，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最大的冶金工厂和机器制造工厂以及乌拉尔和顿巴斯的采矿业已转归国家所有。从 1918 年 5 月起，制糖、石油等工业的整个部门开始国有化。1918 年 6 月 28 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把全部大工业收归国有。——466。

[245]银行国有化法令于 1917 年 12 月 14 日（27 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并在 1917 年 12 月 15 日（28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252 号上公布（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225—230 页）。——467。

[246]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的《土地法令》和 1918 年 1 月 18 日（31 日）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都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权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一种让步。同时，《土地社会化基本法》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享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468。

[247]本文曾同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本卷第 511—540 页）合编成一本小册子，在 1918 年 5 月出版，题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324 页）。——469。

[248]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见《涅克拉索夫作品集》1950 年俄文版第 241 页）。——469。

[249]《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是列宁受党中央全会的委托于 1918 年 4 月间写的，手稿中标题为《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 年 4 月 26 日，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一致批准了这个《提纲》，决定以文章形式发表，并出版单行本。——474。

[250]指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18 日（12 月 1 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列宁起草的（见《列

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1页)。按照这个决定,人民委员领取的最高工资额每月是500卢布,另给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属每人补贴100卢布。这大体上相当于中等工人工资水平。

1918年1月2日(15日),人民委员会为答复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询问在列宁起草的一项决定中解释说,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的法令并不禁止付给专家以超过规定界限的报酬,这样就批准了对科学技术专家支付较高的工资。——483。

[251] 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对对外贸易实行监督。最初,由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调节对外贸易,审查进出口商品申请和监督海关活动。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下令由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监督对外贸易。但是仅仅靠监督和关税保护,还不可能可靠地保护苏维埃经济免受外国资本的侵害。1917年12月,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草稿的第11条中就提出了实行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44页)。1918年4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法令。——486。

[252]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强行摊派和征收特别税曾是补充预算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地方上尤其如此。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俄政府采取了向正规课税过渡的措施。1918年5月17—21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必须实行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建议,并选出专门的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纲制定了相应的条例。1918年6月17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对1917年11月24日的直接税法令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了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严格制度(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41—443页)。——486。

[253] 指《关于消费合作组织的法令》。这个法令的最初草案是列宁写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本卷第384—385页)。参看注205。——488。

[254] 为了适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产的需要,1918年3月27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总的劳动纪律条例草案。4月1日,在列宁参加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关于劳动纪律的决议,建议把决议改写成法令,并在改写时考虑列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95—196页)。4月3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劳动纪律条例》,发表在1918年4月《国民经济》杂志第2期。《条例》要求一切国营企业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和计算劳动生产率,实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制,对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严加惩处。各工厂根据这个《条例》都制定了各自的具体的章程。这对整顿社会主义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

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是率先实现列宁关于实行计件和奖励工资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示的单位之一。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讨论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时,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坚持把必须实行计件工资制写进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4月1日审查的决议中。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的决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4月向所有基层组织发出了关于在金属工业中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的指示。——491。

[255] 十月革命后,在苏俄,计件工资几乎完全被计时工资所代替,这对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巩固劳动纪律起了消极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维埃政权首先在第一批国有化企业里推行计件工资制。在和平喘息时期，计件工资制得到广泛推广。到 1918 年 7 月，彼得格勒各企业已对四分之一的工人实行计件工资。1918 年 12 月颁布的苏维埃劳动法典最后肯定了计件工资原则。——491。

[256] 商业秘密指资本主义企业对其一切生产、贸易和金融业务及全部有关文据保守秘密的权利，这种权利受资产阶级立法的保护。十月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 1917 年 11 月 14 日（27 日）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从而废除了商业秘密。——493。

[257]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寓言讲一只小哈巴狗朝着一只大象狂吠乱叫，无理取闹，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毫不费力地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495。

[258] 指人民委员会《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交通人民委员对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在运输方面拥有无限的权力，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不得直接干预他的命令。所有联邦一级、区域一级及其他各级地方苏维埃组织都无权干预运输事宜。

这项法令的制定过程是：人民委员会于 1918 年 3 月 18 日审查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各机关不得干预铁路部门事务的法令草案后，责成专门委员会根据列宁提出的下述要点改写这个法令：“1. 大集中。2. 根据铁路组织的挑选任命各个负责人，即每一地方中心的执行者。3. 对他们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4. 军事警卫队在保障秩序方面的独裁权力。5. 立即核查流动人员及其分布的措施。6. 建立技术部的措施。7. 燃料。”对专门委员会改写后提交人民委员会 3 月 21 日会议讨论的草案，列宁又作了一系列重要修改。之后，草案被政府批准。由于法令受到在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影响下的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反对，交通人民委员部 3 月 23 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修改这个法令的问题。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这个法令取消了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作用，而代之以委员的个人权力。列宁批驳了这种攻击，指出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消除铁路上的怠工和松垮现象，并对法令又作了两处修改。3 月 23 日，法令被政府最终批准，由列宁签署，公布于 3 月 26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57 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18—20 页）。——499。

[259] 《前进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 年 3 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 1918 年 4 月 2 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萨·马马丁诺夫都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 年 5 月 10 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该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5 月 14 日，该报改称《永远前进报》，出了 1 号。1919 年 1 月 22 日—2 月 25 日继续出版。1919 年 2 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最终查封（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475—476 页）。——501、527、554。

[260] 《我们时代报》（《 》）即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言语报》。《言语报》在 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用《我们时代报》以及《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等名称出版。——501。

[261] 关于伊·谢·屠格涅夫对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为感谢忱》一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1 年俄文版第 10 卷第 122—123 页）。——506。

[262] 为了吸收科学技术力量参加国民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根据列宁和苏维埃政权的倡议，从 1918 年 1 月开始，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出面同科学院进行谈判。3 月底，科学院写信给苏维埃政府，表示同意政府关于在考察国家自然资源方面进行工作的建议。4 月 12 日，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提议，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向科学院提出了系统地解决国内工业正确布局这一迫切任务以及如何最合理地利用国家经济力量的问题，并认为必须对科学院的相应工作提供经费。过了不久，在 4 月下旬，列宁写了《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这一文件。——509。

[263] 指俄国自然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材料。这个委员会是科学院在 1915 年建立的。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个委员会大大加强了出版活动，开始出《俄国财富》丛书和多卷本的《俄国自然生产力》文集。它在苏维埃政权头 3 年（1918—1920 年）出版的书籍比革命前 3 年增加了 3 倍。——509。

[264] 《共产主义者》杂志（《 》）（周刊）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刊物。该杂志从 1918 年 4 月 20 日起在莫斯科出版，头几期是作为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的机关刊物出版的。由于 5 月召开的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莫斯科区域局从杂志上撤销了自己的署名，因此最后一期即第 4 期（1918 年 6 月）是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机关刊物出版的。——511。

[265] 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目前形势的提纲》。这个提纲曾在 1918 年 4 月 4 日召开的党的中央委员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联席会议上讨论过。——511。

[266] 这里说的是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见注 224）上关于批准和约问题的表决情况。在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有两个决议草案：一个是列宁提出的，主张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另一个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即《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这两个决议草案究竟哪一个可以作为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议的基础，在 3 月 8 日的上午会议上进行了表决。结果列宁的决议案得 28 票，获通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决议案得 9 票，被否决。会议接着对列宁的决议案进行讨论，提出补充和修正意见，最后进行记名表决，结果以 30 票赞成、12 票反对、4 票弃权获得通过。“左派共产主义者”把两次表决结果搅和到一起：12 票反对和约用的是第二次表决的数字，28 票赞成缔结和约用的是第一次表决的数字。——512。

[267] 指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共产党党团讨论布列斯特和约的情况，参看注 236。——512。

[268] 指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表决结果。

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17—19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964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42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14名，无党派人士82名，其他方面的代表40名。代表大会宣布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独立，号召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给予侵犯乌克兰的德帝国主义者最坚决的回击。“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利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在会上提出了谴责苏维埃政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提案。由扬·波·加马尔尼克、阿尔乔姆、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和约问题上坚持了列宁的立场。代表大会以408票对308票的多数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512。

[269] “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513、663。

[270] 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514。

[271] 诺兹德列夫习气意为说大话和假话。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516。

[272] 指卡·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和用兵的遗著》第2卷第2册中《向本国腹地退却》一章（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8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卷第6篇第25章）。——518。

[273] 这里说的是俄国孟什维克的论点。列宁对这种论点的批判还可参看《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见本版选集第4卷第775—778页）。——531。

[274] 伊苏夫的提纲是指1918年4月孟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委员会全会根据约·安·伊苏夫的建议通过的提纲。这里说的是该提纲的第3条。——533。

[275] 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533、634。

[276] 出自俄国诗人瓦·李·普希金（著名诗人亚·谢·普希金的伯父）的一首讽刺短诗。诗里嘲笑某些初学写诗的年轻人写出来的作品袭用陈词滥调、言之无物。——535。

[277] 这里指制革、纺织和制糖工业中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联合体。1918年初制革工人工会同全俄皮革业工厂主协会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皮革厂在苏维埃政府的资助下应按政府规定的任务进行生产，全部产品由国家支配。在纺织、制糖和其他一些轻工、食品业部门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

这些协议保证了工人对全工业部门的管理、向企业主和专家学习组织生产的经验、掌握管理国家经济的复杂科学、搞好生产和准确地计算生产与消费。列宁认为这样一些协议具有重大的意义。——536。

[278] 这是列宁起草的有关成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看来是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25日会议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草案时起草并通过的。根据列宁指示改写过的社会科学院条例提交人民委员会6月7日会议讨论。这次会议原则上批准了条例，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详细拟定社会科学院的章程。第二个文件是这次会议通过的给专门委员会的指示。

社会科学院章程于6月15日经人民委员会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社会科学院的法令，7月12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5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468—479页）。

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于191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其任务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对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同社会科学有关的自然科学进行科学研究；培养社会知识各个领域的专门家；向群众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根据1919年4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条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定名为社会主义科学院。从1924年4月17日起改称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年2月，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共产主义科学院撤销，所属各研究所和主要工作人员并入苏联科学院。——541。

[279]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正式院士和教员名单发表于1918年8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9号。

1922年2月5日，列宁当选为社会主义科学院正式院士。收到该院主席团的通知后，列宁因病复信辞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307页）。——542。

[280]列宁的这篇讲话是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26日—6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52人，代表5个区域、30个省和许多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工会组织和工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占多数。

大会开幕前，5月23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列宁参加下仔细地审议了有关大会的各项问题，确定了大会的议程。在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加·达·魏恩贝尔格关于建立国有化企业管理机构的报告提纲时，列宁建议把国有化企业管理体系简化为地方的工厂管理机构和中央的管理机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生产局），撤销一切中间的管理机构。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以下问题：布列斯特条约的经济后果；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俄国的财政状况；国家预算；对外贸易；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地方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关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和管理的计划的有“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原则方针通过了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以及关于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关于城乡商品交换、关于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决定。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543。

[281]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由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米·马·鲍罗廷负责设法送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各国对苏维埃俄国实行封锁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克服许多困难。把信送到美国的任务是由 . . . 特拉温（斯列托夫）完成的。随信带去的还有《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和苏维埃政府致威尔逊总统的要求停止干涉的照会。美国一些报纸刊登了宪法和照会。

《给美国工人的信》的英译文（略有删节）于1918年12月发表在美国

社会党左翼的两个机关刊物——在纽约出版的《阶级斗争》杂志和在约翰·里德、片山潜参与下在波士顿出版的《革命时代》周刊上。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这封信曾作为《阶级斗争》杂志的单印材料大量出版，后来又多次在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社会党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1934年在纽约出版了这封信的全文单行本。——557。

[282] 1898年4月，第一次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爆发。起初，美帝国主义诡称支持菲律宾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答应在菲律宾群岛解放后保证菲律宾的独立。可是，在1898年夏秋之间。当菲律宾起义军几乎解放了整个群岛并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时，美帝国主义者却派兵在菲律宾登陆，占领了马尼拉，并于12月10日与西班牙签订和约，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把菲律宾夺到自己手中。1899年2月4日，美军指挥部对菲律宾共和国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挑起了美菲战争。美帝国主义用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的两手，扼杀了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斗争，把菲律宾变成了它的殖民地。——558。

[283]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学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信》的评论中说：“历史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全然是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923页）——563。

[284] 《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列宁提到的尤·德布兹的文章是1915年9月11日在该报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应是《何时我会去作战？》。——565。

[285] 指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曾对封建主实行恐怖。1649年1月30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白厅前广场上被当众处决。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565。

[286] 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出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569。

[287] 指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

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的决定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进行起草工作。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7月3日，这个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审查了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另一个草案，决定以前者为基础，而以后者的某些论点加以补充。另外，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引言列入宪法，补充了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各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拟定了关于在苏俄领土上以劳动为

生的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关于给予因政治和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外国人以避难权的条款。草案经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0日为代表大会通过。7月19日，宪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569、630、738、832。

[288] 农业公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一种形式，主要在以前地主和寺院的土地上建立。在农业公社里，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建筑物、小农具、牲畜等）以及土地使用一概实行公有化。农业公社社员的消费及生活服务也完全建立在公共经济基础上，社员个人没有副业。农业公社内不按劳动而按人口进行分配。——572、731。

[289] 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委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建立的，由一个乡或村的贫苦农民以及中农选举产生。根据上述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了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572、660、707、730、778。

[290] 士官生的暴动是指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俄国军事学校学生在彼得格勒发动的反革命叛乱。这次叛乱由以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领导，是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的一部分。叛乱分子打算占领市电话局、彼得保罗要塞和斯莫尔尼宫，逮捕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叛乱从这天凌晨开始。叛乱的指挥者、前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格·彼·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自称“拯救军”司令，下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得执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要求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去的政委。部分士官生部队占领了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和电话局，在街头解除赤卫队和革命士兵的武装。但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拒绝支持叛乱。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告首都居民的号召书，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当天下午5时左右，赤卫队和革命部队平定了叛乱。——577。

[291] 列宁是根据1918年11月20日《真理报》第251号引用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信的。该号《真理报》把原来刊载这封信的报纸误称为《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实际上刊载这封信的北德维纳省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叫《农民和工人思想报》。——578。

[292] 指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

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6—9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96人，有

表决权的代表 963 人，其中共产党员 946 人，其他党派的成员 16 人，无党派人士 1 人。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关于十月革命一周年，关于国际形势，关于军事形势，关于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以及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列宁在 11 月 6 日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根据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大会通过了致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各国政府的呼吁书，建议它们开始和谈。鉴于苏维埃政权趋于巩固和红军节节胜利，大会通过了关于释放对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构成危险的政治犯的特赦决定。

列宁在 11 月 8 日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起草的业经同年 10 月 22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128—129 页）。同一天，大会就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报告，通过了根据列宁的提纲（同上，第 130—131 页）拟定的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号召全体公民、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员最严格地遵守苏维埃国家的法律。在 11 月 9 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大会研究了军事形势问题和苏维埃建设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总结了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工作，决定委托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所有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大会代表们听到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无比兴奋，对起义的德国工人、士兵和水兵表示声援。大会选出了有 207 名委员和 39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584。

[293] 指 1918 年 11 月 16 日莫斯科人民银行股东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将该行收归国有的决议。根据人民委员会 1918 年 12 月 2 日的法令，莫斯科人民银行被收归国有，其全部资产和债务都转入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莫斯科人民银行理事会改组为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中央管理局合作社部。——585。

[294]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是为批判卡·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而写的。

1918 年 8 月，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是民主呢还是专政》。列宁在同年 9 月 20 日的《真理报》上看到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欧洲国家的三个使节——在柏林的阿·阿·越飞、在伯尔尼的扬·安·别尔津和在斯德哥尔摩的瓦·瓦·沃洛夫斯基——写信，提出了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作斗争的任务。列宁请他们在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小册子出版后立即给他寄一本来，同时寄来考茨基写的所有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

10 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即动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这部著作脱稿之前，列宁为了尽快占领阵地，又于 10 月 9 日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102—111 页），发表在 10 月 11 日《真理报》上，并指示越飞、别尔津和沃洛夫斯基尽快把这篇文章译成外文发表。列宁的这篇文章译成德文后，于 1918 年和 1919 年分别在伯尔尼和维也纳发表；1919 年译成意大利文在米兰发表。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于 1918 年 11 月 10 日写成，12 月在莫斯科出版。1919 年用外文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出版。

——587。

[295]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587。

[296] 《共产党人》杂志（《 》）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1915年9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个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587。

[297] 指《社会主义与战争》（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507—550页）。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是列宁为筹备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而写的一本小册子。参加写作的有格·叶·季诺维也夫。这本小册子在1915年9月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前夕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分发给了与会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小册子用法文在法国出版，并用挪威文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上全文刊载。列宁当时还曾试图用英文在美国出版。

1918年，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出版了这本小册子。——587。

[298] 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587。

[299] 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人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

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587。

[300] 指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该书 1909 年在柏林出版。——588。

[301] 1914 年 8 月 4 日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德国帝国国会表决军事预算时投了赞成票,这意味着该党完全背叛了 1912 年《巴塞尔宣言》所阐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599。

[302] 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的两个政党,产生于 17 世纪 70—80 年代。

辉格党起初代表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19 世纪中叶起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与其他政治团体合并后,组成英国自由党。

托利党代表大地主和英国教会上层僧侣的利益,同时也依靠中、小僧侣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它维护旧的封建传统,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19 世纪中叶,在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辉格党和托利党曾在英国轮流执政。——603。

[303] 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 26 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604。

[304] 德雷福斯案件指 1894 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环 ü 绶炊 盼芸□5 鹿 涑 痰 路<<ツ写? 丈矸 噉堡皇隆 7 ü 炊 爬 谜庖话讷 慷 从烫 饕攀蛻澄闹饕澹 七鞴埠楸坪免襞 髯杂伞 T 谗率抵っ鞴吕赘 K 刮拮锺蝗 本秩约岫鬣芫 厝蝗 鹁愤笕褐淬 苛也宦 7 ü 緇岬橙撕妥什 准睹襞髀山 饺耸浚 ò ò! ぶ馨 谩と睦 账埂 し 适康龋 松 坪拼蟪囊 G 筵厩筋庖话讷 脑硕 T 谏緇嵯 呗歪沽? 拢*1899 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 1906 年 7 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604、696。

[305] 指英国资产阶级血腥镇压 1916 年爱尔兰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起义一事。在这一事件中,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詹姆斯·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

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东北部分,居民以英格兰人为主;阿尔斯特的军队曾和英国军队一起镇压了爱尔兰人民的起义。——604。

[306] 1917 年 4 月 3 日(16 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资产阶级报纸和临时政府一些部长在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等问题上大造谣言,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诽谤、诬蔑,并不断鼓吹以大暴行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为了揭露这些无耻的诽谤、诬蔑,列宁从 4 月 5 日(18 日)起陆续写了《两个世界》、《资本家的无耻谎言》、《告士兵和水兵书》、《说谎同盟》、《反对大暴行制造者》、《公民们!应当懂得各国资本家采取的手法是什么!》等文章(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125—126、205—206、209—211、218—221、225—228、229—231 页)。1917 年 4 月 16 日(29 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资产阶级报纸诽谤、诬蔑布尔什维克。——604。

[307] 第四届国家杜马是根据 1907 年 6 月 3 日(16 日)颁布的选举法于

1912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5日(28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42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这届杜马和上届杜马一样,也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和1名附和孟什维克而不享有完全权利的党团成员(华沙代表,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叶·约·亚格洛)。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向第四届杜马提出对政府的质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坚决反对战争,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14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被捕,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5年8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组成了所谓“进步同盟”,一半以上的杜马代表参加了这个同盟。列宁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十月党人为了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力量战胜德国这一纲领上达成协议而结成的同盟。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代表为了反对革命和挽救君主制度,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3月1日(14日)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达成协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10月6日(19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604。

[308] 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613。

[309] 指《四月提纲》。列宁于1917年4月4日(17日)先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然后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提纲。同年4月7日(20日)《真理报》发表了 this 提纲(见本卷第13—16页)。——617。

[310] 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617。

[311] 指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89—204页)。这本小册子曾用英文刊载于1918年1月15日美国《晚邮报》和1917年11—12月《阶级斗争》(美国社会党左翼的杂志)第4期,并出版了单行本。

《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是美国资产阶级报纸,1801年起在纽约出版,1801—1832年称《纽约晚邮报》,现称《纽约邮报》。——623。

[312]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07—408页)。——623。

[313] 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7月4—10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6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773名,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 353 名，最高纲领派 17 名，无政府主义者 4 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 4 名，其他党派成员 3 名，无党派人士 10 名。乌克兰、拉脱维亚和外高加索等被占领区也有代表出席。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列宁作了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代表大会对两个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完全信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不信任、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改变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被否决。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于 7 月 6 日在莫斯科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代表大会的工作因而暂时中断。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全体成员被逮捕，与叛乱无干的后来获释，其中约有 200 人回来继续参加会议。代表大会于 7 月 9 日复会后，听取了政府关于 7 月 6—7 日事件的报告，完全同意政府为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所采取的果断行动，并指出赞同自己上层领导观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能再留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之内”。

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肯定粮食垄断制的不可动摇，认为必须坚决镇压富农的反抗，赞成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规定了在劳动者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组织和巩固红军的措施。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部宪法，选出了由 200 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629。

[314] 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631。

[315] 指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

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 5 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 年 3 月 26 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 5 月 14 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 月 25 日和 26 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 1918 年 9 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 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 年 2 月 7 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 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631。

[316] 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太人的蔑称）。此人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634。

[317] 1918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定：“鉴于（1）苏维埃政权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同时受到各条战线上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俄罗斯共和国内部的同盟者的攻击，国际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从最无耻的诽谤到阴谋活动和武装暴动，来反对工农政府；（2）苏维埃组织内部存在着明目张胆地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政党的代表，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3）以前发表的以及这次会议上宣读的文件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直至最负责的人员，确实同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在顿河流域同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在乌拉尔同杜托夫，在西伯利亚同谢苗诺夫、霍尔瓦特和高尔察克，以及最近又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和依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黑帮分子）相勾结，组织反对工农的武装暴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决定：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各级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把这些党派的代表从自己的组织中清除出去。”——634。

[318] “积极派”是指以米·伊·李伯尔、亚·尼·波特列索夫、谢·拉·瓦因施泰因等为首的一批孟什维克，他们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就开始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加入各种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反革命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阿·马·卡列金以及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并与外国干涉者的军队相勾结。1918年，在孟什维克党的支持下，“积极派”以讨论粮食状况为借口，开了几次所谓“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实际上提出了取消苏维埃的要求。——634。

[319] 指1910年9月20日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参看列宁的《两个世界》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10—18页）。——635。

[320]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636。

[321] 指1918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90号的社论《是专政呢还是民主？》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年10月创刊，先后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1933年停刊。——636。

[322]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1903年7月30日（8月1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普列汉诺夫说：“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法律。”

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对于普选权原则也应当用我上面指出的那个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待。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曾经剥夺过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象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就是在议会任期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一种 *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21页）和《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同上，第33卷第188—190页）中都引用过普列汉诺夫的这次发言。——638。

[323] 托尔斯泰主义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列·尼·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学说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宗教空想主义社会派别。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通过宗教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社会，宣传“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者正好是把托尔斯泰学说中最大的缺点变成了教条。——643、801。

[324] 指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考茨基的这一著作由列宁编辑并作序，1906年12月用俄文出了小册子。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226页。——652。

[325] 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是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1918年6月24日的决议组织的，发生在1918年7月6—7日，即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首先采取挑拨行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格·布柳姆金在7月6日刺杀了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接着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的中心是在莫斯科三圣巷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一支部队的司令部，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 . . 波波夫。6日夜，叛乱分子约1800人在波波夫、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领导下开始军事行动。他们炮击克里姆林宫，占领了电话局和电报局，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几个挑拨性的宣言、公报和电报，诡称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的行动得到全体居民的欢迎等等。

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命令政府立即镇压叛乱。列宁领导了平定叛乱的斗争。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坚决措施以及莫斯科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一致行动，叛乱在7月7日下午2时被粉碎。——654。

[326] 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是在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之后从该党分裂出来的两个新党。

民粹派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9月，领导人有 . . . 扎克斯等。民粹派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苏维埃活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措施，赞成布尔什维克党联合中农的方针，虽然由于它本身的民粹派观点残余

而同布尔什维克党在策略上有分歧。民粹派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出版《劳动公社旗帜报》。它的许多党员参加了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1918年11月6日，民粹派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解散该党并同俄共（布）合并。

革命共产党于1918年9月组成，领导人有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革命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恐怖活动和企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俄共（布）合作。但是革命共产党的纲领是混乱和折中的，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共产党从1918年9月起出版《劳动意志报》，12月该报改为杂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之后，革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允许自己的党组织接受原革命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共（布）。——654。

[327] 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7月10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将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月1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基斯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了过来。7月11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659。

[328] 逮捕土地委员会委员是临时政府为制止农民夺取地主土地而采取的反革命措施。——660。

[329] 列宁所说1918年的七月危机是指1918年夏天在俄国中部各省、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发生的多起富农反革命叛乱，这些叛乱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外国干涉者的支持下组织的。——660。

[330] 指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谢·列·马斯洛夫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不久以社会革命党的名义提出的一个法案。1917年10月18日（31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人民事业报》以《土地委员会调整土地和农业关系条例》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法案。法案规定，土地委员会掌握一批专供出租的地产，国家和寺院土地均属这类地产。地主土地占有制保持不变，地主只把以前出租的土地拨归临时出租的地产，而且农民交纳的土地租金应归地主。列宁在《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中写道：“谢·列·马斯洛夫先生的这个法案说明社会革命党彻底背叛了农民，而完全效忠于地主了。”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20页)——662。

[331]指提交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的草案是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拟定的，曾交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特设的委员会审定。1918年1月18日(31日)，代表大会批准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第一章《总则》)。法令的进一步详细制定是在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进行的。法令的最后文本于1918年1月27日(2月9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2月6日(19日)在报上公布。

《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府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让步。法令还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665、720。

[332]指1918年11月德国爆发的革命。

德国十一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起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经济的崩溃和人民与军队遭受的苦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给了它以巨大影响。这场革命以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海军舰队的水兵起义为起点，首先席卷了德国北部沿海城市，然后又迅速地扩展到德国中部和南部地区。11月9日，柏林工人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举行总罢工，罢工很快就发展成武装起义。当天中午时分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往国外。

在起义的过程中，各地纷纷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中派分子夺取了大多数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11月10日，在柏林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成立了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菲·谢德曼等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胡·哈阿兹等组成的临时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后来退出了政府)，其纲领是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进行社会改良。12月16—21日，柏林举行了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们设法在会上通过了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并把立法权和行政权交给政府的决议。

斯巴达克派接受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决定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实行决裂，于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年1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月6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1月8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队伍随即对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杀害了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德国资产阶级接着又用暴力把各地的革命工人血腥地镇压下去。1月19日，德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各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了胜利。

十一月革命没有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但它在德国历史上仍是一次重大事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这是一次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和手段进行的革命，其结果是推翻了君主制，成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了起码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通过立法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这次革

命给了苏维埃俄国以极大支援，为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创造了前提。——675。

[333]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见本卷第 363—367 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1918 年的版本中，《提纲》标有下列字样：“载于 191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彼得格勒《真理报》”。——676。

[334] 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18—28 日之间写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批判了“自由的人民国家”的论调（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6—33 页）。——681。

[335] 指莫·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用法文写的《民主和政党》一书。此书于 1903 年在巴黎初次出版，1927 年和 1930 年出了俄文本第 1 卷和第 2 卷。书中用英美两国历史上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682。

[336] 《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 年 11 月 9 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 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 年迁到布拉格出版；从 1936 年 10 月至 1939 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683、706。

[337] 《呐喊报》（《Der Weckruf》）是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 年 11 月起在维也纳出版。1919 年 1 月 15 日起称为《社会革命报》，同年 7 月 26 日起称为《红旗报》。1920 年 10 月 14 日起是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德意志奥地利是 1918 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在奥地利本土上成立的国家。1918 年 11 月 12 日，奥地利临时国民议会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根据 1919 年 9 月 10 日签订的圣热尔曼和约的规定，该共和国改称奥地利共和国。——683。

[338] 《贫苦农民报》（《 》）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 年 3 月 27 日—1931 年 1 月 31 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 1931 年 2 月 1 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688。

[339] 《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是苏俄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亚·伊·托多尔斯基写的，由该县执行委员会于 1918 年出版。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书中记述了该县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迈出的最初步伐。该书共印 1000 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编辑部。列宁曾不止一次提到托多尔斯基的这本书（除本文外，还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533 页和本版选集第 4 卷第 681—683 页）。——688。

[340] 指 1918 年 11 月 1 日东线肃反委员会在喀山出版的《红色恐怖》杂志第 1 期。该杂志主要刊载指令、报告、汇报等官方材料。——690。

[341] 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三件文献。论膊
实编淮未 兕蠡幔 ü 使膊 炒 砣帽棕 *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
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1914年8—9月，列宁在他起草的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7页）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403—410页）中提出了建立新的、排除机会主义分子的国际的任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团结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分子，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8年1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左派社会党人会议，讨论了筹备召开共产国际成立会议的问题，选举产生了筹备机构。1919年1月，由俄共（布）发起，召开了有俄国、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五国的共产党和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共8个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创立新的国际的问题，并向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39个政党、团体和派别发出了邀请信。

代表大会于3月2日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692、755、790。

[342] 伯尔尼代表会议是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在战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目的是恢复第二国际。会议于1919年2月3—10日在伯尔尼举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民主和专政问题。中派分子亚·布兰亭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企图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并提了一个实际上谴责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案。卡·考茨基和爱·伯恩斯坦在发言中竭力要代表会议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弗·阿德勒、让·龙格、斐·洛里欧等提出另一个决议案，以缺乏足够的资料为由反对对苏维埃俄国作任何评价。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双方满意的共同决议：对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表示祝贺，并“号召各国工人力求用民主方法建立革命政体，而政治革命则应在此范围内进行”。在表决上述决议案之后，会议决定委派由阿德勒、考茨基、鲁·希法亭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苏维埃俄国了解它的政治、经济情况。“伯尔尼的钦差大臣们”（列宁语）后来没有成行。——692。

[343] 1919年1月15日，在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和菲·谢德曼为首的德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部队的军官杀害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噩耗于1月17日传到了

莫斯科，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当即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予以宣布。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了由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联席会议《告德国各级苏维埃和全体工人阶级书》。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号召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莫斯科各企业的工人和红军部队于1月19日打着挽幛在苏维埃广场举行集会。列宁向示威群众发表了讲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25页）。发表讲话的还有斯维尔德洛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697、820。

[344] 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699。

[345] 《自由报》（《Die Freiheit》）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701、796。

[346] 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701、758、796。

[347] 指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6—8日）通过的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3—54页）。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224。——702。

[348] 《印刷工人报》（《 》）是受孟什维克影响的莫斯科印刷业工会的报纸，1918年12月8日创刊，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于1919年3月被查封。——704。

[349] 这里说的是当时匈牙利和瑞士的革命运动。

1918年10月30日深夜，匈牙利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果政权落入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以米·卡罗伊为首的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引起劳动群众的极大不满，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另一方面，在匈牙利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各资产阶级政党为召开立宪会议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匈牙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20日正式成立后，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党的威信和声望迅速提高。原先由社会民主党人掌握的苏维埃逐渐转到共产党方面来。1919年3月20日，卡罗伊政府在

内外交困中辞职。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当时的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月21日，布达佩斯工人占领了该市所有的战略据点，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同一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1917—1919年间，瑞士工人运动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日趋高涨。1917年11月15日，苏黎世举行了庆祝俄国革命的群众大会。会后，工人们喊着“决不再给交战国提供炮弹！”的口号，唱着《国际歌》，直奔两个弹药厂，迫使这两个工厂关闭。11月17日，要求释放被捕同志的工人在苏黎世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筑起街垒，政府调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群众，全市宣布戒严。政府的迫害并未能阻止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1918年爆发了反对提高食品价格的群众性经济罢工，斗争持续了好几个月。同年11月，瑞士爆发了支持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总罢工。在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情况下，瑞士社会党左翼革命分子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706。

^[350]指载于1918年11月18日《红旗报》第3号的罗·卢森堡的《开端》一文。——706。

^[351]这是列宁在主持起草俄共（布）纲领的过程中写下的一些文稿。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他在3月26日（4月8日）以前写的《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中拟订了修改党纲的具体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56—57页），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修改党纲的任务。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列宁为会议起草的《党纲的理论、政治及其他一些部分的修改草案》（同上，第474—478页）以长条样的形式分发给了与会代表。会议就列宁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通过决议，指出了修改党纲的必要性，规定了修改的方针。会议还委托中央为第六次代表大会拟出党纲草案。会后不久，1917年6月，列宁根据中央的建议出版了小册子《修改党纲的材料》（同上，第472—493页）。差不多与此同时，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也出版了文集《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的党纲。大会还委托中央就修改党纲问题组织尽可能广泛的讨论。1917年夏秋，党内展开了理论争论。同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对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和莫斯科区域局的文集作了分析和批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召开的制定党纲的专门代表大会，曾定于10月17日（30日）举行。10月5日（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修改党纲的委员会。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这个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月24日（2月6日），中央决定委托一个新的委员会在列宁领导下制定新的纲领。列宁写了《党纲草案草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6—71页），作为讨论材料发给了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有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伊·布哈林、列·波·加米涅夫和列·达·托洛茨基参加的七人委员会，并责成它遵照大会通过的决议来制定党纲的最终草案。委员会于1919年2月完成了工作任务。2月25—27日，《真理报》公布了《俄共（布）纲领草

案》。——715。

[352] 共耕社是苏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的形式之一。在共耕社里，集体劳动只限于耕地和播种，其余农活由农民个人分别完成。共耕社社员保有农具和自己那份土地上的产品的私有权。有时小的村社全社改行共同耕地和播种，就成了共耕社。——731。

[353] 列宁在这里提出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权载入了 1936 年苏联宪法，而在此以前苏联只有劳动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劳动的剥削阶级没有这种权利。——737。

[354] 这一段话经过修改列入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成为《在一般政治方面》这一部分的第 5 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407 页）。——738。

[355] 这一段话全文列入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成为《民族关系方面》这一部分的第 4 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409 页）。——740。

[356] 党纲草案的经济部分的这一条在初稿中是第 3 条。后来列宁对它作了街拐需模 5 * 8 条。这一条后来稍加修改列为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的经济部分的第 8 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416—417 页）。——747。

[357] 工人协助委员会即工人协助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于 1919 年 2 月设立的，直属农业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任务是：派遣有组织经验的工人到省、区的国营农场管理局和各个国营农场，协助组织农业工会；吸收工业无产阶级参加农业工作，协助国营农场装置各种技术设备，以满足国营农场及其附近的农民的需要。委员会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组成。1921 年，工人协助委员会和全俄中央军事粮食局合并为一个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农业粮食局。——751。

[358] 这里选收了列宁有关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两件文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 1919 年 3 月 18—23 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 301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102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 313766 名党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纲领；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纲领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列宁的党纲草案，但是鉴于委员会内存在分歧，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党纲问题作报告的除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外，还有代表少数派的尼·伊·布哈林。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而只限于论述纯粹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布哈林和格·列·皮达可夫还提议把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观点。代表大会先基本通过党纲草案，然后在纲领委员会对草案作了最后审订以后于 3 月 22 日予以批准。《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附录》中载有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纲领全文。

代表大会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论证了党对

中农的新政策，即在依靠贫苦农民、对富农斗争并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工人阶级与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的政策。早在 1918 年 11 月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关于军事状况问题、关于党的军事政策问题、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大会上，所谓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他们维护游击主义残余，否认吸收旧的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同时也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轻视军队中党的领导的行为以及他的老爷作风和独裁者派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列宁的论点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反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集团，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建党原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即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代表大会选出了由 19 名委员和 8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753。

[359] 协约国（三国协约）是 1907 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 20 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759、789、805、837。

[360] 莫斯卡里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759。

[361] 指 1919 年 3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谈判。

1918 年巴什基尔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军侵占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巴什基尔政府曾宣布边疆区自治，并成立军队对红军作战。1919 年 1 月底，在红军胜利推进和亚·瓦·高尔察克取消巴什基尔自治的形势下，巴什基尔政府害怕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乃开始同乌法革命委员会谈判。苏维埃政府当即表示在建立反对高尔察克军队的统一战线条件下，保证巴什基尔民族自由。1919 年 3 月 16 日，俄共（布）中央讨论了巴什基尔问题，决定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同巴什基尔人进行谈判。3 月 20 日，双方签订了《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巴什基尔政府关于巴什基尔实行苏维埃自治的协议》。协议规定根据苏维埃宪法组织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并确定了共和国的疆界和行政区划。协议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于 1919 年 3 月 2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759。

[362] 毛拉是阿拉伯语中“主人”一词的音译，是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在俄国，毛拉是指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主持人。——760。

[363] 指 1917 年 12 月 18 日（31 日）列宁签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非宗教婚姻、关于子女和关于建立户籍簿的法令》（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247—249 页）。——760。

[364] 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于 1918 年 11 月 11 日建立，是波兰成立最早

的苏维埃之一。当时德奥占领军正从波兰撤退。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波兰各城市先后成立了 100 多个苏维埃，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左派”（两者后来合并为波兰共产党）和华沙工会理事会发起组织的，成立后通过了在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厂委员会并同企业主的总工行为进行斗争等决定。波兰的妥协派政党——波兰社会党、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崩得为了对抗革命的苏维埃，也成立了各自的苏维埃。1918 年 12 月进行了统一的苏维埃的选举，结果妥协派获得多数。在统一的苏维埃内，共产党人和妥协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妥协派企图分裂苏维埃；1919 年 6 月，波兰社会党的代表退出了华沙苏维埃及其他城市的苏维埃。1919 年夏天，波兰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妥协派政党的首领联合起来摧毁了苏维埃。——762。

[365]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于 1919 年 3 月 19 日在代表大会上通过，3 月 20 日在《真理报》发表，全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分册第 581—582 页。——764。

[366] 《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是苏俄人民委员会于 1919 年 3 月 16 日通过的，3 月 20 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60 号。列宁直接参加了这个法令的制定。法令规定：城乡一切合作社都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当地所有居民都加入这个公社；每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公社的社员并在它的一个分配站注册；各地方消费公社联合为省消费合作总社，各消费合作总社的统一中心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列宁早在 1917 年底就起草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本卷第 384—385 页）。参看注 205。——764。

[367] 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即土地问题小组，是在 1919 年 3 月 18 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该小组于 3 月 20、21、22 日开过三次会，听取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报告和工人征粮队在农村中的工作的报告，选举了提纲审查委员会。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起草、列宁审订的关于农村的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提纲，由农村工作问题小组基本通过，交提纲审查委员会审订，最后被代表大会批准。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是代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作的。——773。

[368] 1919 年 3 月 22 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到了俄国，正在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委托列宁以大会的名义发出了贺电（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77 页）。

1918 年 10 月 30 日深夜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激进派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应付内部和外部困难，于 1919 年 3 月 20 日辞职，并建议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织政府。但是在当时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当时还在狱中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签订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同时决定两党在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并，改称匈牙利社会党。3 月 21 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匈牙利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革命政府委员会组成，社会民主党人加尔拜·山多尔任主席，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参看注 349。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如实行工业企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和对外贸易的垄断，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大农场，把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 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为保卫共和国建立了红军。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没有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从 4 月起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在困难局势下，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同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1919 年 8 月 1 日，匈牙利革命政府委员会被迫辞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 133 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被扼杀。匈牙利反革命随即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列宁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评述，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本卷第 834—838 页）以及《政论家短评》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8 卷第 141—152 页和第 39 卷第 235—241 页）。——776、834。

[369] 指 1919 年 2 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1919 年 2 月 14 日发表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条例是在 1918 年 12 月举行的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基础上制定的，列宁直接参加了制定该条例的工作，并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作过报告。条例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规定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见《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政策（1917—1918 年）》1954 年俄文版第 417—431 页）。——778。

[370] 指 1899 年出版的卡·考茨基的著作《土地问题》。——779。

[371] 下诺夫哥罗德党组织的代表就这个问题向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递交一项声明，其中说，《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中“全体中等农民”这几个字是印刷错误，应为“一部分中等农民”。声明同时表示“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组织完全拥护列宁同志在对待中农问题上所表明的观点，并加以贯彻执行”。——781。

[372] 征粮队是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征购粮食的工作队。早在 1917 年 11 月，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就曾派出征粮队到产粮省份。1918 年 5 月 27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法令规定，在地方粮食机关之下建立工人征粮队，这些征粮队多数是武装的。1918 年夏，在国内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征粮队开始具有群众性。大的工会、工厂委员会、县市苏维埃都可成立征粮队。征粮队只能按固定价格购粮或征用富农总工分子的粮食。征粮队所征购的粮食一半归派出征粮队的单位支配，一半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征粮队分属征粮军和全俄中央军事粮食局两系统，1918 年 11 月有 72000 人，1919—1920 年在 55000 人到 82000 人之间。征粮队在对贫苦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制止富农对收购粮食总工和实行余粮收集制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征粮队于 1921 年撤销。——788。

[373] 《时报》（《Le Temp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61—1942 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映法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法国外交部的机关报。——789。

[374] 这里选收的是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19 年 5 月 6—19 日在莫斯科举行，约有 800 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的讲话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目前形势与社会教育的报告。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分组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报告。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决议；通过了关于必须颁布扫除文盲法令、关于建立国家的社会教育机构基本体系、关于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社会教育司的工作从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专门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的专门决议。——798。

[375] 《永远前进报》（《 ！ 》）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 1918 年 5 月 10 日被查封的《前进报》。《永远前进报》于 1918 年 5 月 14 日出了 1 号，1919 年 1 月 22 日—2 月 25 日继续出版。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查封。——799。

[376] 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 1919 年 2 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参看注 342）。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斯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 1914 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 年 2 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 年 5 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802。

[377] 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所有；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 50 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802。

[378] 发表在 1919 年 5 月 13 日《真理报》第 101 号上的尔·格尔曼诺夫的《从克伦斯基向后退》一文，摘引了瓦·弗·舍尔的提纲《合作社在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舍尔在提纲中提出，为了尽快消除粮食危机，必须采取以下的经济措施：坚决实行一切定量商品的自由贸易；放弃垄断制度，有步骤地把自由贸易扩大到一切粮食产品；使农民享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在农村停止实行征集和没收；以农民的农业组织同工人、市民的组织间的自由协商来代替固定价格；立即缩减并在以后取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收购机构。——818。

[379] 可能是指 1919 年 4 月 15 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第 181 号刊登的卡·考茨基在全德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由他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代为宣读）。——820。

[380] 国防委员会（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贯彻它在 1918 年 9 月 2 日颁发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法令而于 1918 年 11 月 30 日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的非常最高机关，有动员人力物力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全权。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和机关、全体

公民都必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防委员会是组织共和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工作都处于它的严格监督之下。列宁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初，国防委员会改组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其任务是指导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的活动。劳动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37年4月。——820。

^[381]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824。

